我心中的人物

李 锐著

京）

本书中所收录的人物

他们都是大小不等的历史人物

他们同我有过

各种各样的接触

和深浅不同的关系

我从一个侧面或点滴事迹中

如实写下了他们的言行风貌

我觉得

从这些人物身上

确实能看到本世纪

中国剧烈变化的种种动态

硝烟和血腥

战斗和创作，苦难和欢乐

错误和正确

失败和成功，后退和前进

黑暗和光明

人物与历史紧紧结合在一起

这些，相信读者跟我是有同感的

ISBN 7-108-00136-5

9 787108 001368 >

ISBN 7-108-00136-5/I・150 定价 19.50 元

登录号 089014
分类号 I26
种次号 071

我心中的人物

李锐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石油大学图书馆（北京）藏书
0087 6797
20082332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心中的人物/李锐著.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9
ISBN 7－108－0013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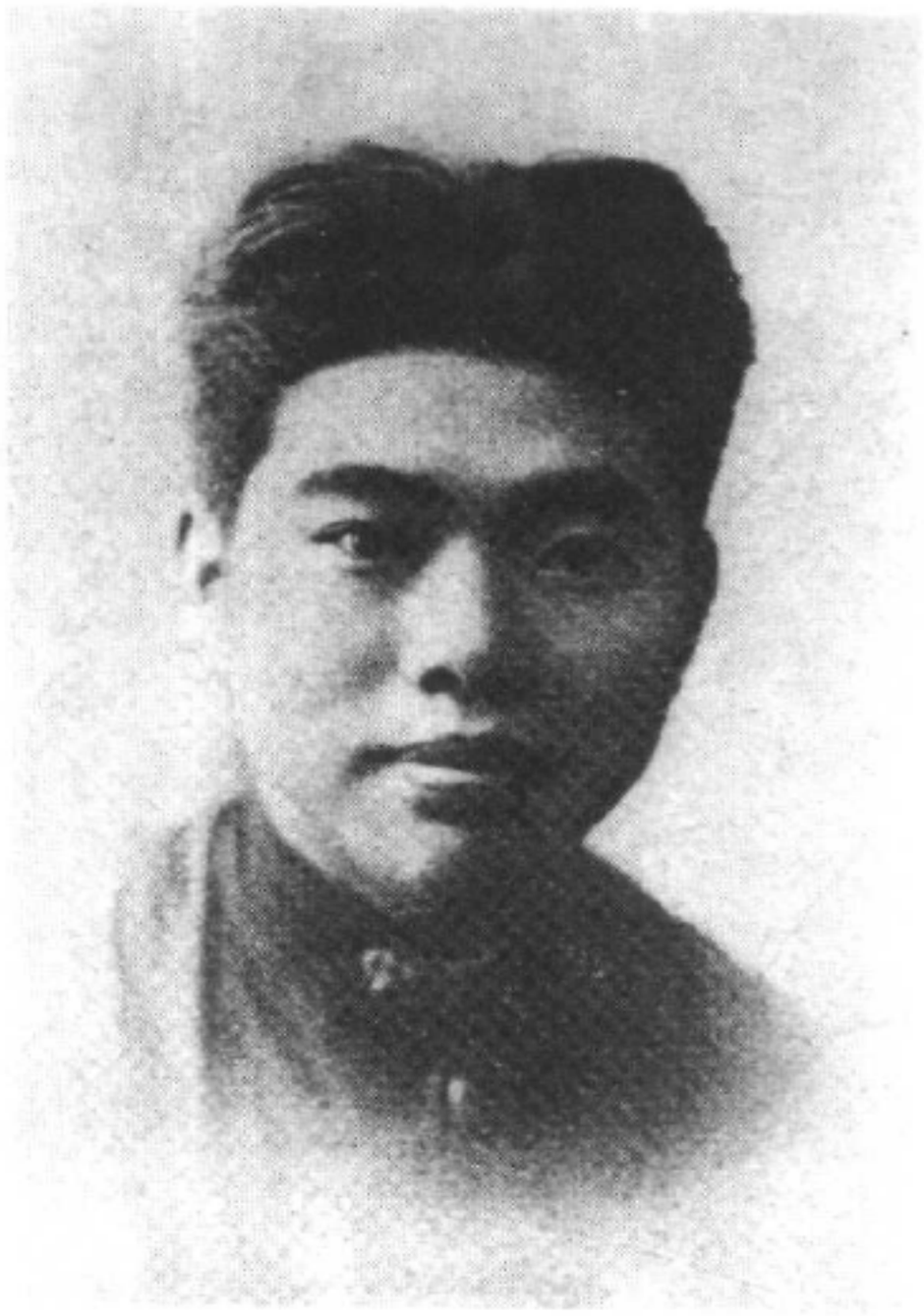
Ⅰ.我… Ⅱ.李… Ⅲ.日记体小说－中国－当代 Ⅳ.I24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4)第 14064 号

责任编辑 尹选波
封面设计 海 洋
出版发行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通县觅子店印刷厂
版 次 1996 年 9 月第 1 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2.875
字 数 289 千字
印 数 0,001—3,000 册
定 价 19.50 元

郭亮　（二十年代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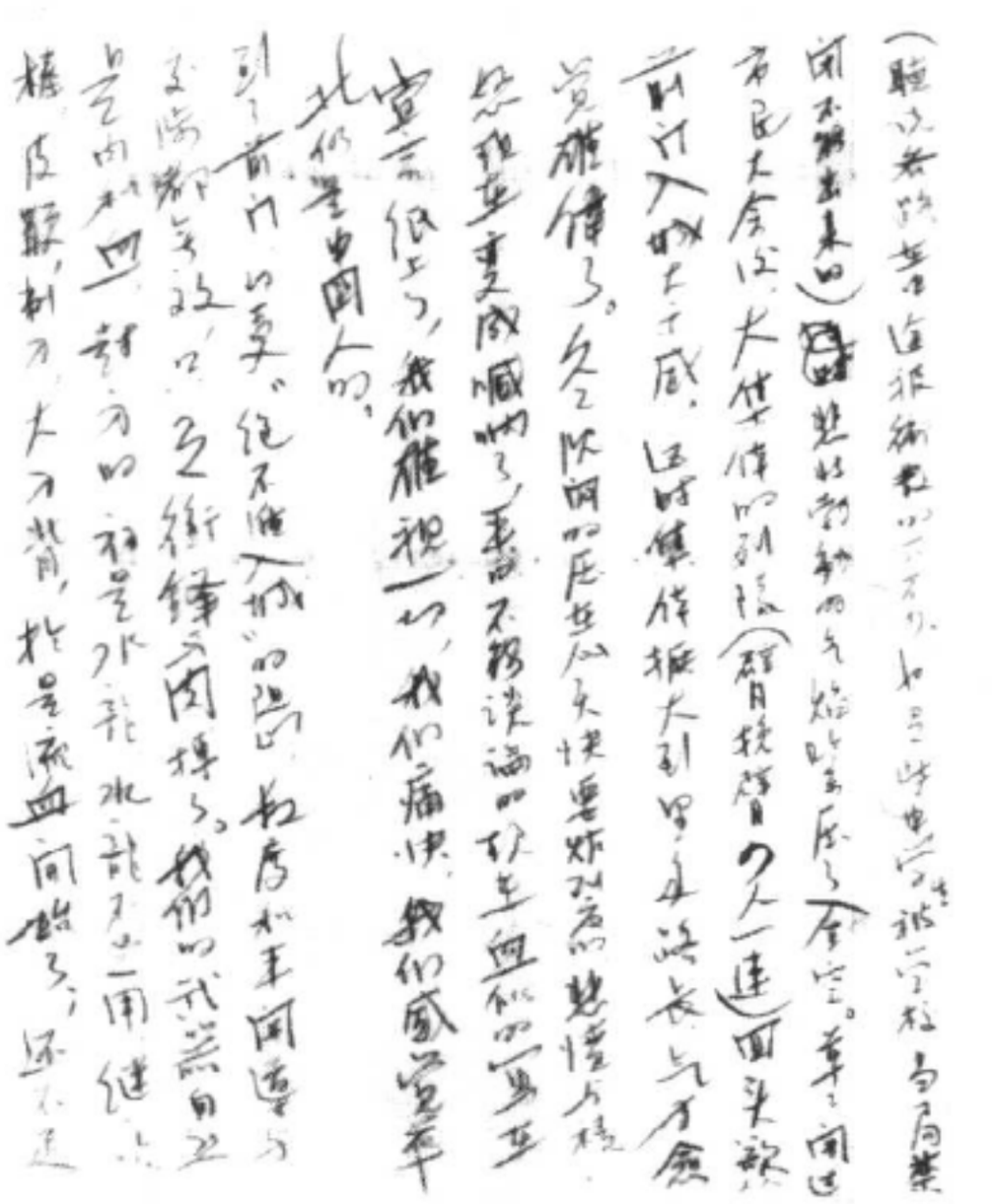
涂正坤　（1938 年）



何斌　（1933 年）

文立徵(右)和本书作者在汉口　(1936 年 1 月)

谢文耀在鲁西南　(1947 年 8 月)



文立徵手迹(一二·九运动时给弟弟的信,介绍游行示威情况)

胡　筠　（1925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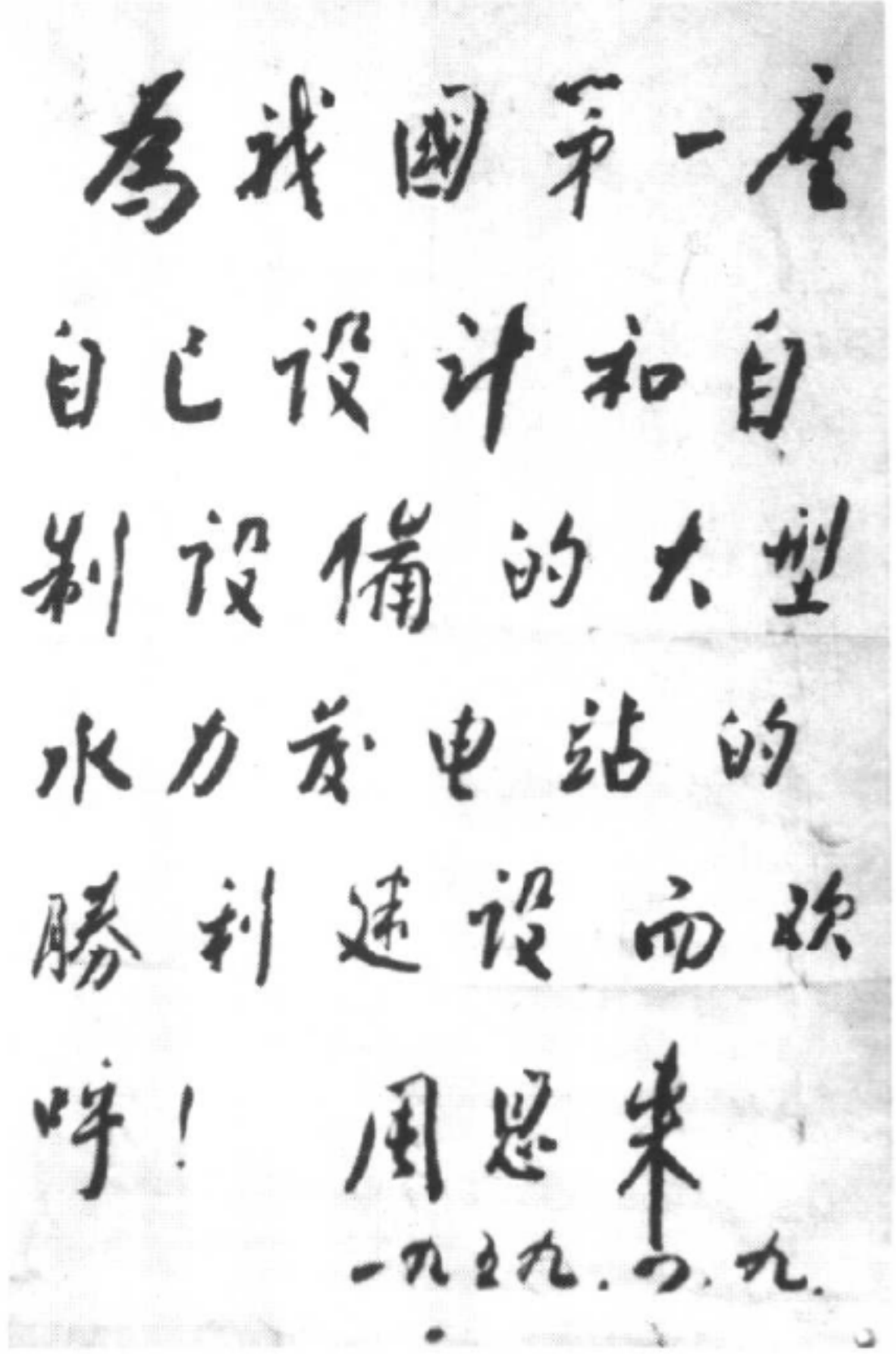
彭德怀　（1955 年）

黄克诚　（1953 年）

张闻天在庐山　（1959 年 6 月 30 日）

周恩来(右)和本书作者观看三峡水利设计图　(1958 年 3 月)

周小舟　(1951 年 9 月)



周恩来为新安江水电站题辞
(1959 年 4 月 9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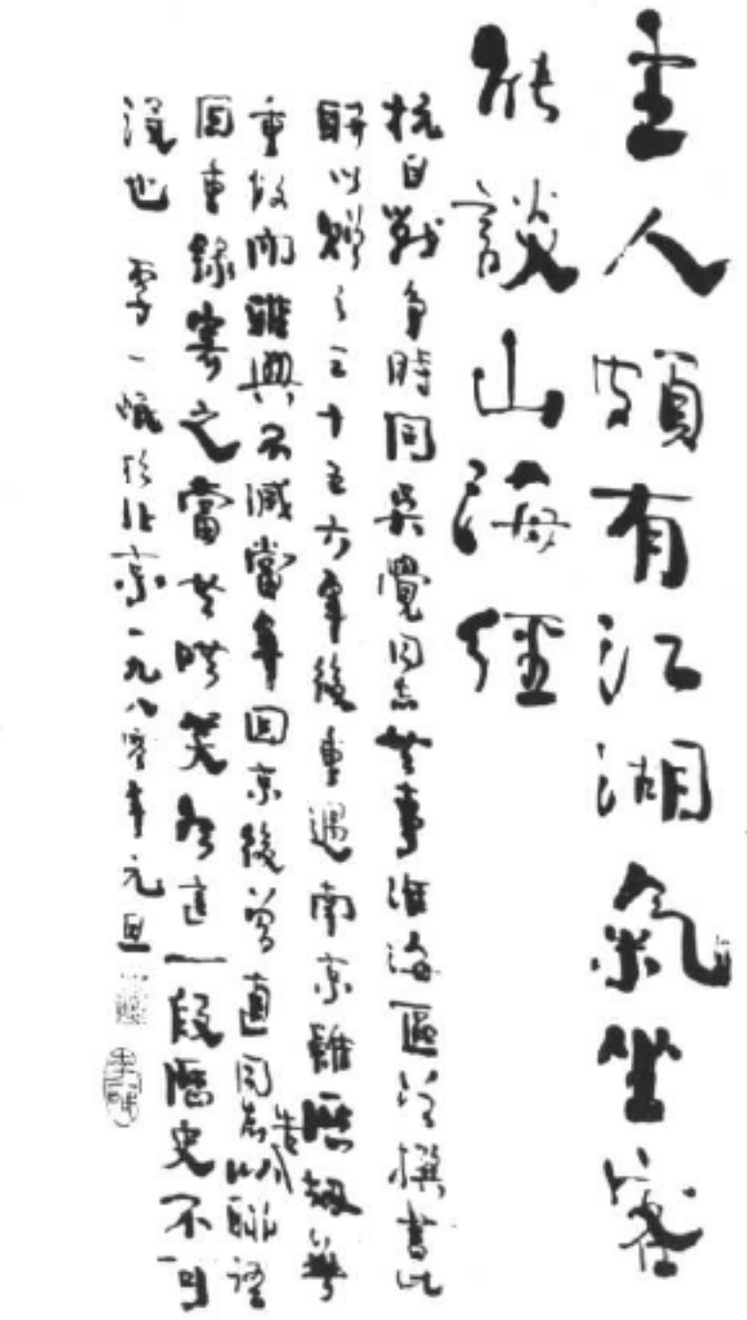
胡耀邦(左)与本书作者长谈　(1989 年 4 月 5 日)

陆兰秀　(解放初在北京)

陆兰秀　(解放初在北京)

田家英　（1959 年夏）

吴　觉　（1979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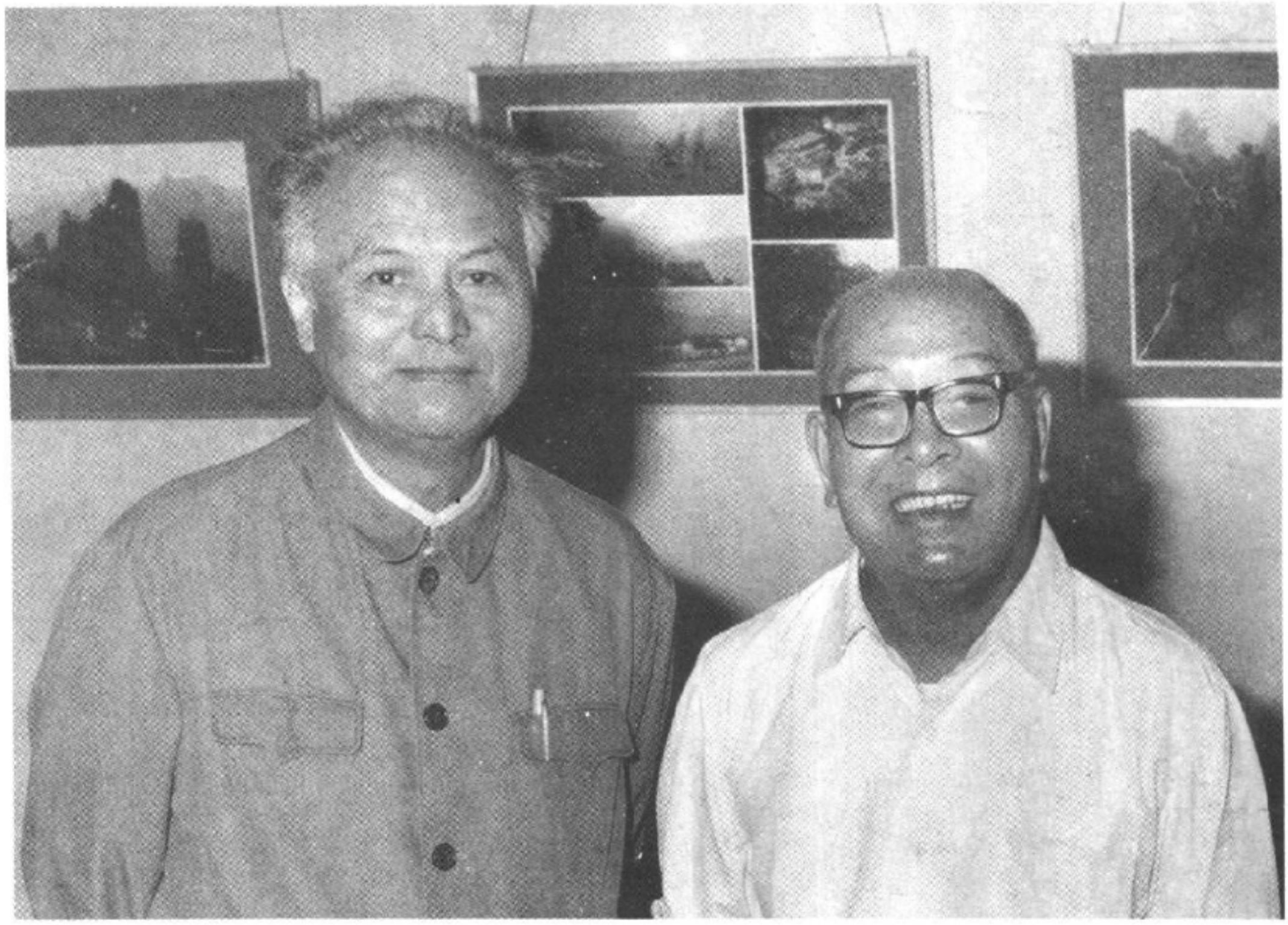


李一氓题字赠吴觉

李六如在修改《六十年的变迁》（1956 年）

郭子化在书房（1963 年）

刘澜波（1980 年）



黎　澍(右)和本书作者　(1984 年)

甘祖昌　(年代不详)

钱宗仁在胡杨树前　(1984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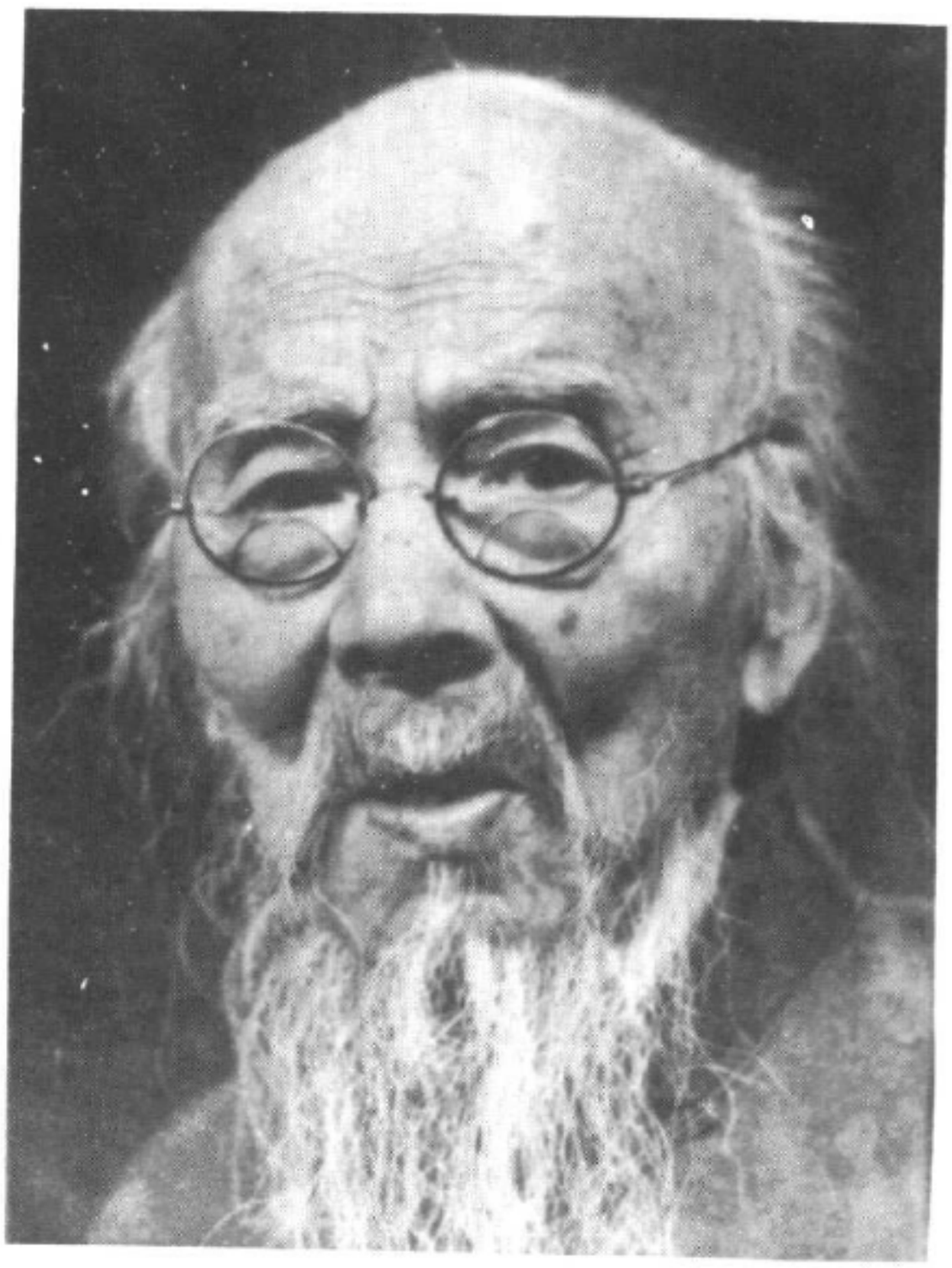
丁　玲(右)和本书作者　(1983 年)

沈毓珂(左)与康克清(右)谈话　(1991 年)

钱宗仁在学习　(1984 年)

宋教仁　(1904 年)

李积芳　（1917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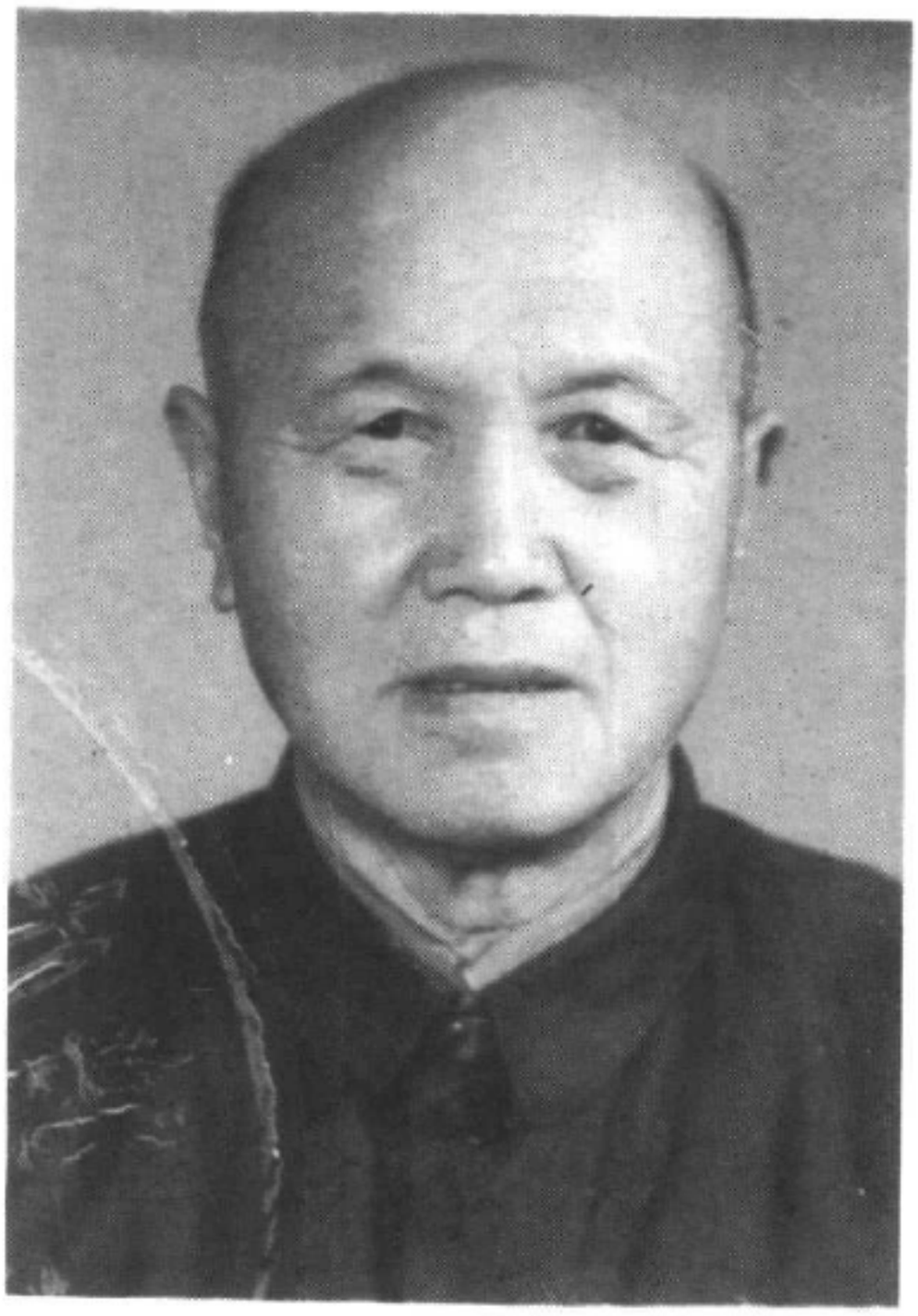
齐白石　（五十年代）

范寿康(右)和本书作者　(1982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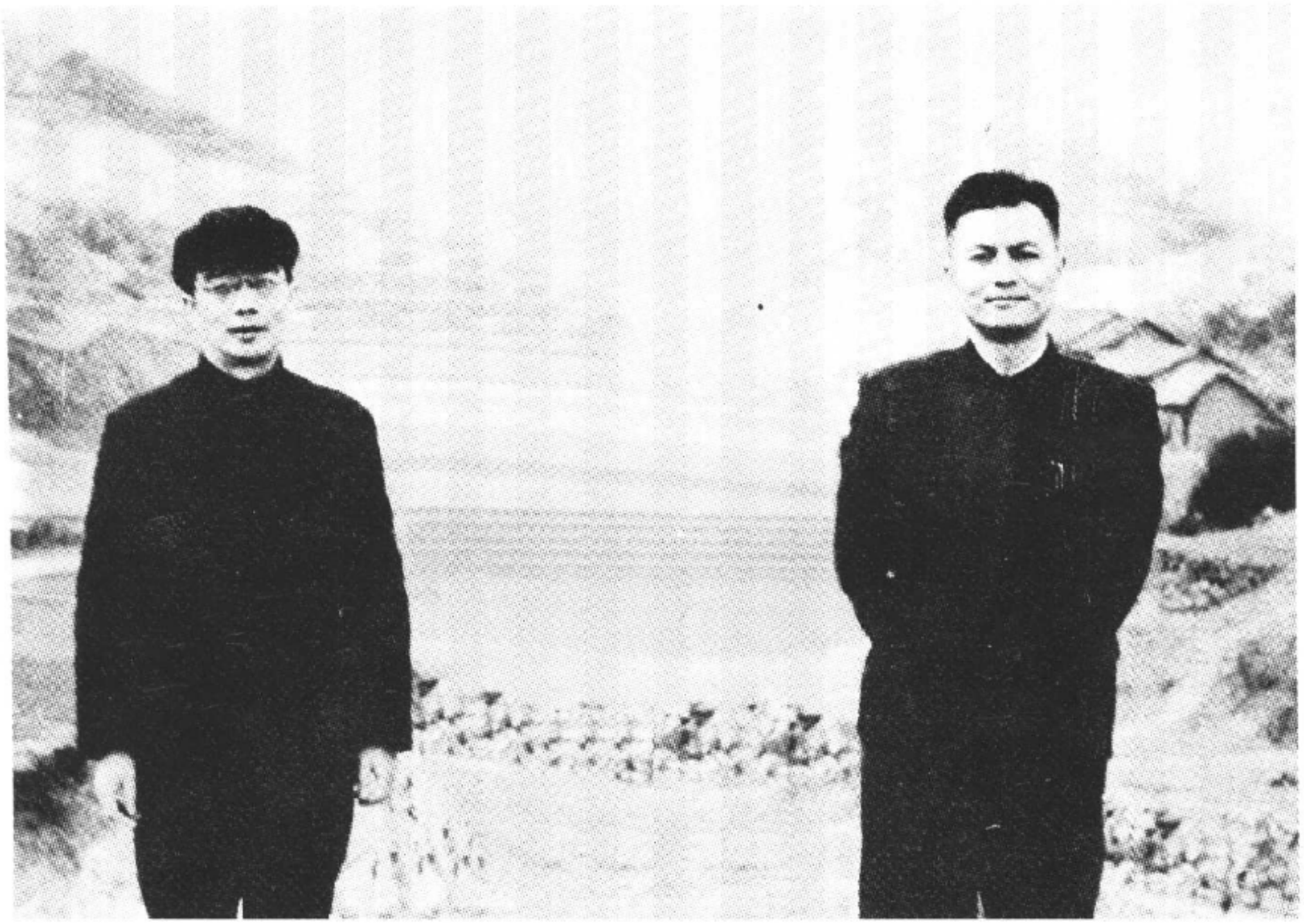
何炳麟

陈润霖校长遗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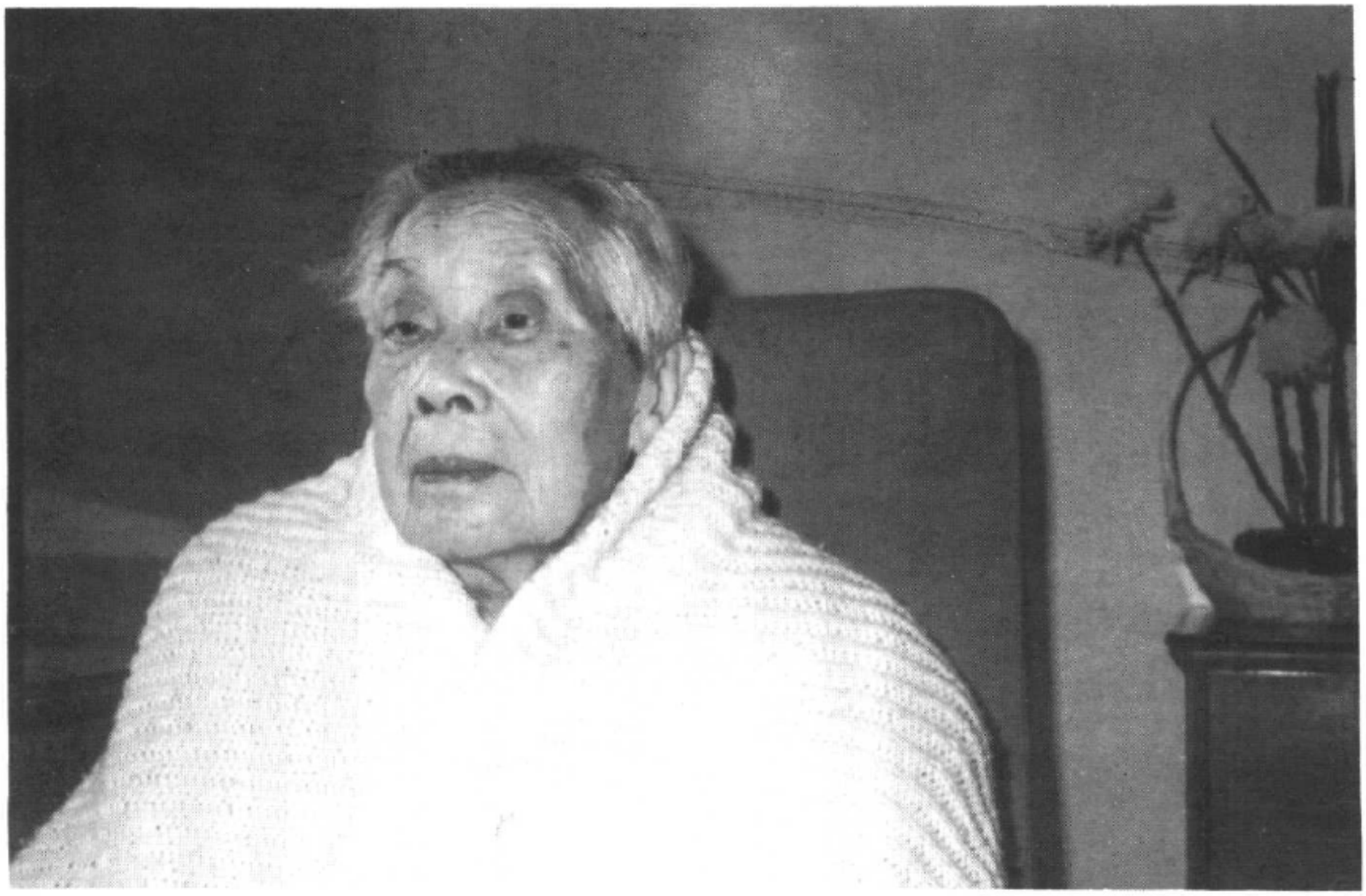
傅任敢(左)及妻子(右)



方宗岱 (1980 年)



张昌龄(右)与本书作者勘查三峡　(1956 年)



帅孟奇在医院　(1993 年)

本书作者(前排右第二人)为帅孟奇(前排左第二人)祝寿　(1992 年 1 月 3 日)

目　　录

1 前记
3 记郭亮
17 记胡筠
33 悼念涂正坤
38 纪念何斌
44 想念你啊，文立徽
54 文立徽烈士二题
104 忆谢文耀

116 读《彭德怀自述》
126 一辈子讲真话的人
——我认识的黄克诚同志
140 重读张闻天的《庐山发言》
155 实事求是，何惜乌纱
——怀念周小舟同志

161 总理在我心中
168 活在人心便永生：悼念耀邦

174 千万不要忘记陆兰秀
——为陆兰秀传记作的序言
184 怀念田家英
192 忆六如老伯
209 忆吴觉
224 怀郭子化
228 一个在晚年大放光芒的人
——怀念刘澜波同志
238 怀丁玲
248 最后一天的书案——哭黎澍
257 记甘祖昌将军
261 记沈毓珂

265 请读《胡杨泪》
281 《胡杨泪尽》序

286 纪念宋教仁
290 我的父亲
304 纪念齐白石
309 怀念范寿康先生
317 纪念何炳麟先生
322 楚怡校长陈润霖先生
——序《教育家陈润霖生平事略》
325 一个献身教育事业的人
——记傅任敢教授

358 一位敢讲真话的老专家
——怀念老同学泥沙专家方宗岱
369 缅怀张昌龄总工程师
373 为帅大姐祝寿(二篇)

[附录]
381 缅怀先烈，启迪后人
——《平江人民革命史》序
388 老区平江县至今还很贫困

398 《怀念廿篇》序言
400 《怀念廿篇》后记

前　记

本书前身是《怀念十篇》和《怀念廿篇》，因此将后者的序言与后记附于书尾，以便读者知其来源，为什么作者要写出这些篇章。

我们生活在人类历史变化最剧烈的二十世纪。前半个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伴随着的革命运动，曾经震撼了整个世界；后半个世纪的冷战中，大小热战也从未止息，苏联与东欧的剧变使得世界更加变化莫测。不论世界的矛盾与斗争似永无止境，相信人类终将学会在和平与发展的大环境中曲折前进。我们中国在这个世纪中，无论革命与战争，和平与发展，都扮演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新中国比旧中国已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尽管我们还比较贫穷和落后，但我们在世界上尤其在东方已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国家，我们已昂然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们代表了人类历史美好向往的一种方向。经过了二十年"左"的大折腾，我们正在脚踏实地一步一步朝这个方向走去；没有失去美好信念的各国有识之士，都在关注着我们的一举一动、所作所为。

历史是由人写的，尤其是风云人物；人与史是分不开的，尤其在剧烈变化的年代。因此，历史人物或具有一定历史代表性的人物，不论伟大或平凡，他们的事迹哪怕点点滴滴，都为世人

所关注，容易引起读者的兴趣。本书中所收录的人物，他们都是大小不等的历史人物，他们同我有过各种各样的接触和深浅不同的关系，我从一个侧面或点滴事迹中，如实写下了他们的言行风貌。我觉得，从这些人物身上，确实能看到本世纪中国剧烈变化的种种动态：硝烟和血腥，战斗和创伤，苦难和欢乐，错误和正确，失败和成功，后退和前进，黑暗和光明，人物与历史紧紧结合在一起。这些，相信读者跟我是有同感的。

从《怀念十篇》起，三联书店一直重视我这本小书，现在又愿意将我近年写的有关十来篇文章，编入书中，并换了这个更确切的书名出版。这使我十分感激并受到鼓舞，因为现在出书甚难，许多学术性的好书都难以及时问世。

原来的二十篇，大体按写作时序编排，现在有所归类分列，并抽出《毛泽东的学生时代》，因此篇已作为代序编入作者《毛泽东的早年读书生活》一书。这些文章都曾在报刊发表过。《怀念廿篇》的写作背景，在“后记”中都略有交代，现在新编入的各篇就从略了。此书三个版本，相隔的时间是四年和五年，如果我能活到 2000 年，会不会有第四个版本呢？

作　者

1993 年 3 月 15 日

记　郭　亮

1

二十四年前的今天，1928 年 3 月 29 日黎明之前，郭亮被国民党反动政府杀害于长沙司门口。

郭亮是 3 月 27 日深夜在岳阳被捕的；28 日下午 4 点钟左右，被戴上脚镣手铐押到长沙。他坐在人力车上；街上的人都看得很清楚：这是省总工会委员长。立时全城就传开了这个消息。到达“铲共法院”的监狱后，他看见全院惶惶不安，监狱门口围得水泄不通，就对狱吏说：“不要怕，我如果沿途交代几句，这法院就会不得了。”用阴谋残忍手段夺得政权的国民党军阀，这时惊魂未定，马上宣布特别戒严，如临大敌；他们害怕群众暴动劫狱，就在 28 日午夜以后，偷偷地将郭亮杀了。

郭亮，这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湖南全省人民群众最亲切的、也是反革命分子最恐惧的一个名字。

3 月 29 日的白天，国民党反动政府将这位二十八岁的共产党员的头颅和尸体，放在闹市中心司门口示众；后来并将他的头颅挂到他的家乡——他最初从事工人运动的长沙铜官示众。3 月 29 日这天，另外还有八个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在教育会坪被杀害，他们的尸体也同样示众。可是这种“示众”，同屠夫们的打算恰恰相反：不仅未能造成恐怖与慑伏，反而成为人民英雄的品

格的宣传，成为坚不可摧的共产主义事业的示威。

关于郭亮与另外八个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的被杀害和示众，鲁迅曾怀着极其沉重和愤慨的心情写过两篇杂感（《头》和《铲共大观》，载《三闲集》）。下面是《铲共大观》文中抄下的当时《申报》的新闻：

……是日执行之后，因马（淑纯，十六岁；志纯，十四岁）傅（凤君，二十四岁）三犯，系属女性，全城男女往观者，终日人山人海，拥挤不通。加以共魁郭亮之首级，又悬之司门口示众，往观者更众。司门口、八角亭一带之交通为之断绝……

鲁迅先生这样写道："革命被头挂退的事是很少有的！"

《申报》记者把当时长沙的群众都写成看热闹的人，其实，无数的工人和学生是怀着悲愤，挤到司门口去向他们的领袖告别。后来在铜官，更有许多工人不顾一切到郭亮的家中致哀，并且冒险偷埋好他们最可敬的朋友的头颅——这一颗英雄的种子。

2

人们都知道，蒋介石曾用最野蛮的屠杀来对付共产党人，企图杀绝共产党人。"马日事变"之后，那是一个何等突然而来的黑暗时期。长沙的教育会坪和识字岭等处，终年血迹不干。但是，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郭亮在牺牲之前，就是这样的共

产党员，他不愧为毛泽东最早的学生和战友。

郭亮在岳阳被捕后，即由国民党军分校的一连学生手枪队，专车押回长沙。在车上，他宣传革命理论，讲共产党员是抓不完、杀不绝的；这些学生被他讲得无言可答。押在“铲共法院”后，其他“犯人”见了他，都很紧张。其中有的同志几乎要喊出声来了，但马上被他的镇静和示意制住了。他谈笑自若地在狱中过了三四个钟头。审问时，他昂首说道：“我承认是总工会委员长郭亮，你们就可以杀了，不必多问！”审讯者还想追问党的组织，郭亮幽默地说道：“开眼尽是共产党人，闭眼没有一个。”

这就是当时传出至今仍一字不差地留在许多人的记忆中的郭亮的“口供”。

被杀害之前，他向他的妻子李灿英（解放后担任衡阳市妇联主任，1950 年 4 月逝世）写了几句激励来者的遗书：

灿英吾爱：

亮东奔西走，无家无国。我事毕矣。望善抚吾儿，以继余志！此嘱。

临死郭亮

这封遗书辗转送到上海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后来影印在秘密出刊的《烈士传》中。

3

郭亮号靖茄，长沙县铜官区西华乡射山冲文家坝（今属望城县）人，生于 1900 年。他 11 岁进铜官东山寺小学，后转学靖港

第四高小。1916 年考入长郡中学(现为长沙市第二中学);由于家庭经济困难,两年后休学,在家帮助哥哥种地。

在长郡读书时,他很善于写作;全校八百学生会考,他取第八名。《湖南通俗报》出版后,他曾投寄反映农民痛苦生活的文章。

"五四"运动期间,毛泽东在长沙创办《湘江评论》,给他的影响很大,使他开始有了明确的革命思想,更加仇恨这个丑恶的社会制度。1920 年,他考入第一师范第二部(专为小学教员进修设的,二年毕业)。这时毛泽东在一师附小当主事。郭亮很快就认识了这个他所敬重的人,并且立即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新民学会"。于是他读到各种宣传新思想的刊物、报纸以及有关社会主义的书籍,内中有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出版的《共产党》期刊。1920 年末或 1921 年初,他又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社会主义青年团。

这时的第一师范有与北京大学类似的情况:充满了青春的朝气,有一批进步的教员,学生组织的各种团体极多,自由研究的风气浓厚,社会主义思想公开传播,爱国情绪高涨,校内外社会活动频繁。

郭亮和夏曦(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湖南省委负责人之一,1935 年长征中牺牲)住在一个寝室。他们多半时间参加校外的革命活动,常常深夜不归,有时几天不上课。在毛泽东领导下,1921 年他们组织了长沙人力车工人的罢工。在这些初上战阵的活动当中,郭亮就已表现了他的极善于接近和鼓动群众的才能。

这个刚过二十岁的青年学生,已经成了坚强的活跃的共产主义的革命战士和工人运动的领袖。

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以后，郭亮由毛泽东介绍入党，是湖南最早的党员之一。

4

1922 年在第一师范毕业后，郭亮就以全部身心投入了沸腾的工人运动。这一年正是全国也是湖南工人罢工的高潮年份。7 月，党派他到粤汉铁路的新河（长沙北门外）和岳州（即岳阳）站，做铁路工人的工作。他起初开办工人夜校，出版《工人之路》周刊。到 8、9 月间，粤汉铁路的长沙、新河、岳州和徐家棚四地，就先后成立了工人俱乐部。他自己担任新河和岳州工人俱乐部的秘书。

9 月上旬，为 了反击路局对工人俱乐部的破坏，并要求增加工资、改良待遇，他领导上述四个地方的铁路工人举行了罢工。

9 月 10 日，一列火车自武昌开到岳州。郭亮即率领工人横卧在铁轨上，阻止列车开行，他自己卧在距机车最近的地方。这样坚持了一天一夜以后，路局买通了军阀萧耀南的北军一个连，将工人一顿乱打乱杀，当场死六人，伤数十人。郭亮和其他二十多个工人被捕，押到武汉，监禁在“陆军监狱”。

这次罢工坚持了半个月，在湖南、武汉和全国工人的声援下获得全胜。

郭亮等人关了一个多月才被释放；其间，毛泽东曾通过各方面的活动来营救他出狱。

他回到长沙后，许多铁路工人和他们的家属都来慰问，一些妇女和老人对他说：你被抓去后，我们天天都为你求神拜佛。

5

1922 年,在毛泽东领导下,湖南有组织的工人达三万多人,单在长沙就成立了粤汉铁路、泥木、机械、理发、铅印、人力车等十几个工会。11 月 6 日,湖南工人统一的战斗组织——全省工团联合会成立了,毛泽东任总干事。郭亮是毛泽东最得力的助手之一。

1922 年的 12 月,他被派到他的故乡铜官,组织陶业工人。原因是长沙县加重了对陶业工人的盘剥。

郭亮去的时候带了一个"法宝"——"省长"赵恒惕颁布的"省宪法"。这个"宪法"是赵以"联省自治"之名,来维持自己的地盘的。可是这里面有"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自由"之类装点门面的条文,却为毛泽东紧紧抓住作合法斗争的武器,它逼使"赵省长"在工人组织工会和罢工等方面,也不得不一时作点让步。郭亮一到铜官,就在东山寺召开工人群众大会,根据"省宪法"来组织工会,坚决反对长沙县的苛捐杂税。工人们选他为工会的筹备主任,同时他创办了第一所工人子弟学校和工人夜校。

1923 年 3 月,在东山寺召开了三千多工人的大会,宣布正式成立铜官陶业工会,举行了盛大的游行示威。安源、水口山、长沙的纺织厂、铜元局、泥木、人力车等工会,都派了代表前来参加。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铜官工会是湖南全省最先进最有威势的工会之一。这个地方的党组织在全省也是站在前列的,培养出来许多优秀的工人干部。在抗日战争前夜,湖南的白

区工作中，只有这个地方还保留了一个以袁仲贤同志为首的特委的组织。

毛泽东于 1923 年离开湖南，郭亮继任工团联合会的总干事。党内他任省委委员兼工农部长；后来工农分为两部，他专做工人工作。

1923 年“二七”惨案以后，全国工人运动转入低潮，赵恒惕政府对群众革命运动的压迫摧残日紧。例如 1923 年 11 月曾武装镇压水口山工人，有一个工人被枪杀。但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湖南的革命力量依然日益发展壮大，工人运动尤其如此。

自“二七”惨案至 1926 年北伐军进入湖南这一个时期，郭亮所直接领导的工人运动的情况，在他自己所写的 1927 年 1 月出版的《湖南工人运动之过去与现在》中，有如下简略的叙述：

> ……湖南工人同遭厄运，集会结社，概被禁止，水口山矿工会及长沙各工会多被封闭，工人遭惨杀，工人运动饱受巨创。但革命的湖南工人运动，却并未因此而低落，公开的争斗，秘密的组合，曾不稍懈。“五卅”运动突起，全国工人阶级与帝国主义肉搏血战，湖南工人一致奋斗，工人组织数量增至七万余人。“五卅”运动被帝国主义、中国军阀打落一下，湖南不获幸免：如安源、水口山工人之遭惨杀，工会被解散；第一纱厂工会工人之被拘囚；长沙铅印工人罢工受压迫等等。但在此情形下，尚能扩大秘密组织，工会人数增至十一万人。在全国工人阶级反攻军阀的争斗中，驱逐赵恒

惕的运动再接再厉(按:赵恒惕于1926年3月13日,被革命群众力量赶出湖南——引者)。至北伐军入湘,安源、株萍、粤汉、长沙、醴陵、湘潭等地工人均努力参战,并竭力巩卫后方,成绩卓著。北伐军胜利,开国民革命发展之新局面,湖南工人组织也日益强大,至今日已达四十万人了。现在一面努力彻底铲除封建余孽,继续反抗帝国主义的工作;一面努力而迫切地从事于建设民主主义的新湖南的工作。

在这个期间,郭亮的活动并不限于工人运动,例如1923年长沙发生"六一"惨案,向日本帝国主义作斗争时,各群众团体联合组成的外交后援会即由他任主席。他还参加党员训练班的工作,选派成百的优秀工人干部到广州去……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前夜,郭亮就已经是湖南工人和广大革命群众所拥戴的群众领袖了。

1926年12月全省工人代表大会上,工团联合会发展为全省总工会,郭亮被全体出席代表一致选举为全省总工会的委员长,在党的"五大"上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7

在1926年到1927年这一段翻天覆地的轰轰烈烈的日子中,中国人民及其代表——共产党员的革命魄力和才能,有了一个飞跃的发展。

二十六、七岁的青年郭亮,这个不及中等身材的被同志们昵称为"郭矮公"的人,在湖南革命群众中享有极高的威信,他的名字真是妇孺皆知。他的令人心折的通俗的煽动的讲演,他的坚

089014

定的勇敢的对敌斗争的气概，他的朴实的联系群众的作风，普遍地深入地感染着千千万万的人。这时我是长沙楚怡小学五年级的学生，童子团的小队长。每次开大会，游行示威，下乡宣传，我都兴奋地参加，教育会坪开大会时，台上那个矮个儿讲演者的形象，至今留在记忆中。

当年曾同他在一起工作过的同志，都久久不能忘却他留下的深刻印象。我从这些同志处听说过的就很不少：

他平易近人，从不疾言厉色，讲话时总是诚恳地看着对方。他的谈话和指示工作，使人信服，使人不敢对他讲假话；谁反映的情况不真确，就会被他几句话戳穿。

他最会讲话，具有煽动的天才，非常吸引人，在群众大会上可以讲得不愿动的群众动起来。

他在总工会时，每天很多人来找他谈问题，每一件事他都亲自处理，都给对方一个答复。他做事很细心，很敏捷，从不拖拉。1927 年“五一”节游行，他事先检查，传单印不出来，他就告诉经办的人：“不要当买卖做；去和印刷厂的工人说，这是工人自己的事情。”结果如期印出了。

他精明强干，有巨大的工作精力。当时工人运动中许多宣言和文件都是他起草的，《湖南工人运动的过去和现在》那个小册子是两个通宵写成的。高文华同志告诉我，1926 年他在益阳做工人工作时，曾接过郭亮一封写了 11 张信纸的指示信。

他是一个勇敢而有智谋的人。1925 年 12 月，长沙的局势很紧张，有一次几个警察到工团联合会（在宝南街）来抓他。警察已到了楼下，他在楼上听见了，便布置成他根本不在家的样子，从窗口跳上邻家的屋顶，逃走了。

8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日子里，郭亮领导省总工会和内外反动派作了坚决的斗争。

汉口收回英租界的运动发生后，湖南英商企图用开除工人等办法扰乱我后方；总工会领导了对英商的总罢工，扩大经济绝交运动，使英国设在湖南的工商企业，完全陷于停顿。日商的日清公司、戴生昌轮船公司等处的买办也跑了，都由中国职工自己组织起来管理。

工人运动中最严重的问题，是原来在反帝爱国运动中与革命群众站在一起的工商界，这时抵制工人的适当改善待遇的合理要求，以停止营业为手段，使许多工人和店员失业；他们同时收买工贼，制造工会内部的纠纷，并故意提高货价，使社会对工人、店员不满。在外县，土豪劣绅与贪官污吏，也极力破坏工会，有的勾结团防、土匪、谋杀工会领袖。在总工会的领导下，全省广大工人群众团结起来，及时地给少数为首的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以应得的惩处。长沙粪码头一个封建把头，把持肥料，纠集流氓，惨杀工人，郭亮坚决主张要处理此人。后来他亲自主持"特别法庭"的公审大会，接受工人要求，当场判决了这个恶霸分子的死刑。

在《湖南工人运动的过去与现在》这个小册子的结尾，郭亮写道：

> 在帝国主义、封建余孽、资本家各方面围攻中的湖南工人，我们应如何救护这个革命的队伍，如何能使这个队伍扩

大并加强他的革命战斗力，这是目前湖南工人运动的严重问题。我们应该分析敌情，决定攻取，要用各种方法去教练工人，使个个工人都能知己知彼，向帝国主义及封建余孽一切反革命派，毫不妥协地进攻。同时叫醒资产阶级，要在打倒洋货的销场、取消苛捐杂税上去发展企业。更联合一切革命民众的势力，来完成国民革命。

郭亮在1926年驱逐赵恒惕运动时，就已深知武装工人的重要，北伐军未进入长沙时，工团联合会就组织了一千多工人成立保安队，维持城内秩序，并缴了叶开鑫残部一些枪支。后来这些武器虽被北伐军第八军收缴了，但工人仍暗地留下一些。

1926年12月全省工人代表大会上他所起草的重要决议之一——《工人武装自卫案》，曾这样明确地指出："统治阶级借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等为他们的武装，时刻向工人阶级进攻；工人阶级要想抵抗这种进攻，用和平的方法，磕头叩拜的哀求方法，以启发统治阶级之'仁爱性能'，是绝对没有希望的。列宁说：'要以武力方能打破武力。'本此，工人阶级不求自救则已，不然必须有武装自卫的组织，这个组织是十分迫切的需要。""工人阶级为要实现他所负担的革命的历史使命起见，非有武装组织不可……就以现在北伐期中而论，工人阶级的武装组织非常必要。"决议案并具体要求：首先给长沙的工人纠察总队发枪一千支，子弹十万发；各县市亦应从速组织武装纠察队。但是由于湖南省政府不肯批准工人武装的要求，加上陈独秀实行让步投降政策，对此还要横加指摘。郭亮就只好领导工人自己想办法。总工会每月的经费是很有限的，他仍用节余下来的钱，买了十二支短枪和八十支步枪，后来又通过各方面的活动弄来一百多支

步枪。因此在马日事变之前，长沙工人纠察总队算是掌握有二百多支步枪(总队部设在东长街，即现在蔡锷中路)。这个数目是太有限了。但是在马日事变的晚上，工人纠察总队幸而有这些枪，才能与许克祥部激战了一夜，才有可能在快黎明时撤退到河西。

郭亮也是在这晚深夜出城的。

9

5月下旬，为了反击敌人的白色恐怖，郭亮在长沙四郊和铜官一带活动，他组织的工农自卫军和湘东、湘南的农民武装一同围攻长沙。后来他还率领一百多人，袭击猴子石，并破坏过铁路。由于陈独秀的右倾投降路线，围攻长沙失败。随后他又潜伏在长沙、湘阴边界左家塅、谭家园、杨桥一带活动，组织工农武装。后来实在无法立足，才转到武汉，参加贺龙的部队，做政治工作。

“八一”南昌起义，郭亮也是参加者之一。起义失败，他随贺(龙)叶(挺)军进入广东。潮汕战役失败后，他与少数同志潜赴上海，找到党中央的关系。

1928年1月，党决定恢复湘鄂赣边平江、岳阳、湘阴、铜鼓、修水、蒲圻、通城、崇阳、咸宁等十几县的工作；长江局派郭亮任湘鄂赣边特委书记，调了二十多个干部先后在岳阳集合。他化装成农民，到岳阳建立特委的机关。

有六个干部先来，住在河街的一个旅馆里。郭亮来后，原来决定一天的下午5点钟到这个旅馆开会。但在开会前半点钟，这六个同志被捕了。8点钟，街头就贴出了“罪状”；郭亮9点钟

上街，看到这六个同志的血肉模糊的尸体横在路上。

在二十天当中，小小的岳阳城内被捕和遭屠杀的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达三十多人。

经过特委几个同志的努力，机关算是建立起来了。郭亮在街上租了间房子，并在河下预备了一只船。其他同志有的晚上到木筏上去睡。另外开了个饭铺，作特委的交通机关。

据当时和郭亮在一起工作的人说，他不同意盲目的报复行动，认为必须艰苦地耐心地来重新创建党的工作，有计划地打击敌人。

3月间，岳阳桂系驻军下级军官中的党员，由于暴露了身份，坚持起义，特委分出一大部力量——二十多个干部去领导这个起义（即岳阳麻塘起义，后来因未与地方农民运动结合，失败了）。这时特委和汉口长江局的联系中断。郭亮将所有的钱都交给参加起义的同志，他自己只留下一条一两多重的金链，想用它支持一时（附带说明，这就是郭亮被捕后，反动派在长沙报纸上大造谣言，说郭亮如何用金链子作裤带等的“根据”）。

郭亮的被捕，是由于派到长沙找湖南省委关系而被捕的叛徒苏先俊的告密。1930年红军攻入长沙时，将这个叛徒捕获处决了。

一个灿烂的春花怒放的生命，一个正走向成熟的革命家，突然夭折了！

这样的民族精华，真是死得太多了！太多了！

然而作为共产主义的精神和事业，所有的先烈们当然是没

有死的，他们永远作为一种动力活在我们的心里。不是吗，湖南人民谁能忘记郭亮呢？

郭亮在屠夫们的面前所写的“以继余志”的遗书，自然是借家书的形式，向我们全体共产党员和革命人民写的。但是也许大家仍不能不关心他的嫡亲后代。他的儿子生下时，取名“多难”；在国民党反动派斩草除根的政策下，“多难”在养育方面自然经过许多的困难，后来获得机会送到莫斯科学习去了。去年11月，湖南省委宣传部接到从抚顺寄来的一封信：

> 我是郭亮的儿子郭志成（多难），今年六月底才从莫斯科回国，现在在抚顺发电厂工作，当主任工程师。从乡下伯伯的来信，说是你们在搜集材料编订我父的事略；如果这件材料已经出版了，请寄给我一份。……虽然我是郭亮的儿子，可是我所知道的父亲的事略是很少的。

郭亮永远活在湖南人民的心中。

1952年3月

附记

七十年代初，在秦城狱中回忆到这篇小文时，作了下面这首七绝，特附于篇末：

北伐军来满地红，长沙谁不识英雄。
未闻革命悬头退，鲁迅声音夜半钟。

记　胡筠

在长沙读中学时，就常听见家乡来的人谈起胡筠和胡筠部队。胡筠在大革命前就读于平江启明女师，同我的一个姑母同学（我母亲是这个学校第一班毕业的）；姑母大革命时参加过革命活动，后来消极了。当年大家都很关心胡筠的情况，谈起来并没有敌意，反而怀着敬意。

1949年南下湖南工作的三年，我没有回过平江，只知道胡筠不在人世了，怎样死的不知其详，模糊听说是肃反中被杀的。当时的工作情况，也没有机会去接触这些往事。

今年2月17日，因《平江县志》最后定稿，来到长沙。我背了个县志"总纂"的名义，同约请的四位审稿人，以及多年主管县志编辑的同志和县委负责人一起，开了四天会，通过了最后的审定稿，并认真审阅和确定了"总述"的内容和写法。四位审稿的牵头和"总述"的执笔者李荣光，已年逾古稀，是胡筠的遗孤。他曾让我为平江的胡筠学校写过校名，这次又要我为胡筠纪念堂题词。于是吟得一绝并附跋语：

当年烽火鼓咚咚，幕阜山前一女雄。
动地惊天生与死，至今仍爱说芙蓉。

1927年夏，胡筠即在幕阜山地区组织游击队，家乡人民习惯称之为胡筠部队；彭德怀起义时，为平江党政主要负责人。当年民谣云："上打咚咚鼓，下打鼓咚咚，两边齐打鼓，中间接芙蓉。"胡筠与芙蓉谐音，又曾用名字芙蓉。苏区错误肃反中，1934年春被诬害，时为湘鄂赣省委负责人之一。

荣光知道我很想多了解他母亲的情况，给我送来一大叠材料，有县志的传略，书刊上的文章，何键政府《清乡公报》中的有关记载，以及几十人的访谈记录。这些谈话或访问记录，最早有延安整风时期的，最晚在八十年代初，内中有我认识的平江老将军张平凯、张令彬、吴溉之、钟伟等，有彭德怀、何长工、李聚奎等，还有同胡筠当年一起浴血战斗过的秘密交通员、司号员、游击队员、连长、连指导员、班长、战士、女兵们、省委秘书、地方干部、党校学员、油印员和家乡亲戚，以及大革命时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的几位女同学。这些谈话记录多是荣光夫妻(汤佩佑)多年奔波的成果。不论当年接触的深浅不同，被访问者谈起来都动感情，都深深怀念这位创建湘鄂赣红军的伟大女性。荣光还特意写了一份《对母亲的点滴回忆》，其中有他人不知的细节。翻完这些材料，心中久久不能平静，耳边似乎响起了这些谈话的声音，他们如此怀念着这位会打仗的女英雄，这朵芙蓉花！

平江在清末很出过一些留学日本的新派人物，地主绅商中也不乏这种人。胡筠的父亲做药材生意，往来省内和粤港，也当过省议员，有冒险开拓精神，有点民主思想。胡筠是掌上明珠，自幼在家中读书练武，十九岁出嫁时，嫁奁中有四杠书，乡中传为佳话。李姓夫家是北乡虹桥大地主，丈夫思想趋新，生了儿子后，还让胡筠进启明女师读书。胡筠在学校积极参加爱国活动，

在反对英国煤油起岸斗争中表现英勇。1922 年，平江就有了共产党人的活动，受李六如影响，由毛泽东、何叔衡介绍入党的余贲民，在启明任园艺主任。1925 年，胡筠即由余介绍入党。北伐战争时，她随叶挺团作宣传工作，随即到武汉，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的女生队，受到军事训练，参加过打夏斗寅的战争。1927 年 7 月，回到家乡组织游击队。丈夫这时退缩了，老人们当然更是对立。她毅然同这个美满的家庭决裂，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幼小的儿子。1928 年初，她带领游击队来到虹桥，召开群众大会，烧田契，分积谷，甚至把李家的房子也烧了。张令彬说："胡筠入党动机之纯，是首屈一指的。"何长工说："她是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候，冒着生命危险干革命的，白手起家闹革命的。"

怎样白手起家的呢？当过红军连指导员的李琪洲(1980 年七十九岁时)说，我的一个当过兵的叔叔带回家一支步枪，埋在地下，胡筠说服他，将枪起了出来；又从两个农民家中收集到两支；还让农会会员缴了三个散兵的枪，不久又缴了散兵一个排的枪；还派人打入敌军，带出八支枪。胡筠还收编过方长发的一支农民自发武装，方是屠夫出身，夜袭本乡警察所，得枪七支发展起来的；他爱吃狗肉，跑得又快，被昵称为狗队长。黄金洞金矿局矿警队长侯金武的一支起义队伍，叫他猴队长。还有朱平被叫着猪队长。胡筠曾长期带过这三个中队。这支游击队还带有上千人的梭镖队。胡筠常站的操坪台上，用喇叭喊操令，训练这支队伍。1928 年 3 月，平江四乡号称十万农民武装进攻县城，胡筠带的队伍曾攻入北街，同敌人展开巷战。扑城失败后，湖南反动政府声称"平江无人不共"，要"血洗平江"。县委书记毛简青和宣传部长到中央汇报去了；组织部长罗纳川、青年团书记朱

璋惨遭杀害，军事部长跑了，无数党员和群众死于敌人屠刀。胡筠化装成农妇，在深山中同敌人周旋，夜里提着马灯，寻找失散的同志。敌人四处搜山放火，游击队伍一夜转移几次，以野菜山果充饥。胡筠与李宗白、张警吾等成立新的县委，她为主要负责人。彭德怀起义前，她先入城取得联系。起义胜利的群众大会上，宣布成立县苏维埃政府时，胡筠被选为县苏主席。1928 年 10 月，湘鄂赣特委成立时，滕代远任特委书记，胡筠为常委。此后她即带领一支队伍，转战幕阜山区。直到 1930 年打入长沙时，这两年多的艰苦游击战，访谈回忆的材料很多。

这里先介绍当年的女兵、当过小队长的余伟大校，所谈 1927 年下半年的情况。她说，当时游击队的枪很少，梭镖大刀是主要武器，胡筠教我们自制武器，“烧旺火”，放竹炮，打手榴弹。楠竹节内灌上爆竹、硭硝、硫磺，打仗时先烧好一堆旺火，竹炮放进火堆，爆炸声不断，两三里以外都听得见，敌人以为是迫击炮，机关枪，惊慌乱跑，游击队就乘机出击。这样的竹节，加灌些瓷瓦碴，安上引线，密封好，就成了手榴弹。瓷碴打进肉里，取不出来，敌人叫它洋炮。有一次，派出去的一个小姑娘侦察兵，得悉敌人换防的时间，胡筠就带队埋伏在一个山峡里，她指挥我们，敌人全部进峡后，再两头堵死，才从山上压下去。这次敌人全部被我们解决了。打了胜仗，还开庆功会，她亲自为战士发奖旗，带红花。

当年的秘密交通员陈泗生（1980 年七十四岁时）说，胡筠那两年常在复兴山区（原名虹桥内山）活动，周围几百里，树木参天，落叶遍地。她在内山建立了三个支部，县委有四个秘密交通同各地联系，信都是胡筠用药水写的。国民党 清乡清山，非常残酷，外有重兵围剿，内有动摇分子逃跑。县委常常从这个山头

转到那个山窝。敌人来了就鸣铳告警，游击队保护干部、群众转移。各个路口、哨卡的口令，都是她亲自拟定下达的。山区粮食困难，常吃稀饭、红薯、南瓜、野菜。县委和游击队的粮食，要靠出山打土豪；打土豪也很讲政策，从不体罚，粮食也不搜光。有时胡筠以县苏名义开条子，到地主家担谷，地主接到条子不敢违抗。贫农则把租谷交苏维埃，以收条抵地租。天黑出山担粮，天亮就回来了。后来，敌人“九路进攻”，围剿内山，进山见人就杀，见屋就烧，见东西就抢，还放火烧山，烧得山岭光秃，到处尸骨，粮食断绝，树皮野菜都吃光。县委仍在群众帮助下，四处转移，坚持在山里苦斗。

当年地方游击队员张满全（1980 年七十一岁时）说，胡筠带的队伍三百人左右，在内山经常同敌军、挨户团（地主武装）打仗。胡筠部队一来，我们地方游击队要负责接应，放瞭望哨。在山顶远望有敌人出动，就放铳、打“哦呵”，让部队作好应战或转移准备。胡筠部队对山区地形熟，尽管敌强我弱，进攻频繁，总能化险为夷。胡筠从来没有打过一败涂地的仗，没有过重大损失，或中过敌人的埋伏。她每到一处，就立即布置好岗哨警戒，看好地形，找好以防万一的退路。这里差不多每一条小路都有赤卫队员、童子团放哨。只要敌人一出动，深山里的部队就知道了。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

张平凯讲了一个坐箩筐打仗的故事。胡筠是一双解放脚（幼时缠过脚，放大的），在山上急行军走不快。她平时常骑一匹白马，挟两支短枪。有一次，一营敌人紧追不舍，游击队弹药不多，急着上山，甩掉敌人。爬陡坡，急转弯，解放脚实在不行了，胡筠只好坐在箩筐里，由战士抬着上山。她看到一处地势很好，便于打埋伏，两边峭壁夹峙，小路蜿蜒而上，敌人经此，无法仰

攻,用"滚木礌石"也可以杀伤敌人。她传令停止前进,打一仗再走。敌人果然骄气十足,上山来了。胡筠手枪一挥,号声枪声杀声,子弹石头滚木,打得敌人鬼叫狼嚎,丢下尸首,扶着伤兵跑下山去了。1929 年,胡筠与张警吾结婚后怀了孕,一次打退敌人向游击队驻地进攻的战斗中,她临产了,用牙齿撕破衣服,草草包裹婴儿,挣扎起来。在打退敌人几次冲锋的间隙中,战士用箩筐抬着母子,安全转移。胡筠的左肩负过伤,多年战斗中负过两次伤;负伤时,仍坚持指挥,不下火线。

每次战斗之后,胡筠都要及时作总结。这样就总结出一套朴素的游击战术,如"拦腰截尾,打敌哨线";"敌进山,我下埠";"敌去河东,我往河西";"积小胜为大胜",等等。在何键政府的《清乡公报》中,不得不承认胡筠这支队伍:"声势浩大","赤焰所播,如火燎原"。现摘录几条这类有关胡筠的"公报"。这些"公报"大都是由何键本人在"省府纪念周清乡报告"中提及的(当年国民党每星期一要举行"总理纪念周")。

"该逆(彭黄)在平江组织六个游击队,共匪胡筠称大队长。"(1928 年 8 月 1 日)(以下"逆""匪"二字可略则略)

"平江东北乡以余贲民、胡筠为首,啸党众二千余。"(1928 年 8 月 15 日)

"彭德怀,黄公略窜入赣境修水,旋回向铜鼓溃窜。8 月 23 日,忽合胡筠部共五千余人,枪七、八百支,窜来平江长寿。"(1928 年 9 月 3 日)

"彭德怀、胡筠两部约三千余众,枪为三、四百枝,经在绞车坳击溃后,向浆市、虹桥逃窜。军来匪去,诚为可虑。"(1928 年 10 月 15 日)

"11 月 1 日由山交坳出发向绞车坳、台庄方向,进剿彭德

怀、胡筠等，胡等闻风先窜，总不与我军接触，而江西友军又不能同时夹击，以致胡等容易逃避。（1928 年 11 月）

“彭德怀部窜入赣境后，我部追击，因边境山路纷歧，人烟绝少，当致失踪。平江境内胡筠所部枪枝二百，流窜东北恩溪、中洞、桃花、虹桥一带，时散时聚，肆行扰害。”（1928 年 11 月 19 日）

“北乡胡筠纠合各股，有枪三百余支，窃据留良洞、小尖、中山民、桃花洞各处，蹂躏恩溪、三墩、钟洞、三眼桥等地。”（1929 年 3 月 14 日）

1929 年《清乡公报》第 2 期（6 月 30 日出版），载何键嘉奖旅长陶广打了一次胜仗的电文，陶的原电中说：“职五团赵营长报称，昨（5 月 12 日）据报岑川有共匪约二百余名，枪五、六十支，梭镖百余杆等，职营一面通知驻岳阳挨户团，请其开赴岑川之后堵截，一面亲率七、八两连，于 13 日午前 7 时进剿。拒料胡筠于 12 日晚由杨梅山开来，率三百余人，枪约二百余支，与原在岑川之众汇合，与职营顽强对抗，相持约二小时。职率官兵奋勇冲锋，卒将匪完全击溃，恢复岑川，计毙匪三十余名，伤五十余，夺梭镖三十余支，匪纷向杨梅山、梓江等处，分头逃窜。此役职营伤官长二名，士兵阵亡五名，消耗子弹一千八百发等。”这以后的“公报”中称胡筠为“悍匪”。

“铜鼓不幸，匪患频仍，沿湘之喜盈、富有、寿遐、禄崇四乡早已沦为匪窟。王式毅、樊仕民、叶道华、张之伦等，勾结悍匪胡筠、侯金武、方长发等人千余，长枪六百余支，在幽居地方居然设立伪党部，分田山屋宇实行共产，到处暗设机关，信息非常灵通。出没于平江、浏阳、修水、铜鼓、方载之间。我军进剿时，不但匪情无从探悉，即问途购物，亦多不便。

“自国军来县驻剿，七县联防以后，共匪知环境不佳，翻然变计兹侦获最近策略，缕析陈明如后：(1)七县约期清乡，匪首下令全体匪徒佯为反对，暗则仍受命令。俟清乡之后，一律仍做共产工作。(2)军队进剿时，令有枪匪徒变整为零，大股为小股，每小股枪支三、四十杆不等，藏匿深山密林之内，暂避我锋。俟我军撤防之后，仍令集合一处，实行反攻。(3)浏阳、平江两县兵力雄厚，匪难以立足，只有铜鼓崇山峻岭，兵力单薄，进可以战，退可以守，共匪必以此县为根据之地。(4)匪区内十五岁以下编为童子团，二十岁以下编为青年团，二十岁以上编为冲锋队，俟组织完竣后，即举行暴动。(5)对于未入匪党之人，纯以政治手腕，笼络羁縻，无所不至。”

以上是1929年第四期《清乡公报》中，陶广向何键发的电报。末尾说“恳转咨江西省政府令饬毛营长期驻剿，将悍匪胡筠、侯金武、方长发等早日消灭，以绝根株，免贻后患。”

方长发后来在红16军，因诬告被误杀，已追认为烈士。侯金武与朱平，后来都任过军参谋长、军长等职，在反围剿战争中牺牲。胡筠率领的这三个中队的战士中，出了好几位将军。

《平江县志·胡筠传》说：“胡筠指挥的著名战斗并为父老所传颂的，有声东击西的木瓜乡塌石壁之战；用辣椒烟薰岑川乡碉堡之战；利用地形杀回马枪的泉水乡之战；扰敌致疲，然后主力远程奔袭的修水县朱溪之战；用湿棉絮绑在桌上，令战士顶着桌子冲锋的武宁县城之战等。”后两次战役，是1930年胡筠调到赣北特委以后的战事。

何长工说：“胡筠不但像男的一样，有许多男的还不如她。她很会打游击，她的部队是平江打得最好的。平江的敌人一听说胡筠的部队来了，就害怕。国民党的报纸曾多次通缉她。”

胡筠虽然学过一些武术(当年女兵说她能打过四个男的),但个子瘦小,一双"解放脚",居然如此善于带兵打仗,四面威风,敌人胆寒,六、七年中转战于崇山峻岭,别的不说,这需要克服多少女性生理上的困难。游击队初期,部队中就她一个女的,出发打仗和操练时,她脚打绑腿,用布带把胸部绑起来。人们至今谈及,不能不深深佩服她的顽强意志和无畏精神。

胡筠短暂一生的高峰,是率领地方赤卫队十二万人于1930年随红军攻占长沙。当时在教育坪召开了几万人的大会,成立省苏维埃政府。在大会上,彭德怀、滕代远、王首道、何长工和胡筠都讲了话,胡被选为省苏维埃委员。李荣光说,当时李家的人都逃亡到长沙,祖父扮着卖河水的去听了,回来对祖母说:"剑容(胡筠当媳妇时的名字)讲的还是有道理。"祖母说:"六个儿媳,数剑容最好。"父亲李筱池(积琦,字筱池)是"党党绝"的灰色分子,终生没有说过母亲半句坏话。

1930年9月,赣北特委成立,胡筠调去任副书记兼宣传部长。随后成立赣北红军独立团时,胡又兼任团长。这时她带部队打过攻坚战,如前述修水、武宁两战。《通城人民革命史》载:"1930年12月23日,胡筠率红八师及赤卫军一千余人,进攻通城。利用内应,一举攻克,计缴枪一千三百七十四支,长机关五挺,手枪三十余支,子弹十余担,其他军用品无数。"胡筠是以八师师长名义参加这次战役的。

荣光说,母亲善长演说、演剧、唱歌,家里有架风琴,那时的山乡是稀有之物。在启明女师时演剧,扮演华盛顿。县志传记说:"胡筠爱好文艺。治军之余,曾创作大量宣传品。其中《李更探监》和《鲁胖子哭头》两个歌剧,前者反映罗纳川妻子探监,感人至深;后者形容鲁涤平哭张辉瓒,淋漓尽致。两剧至今流传在

万载小源等地，刊载于《中国民族民间舞蹈·万载分册》中。”何长工回忆平江一次地方党政军联席会议，这样谈到：“胡筠在会上讲话，我怀着极大的兴趣来听她作报告。她果然不错，讲话很有吸引力，句句中肯，无一句废话，层次清楚，平易通俗，分析形势很准确。她讲的是‘平江起义’的伟大意义和对开创湘鄂赣根据地的关系。后来我同胡筠的接触很多，也愿意与她交谈，常跟她谈农会与地方工作的情况。我很佩服她，她身体很好，在群众中威信很高，很有基层工作经验。她是平江县主要领导人，是根据地的创始人。”

1931 年 3 月，原湘鄂赣特委和鄂东、赣北、湘北等特委，合并成立湘鄂赣省委，李宗白任省委书记，张警吾任宣传部长，胡筠任妇女部长。边区二十多个县，各级都有妇女组织，妇女干部除参加文化、学校、军械厂、金融、贸易等地方工作外，还有大批青年妇女参加红军，在后勤部门工作的最多。广大妇女动员鼓励自己的丈夫、儿子参加红军，妇女成为农村生产的主角，组织耕田队、抢收队、积肥队，以换工、帮工方式解决烈军属和孤寡户的劳力问题。支援前线战争的种种后勤重担，也都落在妇女肩上。当年许多女兵、女干部，关于胡筠在这方面的回忆材料也很多。这一期间，胡筠还负责办过党校，在这方面也施展了她的才能。

直到 1931 年 8 月，湘鄂赣边区二十多个县在平江长寿街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时，胡筠还是主席团成员，并当选为省苏维埃委员。

湘鄂赣根据地和胡筠等一大批领导干部的厄运，是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肃反政策所造成的，1932 年 3 月由中央派人来进一步强制执行后开始的。“目前党内的主要危险是右倾”，

是这条“路线”的总精神。王明在他那本《两条路线》的小册子中写道:“在苏维埃区里,因为忽视肃清反革命的工作,以致在有些党部、苏维埃区里和一部分武装队伍中,都曾发现改组派、AB团、取消派等反革命分子。”鄂豫皖、湘鄂西等区的反改组派斗争,早在1931年就已经开始。1932年3月,中央认为湘鄂赣省委肃反工作领导不力,“仍然没有转到四中全会和国际路线上来”。于是一个中央代表团带着彻底改造原省委、坚决转变路线的任务,到达湘鄂赣省委驻地修水上杉,成员有来担任省委书记的林瑞笙,全总巡视员陈佑生,来担任省委少共书记的郭潜。他们取代了李宗白等人的领导,召开省委扩大会议,宣布原省委作出的一切决议、原省苏维埃颁布的一切法令、文告统统无效,并撤销了一大批领导干部的职务。“左”倾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者在政治上混淆敌我界限,在组织上怀疑一切;对地富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更视为“阶级异己分子”,成为他们“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主要目标;对于一切不顺他们心意,或对他们持有不同意见,或一般工作失误、思想作风等问题,一概指责为“最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或斥之为“改组派”、“AB团”、“取消派”等所谓“破坏活动”。林瑞笙的临时省委制定三个月的工作计划:“发动党内外斗争,在斗争中坚决洗刷消极怠工、腐化浪漫、脱离群众利益的阶级异己分子(富农豪绅地主的子弟)和动摇的知识分子,特别要从思想上和理论工作中,洗刷不执行国际路线与省委扩大会议精神的分子,以及暗藏在党内的改组派、AB团、恋爱研究社、四七团、五八委员会、好吃委员会分子出党。”并且强调“不要和平的洗刷”,认为原“省委成份多系地主富农的知识分子”,“右倾托陈取消派的思想成份不少”,特别是“平浏地域观念”严重。原省委党政工团和部队的领导人,绝大多数是平江

和浏阳两县的知识分子和工农干部，他们成为主要斗争对象。7月，省保卫局颁布“自首自新条例”，只要填表登记，有两人担保，就可发“自首证”，在逼供信的施威下，出现了一批批所谓被欺骗加入“改组派”、“AB团”、以及什么“恋爱社”等等的工农群众中的“自首分子”。到9月在万载县小源召开湘鄂赣省委二次党代会正式成立省委时，又通过“肃反斗争决议案”，“要严格纠正过去下级党对肃反工作领导怠工和极端右倾的取消倾向”。于是，更助长了逼供信的盛行，比以前的斗争时间更长，规模更大，被错捕冤杀的人更多。

根据历史文件和有关党史资料，如红三师七团从团长到班长以致绝大多数士兵，都被当作“改组派”、“AB团”等所谓“敌党分子”，其中半数士兵，都遭到处决。这一期间原省委党政军和县主要领导干部，就有五十人左右被逮捕，包括赖汝樵（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张警吾、胡筠等，红十六军政治部主任吴天骥、组织部长刘英杰、九师政委李幼军、红三师政委叶金波等一批军、师、团级干部，和平江、浏阳、万载、铜鼓、蒲圻、阳新等县县委书记等，都先后惨遭杀害。这些人都是湘鄂赣根据地的创建人，都是有丰富斗争经验的领导骨干。关于苏区错误肃反，现在有关各省党史部门都作了详细调查并有所研究。平江一县错杀的约二千人左右。据我看到的资料，1933年8月，苏区中央局发现湘鄂赣肃反中的问题后，曾电令省委：“停止捕人之权，已逮捕的人，由新书记到达后解决。”直到1934年1月，由陈昌寿率中央工作团到达湘鄂赣后，撤掉林瑞笙职务，改由陈任书记，才基本停止了错误的肃反斗争。可是，胡筠却是1934年4月被杀害的。

关于“恋爱社”等稀奇古怪的名称，李琪洲这样谈道，那些新

来的省委造谣说，我们的部队里有什么“恋爱社”、“打狗委员会”、“好吃委员会”、“AB团”，我们打仗，气都喘不过来，有时饭都吃不上，还谈什么恋爱，打什么狗。有一个老红军战士虹桥人梁克基(1980年六十六岁时)说，查这些“恋爱社”时，采取逼供信，严刑拷打怀疑对象。被拷打的要是被逼而乱咬别人，被供出的人就只有死路一条。战士怕被干部抓去杀了，干部怕战士暗害。许多团长、师长怕遭暗害，在行军中穿一套衣，夜里又换一套衣；白天骑马，晚上夹在战士中走。那时部队的战斗力大大下降，我们那个部队，一次被敌人缴去八十条枪。战斗中部队不听指挥了，一听见枪响，就各顾各地跑，减员十分严重；除了伤亡的外，每天都有拖枪逃跑的，常听到这里一个班，那里一个排跑掉了；你去追赶，他们还开枪打你。这位红军老战士最后一段话真是入木三分：回想建军初期，没有枪，没有部队，白手起家，干起来满是劲头。打仗从不怕死，拿着梭镖大刀，还敢攻城。一天行军一百二、三十里，任它多苦，也毫无怨言。没有枪，没有炮，去抢枪，做石灰竹罐头做炮。身上带花几次，还是要紧跟红军。打土豪，反围剿，干部、战士从不分彼此，即使犯了错误，挨了批评，心里也舒服。想不到红军不败在敌人手里，却败在清查什么“恋爱社”，搞肃反，败在自己人手里。

李琪洲回忆胡筠时，深情地说：想起她和我在一起时，有时饿着肚子，还要拼命打仗。一次她听说我负了伤，将自己攒下的零用钱一块光洋给了我。胡筠被枪毙的消息一传来，我痛哭流涕，许多人都哭了。这批老领导干部死后，部队人心惶惶，有些人丢枪不干了，回了家。有的干部乘机打击报复，造成基层内部互相倾轧。国民党更乘机煽动，说共产党、革命者没有好下场。有些人就跑到敌人那边去了。以林瑞笙、陈佑生为首的新省委，

只会杀自己人，不会发动群众，也不会打仗。他们只知道蛮干，打大仗。加上红十六军军长孔荷宠（孔是新省委中的人）、政治部主任刘学昊先后叛变投敌（陈佑生、郭潜等人后来也叛变了），更是人人自危。战士们多不想干了，敌人重兵围剿，十分残酷，新省委一筹莫展，红军战士各逃生路，湘鄂赣根据地就这样垮掉了。事后，我们常想，湘鄂赣边区为何从手无寸铁发展起来，经过多少次清乡、围剿，不但不垮，反而越战越强？为何到后期有了红十六军，有独立师，好多独立游击队，却垮得那么惨？为何早期人心那么齐，那样困难都信心百倍，而后期却人心不定，悲观失望，觉得革命没有前途，纷纷逃离回家？为何初期打土豪时，都很讲政策，一不体罚，二给饭吃，我们吃不饱；先让俘虏吃饱，多少白军参加了红军。所以，湘鄂赣这样的苏区不是蒋介石打垮的，是我们自己杀垮的。

胡筠是1933年6月下旬，以所谓“托陈取消派”的罪名，与张警吾同时被省保卫局逮捕的，监禁在万载小源保卫局所在地的杨莹洞大屋。当年保卫局的干部骆奇勋老人（1939年曾任湘鄂赣特委书记），对此记忆得很清楚。胡筠在关押期间经过多次审问，她对主审人（保卫局执行部长罗鑫）说，只听得苏联有托派，中国是否有托陈取消派和什么新党，我毫无所知，我有什么可交代的呢？问来问去，互相顶撞。由于保卫局并没有掌握任何具体材料，只是逼供信得来的口供。其他被捕的领导干部也都没有真凭实据的材料。因此，都无法结案，只好等待中央保卫局的复电。这年10月，胡筠要纸笔，写了几十页的《狱中自述》，骆奇勋看过不只一遍，还记得大意和一些细节。胡筠详细谈到家庭和早年在学校参加爱国活动的情况；以及思想变化和坚决走上革命道路的全过程。小时上学，父母给她坐轿，“我怎能把

劳动人民当畜生!”她给轿夫付了钱,自己背着行李走路。胡筠还谈到同张警吾结婚的问题。张是店员穷学徒出身,由于手不释卷,刻苦学习,当上了小学教师,俩人志同道合,最后经组织同意,才结为夫妻的。《自述》中有这样两句沉痛的话:“此志未酬,身陷囹圄”;还有她平常爱说的两句话:“牺牲换大家幸福,奋斗是吾辈生涯。”骆奇勋以记录员的身份,能经常到牢中去看望,牢房阴暗、潮湿,特为她安了门板铺。但监守很是严厉,带有竹制土镣,夜晚不能随意翻身。

荣光写的点滴回忆中说:有两名保卫队员计划放母亲出狱,一起逃走。母亲一则怕连累他们,一则相信党会弄清楚是非,坚决不同意。母亲一面写《狱中自述》,一面交待保卫队员带信给我,叫我多读点书,将来革命胜利了会有用处。1934 年春,母亲等人从铜鼓牢房押往平江黄金洞。从小源押到铜鼓,又从铜鼓迁走,都是由于敌军重兵围剿,省委机关匆匆转移。从小源到铜鼓,“犯人”都带了“面罩”,这是怕战士们认出来,引起骚动。到黄金洞的路上路过泉水乡山鸡坳时,母亲还吃了两个包子,瘦得皮包骨,撑根竹棍子慢慢移步。走过约里多路,到冷水井,被枪杀。山鸡坳上有人听到枪声,赶到冷水井,把母亲病骸掩埋了,还插了根竹子作记号。1947 年冬,我一路查问,寻到冷水井,竹子当然没了。这一地段白骨成堆,刨开一层又一层,分不清了。

胡筠生于 1898 年 2 月 10 日,死时三十六岁。她生前唯一留下的一张在武汉时的军装照片,现在挂在长沙烈士公园湖南革命烈士馆中。平江起义纪念馆中,陈列有胡筠幼年读书用的桐油灯和书箱。

1958 年,彭德怀重返平江时,到了县人民医院(原普爱医院),向陪同的县委书记谈到当年在这里开会,准备起义,胡筠参

加了会，感慨地说：胡筠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很有能力，打仗很勇敢，是个难得的女将。

平江人至今仍爱说芙蓉，我希望中国有更多的人知道胡筠。中国人都知道秋瑾，她的墓地在西子湖畔。胡筠同秋瑾有许多相似之处，其实胡筠的一生比秋瑾更“竞雄”，更威武，更悲壮，同新中国的关系更紧密得多。她的墓在哪里呢？其实，没有墓并不要紧的，她活在人们的心中。

悼念涂正坤

今年6月16日左右，我在邵阳见到3个在湘鄂赣边区参加国民党军队政治工作的青年朋友，他们是被迫离开的。涂正坤同志有一封介绍短函（11日写的），说明他们原先在新四军工作，而不见容于现在的部队。

他们13号晚上经过平江嘉义。离嘉义十多里的路上，碰到一个熟识的老乡，匆匆告诉他们：昨夜新四军驻平江通讯处的六个人，全被驻在对面的杨森的特务营杀了，有几个还是活埋的。里面有一个是“涂书记”。

这真是晴天霹雳，一个不可想象的消息。虽然抗战以来，湖南发生过很多磨擦事件，但从来没有如此严重之事。当时我不敢相信它是真的，极力找理由，总想老乡的报告不可靠。我们都十分清楚，新四军通讯处同各方的上层关系都很好，尤其是涂正坤同志，不单是地方老百姓爱沿用历史回忆亲热地叫他“涂书记”，就是平江的地方政府与各友军也都很尊重他。住在通讯处对面杨森的特务营，虽然常使人很担心，但通讯处同他们处得也相安无事，经常同他们的长官有来往，怎么可能竟……

尽管我们都希望“这是不可靠的流言”，然而沉重的不安和凄然之感终究压在心头。那三个年轻的朋友受了我的影响，感

到这个消息带来了一个何等严重的后果。他们三人怀着无限深情，谈起“涂书记”的种种来了。说涂跟他们见过几次面，怎样和蔼、细心，怎样安慰和鼓励他们，怎样帮助他们了解社会，说服他们的急性病，教导他们正确认识统一战线的问题，注意工作和生活作风，特别谈到平江的老百姓怎样敬仰“涂书记”，涂在平江的威望如何高，等等。这三个受了不少折磨的青年，显然是带着最崇高的感情，来怀念这位革命前辈和群众领袖。我越听他们讲下去，心情越沉重，越痛苦。

我很谨慎地将这个消息传出去（告知湖南省委的同志），大家都不敢相信，然而都很焦急地等候着确切的消息。

一连几天，办起事来，我的精力总不能集中，老是爱回忆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同涂正坤同志见面的情形。那正是武汉沦陷后，长沙动荡的日子，差不多每天有警报。我们在一个仓库的防空壕内开始了谈话。他的个子很高，我们弯腰坐在洞口。我们是同乡（我是平江长寿街人，离嘉义只三十里路），都为这次相见感到特殊的喜悦。然而我当时的喜悦跟他不同，是他所不了解的。由于国民党的反动宣传，社会上一般对平（江）浏（阳）大都怀着一种恐惧不安的心理（平浏是出共产党“暴徒”的地方），可是，在我的心灵中，早在长沙读中学时就已对这些艰苦斗争中的人们怀着模糊的英雄崇拜，并且有过各种各样甚至一些幼稚可笑的想象。如今同这个高个子蹲在一起，我象一个小孩子经过一场哭吵获得了他所心爱的东西，贪婪地来端详这个高个子说话的神情和他的动作。我们畅谈着家乡的一切，关于我的老家那个地方的情况，他比我清楚得多。他是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坚持者，平江的山山水水，人情事态，他了如指掌。他谈到抗战爆发后，奉令在平江县整编零散的游击队伍，准备开赴江南前线

时，地方上的震动是多么大，发生过哪些令人发噱的笑话。说到这些，他仍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一种极自然的笑，并没有一丝骄傲与讽刺，而是充满了安慰与宽大。我们又谈到平江的现状以及一般群众和青年的情况，他充满了乐观与希望："好的特别好，坏的也特别坏；但是对于坏的，我们仍旧是尽量争取他们到抗战队伍中来。就是那些杀过我们的亲属、害怕我们回去报仇的人，我们也是用最宽大的态度对待他们，甚至用更多的时间去接近他们，让他们彻底了解我们是不算旧账的，我们今天只有一个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最后他还谈到平江农民的斗争性，一般群众有丰富的打游击战的经验。他的沉着而急速的语调，使我感到千万平江农民正站在他后面，响应他的号召。

由于战争形势的紧迫，第二天我再去看他时，他已乘车走了。

这样沉重不安的生活经过了六、七天，终于确切的消息传来了，平江的"快邮代电"到了我们手中，我怎样再去寻找"不可靠"的根据呢？

当我的手战栗地拿着那张"快邮代电"时，我马上想到那本《日寇暴行实录》中那些悲惨的画面：手执钢刀的"皇军"，被绑着活埋的中国人民……我没法抑制愤怒，我不敢也不忍去想象涂正坤、罗梓铭等同志被枪杀、被活埋时，是怎样的一种情景。我想世界上再没有比这更悲痛更残酷更令人不敢置信的事件。

听说平江的群众愤怒极了，当地政府以及国民党其他各部队中大部分的人也都极为不满。墨写的谎言掩不住血写的事实。我们不必要待历史的定评，我们只要去问一问湘鄂赣边区千千万万的人民，问问平江几十万农民，就知道这一次亲痛仇快

事件的损失有多么巨大!

涂、罗等几位同志的遇害,这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重大损失,也不仅是新四军的严重损失,而且是中国全体同胞在抗日救国伟大事业中沉痛的损失! 湘鄂赣边区的千万人民尤其直接感到,这对他们是一种多么重大的打击。

为中国民族解放,为中国人民的自由和幸福,涂正坤奋斗了一生,因此也就引起了日寇和反动派的无比恐惧和仇恨。涂正坤等同志在反动派的屠刀下牺牲了性命,然而他们的神圣事业、光荣传统和英雄气概是永远不死的,永远为我们后辈的楷模的!

1939 年 8 月

附记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江惨案》(吴定邦作)中,有涂正坤的简历和牺牲的经过,摘录如下:

涂正坤,原名涂正生,湖南省平江县嘉义区谢江公社人,1897 年 10 月 16 日出生在一个贫苦的缝工家庭。1925 年 5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 年组织农会支援北伐战争,为北伐军攻占平江作出了贡献。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参加了平江县委组织的秋收暴动。后潜回北乡,以缝纫业作掩护,继续进行革命活动。1928 年 7 月,担任党的平江四区区委书记,参加了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领导的平江起义。1928 年 9 月,在党的湘鄂赣边界特委领导的红军游击队中担任领导工作。1930 年调任平江县委书记。1932 年至 37 年,在湘鄂赣省委任保卫局长、组织部长、省委书记和省苏维埃主席等职。1938 年,湘鄂赣游击队编入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湘鄂赣省委改为特委,划归江西省委领导,涂任江西省委副书记兼特委书记,并以新四军上校参议的身份主持设在平江嘉义的新四军留守处的工作,1939 年 6 月 12 日在平江惨案中遇害。母亲何九莲任党

的交通员，一次在执行任务时为敌所捕，为了保护党的机密，惨死于敌人的酷刑之下。女儿涂凤文，18岁参加新四军，1941年在皖南事变中牺牲。

涂正坤遇害的经过：1939年6月12日，驻防平江的国民党第二十七集团军总司令杨森，按照蒋介石的密令，派兵突然包围新四军平江嘉义留守处，枪杀和活埋了涂正坤、罗梓铭等六人。这些天，他们正在积极参加破坏公路的活动，以阻滞日寇的进犯。这天下午3时左右，杨森部特务营中尉侦察员张绍奇来到新四军留守处驻地，毕恭毕敬地"报告涂参议"，诡称杨森要他到嘉义乡公所开会，"杨长官在那里等您，请您马上去一趟。"涂正坤即穿上衬衫，拿起一把蒲扇，同张绍奇走出了留守处。当走到离留守处约三十米的"秀记"杂货店时，张绍奇大声地咳了一下，接着巷口应声响起了几响乱枪声，张绍奇喊一声"有匪"，就溜进了附近的"洪源生"杂货店。这时，预先埋伏的刽子手孙家慧抡起快枪，朝着正在步下石阶的涂正坤猛烈扫射。涂正坤身中数弹，壮烈牺牲。同日，包围留守处的杨森部捕杀了吴渊，活埋了罗梓铭、曾金声、吴贺泉、赵禄英(女)等四人。惨案发生后的三、四个月里，平江县十五个区委和五十八个支部，几乎全部被破坏。据不完全统计，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六十八人，群众七十余人。

纪念何斌

1939 年的夏天，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曾费尽心力开了个小规模的追悼会，纪念平江惨案中殉难的烈士。《新华日报》第二天登出了醒目的新闻；匆匆印出的纪念册，也在国民参政会开会时散发了。这同现在禁锢得象罐头一样的情形相比，是令人感慨无已的。

就在这个追悼会的前几天或后几天，我在红岩嘴同何斌见了面。他刚从鄂南逃出来，光着头，穿一套黑布中式短衣裤，象一个商店的学徒。

何斌原名何功伟，1936 年上半年在武汉被通缉，即离开学校去上海。之后，我们便通起信来，然而一直没有见过面。在这次短短的一个多月的相聚中，我们尽情畅谈，似乎要弥补过去三、四年的阔别。

他是一个没有拿到高中毕业文凭的学生，在家乡的青年中却有很大的号召力。武汉失守之前，他便回到鄂南去了。战争来临，他曾同地方同志们一起，千方百计动员和组织鄂南人民，投入战争。可是历史的不幸夭折了他们的英雄事业。几个夜晚，他详细地同我谈到他在鄂南一年多的生活，从开辟上层，深入农村，直到几个同志的被杀和自己的亡命。他谈得很缓慢，他

经过的那些事情会令人觉得同这个学徒的外表如何不相称。我所感受到的一种力量，是越来越重的；我头一次严重地意识到自己的“少不更事”。我们离别前的一次长谈，是在临江的一个小茶馆中。他苦恼于自己的神经衰弱和恋爱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他羡慕我的身体好，祝福我们的新婚。当时我是很不安的，深深愧疚自己的“庸人多福”。这种心情我没有告诉他。我们谈得远远的，肯定他会找到很好的伴侣。我们做着美丽的梦，设想几年后形势的变化，大家相聚的欢乐。他起劲地笑着，脸色也不显得那么苍白了。

他决意回到环境日益艰难的鄂西去，便搬进城里住了。我也没法最后送他上船。

延安的生活是安静的。由于不直接接触第一线的成败斗争，人有时也会因循起来。然而对于南方故人的悬念是与时俱增的。去年秋末，便听到何斌在鄂西被捕的消息。据说他本来是可以避免这个遭遇的，他早就该离开那个地方，他自己已经知道有十几个家伙在跟踪他。

在南方，虐杀青年的事情，年来愈演愈烈，大小屠伯们都在磨他们的钢刀，血迹遍布于大后方各个地方。例如重庆的防空洞也变为拷打审问的场所，这是取其“秘密安全”与阴森恐怖，企图以此影响受难者的心理。据说武汉时代互讲统一战线的青年，如今竟在这种场所又碰了面。但情形却大有改变：一方面是操着生杀予夺大权的新贵，被训练着以杀人为业；另一方面是阶下之囚，被教育着不惧于死之恐怖。这是如何惨痛而严正的历史画面。

当权者未能变更其“死之恐怖”的政策，这倒是极其可悲的；他们永远想不透革命者虐杀不完的道理。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

在支持他们呢？地位、金钱、女人、亲属……任何东西的引诱都失去作用？市侩与战士的分野就在这里：前者奴颜婢膝以贪生，后者为真理而从容赴难。

“马日事变”后的长沙街上，常有“帝打打帝打打帝帝帝”的冲锋号音吹过，几个或十几个男女青年，被粗绳捆着，有的是赤膊，颈后都插了一支朱（笔）标，被一大群如临大敌的兵士推着跑。不管跑得怎样急，这些青年总是激昂地一呼一应地高叫着口号；这些口号如同闪电划过暴风雨中的黑夜长空，令人惊心动魄。这种情景，给予我——一个十岁孩子的心的撞击，是对英雄的崇敬多于死的恐怖的。这种封建遗产，让死囚在就刑前豪语的“恩惠”，现代权力者早已醒悟到这对自己的不利，他们知道恐怖和威吓只能慑服“良民”。因此，抗战以后，虐杀的方法就更转为绝对的秘密。“在暗室中毕命于几个屠夫的手里，一定比当众而死更寂寞。”（鲁迅语）是的，从群众中来的人，他总希望当着群众表明他的结局。不过近年来，这种“暗暗的死”，对于战士已极其熟悉，他们随时准备着接受这种“寂寞”。当死已成为时刻在威胁着他的存在时，死的方式真也就无足轻重了；何况死者自己也知道，他是不会死的，因为他将永远活在人们的心里。

我不能不写出，我们的战士，二十六岁的何斌的死讯。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最近证实了，他在去年11月被枪毙了。

何斌被捕后，便关在当地的“劳动营”中。后来地方最高当局（按：地方最高当局，系指当时国民党的湖北省主席陈诚）找他去谈话，许以“领导”该地青年的全权。这当然没有任何结果。于是最后将何斌年老的父亲从远处找来，“说服”这个结婚不到一年的儿子。但是这位老人所能做的事情，只是带出了他儿子的两封遗书：一封是向他的心灵所寄托的队伍告别；一封是给他

的比他更年轻的妻子，她刚刚分娩，他惦记着她。

何斌一生中最后一年的经历，现在所知道的，就是这一点点，然而这也就够了。

他的告别辞，他向我们，他的亲爱的战友们说了些什么呢？虽然我们没有亲见遗书，但我们是如闻其声的。

“先烈的‘死’，是后人‘生’的唯一的灵药。”鲁迅的话，也正是向着我们说的。

1942 年 4 月

附

《何功伟烈士诗文笺注》序言

何功伟(何斌)以二十六岁的华年，牺牲于敌人的黑狱之中，已经四十五年了。记得 1942 年 6 月 7 日延安为他开追悼会时，会场四周挂满了挽联，我的挽辞是：“你永远活在我们心中”。这句话没有说错，功伟一直活在人们心中。我同他相见，是在 1939 年 7、8 月间，他从湖北到重庆来，向南方局汇报工作。我们同属抗战前武汉秘密学联的先后负责人。1936 年上半年他被通缉，到上海去了。我们之间只是通信，没有见过面。在通信中，我曾同他谈过在武汉建党的问题，我们当时估计，他在上海一定已找到党的关系了。这次能在重庆会面，同住在红岩嘴，几次聚谈，两人都十分愉快。1938 年 6 月，他被派回鄂南家乡开辟游击战争根据地，在 10 个县建立了党的组织，深入农村，发动群众，同地方国民党上层周旋，同日寇作武装斗争。平江惨案之后，国民党开始杀共产党员，他在鄂南终于呆不下去了。功伟不过比我大一岁多，这时我感到他比我要成熟得多，经历也比我要丰富得多。8 月间，他就离开重庆，调到斗争艰苦的湘鄂西区党委工作去了。1939 年底，我也撤退到延安。

功伟是 1941 年末在恩施被秘密杀害的，时任鄂西特委书记。这消息

过了好几个月才传到延安。借用鲁迅的话来说，当时“我沉重地感觉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他留给我的印象是这样的深：开追悼会时，找不到他的照片，我凭着记忆，为他绘制了一幅很大的近乎木刻的遗像，挂在主席台上。在追悼会之前4月28日的《解放日报》上，我发表了《纪念何斌同志》一文。文章不长，因为他的事迹我知道的实在太少，但是我的悲愤，我对他的钦敬之心，还是写出来了的。当时是所谓统战环境，报纸上还不大直接对国民党点名指责，文中说道：“在南方，虐杀青年的事情，年来愈演愈烈，大小屠伯们都在磨他们的钢刀，死者遍布于大后方各个地方，例如重庆的防空洞也变为拷打审问的场所，这是取其‘秘密安全’与阴森恐怖，企图以此影响受难者的心理。”虐杀的方法就更转为绝对的秘密。“当权者未能变更其‘死之恐怖’的政策，这倒是极其可悲的，他们永远想不透革命者虐杀不完的道理。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在支持他们呢？地位、金钱、女人、亲属……任何东西的引诱都失去作用。”文中写到当时国民党湖北省主席陈诚诱降的失败，被找来“说服”儿子的父亲，“只是带出了他儿子的两封遗书”。这篇文章当时引起重视，人们认为是一篇阶级教育的好材料。前两年我把它编进了《怀念十篇》小书中。

还在当年的通信中，我就感到功伟有文才，文字简洁精密，不蔓不枝，而且“笔锋常带感情”。五十年代的《革命烈士诗抄》收过他的一首《狱中歌声》。我曾想过，如果能把他的遗书、遗文集印起来，留给后人，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事情。现在，何惠文、吴培根两同志把这一任务担当起来（不幸的是，何惠文不见此书出版，即已去世），他们不惮烦劳，搜求遗文，为便于青年阅读，复加注释。我看到这个稿本，真是如见故人，心情一直不能平静。正如编者所云，集中所收远非全璧，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即如当年他给我的信件，倘能保存下来，编入集中，又该多好。其实也不必求全，集中所收，虽不过是几封信，几首诗，有些还是断简残篇，但也足以看出作者的浩浩正气、铮铮铁骨了。我愿意向读者着重推荐烈士在狱中写给他父亲的两封信，这真是情文并茂的绝世文章。读这样的文章，就令人想起文天祥的《正气歌》，想起林觉民的《与妻书》；这些惊天地泣鬼神的诗文，

表明我们共产党人与我们民族历史上的精英是一脉相承的。当敌人无法叫这个落在他们手中的囚徒屈膝时，便把年迈的父亲找来，想以亲子之情来软化他。可是，他对父亲说的是："儿献身真理，早具决心，苟义之所在，纵刀锯斧钺加诸颈项，父母兄弟环泣于前，此心亦不可动，此志亦不可移。""揆诸宁死不屈之义，儿除慷慨就死外，绝无他途可循。为天地存正气，为个人全人格。成仁取义，此正其时。""儿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此志不渝。案决之后，恳大人携被褥以俱来，与儿同居数日，少伸骨肉之情。此番生离，或即死别。"这是何等的气概，何等的情操！我们民族出了这样的人物，是我们民族的光荣；我们党有这样的党员，是我们党的光荣。现在，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要向青年一代进行理想教育，何功伟烈士的诗文就是一种极好的教材，像他在狱中给父亲的信，我看是可以编入教科书，给中学生读的。因此，我认为这本书的出版，不仅有纪念的意义，而且有现实的教育的意义。

何功伟其人其文的光彩，早有目共睹，又何待于我的序言。编者和出版者嘱我撰序，使我得以又一次缅怀亡友，发些感慨，是给我的荣幸，也是给我们这些幸存的后死者的鞭策：不要愧对死者。四十四年前我那篇纪念小文最后一句话是这样写的：

先烈的"死"，是后人"生"的唯一的灵药。鲁迅的话，也正是向着我们说的。

1986 年清明节

想念你啊，文立徵

寇逼徐州入鲁先，
得知消息换人间。
忠魂定不回衡岳，
日出当观泰岳巅。
——《龙胆紫集·哭文立徵》

七十年代初，在京郊秦城狱中怀念老友立徵时，作了上面这首绝句。我们是平津失陷后一起到济南并留在山东的。1938年3月，我到武汉开会，碰到立徵从鲁北前线辗转回后方找组织关系。于是我介绍他入了党，一起来到徐州；他和同行的十几个青年同志，立刻被苏鲁豫特委派到鲁南开辟工作。我们就此分手，一直不通音讯。1949年南下途中，遇到山东的老同志，才知立徵于1945年初在鲁南游击区牺牲了。

去年1月我重新回到工作岗位后，立徵的一位表弟不断来信，为的是立徵老家湖南衡山县，由于“找不到入党证明人”，多年来不承认立徵的烈士身份，甚至还有说他是伪军的。表弟寄来一厚本复印的二十二个人写的证明材料，他们都是立徵的战友和同事，有省军区政委、军分区司令员、特级战斗英雄、游击区区长、影片《大浪淘沙》作者，等等。这时我才发现，我的这位

老同学、好朋友文立徵，原来还担任过赫赫有名的铁道游击队的政委。

现在的年青人呵，你可曾知道，你们从电影和小说上认识的那位铁道游击队政委，牺牲时还不过三十四岁；他家中富有，是国民党一个高级军官的儿子；他在北平辅仁大学学化学，英文很好，又爱好文艺，会吹口琴，还喜欢照相，写得一手好字；抗战期间，他在鲁南艰苦的环境中打了八年游击战；他只有短暂的初恋，没有结婚……

为了敦促我写一篇纪念立徵的文章，他的表弟又寄来珍藏的立徵于 1934、35 两年写给弟弟的十五封信，其中有 1935 年 12 月 11 日、18 日两信，详细描述了“一二·九”和“一二·一六”两次参加游行示威的悲壮情景。“一二·九”的当夜，立徵就给我写了信，告知游行队伍怎样在王府井南口同警察的水龙、皮带奋战。我收到这封信后，即用报纸抄好，张贴在文学院大门口，燃起了武汉大学同学们的愤怒之火。

在中学时，立徵是一个非常用功、沉默寡言的人；午饭后必临魏碑，当作午休。我们直到高三才成为好朋友。这是由于两人都爱读邹韬奋编的《生活》，都好写白话文，一起办班上的墙报，常常旷课同去看联华公司的进步电影，我们的政治思想倾向完全相同。1934 年上大学后，我们每周通信，从不间断；谈论的范围很广，“一二·九”前后，华北形势、国家命运成为主要话题。当年的辅仁是有党组织的，大概由于立徵沉静内向的性格，以及学样生活环境，没有可能同组织中人接触。1937 年 5 月，我离开学校来到北平接党的关系。6 月间，他就正式办了退学手续，跟我住在一起。遗憾的是，当时没来得及介绍他入党；但他从我处看到了许多党的刊物。他也自认为自己已象我一样，是一个

共产党员了。1937 年 8 月到达济南后，我们就决定不回后方，留在山东打游击，接受组织的安排，进了韩复榘第三路军的抗日军政工作人员训练班。大概从这时起，他的性格和作风，有了某种根本的变化。

从 1938 年 3 月后，我和立徵虽然没有再生活、战斗在一起，但这一厚本证明材料告诉我：这个沉默寡言，曾经热心于化学试验的人，由于斗争的需要，从参加“一二·九”运动的普通一员，成长为一名深受鲁南当地人民爱戴的游击战士和指挥员。鲁南人民义勇总队和鲁南民众抗日自卫军，都是 1938 年春夏间建立的党领导的群众武装。立徵参加这个部队后，就改名文立正。据当时在这个部队任政训处长的朱道南同志说：“我只兼名义，实际工作由文立正做。1938 年 3、4 月间，我们带义勇队一个大队到台儿庄一带活动，随即回到峄县四区，和国民党几个比较进步的司令共同协议成立了山外抗日联合委员会，办了一个青年训练班，由文立正负责主持。1938 年 7 月，同党有统战关系的国民党特种工作团第五大队的邵剑秋，抗日坚决，政治进步，一再要求立正到该部工作。特委即派立正以公开共产党员的身份到第五大队，在那里发展了党员，建立了党组织。立正的威信甚高，为所有的干部和士兵所爱戴。”1938 年秋，朱道南到国民党第三专署保安第五旅工作，这是一支带土匪成分的队伍，工作很困难。朱道南就向山东分局统战部要求，立徵又被调来当政治部主任。这支部队整顿好了后，1939 年秋，立徵又被调回第五大队。朱道南说，“当年冬，邵剑秋部正式改编为八路军一一五师运河支队。这可说是文立正同志初期工作的一大成果。”

立徵在第五大队和运河支队工作两年多，邵剑秋至今非常怀念他。他写的材料说：第五大队成员都是自愿集合起来抗日

的老百姓，只有朴素的民族意识，对抗战的持久性、艰巨性认识不清，更不懂得革命的道理。立徵在部队教政治课，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唱抗日救亡歌曲，用油印印成带画的书，极受战士欢迎，终于使这支部队成为有纪律、有觉悟的抗日部队。在运河支队成立前，干部和战士都叫他文老师。这支部队在立徵的教育指导下，在军事上也懂得了游击战术，除了一般战斗外，打过好几次比较有名的胜仗。如在津浦路上唐湖车站附近袭击日寇军用火车，在津浦路侧伏击汽车，曹家埠歼灭战，夜袭利口铁矿，奇袭唐湖车站据点，等等。这都同立徵的正确指挥有直接关系。在抗战年代里，部队物资供应极端困难，吃饭、穿衣全靠当地群众。在日寇扫荡、围剿、封锁和日、伪、顽合流向我们进攻的情况下，常常吃不饱、穿不暖。立徵爱吃高粱煎饼卷辣椒，常穿一件破棉袍。

1941 年 3 月，立徵被鲁南军区派到第三军分区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这个地区即现在的临沂、郯城、邳县、枣庄平原地区，是当年非常艰苦的游击区。1943 年到峄、滕、沛地区检查独立支队工作时，因政治委员牺牲了，即留立徵任独立支队政委，并兼任过八个月铁道游击队政委。后来由于小说和电影的关系，铁道游击队真是十分出名了，当年配合铁道游击队工作，在临城六区当区长的范有功，追忆起政委文立徵的时候，叙述了当年他在游击队的一些生动场面：为了应付敌人，他穿着褴褛的衣服，戴一顶破毡帽头，穿一双铲鞋（一种很结实的布鞋）。真象小说上写的李正，穿一件破烂棉袍，束一根用布旒子编成的腰带。他个儿矮，袍子太长，就把前大襟翻起，掖在腰带里。破裤子也补满了白、黑、蓝各色补丁。他常带两支短枪，掖在胸前袍子里。战士们在铁路上斗争，都穿一色服装，很“阔气”，都有手

表、好枪。文立徵等领导同志跟随队伍在周围村子里隐蔽指挥。当时护送干部过路，他总亲自参加。记得有一次大清早，见他毡帽上沾有稻草，准是夜里在哪个草堆里“歪块”（随便躺）了半夜。当时生活很苦，几个小枣也算一天口粮。有一天，他拿着一小块果子饼认真地对范有功说：“伙计，咱们今晚有饭了。”他非常爱学习，军装上衣和大襟衣的口袋里，全是自己用布面钉的小记录本，写满了密密麻麻的铅笔字。他很沉着，遇事总要弄个清楚，不轻易下决断。他非常乐观，对人总是和蔼可亲，从不高声说话。他是领导干部，在群众中却很活跃，会吹口琴，总随身带着，一边吹，一边还教小孩们跳舞。

1945 年 2 月，立徵到当时的临城县六区（今滕县西岗公社）检查扩军情况，这一带群众都亲热地叫他文科长。这里是游击区，他住在丁家堂村。区武装队的一个副班长是内奸，勾结伪专员大汉奸申宪五的匪军，于 2 月 22 日深夜突然袭击，立徵不幸遇难。滕县以西、微山县以北广大群众，知道文科长在丁家堂牺牲了，称这次事件为丁家堂惨案。1945 年和 1948 年，这个内奸和申宪五先后被我军捕获，在当地开了公审大会后枪决。

立徵牺牲之后，广大干部和群众十分悲痛，从当地一个大地主家找来一口柏木棺材，将他的背包、衣物一起入殓，埋葬在丁家堂村；在追悼会上唱了临时编的挽歌。解放以后，西岗公社丁家堂村等地群众每年清明和国庆节，总有几千人到文科长墓前开纪念大会，献上花圈，安上高音喇叭，宣传他的英雄事迹。

相信立徵家乡湖南省衡山县的人民，也一定会以故乡出了这样一个人民的好儿子而引为光荣。忠魂呵，你现在可以回衡岳省亲，看望看望家园了。

1980 年 11 月

附记

这篇文章在《中国青年报》发表以后，我仍然继续在收集有关立徵生平的资料，重要的有立徵表弟陈铁如为他撰写的小传，有立徵的辅仁大学同学许衍梁写的回忆材料，有邵剑秋写的《运河支队回忆录》稿本的有关部分，还有梁再写给我的谈立徵在游击队情况的信，等等。其中不少材料正好补我这篇短文的不足，现在节录一些在下面：

据陈铁如撰小传，立徵字国遵，1937 年在韩复榘的抗日军政工作人员训练班时的化名是赵宓。衡山东湖天柱寺（今东湖公社高峰大队第二生产队）人。1911 年 4 月 14 日生。祖父文山玉的职业是翻盖草屋的泥瓦匠，当地称为盖匠。父亲文九德，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北伐战争中曾在唐生智为军长的国民革命军第八军任团长，后任黄埔军校长沙分校少将总队长。1927 年立徵考入长沙岳云中学。他在高中还没有毕业的时候，就在寿康里自己家里为贫苦儿童办了一所半日制学校，自己讲课，免费发给课本和学习用品。

1937 年 8 月中旬，我同立徵到济南后，曾一起到他的辅仁同窗好友许衍梁家去过。许衍梁现任山东科协副主席，他的回忆材料说："一九三四年文立徵同志考入北平辅仁大学化学系。那时，我是历史系三年级的学生。我与他，还有两位化学系的新生，四个人共住一间宿舍，直到一九三五年暑假我毕业为止。化学系主任是美国人司徒豹，对教学和实验都抓得紧，学生（尤其是新生）感到压力很大。立徵学习很刻苦，很少参加娱乐活动，几乎每天下午都呆在实验室，晚上就呆在图书馆。他不大讲话，不爱说笑，很憎恶某些同学的名士派头和公子哥儿气。他身材较矮小，但结实，生活衣着都很俭朴，很突出的是爱整洁。每天午饭后必临大仿一两张，从不间断。他喜欢古拙有力的字体，这一点我们有同好。他也确是人如其字，颇有刚劲厚重的气概。我们同住一室的一年，正是日本侵略加剧，华北岌岌可危之时，记得立徵在言谈中，常表示痛感国家民

族的危亡，痛恨国民党当局的误国和自己的报国无门。抗日战争开始，韩复榘的第三路军政训处办起抗日军政人员训练班，吸收了大批平津流亡学生，立徵也参加了。毕业后分配到鲁北，他就把几个口琴和他手抄的几本琴谱存放我家，动身前往城武去打游击。临行，他送了我一只常用的桃源石笔架，我将自己的一只军用皮挎包和一支短剑送给他，作为纪念。这以后他从前线到济南来过一次，风尘仆仆，更显得黑瘦。我邀他到铭新池洗澡，他满身虱子，一边捉，一边谈，谈发动群众的情况，组织抗日力量的经过，生活的艰苦，很激昂。也是这一次，他和我谈及了他的父亲，姊妹，家住在长沙小吴门外……。这是我和他的最后一面。解放后征集党史资料和烈士传记材料，我就写了一份他在辅仁求学时的情况，并把他手抄的琴谱和他送我的桃源石笔架作为烈士遗物，送交了济南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邵剑秋《运河支队回忆录》的稿本中谈到，当时国民党军委会战区特种工作团第三总团的团长陈中柱、第二分团的分团长陆仰山欺骗他们，想把他的队伍拖到苏北去，说什么苏北未沦陷，还有中央军，部队去苏北补充枪支弹药，换发军衣，装备好了之后再回鲁南抗日。邵剑秋信以为真，1938 年 9 月就率部跟随陈、陆越过陇海铁路南下。为了掌握部队，经特委同意，立徵随军行动。到淮阴后，他们将邵部编为一个营，一个月间，只是不断地整编、检阅、点验和请客宴会。至此，邵剑秋才知道陈、陆等人不过是借抗日之名扩大部队以图升官发财。11 月日寇进犯苏北，坦克、骑兵、炮兵一齐出动，而陈、陆却命令游击队去和机械化部队打阵地战，使部队遭受到惨重的损失。立徵和邵商量，决定脱离陈、陆的控制，连夜带部队回鲁南根据地去打游击。于是邵剑秋带着第三营，立徵和王墨卿、翁剑秋（此时这两人已由立徵介绍入党）带着第一营分头行动。立徵他们在过了陇海路以后，遇到国民党石友三的部队，文、王、翁三人认为是友军，前去联系，当即被扣。部队也被孙茂墀部堵截缴械，损失殆尽。文、王、翁三人被扣后，押送到石友三总部，当时张友渔在石部做统战工作，立徵认识张友渔，他们才得释放脱险，与邵部汇合。到 1939 年

初，游击队和峄西游击区又得到了一些恢复和发展，陈中柱和陆仰山又来信拉邵剑秋，给了一个“特种工作团第二分团”的番号，国民党的鲁南第一行署主任蔡少衡也想把邵部编成他属下的一个大队，并送来了关防和现金，同时写信来：“当今天下大势，不归于杨，则归于墨，何去何从，请君自择。”这年秋天，八路军一一五师罗荣桓政委率东进支队到达鲁南抱犊崮地区，与鲁南人民抗日义勇队会师，取得了一系列的战斗胜利。邵剑秋认识到：我们要抗日，只有跟着共产党，参加八路军。为了作出决定，召开了全团的干部会。邵剑秋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会上绝大多数意见一致，这与平时文立正的帮助教育是有直接关系的，真是水到渠成。”1940 年元旦，正式宣布了八路军一一五师运河支队的成立。

梁再同志给我的信中说：

我和文立正同志初次共事是一九三八年夏天。我们在一起办过一个“抗日训练班”。

为了说清老文的工作和作用，先得写点当时当地的形势。他是随同党领导的游击队出山的；但那个队伍并未用八路军的番号，先叫“抗日义勇队”，后来在国民党的专员分署接受一个番号。他们南下到运河北岸的阴平、周营一带，距活动中心的抱犊崮山区一百多里。那里是几个土地主的天下，有的地主有“保家”的武装，有些还任国民党政府的区、乡长之类。少数中小地主家的子弟在外面上过学，有抗日救国的思想，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们中有的人就组织抗日游击队，其中影响较大的是邵剑秋和孙伯龙两部，战士大多数是贫苦农民。那时国民党的各派也到处拉拢武装，他们也就领得“国民革命军”什么什么游击队的名义，但同他们所属的上级既无政治关系，也无较好的人事关系，其实是独立自主，并也孤立无援的（这孙、邵两部的关系倒始终不错，后来合编为运河支队）。

义勇队南下，就是以朱道南同志为代表来做统战工作的。来后道南提议三部合办训练班，培养干部，一下子号召来了几十个青年。这个训练班其实是老文一个人办的。我那时住在孙伯龙部，也去参

加了。我原是小学教员，主观上追求进步，但处境偏僻，耳目闭塞，对于怎样抗日、革命，所知甚少。训练班讲课大半是老文的事。他的大困难是语言障碍，鲁南话的语音和一些特别的词汇，他听起来很费力，他的湖南话别人也难懂，有时只好由我来当翻译。《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也是他先教我，我再教大家。他告诉我，这歌是红军时就唱起的，但歌词改了，这修改也不知出自何人之手。我记得的是"第一抗战坚决抗到底，拼命(?)争取最后的胜利。第二服从上级的命令，抗战胜利才能得保证。第三不拿群众一针线，群众对我拥护又喜欢。"还教《救亡进行曲》，"牺牲已到最后关头"，这是我原来就会唱的。这个训练班只办了十五天，便被一次较大的扫荡冲散了，但它起了应有的作用，四五十个青年(连我在内)在这里听到了一些全新的道理，大部分参加了运河支队或进了抗大，成为革命战士，有的同志还为革命而牺牲了。

第二次共事始于一九三九年十一月酝酿成立运河支队的时候。一天，他告诉我邵部二中队长有些犹豫，要我以亲戚关系对他进行工作，可见他已能懂得大部分鲁南话了。运河支队编成后，他做政治处主任，我任宣教股长。在频繁的战斗中，我们的工作是十分紧张的：起草、印刷宣传品，编写唱词，拟写标语，每次更换宿营地，除了战后转移，他都布置并参加群众纪律的检查(送走铺草、扫净院子、赔偿损坏的东西，有时还要挑满水缸等)，而我们的驻地几乎是一两天最多不过四五天就要换的。尽管移动勤，只要有可能他就做群众工作。记得有一个星期天，住到阴平附近了，阴平有个礼拜堂，他带了我们三四个人，径直走进去，牧师正在讲道，我们也做出个听讲的样子，等牧师讲完了，他过去和牧师招呼了几句，也就上了讲台，开口道："圣经第××页上说，上帝帮助能够帮助自己的人。"接着就讲起保家卫国、抗日救亡的道理，牧师也站在旁边听。我们几个得意地悄悄互视，返回驻地的路上，兴奋得大声说笑，佩服他的见空子就钻。他说："这不是不用召集吗？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任何

场合都有可以运用的机会，只要先和人家有点共同语言。”

运河支队成立后，短期间里便洋溢着八路军的风气了，群众纪律严明。后经“三起三落”，与强大到无法比的敌人周旋了四五年，必要时人自为战，始终打不垮也拖不散。这与开端时老文的倡导有关，是他把宣传、鼓动、教育、检查那一整套方法与作风带到部队来的。如今想起，他分明是我的直接上级，可是当时我们这些下级大概谁也无此感觉。他的主意多一点，我们都高兴照着去做，于是成了大家的心意。这是一种优良的传统还是游击作风呢？经过了四十余年的岁月，老文的音容笑貌还历历如在目前。算起来，我们那时年龄相仿的一伙人中，一大半用鲜血浇灌了祖国的土地。这一番回忆对我自己是有益的，它鼓励我为恢复党的传统，依照他们当年的样子过好残年。

后来梁再同志又来了一封信，说：

我还向山东省军区托人查找老文的历史材料，寄来的抄件说：他的名字记在“鲁南”部分，简历为“曾任运河支队政委（主任），被害时任地委宣传部长”，牺牲日期和地点为“一九四四年秋冬在滕县城楼村被顽俘去杀害”。籍贯为“江苏铜山县”！（《山东军区抗日战争时期战史》附件：《抗日战争时期山东我军革命烈士英名录》）您看，与我亲见亲闻的无一相符！据说山东临沂烈士陵园抗日烈士英名录也有他的名字，可不知道是怎么写的了。若也与《战史》附件相同，则若干年后，人们可能以为在鲁南牺牲的烈士，有两位叫做文立正的！时隔不久，就这样言人人殊，真实情况太不易弄清了。

文立徽烈士二题

一个战士的书生时代

1979年初，离合肥来北京的前夕，安徽省地质局的党委书记曾星五同志来找我，让我写立徽入党前后的证明材料。到北京后，立徽的一位在山东工作的表弟陈铁如同志就不断跟我通信，为的是立徽的家乡湖南衡山县，由于“找不到入党介绍人”，多年来迟迟不正式承认立徽的烈士身份；并给我寄来一厚本复制的二十二个人写的证明材料，他们都是立徽的同事和战友，其中有山东军区政委、苏州军分区司令员（铁道游击队队长）、影片《大浪淘沙》作者、游击区区长、特级战斗英雄，等等，还有已经去世的原山东省委负责人郭子化同志。到1979年11月，我这个入党介绍人早写过了证明，问题还是没有解决。这位已为此奔走多年的表弟，又将他珍藏的立徽写的十五封书信寄来，嘱我写一篇纪念文章，趁“一二·九”在报上发表，以促此事的实现，因为立徽的亲属已盼望整整三十年了。直到80年6月，我给民政部部长程子华同志写的信批转到湖南后，文立徽是革命烈士，在他的家乡才算得到正式认可。

立徽是1945年2月22日牺牲的，距今整整四十年了；我们是1938年3月在徐州分手的，整整四十七年了。这一厚本证明材料和十五封书信（我多么熟悉这些字迹呵），曾象捏在手中的

两团火，非放下来不可，于是趁“一二·九”四十五周年约稿时，匆匆写了一篇短短的纪念文章，发表在 80 年 12 月 26 日的《中国青年报》。其中有这样几句话：“现在的年青人呵，你可曾知道，你们从电影和小说上认识的那位铁道游击队政委，牺牲时还不过三十四岁；他家中富有，是国民党一个高级军官的儿子，他在北平辅仁大学学化学，英文很好，又爱好文艺，会吹口琴，还喜欢照相，写得一手好字；抗战期间，他在鲁南艰苦的环境中打了八年游击战……”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烈士书信时，我曾将立徵这些家书交给他们。现在出版的《革命烈士书信》续编中，收录了立徵参加“一二·九”运动时写的两封信。

1928 年到 1934 年，我与立徵在长沙私立岳云中学同班。那是何等黑暗的年代，何等黑暗的地方。学校生活是死水一潭。这个学校的教员是当年第一流的。可是初中国文读《孟子》，高中国文教员是一个举人，讲《古文辞类纂》，不准作白话文；历史教员是念自编的讲义；地理教员总是让学生抄黑板。这所中学以数学闻名，高中的数、理、化全用英文原版的外国教科书，每天做不完的习题。当时长沙的书店买不到鲁迅的著作；有一个泰东图书馆在 1930 年左右卖过创造社的书刊，后来就买不到任何左翼文学的东西了。“九·一八”后，日本灭亡中国的计划《田中奏折》曾在社会上流传，学生们读了之后都义愤填膺。国民党省政府的主席何键却提倡“武术救国”，找来七十二县“好汉”在长沙摆擂台。社会上的乌烟瘴气自不待说。

立徵沉默寡言，不好活动，每天午饭后临魏碑。我是班上唯一的走读生，喜欢打球，因此一直没有交往。直到高中三年级，由于以下三件事，我们才突然成为好朋友：其一，立徵订了邹韬奋编的《生活》和林语堂编的《论语》，每期都要向他借阅，逐渐谈

得来了。其二，班上办墙报，半月一期，我们都用白话写文章，我还主编过美术专刊，他也有同好。其三，间或下午不上课，一同去看联华公司的进步电影，如《大路》、《城市之夜》、《都会的早晨》、《小玩意》、《渔光曲》等，都是悄悄去看的日场。记得有一次下大雨，影院就我们两个观众。看完电影后，有时还上面馆吃一角钱一碗的高价面，都是由他请客。他去过我家几次，知道我家贫寒，点油灯做功课。大概是由于这个缘故吧，他从没让我去过他的家。他的父亲出身于保定军官学校，北伐时是唐生智部下的团长，后来大概是何键部下的副旅长，家里当然富裕，住的是洋式房屋。临毕业之前，全班同学开会，决定编印一本毕业纪念册，上刊每人的相片和小传。当时由于全班同教务主任闹了一个大冲突，临近毕业考试时，寄宿生全部搬到旅馆中住，因而纪念册中未列教员名单。这件事由我们两人包办：从交涉照相，跑印刷所，直到编排看校样。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同编辑与印刷打交道。封面由我画了两张：一个工人推着一个大齿轮，一群骆驼在沙漠中前进，都是图案形的。立徵选定了前者，这也说明我们两人的意气相投。纪念册上的照片，别人都是一副正经面孔，用的长方形；唯独我们两个突出：开口笑容，用的圆形。别人的小传都是文言，也只有我们两人和另一位要好的朋友秦本立，用的白话文。他俩的小传都是我作的。

中学时代值得记述的事情不多。十年动乱在狱中作旧诗，有两首绝句回忆当年情况：

六载寒窗未遇师，厌抄黑板背书辞；
留连唯有泰东馆，曾是联华电影迷。
寂寞少年经武门，田中奏折警钟闻。

疮痍满目观《人道》，得一知音文立徽。

经武门是中学的校址。《人道》反映了 1931 年大水灾的情况，金焰主演，是联华公司早期出名的影片，学校特地租来，在风雨操场放映给全校学生看的。爱好左翼文学，关心时事，不愿意读死书，这是我与立徽成为莫逆之交的原因。

毕业之后，由于不满意湖南这个地方，也看不起当时省立的湖南大学，我同立徽、秦本立、赵焕南四个要好的朋友，一同去北平升学。我们穿着军训用的服装，弄来斜皮带和校、尉官符号，冒充军官买半票，一路威风乘车北去。经过汉口还照了张相，在照片上互相题字："凝视着光明"（可惜我的全部照片在十年动乱中在寄存的地方被烧毁了）。到北平后，我们住在西城一所公寓，真象鸟儿出了笼样地自由。我与立徽爱好的是文学，但那几年考工科的人特别多，我们受社会风气影响，偏要考理工科。结果都没有考上清华，他考入辅仁大学化学系，我考入武汉大学机械系。（秦本立考入北京大学教育系，解放后长期在北京市教育部门工作，"文化大革命"时受迫害死去。赵焕南毕业时是班上第一名，考入北洋大学机械系，抗战时在国民党空军基地负责机修，死于飞机事故。）他们三人都留在平津，唯独我一个人怅怅南归。在珞珈山虽然结识了新的朋友，但我的感情大部分还留在如此眷念的故都，向往那种穷学生住公寓的生活。于是同立徽每周一信，从不间断，直到 1937 年 5 月离校。

现在手头的立徽的十五封信，除 1933 年除夕一封外，都是 34、35 两年，写给他的在读高中的弟弟——劲弟的。信中内容当然跟写给我的不同；我们之间的思想倾向和达到的水平，大体是一致的。这些，却是以长兄的身份写的。几次读着，读着，这

些信又将我带回到半个世纪前的生活：矮矮的沉静而深思的立徵，似乎就站在面前，招呼着去散步，缓缓地交谈，有时争执几句。我用了两个晚上，将这些信摘录下来，相信读者不致于怪我摘录过多。从中可以看到，三十年代一位有思想的青年，在如何引导他的弟弟走上一条正确的人生道路，并激励其爱国思想；同时也反映出为什么这样一个好学的书生，后来会成为一个坚强的游击队战士。我也相信，这位三十年代的青年，就在他求学之时，也有许多地方值得今天八十年代的青年来学习。现在就用这些摘录的（稍作文字处理的）信现身说法，来说明立徵本人吧。

1993 年除夕：

今夜一过，明天又是新年。你应当仔细想想你所要做的事，如何准备你的将来，对着全国，全世界。我决不是叫你抱头冏想，把一晚游艺会得来的快乐完全忘掉，而是要你反问自己，在这样时光的追逐里，重逢新年的一刹那，我的家庭是……？我的学校是……？我的国家、民族是……？我的世界是……？（这里的“我”当然不是狭义的我），能有美好的回答。

你不要看到街上蠢动的人们个个脸上清洁，虽然有许多人还加上一层厚厚的粉膏。实在个个都是污垢满面的，白沙井（按长沙有名的泉水井）的水洗刷不去，脂粉也盖不了污垢。不但脸上，心灵上更充满了这些，一团黑漆。这些污垢、黑漆是：贪狠、虚伪、闲散（包括懒……）。我们不仅要清洁他们的脸垢（外表），同时还要洗涤心头的黑漆。自然，最要紧的是首先从洗涤自己着手。

1934 年 9 月：

（按由于投考清华失败，又错过燕京、南开的考期，这封信的开头，极端责备自己。）

我痛心极了，真是钢笔替我流眼泪。这次的失败，凡关心我的人，当然会加以轻视或怜悯。他们轻视我，那是可以的；怜悯可就用不着了。我不能接受他们给我的“怜悯”，多给我“轻视”的好。

世界大发明家爱迪生说：“天才是一分神来，九十九分汗下。”他所谓“神来”即是玄学者的所谓“灵感”；用血汗苦功到了九十九分时，也许有一分的灵感的巧怪新花样出来，那就是创作了。我现在是须要百分之百流汗了。

不得已我入辅仁了，我不是急于要做“大学生”，是为着要求较好的读书环境。

1934 年中秋节：

今晚，我们预备到北海去吃月饼——我们的月饼在天上与湖里。现在已上课一周，除国文、军训外，其余都是德、美人任教授，全以英语授课，一整周都有点摸“洋风”；每堂课能懂得他们的 general idea（一般概念），就算不枉坐这五十分钟了。两三周后或可习惯。

我住在第三层楼，房间窗子向正东，北海里的白塔、景山均在望中。太阳出来，照得满屋红光，这样，大自然给我不少快乐与力量。每早起床，我同太阳差不多；星期日也许它比我早半点钟。四人一房，大得宽松。我的床靠近热气管。舍内餐间、澡堂、洗脸间一切设置都极现代化。不过，对我这样的人也许是物质享受太丰厚，容易懒惰下去，你须得时时警惕我，鞭策我。

1934 年 9 月 27 日：

关于你明年投考大学的事，本想将材料收齐后作系统叙述，现暂照你问的零碎回答：一所名大学，从教授、设备或历史各方面比较，也不可能全好全美。所以你选择学校应以何者最著称为主，如想学土木，最好能考上唐山交大；化工最好是浙江大学；地质考北大；机械或电机自应考上海交大，天津北洋与清华也不错（清华此二系历史不久，正努力中）。工学院当然以大代数、解析几何、三角、理化为重要。《范氏》代数方法较新，还巧妙；《霍尔·乃特》习题搜集广泛，可各取其特长（按这两种大代数教本为当年长沙一些学校采用）。考北大、清华，国文都须语体文（即所谓“小品”），且注重描写或叙述方面。如今年清华作文题为《夏日的昆虫》，另题为《我的国文教师》；北大也是两题任作一个：《描写你一件最可纪念的事》，《描写你一个认识最深的人》。英文作文也是同样情形，并重改错、翻译、填字。

父亲这种突变，自然起于精神的大不满足（如个人的意志不展，家庭间的无乐趣，或我老使他失望等）。人的生活种种作用，本是一种波状曲线，有向上的时候，也有向下的时候。我们要使这种曲线的向下曲度减小，一方面要靠继母大大整理家庭，使生气、乐趣、喜快充溢于我们全家人之间，使父亲得着安慰。一方面是要我们兄弟努力做人——铸炼自己，做一个“最好的我”，使父亲增加新的希望。“侍父母讥谏”，这是中国的古训。这就是说，父母言行有了错误，子女可以乘时隐隐约约地、不怨不怒地婉言劝谏。但这种“进言”功夫极不容易，稍不聪明，就坏了大事。（你如有这种信给父亲，宜先寄我一看，怕一时贸然触怒呵！）

原先想跟你谈谈“性”的问题，但现在可没有这种工夫了，只好先寄二十七页《青年期之性的卫生及道德》给你看看。现在还是简单补上几句：1.煌炎与炳叔(按当是两个亲属)的急性肺痨都起于“自戕”。2.你有什么精神上的不乐意没有？开诚地与我商量吧。3.如有和异性做朋友的chance(机会)，你也可不放过。现社会的情形，与年岁不远的女人谈话与往来，就流俗地想到男女间的某种特殊关系，乃至目为“非士君子”。这种俗下的眼光与态度，你摒除吧。只要我们是真诚的清白的友谊，无论思想、言行都是只在“灵”的方面，即精神方面。

1934 年 11 月 11 日：

你临的张迁碑我已看到，在用笔方面，确实很有进步。初步当力求貌似，继而进取神合可也(碑坏不能辨者，不必勉强临写)。记得一次，李伯对我说：“写字动笔要有起势，字方得神味，不然纸白墨黑而已。”我想这种龙走虎奔的起势，是精神的由手腕至笔落到纸上，并且这精神电似的传递，当然又是流汗得来的结果。可愧我现在还是白纸黑字。你的小字还是临柳公？笔法受魏体影响太深。

录冰心《春水》，题在故都照片正面，现重写一遍：“先驱者，前途认定了，切莫回头。一回头，灵魂里潜藏的怯弱，要你停留。”求学的进程太重要，一失时，极难挽救的。我现在这样警告你。今日的中国人，有一天自己用功的机会，已是大大幸福；即明日降为人奴，也是该受，因为我们根本惰性太大。美学者 Robert E·Lee(按罗伯特·爱德华·李，1807—1870，美国将军)给他儿子的信中有：“你大胆、坦白地去认识你所在的世界(意指研讨学问 以理解宇宙真理，非谓多

谙习社会黑暗以混饭吃)……青年在十八岁以前,是学问真正驰入他脑子的时候,以后就只有经验的充实,再无学问的进展了。你如想你应当享受学问的权威、伟大与自由,你该当此时立基。"(他儿子那时只十六岁)。你不也是未到十八岁吗?我希望在"你的面巾上有因打球流的汗,也有因读书流的汗渍",那便可以做到象德人一连十二个钟头脑力工作,还不感头昏。一个人能解决吃饭问题,固然重要;但我以为终身毫无学问上的享受,何不长眠以休乎!每星期必浏览杂志一、二小时,至少须读《中学生》(即小品文也得注意看看)。

1935 年 1 月 27 日:

关于"化学平衡"你懂得清楚不清楚?这种现象是很重要的。譬如这个可逆方程式:$3Fe + 4H_2O \rightleftharpoons Fe_3O_4 + 4H_2$,在什么情形下化学作用向右或向左呢?假如一定量之氢与磁铁同放入于一密闭器里,又怎样呢?又如:$3H_2 + N_2 \rightleftharpoons 2NH_3 + heat$(热),须要何种条件才脑精(按今称为氨)制得最多呢?又如风化与潮解也是一种平衡作用。

1935 年 2 月 22 日:

我的字,笔姿不开展,是第一大毛病;而笔调不十二分下俗,或是我的长处,尚不敢肯定。笔姿不展,记得父亲也曾向我示过此意,当时我还傲不自认呢。你的字也有不展的病态,是不是受了我的影响。字的风格是最要紧的。"风格",是抽象名词,不易解说。就说少女吧,她的 face(脸庞)虽不合西施的条件,而她的风格(这里不如说风度)很好,那她就很有挑战他人心灵的力量;若她风态下俗,虽具电影明星胡蝶的脸子,也就只有下俗人爱她了。同样,字的风格不

高，不但全无美感，浅一点说，全无快感，而是东施效颦，岂不大糟。风格似乎又各种各样，我的标准是“刚劲而雅朴”，今我虽未之至，却心向往之。假如打字机通行得如门闩一样，那上面的话都是废话了，除非他是个艺术家。即今学生也大都不讲究写字，尤其学理工的，遑论什么风格不风格。我也常常这样想：“字，能认识就得了，何必要好！”然而人的爱美心情，你不可忽视。

你现在数、理、化全用英本，如我在“岳云”一样。我从前有一恶习：老不爱查生字，读不懂就找中文本看。结果，一进大学，作理化实验报告，全得用英文，每次四、五页，写得慢。我第一次进实验室，问管理员俄国佬要个软木塞子(Wood stopper)，我不知英文名，解释了半天，拿个瓶子做手势，他才明白我的意思。有时实验做得不对，找教授问，也苦于英语不流利。所以你得学好英文本理化，否则，将来进大学，没时间查生字。至少现在要拿起原文本读个全懂。科学书又没有中文译本，读不来，即进了大学，也不能念好的。

1935 年 4 月 22 日：

“工程师职业”曾引起你的注意，我还希望你再加上热心。人世间的事物，只要有热，没有造不出来的。你看，黄金与钢铁不都是由于高热的结果！拿破仑的字典无“难”字，也只是他用热力把“难”字赶跑了。只有热才是宇宙间的大力士。

所谓特殊的自然科学天才，多只偏重于数学与物理；而工程范围内所需要的数理，只要你现在于数理不厌恶，功课能应付裕如，那将来很可以对付工程的学科。说到所谓有

解决繁复问题的兴趣，由繁变简，这是人所乐为，只看你脑子能不能凉一凉，途径对不对。所谓无生界生活，就是说机器世界，其实静的机械，的是动的根源，没有钢的飞轮，时代怎能被推着前进？机器实统治了运动的世界，而执机器之鞭的是谁呢？不就是工程师和工人？

“天下事本无分难易”，只要有热力与毅力做你坚强的基础。你有热力，生长你的才干；你有毅力，维持你的才干。今日从事科学的人尤其是工程师，可说是积极的新中国的建设者，除了解决个人职业外，还有为大众的更可骄傲之处。

写日记是随笔的最好练习。至于用文言或白话，本来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章，但我们处在这紊乱的漩涡，西装时髦轻便，马褂古香朴朴，非二者全兼不可。写日记可不管文言、白话，只看如何写得真切、明快，合乎文理就好。

1935 年 5 月 27 日：

我常回想过去的生活，有许多事很好笑，许多事太过火，许多事太蠢，许多事很可耻……检讨一下，很满意的事几到了绝无仅有的地步。质地低劣固有关（按：直到这时，立徵还在苛责自己没能考入清华），缺乏指导不能不说是最大原因，然而这也是中国的普遍现象。现在你也在这圈里过活，我很希望你能培养自己的锐感，来观察一切事物，作自己的指导，时时打开你的眼睛，好象电影特写镜头，察见人家的好坏，做自己的镜子，常清洁自己。“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至于孰为恶，孰为善，你以现代立场，自己当有些把握吧。现在想起过去许多不满意事，而在当时未尝不自认为快意事。所以，今日的我与昨日的我冲突，

实在是由于自身观察与理解向前推进了的表现。“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这明明说宇宙万物都是动的，人的思想也随着时代而迈进。觉今是而昨非，不正是思想上应有的反应么。

到了大学，同学间的关系，友谊，常“点头”而止，因为各人的社会经验多到了个半足程度。中学同学多诚恳，坦白，不粉饰。往往小学、中学的老朋友倒成了你终身最坦白最相信的好朋友了。

一块毛铁须加锻炼，而后成纯钢，而后能致用。

1935 年 6 月 16 日：

我很高兴你已经是校队排球队里的一将了。在学术、体育、音乐三者中，各有一技之长（至少也得说有嗜好），我们的生活才不感觉有大缺陷，在集体活动中也不至于“遇事无以对”。

1935 年 11 月 16 日：

从前美国有位学者说：二十五岁以下的青年，不信仰无政府主义，十足表现他无出息；三十岁以后，他还不放弃无政府主义，十足表现他无用。不过现在又有其他种主义代替无政府主义了。你能注意社会、政治各种动向自是很好的。不过你举出那两位与你常聚谈的人，他们的思想都出了时代圈之外，官、财气息特重，虽目空一切，终坐井观天，纵成势力人，亦不能成全“人之伟大”，我所不取。希望你未传染得这种流行空虚病。这种“空虚”病，只有用“无烟煤”可以填补。（按：下面录下郭沫若《女神》中的《无烟煤》，第一节是法国小说家斯汤达尔的警句：“轮船要煤烧，我的脑筋中每天至少要三四立方尺的新思潮。”此诗最后一句是：

“我要往图书馆里去挖煤去喲!”)我们想要路走的远,要多装无烟煤;想要走的快,也要多装无烟煤。煤经过一种变化,产生伟大的力量。你要快装煤,多装煤。

这些信,写于半个世纪之前。那时的中国,只有极少数有识之士将希望寄托在共产党身上。立徵比我大六岁,关于大革命时期的回忆,他比我更清晰一些。从给弟弟的信中知悉,1930年红军攻入长沙时,他的家(在小吴门外城郊)曾受到损失,大概是附近贫苦居民所为。这些事他从来没有同我谈起过。那时我们无法知道共产党的任何具体情况,只是一种朦胧的寄托。然而,我们对于国民党、蒋介石是深恶痛绝的。林语堂办的《论语》,有一期揭开封面就有一幅整版漫画:一片漆黑中,用白线勾勒一个人形,在抽鸦片。题目似是:中国财政的一线希望。我和立徵议论过这幅画,认为这就是当时的黑暗中国,希望则在那一边——我们所不了解的“苏区”。“苏区”这个名词是从我的老家平江来人中知道的。我的忆旧诗中有句:“人人平等事悬殊,来客频频话苏区。学唱饥寒交迫曲,心驰桃树武陵居。”这是一个年轻的远房亲戚,他在苏区呆过,来到长沙时,眉飞色舞地跟我讲过苏区的生活,教我唱过《国际歌》。如果新中国不曾发生这十年动乱,那么上面摘录的这些信,对今天的青年是无大意义的。然而,不幸的是,十年是非黑白的颠倒,搞乱了一代青年的思想,他们现在生活在灿烂的阳光中,有些人仍如在五里雾中。我录下这些信,也还有另一个意思。即这些信件的收信人、当年深情地读过这些信而且将它们完好地保存在衡山家中的立徵,立徵的亲爱的胞弟,我也认识的,比我们低两班,曾是岳云高十三班的学生,现在当也跟我一样,鬓发如霜了吧。他住在大海的

另一岸，我希望他能有机会读到我这篇文章，引起他的怀旧和乡思。立徽高中毕业时，由于爱国激情的冲动投考了国民党军校，在抗日战争中，两兄弟在中国大地的两个战场上同时抗击着日寇。差堪告慰的是，立徽的弟妹们不久前告诉我：他们已收到远隔重洋的哥哥的来信。立徽在信中说："读徽弟、御妹来信，得悉母亲身体健旺，弟妹们均已成家，有孩子，更有合适的工作，年节家人均能团聚，闻之亟慰。我们在海外，一切平安，惟时以家人为念！侄儿三侄女一均已婚嫁就业，老大老二各有一女，年节及假日都回来团聚，得享天伦。"血比水浓，海内外兄弟聚首一堂的日子总会要到来的吧。

1935 年暑假，我提前一年进行暑假期间的工厂实习，选定长辛店铁路工厂，为的是靠近北平，以便同立徽共度暑假。这时华北的形势已经紧张。6 月 16 日，他给弟弟的信中写道：

半月来，报上"华北"的字眼真够醒目了。自五月二十九日至六月十日，问题才告一段落。然邻邦移外交于军部，手段堪惊，故目前形势仍不可尽测，未敢乐观。至原提条件为何，不能全悉。原则不外扫除我在华北之军政势力，造成黄河以北非武装区，然后言中日亲善(?)与提携(?)，此固维持东亚和平(?)"有不得已也"。而旬日来：于主席(按河北省主席于学忠)之免职；天津市长之易人；军分会政训处之撤销；宪兵第三团之离平；关、黄两师之移防；河北省、市党部之取消……等事实之变化，当系受其影响。近两日消息稍沉寂，此对方为了要监察我方承办条件履行与否也，然后进一步工作(日日有飞机侦察)。还说一件事：六月七日，河北高中军训集中训练处，接日方某武官电话，谓欲领两连兵

在两小时内前来观光，主持人关麟徵师长（古北口一役勇将）即应允，并备阵以待，不意客至过门不入。移时，关即奉遣散命。临别，作最后精神训话时，关上台四、五分钟久，泣不能言。在场数千学兵，无不落泪。因为他们都读过都德的《最后一课》。

我到长辛店后，第一个月的周末，都是到北平同立徵一起度过的。由于实习生活过于呆板，同伴也谈不来，第二个月就索性离开工厂，同立徵住到一起了。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个月。我们常逛书摊，东安市场可以买到翻印的鲁迅杂文集。有次去游颐和园，门票五角钱，进排云殿还要花五角钱，于是两人沿着外墙往上走，在最高处翻墙而入。那时游人很少。当我们走上最高处亭子时，一大群日本男女挤在里面，又吃又闹，好象这儿是他们的天下。这个刺激的场面，使我们大败其兴。立徵带了一个Box（盒式）照像机，也不想拍照了。

“一二·九”运动前夕，立徵来信，常谈华北形势的危急。下面是11月24日他写给弟弟的信，可见他当时的忧国之情：

这星期你们一定天天挤着看报纸。现在我不能不很悲痛地告诉你。但是我能写些什么呢？你只有从新闻语调里忖度（天津《大公报》），现在我只能告诉你一句话：“要问华北的消息么，那正在破灭与创造之线间。”事已确到最后关头，屈辱流离在所不免。这点当我去年北上时就认清了的。我并不因此惶恐，只更自奋力，知学生生活一日宝贵一日，活动力、沉毅力更增大了。只是我们的言行远远不如你们在长沙的自由。我们也时常看到铁鸟的飞影，但上面却不

是“青天白日”的徽标，而是别种颜色。常想到一句悲壮的话：“我学航空，就是要求死的伟大！”这是一位航空学校同学的意志。“最好是来北平读书”，这样的话，你不要再说了，也不要想了，免得人家笑你神经错乱。我知道我有一天会在火车站与从不相识的人握手的，那是平汉车还是平沪车，现在不可预测。

“一二·九”运动爆发后第三天，我就接到立徵的长信，他参加了那天的游行，当夜给我写信，详细描述了在王府井南口挨水龙冲射和皮鞭抽打的情形。这封信立即在我的朋友中传看，我连夜用大张白报纸抄好，张贴在学校中心文学院的门口，于是点燃了武汉大学全校同学的愤怒之火。之后，又收到他详述“一二·一六”游行的长信。这时，武汉的学生运动已经同北平同全国的学生运动汇合在一起了。12 月 11 日立徵给他弟弟的信中写道：

关于“一二·九”，你们是否得到了这类的快邮代电？这次示威运动北方报纸都不能登载，南方总不如此吧。我在当天晚上就写了封信给你，只是那时情形混乱，事后查明的结果是这样：参加人数约五千余人，受伤者二百余人，被捕者三十余人。对方的武器是东洋刺刀，水龙，与中国皮腰带、皮靴。有师大女同学一人受刺刀重伤，有性命危险。事后当局戒备益严，凡被注意的学校门口皆布警兵数十或百人，水龙数具，严禁团体行动，便衣侦探四伏。北大、平大、师大十日起已罢课；我校虽受伤有人，尚未罢课。空气表面似乎转入镇静、沉默，内心之火更可化金石了。北平今冬特

冷，报载几天冻死了百多人。我们有热血，并未因此寒惧，两拳压在口袋里，依然热烘烘的。

果然，立徵又英勇地参加了“一二·一六”的示威游行。18日给弟弟写的信是铅笔字，发现其中有五页用了复写纸，一定是同样的几页也寄我了。这是“一二·九”运动的战士也是后来牺牲于抗日战场的战士第一次参加战斗的亲笔记录。虽然“一二·一六”这天的战斗经过已有专书记载，立徵所记只是他亲历的一段，我仍觉得有责任一字一句抄下烈士的手迹，何况其中有些细节还有史料价值。今年是“一二·九”运动五十周年，发表这些信件也很有纪念意义。

事先当局已闻悉十六日有第二次示威运动，故各校门与各街通衢戒备益严。学联会分全市各校为四区路，定上午在天坛前天桥集中。大集会后再进城示威游行。

我校晨八时由西城出动，经过两三度水龙、警棒、大刀奋战后，中途与清华一部分（也是被冲散了的）汇合，直达天桥。十点过，先后奋斗得以到场的大中学生将近一万（听说各路在中途被冲散的不少，也有些中学生被学校当局禁闭不能出来）。悲壮激昂的气氛坚压长空。草草开过市民大会后，一万群众列队，臂挽臂四人一排，回头欲从前门入城示威。这时队伍已扩大到一里多路长，气势愈觉雄壮了。久久沉闷地压在心头快要炸裂的悲愤与积怒，现在变成呐喊了；平日不能谈论的，现在血似地写在宣言纸上了。我们雄视一切，我们痛快，我们感觉华北仍是中国人的。

到了前门，即受到“绝不准入城”的阻止，数度和平开导

与交涉都无效，只有冲锋与肉搏了。我们的武器自然是肉和血；对方的，初是水龙，水龙不足用，继之以大棒、皮鞭、刺刀、大刀背，于是流血开始了；终于第一排枪声（向天）响了。群众暂时退让了一下，又即刻齐集前进，第二第三排枪继续响了，同时大刀、警队一车车压来，机关枪排列更多了，但群众不再惊动。他们见弹压无效，只好与我们讲和，允大队从宣武门进城。我们也只得改路了。途中在西河沿又小冲突一次，下午四点抵宣武门。到达时才知道被骗了：城门同样关闭了。后传开城，以解散大队为条件。燕京受骗，先离了大队，后来清华也离开了宣武门。

“各人走不各人走？”“不走！”“等不等？”“等！”这是我们留下来的队伍大家的回答。东北大学、师大、辅仁、北大、汇文等校四百多人，在大风严寒中，在城门外直等到夜里十点多。最后大队欲集中师大，走不到半里，在骡马市大街又与水龙、大刀、刺刀大激战几个回合，此时因人马太疲，又肚子饿，只好疏散开，各向师大奔来。到了师大点兵，轻重伤的占五分之三、四。我们坐本校慰劳队的汽车回营了。

在汽车中大家都沉默无语。我在回想这些悲欢壮烈的镜头：在宣武门外时，有一位清华女同学偷从城门下甫匐穿过，刚起铁闩时，警察发觉了，被捕毒打回来。有十多个小商贩走来慰劳我们大队，显示一种强烈的爱国热情，慰劳品是窝窝头、烧饼、芝麻糖、哈德门香烟……都是由几大枚、几十枚凑起来买的。我们饿了一整天，冻了半夜，这时觉得从来没吃过如此味道好的烧饼。当慰劳团来的时候，市民围近来看的更多，我们借此向他们作真切的宣传，还与他们同叫了口号。还有件事值得说的，当我们出发时，有位国际新

闻记者 Mr. George Kaiunkov(乔治·凯诺可夫先生)从辅仁经过,得他许可与我校两同学携 camera(照相机)乘汽车在各路与前门一带摄取影片,并允即运欧美。

"一二·九"这年寒假,立徵和我都曾回到长沙过年。我们的交谈,当然比过去大不相同了:这是两个无愧为救亡战士的老友从南北同一战场上归来后的交谈,我们兴奋,对民族前途充满希望。这时,八年未见过面的我的小学同班好友黄乃(原名黄一寰),正从南京回来度假,他是黄兴的幼子,名门之后。一见面,三言两语,我们的思想认识是多么一致呵! 过了元宵之后,我们三人一起离开长沙,经过武汉才分手的。我们还在武昌蛇山黄乃父亲的铜像下照过像。现在我的幸存照片中,有一张立徵和我的半身像,是特意在汉口照相馆中照的。立徵家中还找到一张他在船上的背影全身照,则是在轮渡上由我拍的。"一二·九"以后到 1937 年 5 月我离校前,我们的通信更加频繁。1936 年暑假他没有回家。那时,我在校内外活动甚多,36 年下半年开始寻找党的关系,37 年年初正式成立党的武汉临时支部。1936 年下半年全国救亡运动中,各地大体都开展过援助绥远抗战的活动。立徵写信告我,他参加北平学生组织的一个口琴队,到绥远前线劳军,就便游了云岗石窟,寄来许多照片。为找到党的正式关系,1937 年 5、6 月间,武汉临时支部武大小组的三个人,杨纯(万国瑞)、谢文耀和我先后来到北平。5 月中旬,立徵即离开学校,同我们住到一起。我们先后同北平市委和北方局的同志接头,商议在武汉建立党的正式组织问题。由于时间急促和繁忙,我竟来不及介绍立徵入党。芦沟桥事变之后,谢文耀先回武汉。8 月中旬,我与杨纯、立徵三人经天津到济南,不准备南下

了，随即参加韩复榘的三路军受训，以便留在山东打游击。我因故中途退出，于 11 月间到泰安。立徵于结业后，被分配到鲁北城武县当民训督导员，在泰安还收到过他从前线寄来的信，说那里举目无亲。1938 年 3 月间，我从徐州到武汉参加全国学联代表大会时，一天，突然在武昌的民先队部见到立徵，才知道他在城武很难立足，找不到任何可靠的进步关系，在敌人临近时，撤退下来，辗转回到武汉找组织关系。于是我与谢文耀正式介绍他入党。3 月中旬，我们一起来到徐州。离开武汉时，长江局组织部让我带领十多个青年同志到徐州前线，相机转入山东敌后。到徐州后，同苏鲁豫特委负责人郭子化商议，这一批同志全部到鲁南敌后去。从此，我就同立徵分手了，再没有通过信，也一直打听不到他的消息。直到 1949 年 6 月南下途中，才从金明同志处知道，抗战胜利前不久，立徵已在鲁南牺牲。

前面谈到，1979 年收到立徵表弟寄来两大包材料时，我就想为立徵写一篇较详细的传记，而终没能写成，这是由于工作忙，更由于他在抗战时期的情况我完全不清楚，手中只有这些简要的“证明材料”。经过几番周折，这些传记材料又在一个地方被耽搁了。我断断续续写出以上这些回忆，为了存真，大段大段摘录下来他写给弟弟的家书。这些，大体上反映了从“一二·九”前后到参加抗日游击战争这一时期，立徵的为人、治学和思想的片断情况；至于最重要的八年艰苦抗战的情况，就只有让他的表弟千辛万苦搜集“证明材料”及其经过，如实地勾勒出一个轮廓。这个轮廓也可说是为了恢复烈士本来面目的一曲“寻兄记”。这也附带说明二、三十年来，我们各项工作中“左”的危害特别是在湖南这个地方曾何等严重。

据表弟告我，丁家堂当地群众埋葬立徵——他们的文科长

时，找到当地大地主一口名贵的棺材，将立徽的随身物件包括他的装满笔记本的旧挎包，一起放入棺中。我真幻想有朝一日，能为立徽迁葬时，如挖掘古墓一样，这些笔记本仍完好地自棺中找出。那么，抗战八年残酷斗争的鲁南游击区中，一个活生生的，为当地群众无限爱戴的战士和领导者的形象，他的音容风貌，就会更加明晰地出现在世人面前。

铁如寻兄记

“你知道一个名叫文立徽，化名赵宓的人吗？”

多少年中间，陈铁如几乎是逢人就问。至少，每当他遇到抗日战争时期在鲁南一带战斗过来的同志，总要提出这个问题来。他也千百次地得到了同样的回答：

“不知道。”

当然，有的人的回答并不这样简单，他要求陈铁如把问题提得更具体一些，多提供一些有关的细节，以便思考。但是结果仍然是抱歉地表示：“不知道。”

陈铁如在山东临沂拖拉机制造厂工作，是从部队转业下来的。他为什么这么执著地一定要打听这文立徽的下落呢？

文立徽是他的表哥。陈铁如舅舅家的表兄弟姊妹很多，立徽最大。小时候他常常同妈妈到舅舅家去，可是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一位年纪比他大许多的大表哥。原先，他听说大表哥在北平上大学，后来抗日战争开始，又听说他在山东打仗，年纪更大一点，更听说他当的是八路军……。尽管没有见过面，但他常常听到爸爸妈妈夸奖大表哥，说他在学校里功课好，说他肯帮穷苦人的忙。有钱人家往往是看不起穷亲戚的，文家可不是这样。

陈铁如听妈妈说，她每次回娘家，立徵待姑母总是又恭敬又亲热，问长问短。到要走的时候，他也总是买好车票送上车去。那时陈家没有钱供孩子上学，陈铁如的两个姐姐也就是由这一位大表哥带到长沙念书的。由于常常听到妈妈爸爸说起他，陈铁如对这一位从未见过的大表哥似乎是很熟识了。

1949年全国解放，可是这一位听说当了八路军的大表哥并没有回来。舅父文九德在军界工作多年，有一些故旧在人民解放军任职，他向这些人打听大儿子的下落。有的人没有听说过，有的人说是听说过但是不知其详，还有绘影绘声的传闻，说他现在是人民解放军某一个支队的司令员……。一切熟识的人都问遍了之后，没有办法，文九德就在《人民日报》上登出了“寻人启事”。他们家里还写信向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国务院人事局、《解放军报》、《中国青年报》等各处寻找，回信都是“查无此人”！一个不祥的阴影逐渐出现在家人的心头。如果他还在人世，也该主动找家人联系了，莫非已经殉国了吗？万一真是如此，他又牺牲在何时、何地呢？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当时还在念初中的陈铁如，怀着满腔的热血，响应号召，报名参加了军干校。开始他被分配在一个机要学校学习，后来因为“社会关系复杂，不宜于做机要工作”，被调到海军的一个工厂。过了几年，又根据一个什么“几清几查”的命令，一夜之间，他又不宜于在军事工厂工作了。陈铁如想，说他社会关系复杂，大约是因为舅父文九德在旧军队工作多年吧。后来他才知道，不仅是舅父，解放后一直下落不明的大表哥也不知怎样被定为“伪军官”了。这种谣言他早就有所风闻，到了1967年，陈铁如竟收到北京医学院一个什么“专案组”寄来的这样一份“函调提纲”，其中指供的项目之一是：“文立徵何时参加

伪军？任何职？现逃往何处？”天哪，血口喷人，这么多活着的人遭到污蔑还不够，已经为国捐躯的先烈也要被骂得狗血淋头吗？悲愤的心，使陈铁如越来越下定决心，非找到大表哥的下落不可！

湖南衡山县的民政部门也不知道他们这地方出了一位死不还乡的英烈。立徽的继母、弟妹在家乡，根本不被当作烈士家属看待。相反，立徽的“伪军官”身份，虽然不可能有任何材料证明，却是被毫无疑义地承认了。凡是“伪军官家属”所应当“享受”的种种“待遇”，他的继母和弟妹是一项不缺地全部“享受”到了：不能升学，不能招工，不能参军，不能入党，不能……

1953 年，陈铁如在海军军械部上海训练队学习，就近写信给华东军区政治部干部部查询，不久回信来了：“因你信上未写明他原部队的详细番号与职别，故无从查询，你若知其部队番号与工作等情，可告知我们，以便代查。”这一些陈铁如全不知道。他只知道大表哥当了八路军，在鲁南打过仗。陈铁如还请军委总政刊登了《军属寻人名单》，也没有结果。

为了多了解到大表哥的一些情况，陈铁如写信给在家乡的父亲，请他到舅父家去找找看，看能不能够找到一点大表哥的证件、信件或其他什么的。结果只找到了他在北平求学期间写给弟弟立徽的十几封信。1939 年冬天，他在山东峄县周家营以友人口气寄回的信，1943 年从临沂寄回的信，比较详细地谈到当时战争生活的，可惜都找不到了。找到了的这些给弟弟的信件，处处显现着一个向往革命的青年的热烈的心，其中记述他参加“一二·九”运动情况的那两封信，几十年之后读了都令人激动。陈铁如读着这些信笺已经发黄、变脆的信件，更增加了对这一位兄长的敬爱了。

也真是无巧不成书。陈铁如因为受到文立徵这个“复杂”的社会关系的连累，不宜留在军队工作，转业到地方，全国三十个省市自治区，两千多个县市，别的地方都不叫他去，辗转让他到了临沂。这里属沂蒙山区，正是当年文立徵战斗的地带，也许在无意之间，他也曾踏着当年大表哥的足迹。这种巧合更便于他打听大表哥的下落了。那是在六十年代的头一年，他参加了新建拖拉机厂的工作，接触的人不少。每逢遇到参加革命较早的老同志，他都问：你知道文立徵或者赵宓这人吗？不管在理发店里，在公共浴池里，还是出差住在招待所里，他几乎象一个精神病患者一样，象希腊神话中的斯芬克司一样，执著地向人们提出同一个问题来，在失望了一千次之后，依然一千零一次地提出问题。他下决心要在浩瀚的大海里捞出这一枚确实存在过的针来。

陈铁如永远不会忘记 1968 年 12 月 29 日这个日子。这一天他遇到了山东省招远县的岳风成。谈话中，他知道了岳风成抗战时期在这一带打过游击，于是也并不存特别希望地提出他的老问题来了：

“你知道一个名叫文立徵，化名赵宓的人吗？——他是我的表哥，也在这一带打过游击的，现在下落不明了。”

“赵宓——，我见过。”岳风成沉思了一下，回答说：“那是 1939 年，我刚参军不久，在台儿庄听过他作的报告。”

“当时他干什么工作？”陈铁如急切的问。

“他是我们鲁南沂河支队支队长。个子不高，胖胖的，说话带南方口音，那时大约三十岁吧。”

至于后来的情况呢？岳风成就不知道了。

问题并没有解决，但是朝问题的正确解决迈出了真正的一

步。从此，问题的提法可以更具体一些，范围也更广阔一些了：

“你知道抗日战争中鲁南沂河支队的情况吗？你知道现在何处有沂河支队的同志吗？”

首先，陈铁如向临沂地区直属机关的老同志打听，寻找还健在的原沂河支队领导人的姓名、地址，逐渐地也得到了一些线索。

1973 年，立徵的妹妹立御通过另外的途径听说：抗日战争中，我冀鲁豫军区第二军分区有个赵谭支队，支队长为赵宓。她没有能够打听到更多的细节，就把这告诉了陈铁如，请他循着这线索追寻下去。同时她把自己珍藏的大哥的唯一一张相片，1934 年在长沙拍摄的，复印了许多张寄来，好让陈铁如拿给立徵当年的战友去看，帮助他们回忆。

陈铁如辗转打听到王献廷、韩去非、杨士法三人了解情况，就写了信要去问，但他只知道他们原在上海工作，不知道具体地址，就将信寄往上海市革委会组织组，请他们转交。不久，原信退回：应通过组织按规定手续办理！托转几封打听表哥下落的信有什么规定手续呢？幸好世上总有热心人，苍山县物资局的于广明帮助他找到韩去非的地址了。1974 年 5 月 16 日得到了第一个真正的突破。这一天，陈铁如收到了当年鲁南三军分区政治委员韩去非的复信。信中说：

关于查询文立正同志下落的信，刚已收阅。所说文立徵(赵宓)，这可能是文立正同志的原名。

文立正同志是在一九四一年三月由山东八路军鲁南军区派到鲁南军区第三军分区(即今临沂、郯城、邳县、峄县之平原地区)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到一九四二年春，

文立正同志又被鲁南军区调到铁道游击队任政治委员。据说文立正同志到铁道游击队只十八天，在对日寇作战中英勇牺牲。津浦铁路西，具体地址不详。

对文立正同志在一九四一年三月来到第三军分区工作之前的历史情况不详。当时的鲁南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长为唐健如同志，现为山东军区政治委员。一般说来，组织部长对干部的革命历史情况，是比较熟悉的。但也年长日久，人也年老，记忆衰退，希设法向唐健如同志进行了解。

一九五〇年我被调到中共济南市委工作时，曾听到许衍梁同志（现在济南市革委工作）谈过他和文立正同志原在北平辅仁大学同学。文立正同志可能是一九三七年曾到济南。一九三七年十月济南沦陷前离开的。为此，希向许衍梁同志进行了解。

我对文立正同志的情况不大了解。因我正是一九四一年被调离三军分区之后，他才被调到三军分区工作的。我在一九四二年又被调回三军分区工作时，他已被调到铁道游击队工作，所以只是认识，但不熟悉他的历史情况。据我所知，他还未结婚。

韩去非不但复信提供了自己知道的全部情况，介绍了唐健如、许衍梁两个重要的调查线索，而且在复信之后他也帮着打听文立徵的情况了。他找了上海原在鲁南工作过的同志交谈，找了原八路军一一五师运河支队政委、上海房产局党委书记朱道南。提起文立徵，朱道南记得十分清楚，马上写了一份详细材料，请韩去非转陈铁如。这份 1974 年 9 月 15 日写的材料说：

文立正同志湖南人，其父曾在保定军官学校毕业，一九二六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期内曾担任第八军唐生智的团长，一九二七年初调任黄埔军校长沙第三分校步兵大队长，当时倾向共产党，拥护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一九二七年马日事变以后的情况就不清楚了。

据我所知，文立正同志的生母去世后，其父又结了婚，生有弟妹数人。文立正同志在长沙某中学结业后，考取了北平一教会大学(曾同我谈过大学的名称，我忘记了)。他的思想比较进步，依靠共产党，痛恨国民党反动当局未放一枪放弃了东北四省，据说当时曾同平津同学会有联系。约在一九三七年下半年，和北平郑琳(女)等同志到了徐州，和我们的苏鲁边区特委书记郭子化同志接上关系(郭在徐州第五战区动委会兼做统战工作，文化大革命前任中央卫生部副部长)。一九三八年春文立正、郑琳等同志由于徐州形势紧张，随郭子化、张光中同志到了山东鲁南地区抱犊崮以西南唐等地，参加第五战区鲁南人民抗日义勇总队(我党领导的部队)工作。到了一九三八年四、五月间，特委决定我兼任鲁南民众抗日自卫军(我党领导的武装)政训处长，文立正同志担任副处长(我只兼任名义，实际工作由文去做)。当即我和文立正等同志带义勇队一个大队出山到台儿庄一带活动，过了二三天又回到峄县四区周家营一带，和国民党几个比较进步的司令共同协议成立了山外抗日军联合委员会。由于工作需要，报请特委同意，在周家营以北的白楼办了一个青年训练班，由文立正同志负责主持。接着我去山里参加反顽战斗。到了一九三八年的七月份，国民党特种工作团(CC 领导的，和我们有统战关系)第五大队的邵剑秋

抗日比较坚决，政治上亦较进步，一再要求文立正同志到他那里帮助政治工作。经特委同意，文到邵部工作。到了那里以后，发展了党，不久成立了党的支部。文立正同志的威信颇高，为所有的下级干部和士兵所爱戴。为邵剑秋的部队一九四〇年改编为八路军一一五师运河支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可说这是文立正同志工作的一大成果。

一九三八年秋组织上调我到友军国民党第三专署保安第五旅工作，这个部队土匪成分，工作非常难搞，政治工作必须积极展开。一九三九年初我去山东分局找到统战部长郭子化同志，经过郭的同意调文立正同志到保安第五旅担任政治主任。到了一九三九年秋，组织上调我和文立正同志带保安第五旅回到了鲁南。由于工作需要，组织上决定调文立正同志重回特种工作团第五大队，到邵剑秋等部改编的八路军一一五师运河支队去工作，文担任了运河支队的政治主任。一九四一年我不再兼任运支政委，从此与文立正同志分手。以后他也离开运支，到八路军沂河支队工作。此一情况可向韩去非、王献廷同志了解。

约在一九四三年文立正同志被派到二地委担任工委书记。这个地区是最艰苦，斗争最复杂、最残酷的地方。文立正同志坚持战斗，毫不动摇。所惜由于武装力量单薄，加上人地生疏，于一九四四年秋，他带一警卫员在铁路以西（临城沙沟夏镇附近）某某村里夜间隐蔽，为国特侦知，勾结日特武装偷袭，不幸遇害，壮烈牺牲。（具体情况问山东泰安建设兵团副参谋长王墨山同志。）

文立正同志自从一九三八年初来到鲁南地区，为党做了大量工作，在极其艰难困苦复杂尖锐的斗争中，英勇战

斗，勤勤恳恳，老老实实地埋头苦干，做出了良好的成绩，最后为党的事业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他不愧为优秀的共产党员，党的好儿子，是一位值得我们学习的好同志。

根据朱道南的建议，陈铁如又写信给王墨山，向他了解文立徵遇难时的具体情况。9月25日，王墨山写来了回信：

文立徵同志是一九四三——一九四四年由中共鲁南区党委派到滕沛峄办事处（后改为薛城县）工作的，当时我任办事处主任。由于抗日战争的胜利发展，敌占区逐渐缩小，我占区逐渐扩大，滕沛峄办事处正在扩建为二地委。文立徵同志就是派到二地委工作的（参加二地委的领导）。他是在一次到敌我活动区去开展工作，在夜间宿营时，为敌特袭击而牺牲的。当时陪同他的有区长范有功同志。

王墨山不但提供了材料，还在信中无限深情地对陈铁如说："我们虽未见面，你既是文立徵同志的亲属，我们就有了阶级的感情，我希望你有机会来泰安。文立徵同志的善后问题，凡要我协助办的，我一定尽力而为。"

陈铁如也深深为这种感情所激动。他从这许多人写来的材料中知道大表哥确实已经不在人世，当然很觉悲哀，但他同时知道了大表哥是死于抗战的烈士，又为自己有这样的兄长而自豪。他想尽量详细地弄明白大表哥的生平事迹，他要循着已经找到的线索继续追寻，不断将调查询问的信件寄出去。

在很长时间里，陈铁如只是私下做着这一切。他的业余时间，那怕是一星半点的闲暇，都 用在这件事情上了。多少年如

一日，他写了字以万计的信件。没有静电复印设备，就利用氨熏晒制图纸的设备来复制材料，一笔一划地先照描在描图纸上，尽量不失原貌。他爱人也支持他，尽管身体不好，还是强把全部家务揽过去，让陈铁如腾出手来，多一些时间写查询信，描证明材料……当临沂拖拉机制造厂的领导知道他在做这一件事情以后，马上表示了支持。按说，查明一位烈士的事迹与拖拉机厂的业务并无直接关系，但是这个厂的党组织不是只看到拖拉机与革命史无关的这一面，而是把制造拖拉机和弄清革命史都看成党的事业。他们积极支持了陈铁如的这一工作，例如打印、晒制材料都给予方便。周围同事也热情帮助他，对这事都很关心，争相传阅一些答复询问的信件。都为调查的每一步进展感到高兴。有的人主动分担陈铁如的工作任务，使他有可能外出作一些调查和访问。

通过广泛的通信调查，陈铁如已经掌握了大量材料和线索，也从这些材料中发现了一些有待进一步弄清楚的地方。他向厂领导提出：希望能到济南、泰安、济宁等地去访问一些老同志，进一步调查清楚烈士的事迹，并且看看烈士的遇难地和坟茔。厂领导支持了他的计划，并且派了一位同志陪同前往，协助他工作。1975 年 4 月 3 日出发，陈铁如他们进行了近一月的调查和访问。

清明节是扫墓的节日。4 月 4 日和 5 日，连续两天，陈铁如来到了大表哥的坟前。坟墓在滕县西岗公社丁堂大队，南靠昭阳湖，西接城廓河，东依甘桥村打谷场，北面一望无垠的肥田沃野一直延伸到远处的防风林带。这里是一片开阔地的制高点。文立徵就静卧在这里，听着澎湃的湖水和呼啸的林涛，看着他如此熟识亲近的乡亲们的辛劳和愉悦，陈铁如被村里男女老幼友

好地环拥和维护着。当年的妇救会长、儿童团长和民兵连长紧握着他的双手，久久不肯放开，说：见到你，就象又见到文科长了。陈铁如在大表哥的坟前深深默哀，他默念着：大表哥，我来了。日夜在想念着你的亲人们叫我来看望你了。……扫墓过后，陈铁如还去凭吊了大表哥遇难的房间：原临城县六区区委旧址。北墙与门框上，一个个弹着点还清晰可辨，它记录了革命先烈的浩然正气，也记录了敌寇汉奸的血腥罪行。

在泰安，王墨山亲热地接待了陈铁如一行。并给写了致唐健如的介绍信。到济南，正碰上军区开会。唐健如抽不出身来，但是他即另约了会见的时间，细读了留 下的材料。原先约定是星期日相见的，当他星期六听说陈铁如他们已经来到，马上就接见了。唐健如不但谈了材料，写了材料，材料中既实事求是地说明他没听说过赵谭支队这个番号，也提供了一些重要情况，他还请省军区政治部把材料寄给了湖南省衡山县民政局，附以公函："我部唐健如同志为文立正同志所出的证明材料属实。根据文立正同志的情况，应定为烈士。"

在济南军区干部休养所，陈铁如访问了文立徵当年的战友董明春。他说，一年来，唐健如两次找他共同回忆文立徵的材料。他告诉陈铁如："文立正同志虽然是大学生，但生活艰苦朴素，整年穿件破旧衣裳，时常光着脚丫子，背个文件包。他去运河支队时，在我那里（鲁南湖边支队）住了十多天，太冷，我还送了他一双袜子。他 1938 年就担任团职，以后整编部队，有时担任师职，有时又任团职，他从不计较，任师职或到基层都一样认真。"

在济宁，陈铁如找到了范有功。范说："接到你的信，我一夜没有合眼。我常常回想起文立正同志，我多次跟他一同作战，他

常来我的连队帮助工作，还手把手地教我写字学文化，我病了，他煎药端给我喝，真比亲兄弟还亲。”

范有功详细地介绍了文立徵牺牲的情况：“1944 年 6 月鲁南二地委二军分区成立，文立正同志被派到二地委担任宣教科长，我调临城县六区区长。1945 年正月初，文立正同志从二地委住地来到六区（这时区部驻丁家堂村，现在是滕县西岗公社丁堂大队）检查扩军情况，帮助巩固地区，并且为我们区办党训班讲党课。刚到三、四天，于正月初十深夜 12 点左右，文立正同志在宿营时，由于内奸（区中队三班副班长）徐宜南勾结国民党伪专员大汉奸申宪五的匪兵，对区部机关突然袭击，文立正同志不幸头部中弹，当即牺牲了。我们区中队打跑了敌人，第二天到了丁家堂村北的两河岔村大地主家找来一口好柏木棺材，我们区机关干部战士和广大群众十分悲痛地将文立正同志连同他的背包衣物成殓。安葬之后举行了追悼会。所有这些善后工作都是我主持办理的。人们都很怀念他。每逢清明节、国庆节，都有许许多多的人到墓前凭吊，开会纪念，献花圈，向青年学生讲述他的事迹。”

当年在六区青救会工作的张秀桐，还记得追悼会上所唱的问答体的挽歌：

什么人造成丁堂惨案？什么人带路当的汉奸？什么人为国殉的难？什么人准备大报仇冤？

申宪五造成丁堂惨案，徐宜南带路当的汉奸，文科长为国殉的难，同志们准备大报仇冤！

后来，申宪五和徐宜南这两个凶手都被捕获处决了。

范有功还和陈铁如谈起，大约就在1949年大队伍南下期间吧，文立徵的妹妹曾经来过，她是在北京工作的，先找到了滕县县委，向当时的县委书记陶友亮详细询问了文立徵牺牲的经过，安葬在什么地方，凶手处决了没有……县委特地为她组织了一些知道情况的老同志开座谈会，并领她到墓地凭吊……。骤听之下，陈铁如有点觉得诧异。他十分清楚，他本人是亲属中来扫墓的第一人。在他之前，哪一个表姊妹也没有来过，也从来没有哪一个表姊妹在北京工作。陈铁如猜不出这人是谁，但是他深深被她的行为感动了。他想：他们虽不是同胞兄妹，但必定是有着很深的革命友情的战友。她一定也是很尊敬大表哥，愿意自己是他的妹妹，并且以此为自己的光荣吧。所以，她才不远千里，来凭吊故人的坟茔，大有古人素车白马的遗风。对于这种高贵纯真的感情，陈铁如是能够理解的。这一个月的访问中，他接触了许多人，大表哥当年的许多战友，他们谈起他来，还是那样的亲切，深情，还能谈出他许多轶事。呵，谁说大表哥早已不在人世了呢，他还活着，活在当年战友的心上，虎虎有生气地活在人们的记忆中。

陈铁如知道了大表哥曾经是铁道游击队的政委，他联想起那一本以铁道游击队的惊险情节获得众多读者的小说，就把这书找来细读了。小说作者在后记里说，他同铁道游击队的干部战士十分熟悉；还说，他最先认识的是政委李正的模特儿，那是1943年在山东英模大会上。陈铁如想：这一位作家一定很熟知铁道游击队的情况，于是就写信向他讨教，热切地希望从他那里获得大表哥的一些材料。可是回答却是令人失望的：他说，铁道游击队前后几个政委他基本都知道，其中并无文立正，他“认为文很可能在铁道游击队前期或在微山湖边和铁道游击队一道活

动过的其他游击队工作过”。不过这位作家表示:当年铁道游击队的领导人杜季伟、刘金山等人是他小说中人物的原型。当年躬与其役的这些同志毕竟更加了解情况,杜季伟写的材料中说:“文立正同志 1943 年秋确实在铁道游击队工作一段时间,当时任职政委。相处不久,我即调离铁道游击队。我对文立正同志印象较深,他学习认真刻苦,政治思想老练,工作积极负责,作风艰苦朴素,作战勇敢,对党忠诚。”刘金山写的材料中说:“文立正同志是 1942 年 11 月调到铁道游击队工作的,只有八个月左右,他就调到滕县武工队去了,任武工队政委。”1978 年 6 月,陈铁如到上海,看望了朱道南,顺便谈到这事,朱道南说:“作者不知道。他 1944 年以后才搜集素材写小说,以前只是随军记者。”在一次访问中,邵剑秋也同陈铁如谈起文立徵在铁道游击队的时间,他说:“恰恰不是早期,而是 1943 年,那时我同他还在郯(城)马(站)地区相会过一次。”陈铁如收到了上百份材料,尽管一些材料在年月地点之类细节上稍有出入,对于文立徵担任过铁道游击队政委这一基本事实总是众口一词予以肯定的。其实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文立徵在铁道游击队当政委,只不过是他十年革命生涯中短短的几个月。即使没有这一段,他还当过鲁南人民抗日自卫军政训处副处长,当过友军保安第五旅政治部主任,当过八路军一一五师运河支队政治部主任和副政委,当过鲁南军区第三军分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代理过独立支队政委,而铁道游击队即属于独立支队建制。陈铁如不是要为烈士多争一个头衔,而是为了弄清楚一段史实。

陈铁如搜集到的材料越来越多。这些材料每篇孤立起来看,写的虽不过只是一枝一节,但集在一起,一个栩栩如生的形象就凸现出来了。1975 年 10 月,他把所有重要材料的复制件

都寄了一份给湖南省衡山县民政局，接着又遵照民政局的意见寄去了原件。这些材料对于证实文立徵的烈士身份，对于推倒横加在他头上的“伪军官”这诬蔑不实之词，应该说是足够了的。

可是，在极左路线的影响下，要办好这件事竟是如此的烦难！文立徵要走进烈士的祠堂，还得跨越多少障碍啊。为了这事，陈铁如和文立徵的弟妹们同衡山县民政局纠缠了六年之久。

因为陈铁如寄去的证明材料大都是给他个人的复信，需要补盖公章方为有效。这是正当手续所必须的，无可非议。这样，就要耽搁若干时日。

因为许多材料写的是“文立正”，山东军区政治部来信说“应定为烈士”的也是“文立正”，而陈铁如的表兄名叫“文立徵”，这究竟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其实，这是一个早已解决的问题：张新华写的证明说：“文立徵同志原名立徵，后自己简化，改为‘立正’。这名字是在统战部队改的。”邵剑秋也证明了这一点，他说：“老文改名立正，就在我那个部队，当时我劝他：‘你改它干什么？’他却说：‘徵字笔画太多，还是改了好。’”就因这一字之差，几乎弄得“查无此人”，这样又得拖延若干时日。汉字简化，“徵”已简化为“征”，又是问题 。

因为许多证明材料都没有写明文立徵或文立正的籍贯。只有朱道南一人说文是长沙人。“我县也有个文立徵，多年没有信息，与朱道南所介绍的略有相近，为了避免弄错，请朱道南将文立徵的家庭情况写得更加清楚一些……”公函寄到朱所在的上海房产局。朱道南对于他们这种对烈士毫无感情，拖拖沓沓的态度很不满，但还是详详细细写了一份材料加盖公章寄了去。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时间就在不断的节外生枝中无声无息地过去了。为什么老是这么拖着不办呢？后来才明白了这

奥妙:一次,立徵的弟妹到县里去询问,接谈的同志无意之间提到:“以你们的家庭出身,能不能享受烈属待遇还是个问题。”这样说也真太伤人的心了。人家的哥哥,为了革命,自愿地把自己的生命都献了出来,难道说他们忍心拿哥哥的这一条性命来给自己换取一些什么?不是的,他们什么也不需要,只希望洗净横加在哥哥英灵上的那些污蔑,使他享有本来应该属于他的荣誉,就心满意足了。至于说到出身,彭湃烈士又是什么家庭出身呢?朱道南在致陈铁如的一封信中说:“追认文立正同志为烈士,这不只是文的家属光荣,也是衡山县的光荣。”

在大体上肯定文立徵是革命烈士之后,衡山县民政局在1978年6月3日给立徵的弟妹立微,立御的复信中,又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

现在的问题,这个烈士在一九三七年八月以前是什么地方人,在什么部队或学校工作。什么地方入党(时间),除个别一点线索外,我们查了大量单位,终未弄清。

你大哥文立徵从长沙至北京辅仁大学化学系这段情况,我们已弄清,你大哥是一九三六年离开学校的(原因不明)。

从这两项得出的结语是颇带威胁性的:

一九三六年六月至一九三七年八月这段时间只要联系上了,有证据了,我们定会井(整)理上报。联系不起来,不会井理上报。

不知道是为了嘲弄还是为了抚慰，信里面还写了这样几句："办理烈士手续，我们衡山人不能说内行，但必定知道一点，特别是上级规定、要求。希你俩不要担心，着急。"

这真有点叫人啼笑皆非。已经有那么多详尽确凿的材料证明文立徽的基本情况，证明了他是在敌后的战斗中死于敌寇汉奸之手，即使一时找不到他的入党介绍人，不了解他入伍前一年间的情况，应该也完全可以认定他为革命烈士了。路友于，张挹兰，闻一多，李公朴，杜斌丞，杜重远，杨虎城……这许许多多的人都不曾入党，不也是公认的烈士吗？何况已经确知道文立徽是党员，不能确定的仅仅是他入党的时间。他的党龄长一点或者短一点，对于是否能定他为烈士难道会有决定性的作用吗？

陈铁如也不知道大表哥是何时何人介绍入党的。他马上为打听这事而奔忙起来，一一给一些老同志写信请教，一些热心的老同志自己虽不知道，还是苦苦思索可能知道的线索，他们又向一些人发出询问的信去……

文立徽的入党介绍人是李锐。有人告诉陈铁如，只要找到李锐，就可以弄清楚文立徽入伍以前一年的情况了。陈铁如不认识李锐，也不知道上哪里找他。几经打听，他知道了李锐原来是水电部的副部长，在 1959 年庐山的那一场风暴之后即从地平线上消失，不知何往了。有人写信告诉他，听说"文革"前李锐在北京郊区某县任县长。还有人说他还关在牢里。文立徽的战友、当年运河支队的司令员邵剑秋，在安徽就打听到了三个名叫李锐的老干部，一个是安徽省科委的党委书记，在新四军二师工作过，不认识文立徽。后来，终于辗转打听到了一点线索，于是他就在 1978 年 12 月 11 日给安徽省地质局长曾星五写了这样一封信：

星五同志:你好!

现有一事相托,抗日时期与我在一起工作的战友文立徽同志,文原籍湖南衡山县人,一九三六年在北平辅仁大学化学系读书,三六年六月后离开辅仁大学,三七年八月("七·七"事变后)文立徽和其他人由北京经天津到山东,作抗日救亡活动(据了解此时文立徽同志已是中共党员,带有组织介绍信),三七年冬国民党山东主席韩复榘不战而退,三八年春文立徽到武汉,经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即长江局)介绍到敌后沦陷区鲁南工作(中共苏鲁特委书记郭子化处),三九年冬任我八路军运河支队政治主任,从四一年到四五年先后在鲁南第三、第二军分区工作(文立徽同志在运河支队工作时,改名为文立正,当时曾以友人口气给家乡写过一次家信,因此他的衡山县亲属,知道文在鲁南)。一九四五年一月文立徽同志在鲁南滕县丁家堂牺牲(坟茔尚在)。

前年(七六年)文立徽同志的表弟陈铁如与我来信说:全国解放到现在,湖南衡山县地方政府尚未承认文立徽同志为革命烈士,甚至对其亲属歧视,原因是文立徽同志的父亲是国民党高级军官,并怀疑文立徽逃亡在外,也是坏人。近年以来,经陈铁如与原在山东同文立徽同志一起工作的老同志联系,收集许多证明材料,转给湖南省衡山县民政局。现在衡山县民政局认为,从一九三七年八月文立徽离开北京,到一九四五年一月在鲁南滕县丁家堂牺牲的文立正,证明材料业已弄清。但他们仍不承认文立徽同志为革命烈士,理由是:文立徽三六年六月前在辅仁大学化学系读书,不是中共党员;三六年六月后请假离开辅仁大学,到三七年八月离开北平去山东,这一段时间文立徽在什么地方?

在何部门或学校？什么地方、时间入党？尚无人证明，未能查清。因此，湖南衡山县至今仍不承认文立徽同志是革命烈士。

据同文立徽同志三七年八月一起由北京经天津到山东的同志说，知道文立徽同志这段历史情况的是李锐。李锐是湖南人，早年负责湖南"民先"工作，三六年三七年与文立徽同在北平。全国解放后在中央水电部工作，五九年犯了错误，下放到佛子岭磨子潭水电站。

星五同志，你在安徽水电厅(局)工作多年，你对佛子岭磨子潭水电站的情况比较了解。你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也在鲁南工作，你也会知道文立正同志。咱们未牺牲的人，为了对革命烈士负责，请你在省通过组织找到李锐，回忆一下，写个证明，证明文立徽三六年六月到三七年八月这一段时间的历史(如能知道三八年春文立徽由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介绍到苏鲁特委郭子化同志处情况亦好)，以便转给文立徽同志家乡衡山县地方政府追认烈士。

请速找李锐，并请将找的结果来信告我。并将李锐住址告我。

曾星五不负所托，他接到邵剑秋的信，马上设法去找李锐。这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开过，已经开始着手平反历史上积累的那些冤假错案，我也经中央组织部批准，1978 年 10 月，从磨子潭来到了合肥就医。1979 年 1 月 5 日，曾星五在合肥找到了我，第二天，1 月 6 日，我就回北京了。多年来，一直不知道立徽的更多的消息，也怪自己没能向山东有关方面着意打听。在八年的单监生活中，追怀往事，立徽的音容笑貌时时浮现在我

的眼前。

我按照曾星五的要求立即写了如下证明材料：

一、我与文是长沙岳云中学的同班同学，好朋友，志同道合。一九三四年同去北平考大学，他考入辅仁化学系，我考入武汉大学。他参加“一二·九”运动游行的当夜，即将当天的情况，写信告诉我了。这封信在武汉大学起了点火的作用。

二、一九三七年五月，我到北平接上党的关系。他当时与我同住在北平翊教寺，实际上即已离开学校。八月，我们一起到济南，加入韩复榘三路军的干训班。这个班结束时，日寇已临近山东，他被分配到鲁北城武县。大概在日军侵占时，他与地方没有建立关系，辗转回到武汉。一九三八年三月，我到武汉参加全国学联开会时，碰见了他。当时党组织让我带一批青年(内中大多是党员)到徐州去工作，并相机进入山东。这时我与武大同学谢文耀(党员，已牺牲，文同我们住在翊教寺时，谢也在北平，因而熟识)，介绍文入党，但未履行正式手续，即匆匆离武汉到徐州了。

三、三八年三月到徐州，我与郭子化同志(苏鲁特委)接头后，即将长江局组织部的介绍信及党员关系交与郭，并对郭说明，其中文是由我介绍入党的。这批党员随即由郭介绍到山东去了。当时特委留我在徐州工作(我本来也准备去山东的)。

四、之后，我与文即失去联系。

〔附：长江局组织部即在八路军办事处，是刘顺元同志写的介绍信。〕

我把这材料交给了曾星五，同时表示，很想更多了解一些文立徵家庭的情况和他到山东以后的情况。邵剑秋把这些转告陈铁如，一月底陈铁如就给我写信，叙说了几年来为了调查这事的曲折经过，并寄来前述一大本调查材料的复制件。看了这些材料，真是如见故人。从此我也就关心起这件事来。

几年的信件往还终于有了结果。1980 年 8 月 20 日，湖南省民政厅的批复下来了："关于追认文立正同志为革命烈士的问题，根据调查材料，文立正同志是革命烈士，鲁南早已认定，临沂县烈士陵园有他的名单和史料，不需要再办批准手续。待 1981 年统一换证时再补发牺牲烈士证明书。"呵呵，"不需要再办批准手续"的，拖了五年才办妥，如果需要办批准手续的，该拖多少年呢？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就在拖的这些年月中，写过材料的郭子化等几位老同志已经不在人世了！今年 3 月，收到上海寄来的朱道南同志去世的讣告，遗憾的是我与道南同志生前无见面之缘。1983 年冬，已经离休的邵剑秋同志，从安徽到北京来时特地找我恳谈，他说这是一了平生的夙愿——来会见战友的战友。

衡山县民政局已决定：整理文立徵的材料附在"毛泽东同志考察农民运动旧址"（衡山康王庙）里展出，一同展出的还有毛泽建、欧阳海等等烈士的事迹。

多年的奔走劳碌，总算有了结果。陈铁如有了如释重负的感觉。他可以告诉大表哥：在你的家乡，乡亲们都知道你，都在记念你。

在十年动乱中，我被关在秦城监狱，怀念立徵时，做了一首七绝，其中三、四句为：

忠魂定不回衡岳，日出当观泰岳巅。

这首诗的寓意是准确的。鲁南的人民是何等怀念文立正呵。最近收到山东滕县县政府来信，谓该县烈士陵园将进行扩建。“文立正同志是我县四位著名烈士之一，为我县的解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要我为立徵撰写碑文。在这之前，表弟陈铁如就受命撰过碑文，我以为是恰当的。碑文如下：

文立徵，又名立正，字国遒，湖南衡山人。一九三四年入北平辅仁大学化学系，为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一九三七年入伍，一九三八年三月入党。抗日战争时期，在鲁南历任八路军一一五师运河支队副政委兼政治处主任，鲁南第三军分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独立支队代理政委兼铁道游击队政委，鲁南区党委所属二地委委员，宣教科长等职。一九四五年二月二十二日，于原临城县六区丁家堂村开辟工作时，因叛徒告密，遭敌特武装袭击，壮烈牺牲。时年三十四岁。

1985年5月

附记

1986年8月18日，趁在山东出差并休假时，我来到滕县，在枣庄市委、滕县县委负责同志和陈铁如的陪同下，我和我的老伴到西岗镇丁家堂村（微山湖边沿）立徵的墓地，为我的老同学老战友扫墓，献上花圈后，我含泪念了头天晚上吟成的一首七律，最后又沉痛地加了一句：呜呼，吾

兄生死太匆匆。

银幕荧屏惹梦思，微山湖畔立英姿。
列车飞上真身手，虎穴频探妙指挥。
莫道书生难造反，一为战士善坚持。
倭降未见君先殉，齐鲁招魂我太迟。

归途到滕县烈士陵园，瞻仰为立徵修建的纪念亭，亭为重檐六角，彩绘红柱，立有石碑，正面为“文立徵烈士纪念碑”，背面为烈士简历。

是夜续成七绝一首：

横戈杀贼秀才风，游击生涯百事通。
进退无形寒敌胆，吾兄生死太匆匆。

县委同志告我，立徵的墓将迁入陵园。

附

《寻兄记》补遗

陈铁如

我舅家大表兄文立徵，在鲁南抗日前线殉国已四十周年。家人亲属寻找他的下落，用去整整三十年，其间的曲折坎坷，李锐同志《文立徵烈士二题》之述备矣。我作为文立徵的表弟，寻找他踪迹的当事人，还能向读者再说点什么呢！现不揣拉杂补白如下。

我寻找立徵表兄下落一事，始于 1955 年，1974 年取得较大突破，1983 年才告完成。此一行动得到许多老同志的谬奖，给了我极大的鼓励。其实，比起老同志们的关怀，我做的实在微不足道。当时处“文化革命”中，备受凌辱的郭子化、朱道南等革命前辈，夸奖此举是“对牺牲烈士的极大抚慰，对幸存者也是极大的教育”；在鲁南曾同烈士并肩战斗过的王墨山、张新华、范有功、姚兴华等老同志，将此看作正义的行动，表示坚决的支

持。老同志们都说我寻找烈士的史迹，为其恢复政治荣誉，代表了他们的心愿。

1982年5月25日，我往访原鲁南三分区政治委员韩去非同志，面谢他1974年5月正确的判断，使查找工作得以顺利展开。因我请于光明同志转去的查询信上，只有：文立徵，字国道，化名赵宓，毕业于北平辅仁大学化学系，以及他的外貌特征、早期照片等资料，并不知道已改名立正。这"徵"、"正"虽然谐音，但究系两个字。韩去非同志说："我看过你的查询信和照片，经过分析，你找的就是文立正。当时战争环境，情况复杂，许多事情就要作分析。当然，我也可以写一封信给你说我不知道文立徵，我也就没事了。那样你就得再费许多周折，我也对不起牺牲的战友。"韩去非同志1937年起就任临郯中心县委书记，因而临沂、苍山地、县党史办都请他写党史和回忆录。他说一定会实事求是地把老同志们都写进去，包括文立正在内。他还叙述了让我寻找许衍梁同志的原委："我怎么知道许衍梁认识文立正呢？说来话长，解放初期，我在济南市委工作，许任齐鲁大学教务长并济南市副市长，我们接触较多。有一次打扫卫生，他穿一身蓝工装，我想他家境富有，并无作工的，又未接触工厂，怎会有工装呢，深感奇怪，便玩笑说：'你这身工装值得研究！'他说：'的确值得研究。'接着他便把与文立正是同学，在辅仁同住一间宿舍，立正南下济南在他家住过，最后是把零散东西撂在他家而参加革命的事讲了，并说这套工作服就是文立正送他的。当时我没插话，只注意听着，他谈了许多具体事，可惜年深日久，都记不清了。听完，我告诉他立正已经牺牲了，并嘱把烈士遗物妥善保存，后来他果然将几件纪念性遗物，连同撰写的小传送交济南市府保存。"韩去非同志对我说："你在临沂活动能力真不小，拐弯抹角找到了我。"我告以费尽周折的经过，"自从打听到您在上海，就想通过市革委找您！"他说："那时我们都是黑帮，找不到。"我说："是的，材料寄到上海市革委会组织组，退了回去，批条上写着要通过组织联系云云。无奈，我又找临沂地革委，当时正是批林批孔闹派性的高潮，两个多月连封信也未发出去，更不可能有结果。经几番周折，终于在热心同志的帮助下，找到了苍

山物资局的于光明同志，这才找到了您。”

这一次，我还到上海华东医院看望了病中的朱道南同志。他已年过八旬，早年投身革命，参加过广州起义，是革命老前辈。他见到我后，紧握我的双手激情满怀地说：“我听到你来上海，很好，我们多年通信，今天终于能见上一面，十分高兴。我曾考虑过，立正同志许多事迹不为人知。”接着卧在病榻上的道南同志回忆了 1938 年春在郭子化同志处与立正同志相识，后来立正同他到五旅、鲁南人民义勇总队，办青年训练班等经历，还说到应邵剑秋同志的请求，派立正同志去帮助第五大队，并带领这支部队走上革命道路，成立运河支队，立正同志作了大量艰苦的工作。他告诉我：“1938 年秋冬，CC 分子陈中柱等想以邵剑秋的第五大队作为向上爬的资本，把队伍骗到苏北淮阴，当时经我与义勇总队总队长张光中同志等商议，决定立正同去，以便掌握部队。到了那里，CC 分子露出了本来面目，立正同志等带领一部分坚定的战士返回根据地，行至邳县被石友三部缴械，幸亏张友渔同志在该部作统战工作（任政治部主任），在他的帮助下，立正同志等三人得以回到根据地，找到我，说明情况，问我怎么办。我们作了研究，决定让立正同志仍去帮助邵剑秋整理队伍。这一段历史不为人知，但你那里都有材料。我想，是否以你、我两人名义整理一下，枣庄、济南都很需要，我写了一个，很没有味道。”我返回单位以后，琐事繁多，疲于奔命，竟未及遂朱道南同志之愿，而他却于 1985 年 3 月以八十三岁的高龄谢世，酿成终身憾事。

那次谈话中，道南同志很感激李锐同志对立正同志补认为烈士一事给予的关心和支持。他说：“衡山这方面的人，受‘四人帮’的流毒太深，对革命烈士毫无一点感情，当时我真气愤得很。幸亏李锐同志热情帮助。”我说：“我在衡山民政局听说您为此颇为生气？”道南同志说：“他们总怀疑这也不对，那也错了。怎么会错呢，立正同志的父亲文九德曾是唐生智第八军的一个团长，1926 年任黄埔军校长沙第三分校的步兵大队长！”我问：“您见过我的舅父？”他说：“他是我们的大队长。以后巧同立正同志一起工作，谈起来才知道文九德是他的父亲。那个人并不坏，当时倾向进步。”

我也说明 1939 年我舅舅文九德因与上司意见不合，电辞回乡，开山植桐，办小学，开纸厂，倡导种小麦，在地方上也颇开明。

李锐同志是文立正烈士的挚友和入党介绍人，在十年动乱中，他在京郊狱中单监生活时，曾作绝句《哭文立徵》纪念烈士，寄托哀思之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过后不久，1979 年 1 月，他回京复职，从我的信中得知为文立徵同志办理补烈手续之难以后，给予了极大的关心。自 1979 年 1 月起，他在繁忙的工作中，先后为此给我写过二十多封信，足见他与烈士的深情厚谊。三十年代的长沙一潭死水，使他和烈士成为莫逆之交，走向革命之后，介绍立徵入党。

在当时的条件下，我深知李锐同志对补认立徵为烈士一事的关键作用，曾费尽心机，终未找到。历史不负有心人，邵剑秋同志于 1978 年 12 月通过曾星五同志找到李锐同志，于 1979 年 1 月 5 日写出第一份证明材料。1 月底我收到后，慑于衡山民政局的种种借口，感到略简单了一点，因而于 1 月末、3 月 5 日及 4 月 1 日 3 次致信李锐同志，诉说查询事之不易，衡山民政局有关同志"左"的影响之深之固。同时寄上一本调查材料的复制件，请他考虑，详为证明。4 月 7 日他回信说：

> 四月一日信收到。我是今年一月六日回到北京复职的。春节前后到长沙探亲住了半个月，回到北京即上班，两部分开，忙得不可开交，随即生病，到医院住了五周，住院时仍半天甚至整天办公。你寄给我的那包有关立徵的材料，是从长沙回来后见到的，但来不及详看，直到收到你的来信（刚从医院出来），才细看了你那封长信。这个情况希能见谅。

一月五日离合肥时，曾星五同志来访，我匆匆写了那份证明材料，按照惯例，以为曾已将此材料转到湖南，问题就解决了。所以我春节回长沙时，就没有为此事再去找湖南有关部门去探问或关照。在长沙住了约半个月，每天人客川流不息，又是因私事返回家乡，各方面变化很大，这也是没打算为立徵

事再作进一步落实的原因。

现在因为工作太忙，实无法按你所列提纲再详细写个材料寄你，由你转湖南。为使事情快点落实，建议你将我在合肥写的那个简单材料立即寄去湖南（说明晚寄的原因，或将我这信附上）。同时，我再为立徽写个简单材料交来京汇报工作的中南水电勘测设计院院长李善民同志（他是在湖南工作的老同志）带回长沙，交给省民政局，当面交代请他们尽快解决。

立徽是我岳云中学的老同学、老朋友，是我介绍入党的。三八年三月从武汉到徐州时，亲自介绍他进入山东敌后的。直到一九四九年六月南下湖南时，才从金明同志（郑琳的爱人，当时湖南省委副书记）处得知他已牺牲了，曾作过一首绝句悼念他：

寇逼徐州入鲁先，得知消息换人间；
忠魂定不回衡岳，日出当观泰岳巅。

立徽的弟弟立徽，比我们低两班，我还记得他的模样，人还在，且任金门副司令，当从北京有关方面了解，看能否作点什么统战工作。

我在岳云时名李厚生，现仍回到电力工业部管水电工作……

与上信相隔六天，便收到李锐同志前述的“另一简单材料”，即“致湖南省民政厅并衡山县民政局的信”的副本，包括六个方面二千余字，详细说明了衡山民政局长期“存疑”的问题，信中要求省、县两级民政部门“尽快办妥文的烈士追认手续，使他的家属亲人得到安慰”。但好事多磨，李锐同志的关心，一时并未引起有关方面的足够重视，一拖再拖。当得知这些情况后，于这年的12月17日，李锐同志来信嘱我另作他图，他说：

文立徽同志补烈士手续事，按理自然应当没有任何问题了。如果至今没有得到回信，请你为此事向程子华同志写报告，简述前后经过（过去有多少负责的老同志——职务姓名等——写过证明，现在我的证明——请附上我写的副本——

发出后又半年多无回音等等)，请程嘱湖南省民政局急办此事，寄给我，由我再附短信与程，我请他批办，这样就可以了。

文章(按：指我建议他写纪念立徵的)我是想写的，不过不知哪一天能写出，写好后当寄湖南的刊物发表。这样比较妥当一些。前信已提到过去曾作过一首怀念立徵的小诗，或者就从这首诗写起。

文立徵烈士的补认烈士手续，当我们(许多老同志、烈士弟妹等)同衡山民政局在办不办的马拉松式对抗赛中，李锐同志继续给予关心。为释李锐同志对老友之念，我于3月1日将珍藏多年的烈士遗墨——十五封家书寄奉，并汇报补认烈士手续仍不见分晓。1978年3月18日他复信中说：

> 信与立徵遗墨已收到。睹物思人，不胜感慨。
>
> 我日常工作甚忙，又常出差，纪念文不知哪天能动笔。今年是"一二·九"卅五周年，或许将立徵遗墨交哪个刊物届时发表。总之，此事我责无旁贷。
>
> 你的报告已转程子华部长，他们已经批办。我设法再去查问一下湖南办了没有……

1980年7月，我回湖南探望病中的老母，就便到衡山民政局和湖南省民政厅了解此事进度，民政局的同志此时态度已经转变，告诉我民政部已批催，现已经衡阳地区民政局转省民政局待批。他们还说衡山县委打算收集文立徵同志的史迹，将展于毛泽东同志考察农民运动旧址——衡山康王庙中。于是这年8月20日省民政厅终于批复："关于追认文立正同志为革命烈士的问题，根据调查材料，文立正同志是革命烈士，鲁南早已认定，临沂县烈士陵园有他的名单和史料，不需要再办批准手续。待1981年统一换证时，再补发牺牲烈士证明书。"(按：这个证明书迟至1983年底才发下来。)我将这些情况写信向李锐同志报告，他回信给我极大的鼓舞，信中说：

四月一日信并照片收到，三、四月份都出差，前几天才回来。你为立徵补烈事，多年奔波，付出巨大劳动，很使人敬佩。此种锲而不舍的精神，正是今天青年一代所要学习的。请你考虑，你可否将你十多年来办此事前前后后如实写出，如类似报告文学体裁则更佳。其中可以贯穿两点：文立徵其人其事；作者与证明人之热心为立徵补烈事而积极活动与提供材料（包括你到烈士牺牲地的调查等等）。当然可以附带将有关单位的"左"的思想及种种阻力写出来。你的文笔很流畅，写起来不费力。

立徵给弟弟的旧信已交中国青年出版社看过，他们准备摘一点点，印在烈士书信集中（这种书已出版过一集，每位烈士的篇幅有限）。我日常事务极忙乱，再写长信，恐力不从心。

如果你可以离开工作一段时间外出为立徵搜集资料，或请其他人帮忙当然更好。

济南副市长许衍梁是立徵的辅仁同学，一九三七年八月至十月在济南时，我同立徵到他家去过（那时我曾改名王某）。你还可以向他征集立徵在辅仁时的情况。解放后我一直未同他联系过，他可能也不知道李锐就是当年的王某。

此后，我陆续收到李锐同志寄来的《龙胆紫集》、《中国青年报》上所撰纪念文《一二·九运动在武汉》及《怀念十篇》等有纪念文立徵烈士文章的书报。1984年1月9日李锐同志于《人民日报》撰写《纪念齐白石》一文中，也提到好友文立徵："我是一九三四年才知道齐白石的名字的，那时我在武汉读书，收到在北平读书的好友文立徵（一九四五年初在鲁南游击区牺牲）来信，说他请齐白石刻了一方图章，高兴得不得了。"上述文章对烈士的史迹，对老一辈革命者为了民族的安危、国家的振兴和人民的幸福而追求真理、不怕牺牲的高风亮节，都作了不同侧面的介绍。

1974年，正是我日夜盼望得到老同志们来信的时候，在梦中，我多次

“寻”着了立徵表兄，其中两次至今记忆犹新。一次是他笑容可掬地对我说，他已经牺牲，住在一个湖中，随葬有笔记本、挂包之类。我见他在湖底一口宽大的棺材里慢慢坐起身，那笔记本是粗纸线装的，看到里面密密麻麻的、熟悉的铅笔字，激动地惊醒。另一次是我“找”到一个乡村小镇的石头街上，这里满目萧条，弥漫着战火消烟，一位陌生人在得知我是寻找表哥以后说，“你表哥已不在这里了，但书店有他的书，你去查查。”待我赶到书店，已是上门板收市的时刻。这梦中“牺牲在湖边”、“有他的书”等情节后来都为事实所印证。

我，烈士的表弟，寻找烈士史迹的当事人之一，应该感谢有关单位的组织和诸多老同志的帮助，才使此事历经二十年终于有了结果，加在烈士身上的诬蔑之词，统统被推倒，烈士的继母得以享受烈属待遇，烈士弟妹们再不必为一个下落不明的哥哥而惶恐，我的心里犹如流过汩汩清泉。1981 年 2 月 8 日，我致李锐同志信中提到：“我因立徵表兄家这一‘复杂’社会关系，在‘左’倾的日子里，尽管忠于职守，小心翼翼地工作，仍然诸事不顺，命运多舛，平生满意事，几达绝无境地。唯有查清立徵表兄史迹，与您们老同志们通信求教，才得到精神寄托。”事实就是这样。

现在，堪可告慰烈士在天之灵的是：在原籍，得以恢复他的真实面貌，再不是“在外干坏事而下落不明的人”；而在牺牲地，也不再是“无籍贯”烈士。山东滕县政府决定为文立徵同志迁坟树碑，安葬于烈士陵园；枣庄市和临沂地委党史办公室正在收集烈士史迹；烈士当年浴血奋斗的微山县，树立起运河支队纪念碑，其中文立徵是重要人物之一。

1986 年 1 月 17 日

忆谢文耀

文耀离开人间三十四年了。刚得到他牺牲消息的时候，就想写一篇悼文，但由于世事的纷扰，一直没能够提起笔来。文耀在天有灵，当不会怨我忘记了故人吧。

1936年暑假开始的时候，我因为还有点事，留在学校里。一天下午，正从东湖游泳回来，一个陌生的同学突然敲门进来，操湖北口音，瘦小的个子，留着长发，不修边幅，带一副近视眼镜，态度很随和。他就是谢文耀，这是我们的第一次见面。他告诉我，他是外文系的，刚从上海回来，准备下学期复学。原来，他比我早两年，于1932年考进武汉大学，读了两年，就休学到上海去了。他哥哥谢文炳在上海暨南大学文学院执教，也发表作品。他住在哥哥家里，想专门从事写作，当“兄弟作家”。这个愿望未能实现，只是读了些书，学了法文。终于又离开上海的原因，也许是寄居生活很难长期延续下去，似乎还谈到不习惯哥哥家庭的生活方式。但最重要的还是“一二·九”运动的影响。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的形势下，他闲不住，他不能做一个旁观者，于是就回到学校来了。

这天文耀还谈到，他为什么来找我。当年武大有一个师生合办的校刊《珞珈月刊》。我在中学时一直爱好左翼文艺，高三

时兴之所至，写过一个短篇，题目叫《走》。我刚入学不久，这个月刊要出“文艺专号”，向同学征稿，我就把这篇东西寄去了，出刊时居然压卷。写的是一个人力车夫和他的儿子，忍受不了剥削和贫困的生活而暗示投奔红军。从小学到中学，我是在长沙度过的。在大革命时当过童子团员，平江老家也常传来红军的故事，于是有过许多朦胧的遐想。这是我生平写过的唯一一篇“小说”，当然是很幼稚的。大约是它的倾向曾使文耀感到兴趣。这一次是从他的同班好友林守正（林已在新四军皖南事变中牺牲）等人处知道，我是“一二·九”运动的积极分子，工学院的一个头头，还主办过学生会的刊物《救中国》（这个刊物思想激进，旗帜鲜明）。“一二·九”运动在武汉也是闹得很厉害的，武昌几千学生曾在江边和街头露宿，武大则罢了课。这些，他在上海就从报纸上看到过有关报道。我们尽管是初会，可是越谈越投机，越谈越兴奋，真是相见恨晚。那时我年未及冠，文耀比我大四、五岁，我们的话题却没有触及年青人喜欢谈的爱情之类，完全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气概：厌恶蒋介石，向往共产党。竟日长谈继续了整整一个星期，我才怀着惜别之情回到长沙去了。这时，他给我看过他写的中篇小说《万民伞》的稿本，写的是国民党地方官盘剥农民而又沽名钓誉的故事。可能由于再也无意于当作家，这篇东西似乎从来没有向哪个刊物投寄过。这部稿子是否还存在于天地之间呢？文耀是很会写文章的。1936 年下学期武大学生救国会出的校刊，是公开发行的，文耀在上面发表的时论，最受读者欢迎。

下学期一开学之后，我们联合所有的进步同学组成一个秘密团体“武大青年救国团”，参加的有四十来人，其中还有助教，文耀被推为负责人之一。我那时的活动主要不在校内，而在武

汉三镇的“秘密学联”。这是公开学联被国民党当局强迫解散后成立起来的，骨干多是“一二·九”运动时最积极的分子。参加的共有二十多个学校，每校少则几人，多则十几、二十人，除武大以外，总共约二百多人。名义虽叫“学联”，实际类似北平的民族解放先锋队组织，完全采取秘密活动的方式，如传阅革命书刊，组织读书会，领导各校的公开活动，等等。我常要下山，几乎很少上课了。这时在校内同我关系最密切的就是文耀，他家住在武昌，也就逐渐参加了学联的活动。我设法单独住一间房子，文耀在外文系占用了一间公用房间（也在宿舍内）。这两间房子实际上成了我们的“工作机关”，敲门有暗号，以免闲人突然闯入。我们两人，加上1936年入校的原来就是秘密学联负责人之一的万国瑞（杨纯），三人小组办了一个秘密的油印刊物：《武汉学联》。搜集材料，写文章，刻蜡板，印刷装订，为此常常熬夜。汉口的生活书店是学联的秘密发行机关。

我们时常谈论的话题是必须找到共产党，否则，我们这只小船，就没有舵，怎样在风浪中前进呢。上海全国救国会领导成员之一何伟，当时常来往于武汉与上海之间，我们同他有密切的联系。何原是武昌华中大学毕业的，在汉口一个教会女中教书，我们在他的转寄信件的朋友处见到党的北方局刊物《长城》，断定他一定找到了党的关系。向他提出此要求时，他却没有肯定的表态，可能党还没有交给他在武汉发展组织的任务。我们只得另找别的途径。文耀认识一个大革命时期到莫斯科学习过的姓甘的武昌人，不久前从苏州反省院出来，我们在他家里见到俄文书刊，就觉得特别兴奋和亲切。于是找他谈党的问题。那时我们在政治上很幼稚，不知道反省院出来的人是需要经过党的详细审查的。甘的意见是，在没有找到党的正式关系以前，可以先

自发成立一个临时支部，一边建党，一边找党。我们认为这是个好办法。于是在秘密学联中串联，找了几个最可靠的积极分子商谈，他们也赞成这样办。经过几个月的酝酿，1937 年 2 月的一天，我们一共八个人，在武昌贡院街三十号文耀的家里集会。记得是在他家后院的一间大房子里开的会，由他的姐姐景屏为我们放哨。我们庄严地举手宣誓，每人都填写了入党表，正式成立了这个自发的党组织，称为武汉临时支部。后来才知道，自发支部中有位同志当时已经有了党的关系，可说是党组织打入我们自发支部来的吧。在延安时，钱(瑛)大姐、陶铸同志都跟我谈过，党后来承认了这个自发支部，认为这个组织对抗战前后武汉的救亡运动和党的发展，起了很好的作用。

这时，我对文耀和他的家庭了解才多一些。他的老家是湖北汉川，家境比较贫寒(贡院街的房子似没有正式的大门，是那种店铺型上格板的门面)。祖父是农民，父亲教过私塾，会一点书画，也当过打秋风的游学先生。家里曾薄有田产，有半条耕牛，雇了半个长工。后来把田地卖掉供大哥文炳在清华读书。文炳考取公费留美，回国后，当了大学教授，由他来供给弟妹读书。文耀天分高，在学校功课很好，念高中时即为别人枪替，考取了大学。他是以第一名考入武大外文系的(同时他还考取北大)。学法文才半年，就可以用法文写信了。

1937 年 5 月，我带着自发支部全体同志的入党表到北平，很快就与党接上头，随后文耀也到北平来了。北方局的同志正同我们研究如何在武汉正式建立党的组织时，7 月 7 日芦沟桥事变爆发，形势大变。几天之后，文耀即匆匆忙忙奉命先单独返回武汉去了。

这年 11 月，我从山东到武汉，又见到了文耀。他告诉我他

回到武汉以后几个月的活动。陶铸到武大建立了正式的党支部，文耀是支部的负责人之一，管宣传。以学联的成员和平津流亡同学为基础，成立了当年有名的青年团体——武汉青年救国团，因此，他非常忙碌。1938 年 3 月，全国学联开会时，我又来到武汉，那时，他正在长江局受训，我们见面的机会不多。

1938 年 6 月间，我从徐州突围后路过武汉，又同文耀聚首了。那时，他正准备到鄂北去打游击。那天我们两人在武昌汉阳门码头江岸上漫步，这正是“一二·九”运动游行队伍露宿之处，当年在寒冷的阵阵江风中坚持的情景，历历如在目前，此起彼伏的救亡歌声，还在耳边回响。我们缓缓地并肩走着，兴奋地畅怀交谈。眼前的形势使人激动，唤起一缕得意的情怀。那天我们谈了很久，甚至谈到胜利之日，必定要到武汉重聚。谁能料到这一次的分手竟是我同文耀的最后的诀别！

回到长沙以后，还和文耀通过几次信。他来信说，我们的这些通信，是他“生活中唯一的享受”。由于彼此的地址都常常变动，更由于彼此都处在紧张的战斗生活之中，武汉失陷之后，这“生活中唯一的享受”也无法继续下去了。

我在延安，文耀是在新四军第五师，那时从华中到延安的人少，很少听到他的信息。只知道他在担任《七七报》的总编辑；中原局成立，他任《七七报》的副社长。此外就什么也不知道了。整个抗战时期，学生时代的战友大都东西南北，天各一方，大家都在紧张的战斗生活中，各自为各种各样的事情而忙碌，大概也都很少有机会去回忆往事了。

直到 1947 年 9 月下旬，我才又意外地得到了文耀的消息。那时我在热河主持冀察热辽分局报社的工作（这时报纸改名《群众日报》）。一天，新华总社发来的电讯稿中，突然看到第一篇是

“中原前线记者谢文耀”写的，评论刘邓反攻大军南征以来的敌我态势。真是大喜过望！哦，哦，文耀，原来你在这里！总编辑朱九思也是武大外文系的同学，当年“青救团”的成员。我们两人拿着这份电稿就谈起这位久别的故人来了。那天，我想起了许多往事，兴奋得彻夜不能入睡。正像刘邓大军打仗纵横自如极有气势一样，文耀的这篇述评也是写得纵横自如极有气势的。他的笔还是同从前一样泼辣锋利，他的观察还是那样敏锐深刻和有条理；篇中的警句：“解放军现在驰骋于江淮之间，如蛟龙入海，纵横自如”，多少年来我一直不曾忘记。这次为了写这篇文章，请穆青同志帮助把旧报纸上的这篇述评复制出来了，现在摘录一点在下面，让大家看看文耀的文采：

> 蒋贼及其统帅部始终以为刘邓大军是北渡或被迫南移，其蠢愚无知缺乏战略眼光可谓惊人！及至八月十四日以后，南下大军突然出现在沙河以南，蒋匪这才慌了手脚，为了掩盖他惊慌忙乱的丑态，又不愿意也不敢于承认南下解放军的行动乃是一个预定的巨大反攻行动。无可奈何之余，只好叫中央社出来叫嚣所谓“刘匪全部被歼于沙河”以自解嘲。蒋家匪帮们所苦恼的，是尾追部队对解放军既可望而又不可即，在沙河仅有的一次阻击亦告惨败，而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更无一兵一卒可以阻击解放军的前进。
>
> 南征大军把蒋匪一切尾追部队远远地扔在后面，从容渡过淮河，进入大别山区。蒋介石匪帮们的一切所谓“围歼”、“追击”、“堵击”都已变成纸上的名词。解放军现正驰骋于江淮之间，如蛟龙入海，纵横自如，它高兴进兵哪里便进兵哪里，……蒋匪军则东碰西撞顾此失彼，处处可防，而

处处不胜防。四十八师向光山、经扶碰了两下，忽然觉得不妙，又夹起尾巴掉头东奔皖西，图救合肥。五十八师则于固始、商城间徘徊不前。罗广文及八十五师等部则龟缩于平汉东侧，不敢动弹。五十二师之三十三旅才到郾城，又忽然返防武汉。六十五师也急忙沿平汉赶回汉口。蒋匪军郑州前方指挥所，则由菏泽而开封，而信阳，只能望着刘邓大军的背影移动。二〇六师及第三师等才"追"到许昌、正阳，忽然豫西告警，又中途折转，西奔洛阳。蒋贼及其统帅部手忙脚乱的窘态表露无遗。

当年刘邓大军强渡黄河，向大别山进军，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反攻的序幕，标志着人民解放战争"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即从上面节录的两段来看，文耀对战争的这一转折作了何等有声有色的描述，真是长人民的志气，灭敌人的威风。

我很兴奋，庆幸着我们天南地北，战斗在同一个岗位上。虽然一时还不可能直接同文耀通信，但总算从新闻电讯中得知他的下落了，相信以后还会看到他的文章的。我怎么也没有想到，几个月之后，我所看到的竟是他的噩耗。1948 年 2 月，我正调到东北局工作，一天早晨，突然在《东北日报》上看到一条新华社的电讯，说新华社华中总分社的负责人谢文耀在中原汝南区敌后工作中牺牲。这在我真如晴天霹雳，震惊，悲痛，多少天也排遣不了。现在没有查到那天的报纸，依稀记得消息说的是：文耀在村中遭到地主武装的伏击，他开枪抵抗，因寡不敌众而牺牲。新华总社档案室保存的材料说的则是：1948 年 2 月 15 日，文耀在中原汝南区李楼村附近搞土改，被敌俘后牺牲。这份材料还说："谢文耀同志参加革命后表现很好，生病后仍坚持工作。在

困难时期，如在中原突围时，有人想到大解放区，他未提过意见。到晋南与爱人会合后，不久（单身）被派赴中原，愉快受命，且提出很多积极意见。对同志很注意帮助、团结，注意老乡生活。牺牲时很年轻，大家都觉得可惜。”确是年轻，那时他还只三十岁出头。

十年浩劫中，我在八年单监枯坐无聊时，默念着故人和往事，做了些怀旧的诗，有一首是纪念文耀的，写得到噩耗时的心情：

故人又似笑来前，
喜读“蛟龙入海”篇。
正待中原席卷日，
何期万里哭南天。

1949年南下途中，曾在武汉停留短时。有一天，与朱九思等一群人作东湖之游，大家的兴致都很高。可是，我的心情却很沉重。轮渡过江，在汉阳门上岸，这是我和文耀最后流连之处。十一年物换星移，但汉阳门景物如旧，码头陈迹依稀可辨，可是，故人何在？当年的梦幻——胜利重逢的喜悦又何寻呢？沉默无声的痛楚，使我无法分享游伴的欢欣。那天风浪特大，游艇不能下湖。狱中怀旧的《一九四九年南下过武汉》题目中的一首，正是记述此时对文耀的怀念：

过江又见汉阳门，
车近东湖思故人。
八十里波不平静，

莫非为我洗风尘。

1980年春的一个星期日，我邀请了文耀的姐姐景屏、弟弟文煊夫妇，还有文耀在武大外文系的同班好友叶君健，到家中作客。我们的话旧当然以文耀为中心。文耀别后的情况，在很长时间里我几乎是一无所知，这天才得知一个大概。1938年武汉沦陷后，文耀由党的湖北省工委派到洪湖地区天门、汉川一带工作。那里是他的家乡，在他的领导下，党的组织很快发展起来。办鄂中特委党训班时，他亲自刻印过一本油印小册子《党的建设》，作为教材。随后又被派到当地几支小的游杂部队去作统战工作，几经艰难险阻(有一次几乎被一个有土匪习气的队伍活埋了)，到1939年7月，这几支小部队终于接受党的领导，编成“抗日游击队天汉第三中队”，走上了抗日前线。1940年，文耀任天汉地委宣传部长。鄂豫边区党委机关报《七七报》创刊，他被派到该报参加领导工作。他的第一个孩子在战乱中夭折。第二个孩子出生在1944年2月，正值战争转徙之际，还没有满月就寄养在当地农民家里，直到文耀牺牲，他们父子也没见过面。解放后，孩子才由党组织派人认领回来，这时已是一个六、七岁的牧童了。那天还知道，文耀的牺牲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当时他未听劝阻，带了支短枪，只身到村子里探听虚实，因而遭难。遗体被丢在河里，后来就葬在汝南城郊。我们谈到，如果文耀还活着，不是继续在新闻、宣传部门工作，很可能早就转到外交系统，因为他不仅精通英语，法语也好。

姐姐景屏保存了弟弟给她的一封信，这是中原突围后辗转寄到延安的，是文耀留给家人的最后的手泽。现在转录在下面：

我随部队由中原突围到了陕南。前后八个月，于二月底渡河到了太岳。北上之行总算达到了目的。此次部队过河主要为休整补充，准备时机一到，回戈中原。我们二十九日抵阳城，四日去晋城。五师部队干部及家属都将集中在那里作较长的整顿。我不惯于部队宣教工作，已向组织提出去延安学习，或去《解放日报》、《人民日报》工作……。我搞报纸近十年，从党的事业方面，从个人兴趣和经历方面，都是以新闻文化工作为自己终身事业，因此我有比较长期的打算。在新闻文化工作方面，我比较长于组织管理，特别对新闻事业有较深的兴趣和感情。至于写作，我对自己估计已不是那么高了，主要原因是，在中原八九年长期处于游击战争环境，技术荒废了，落在时代后边了。政治生活经历虽然有些，但写不出，写不好。我之想去延安，一方面希望在政治水平、思想锻炼上更提高一步；一方面把英文和世界语温习一下，再学俄文，将来兼做翻译工作。……我拟以全力争取这个前途。

小刘（刘健，文耀的爱人，已去世）于去年突围前半个月生场病，乘火车去邯郸，现带着孩子在《人民日报》工作。她来电告我，母子均好。我要是能去延安，将与她一同去，那时，你便可以见到久别十年的三弟和小侄了。对我们来说，未必不是一件最大的乐事……我多么想和你见面，倾谈十年以来的心情啊！……我明日到晋城，行止确定后再写信给你。回信暂寄太岳区晋城新四军五师政治部。

很久以来，我就决心要写一篇回忆文耀的文章，这倒不是为了排遣自己的悲怀，也不是为了偿还对故人的宿债，而是为了今

天的青年读者，帮助他们了解前人是如何为着党的事业奋斗牺牲的。

原来打算找一些熟悉文耀的同志，更多地搜集一些有关文耀在漫长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事迹，使这篇文章的内容稍稍充实一点，后来一想，湖北党的组织和有关部门，必定会为文耀立传的，我这篇东西就写成这个样子吧。

1982 年 11 月

附记

《湖北省志·新闻志》编辑室的同志最近找到了李普 1948 年 3 月 3 日写给新华社社长廖承志的一封信，谈谢文耀殉难经过颇为详细，是现在能够得到的最初、最确切的记载，兹转录于下：

廖社长：

兹将谢文耀同志（按谢曾任中原《七七报》副社长、临时总社秘书）被土匪俘去之经过情形报告于下：

谢文耀、张铁夫和我三人随陈克寒同志到汝南县境的东南部作土改，于十二月底出发，一月中旬开始工作。谢文耀同志在袁寨（亚光出版之袖珍地图上可以找到）西北十二里的李楼一个工作组担任副组长（克寒同志在北面，张铁夫同志在西面，我在东面，各组相距约七、八里）。

旧历元月初五日（二月十四日），敌十一旅由汝南埠向西北开向汝南城。我和谢等两组（还有另一个组）一起行动，于先一天深夜向正西转移约三十里，到汝河的河套里，第二天（初六日，二月十五日）探知敌已过去，乃决定回原地继续工作。谢组未吃早饭就先走了。他们那一组共八个干部，他和正组长各分一半，他那一半又各自分开，他独自去李楼，其他三人各去一村。他到李楼仅一小时许，即来

土匪十余人把他俘去。匪徒又到另一村俘去另一人，其他附近两个村子的两个人乘隙逃脱。

李楼水沟很深，仅有一条独木桥通入寨门。谢带了一支二十响的驳壳。被匪徒发现时他曾发了两枪，然后向一个草堆躲去，为匪徒击中腰部，随即被俘。

李楼老百姓只看见匪徒们把他带往南去。又据别的老百姓说，匪徒们自相惊扰，说我军早已追击他们（我们转移时跟着我军一个连，由一个团长指挥）。他们仓促爬过一条深沟，水深及腰，土匪和谢文耀都是徒涉过去的。以后，有人说把他带到河南正阳县去了，有人说，谢走不动，途中就枪毙了。后一说的可能性很大，因为土匪以为我军在追他（其实并没有。那时部队仍在河套内，不知道发生了这件事）。他们自己狼狈逃窜，谢已负伤，又浸了水，当然跟不上他们。

土改工作队随即打听消息，设法营救，但至今没有下落。我们愿意出钱赎，或者交换，因为他们也有人扣押在我们这里。

文耀同志的牺牲，大家都很哀痛。我们将化悲痛为力量，努力工作。

李普　三月三日（一九四八年）

新华社编者在这一信件后面加了如下的按语：

李普同志的信，是本月中旬才收到的。中原前线分社于本月（可能是四月）二十三日来电称："谢文耀同志被俘后，我们曾派士绅前往交涉，但经查看，业已牺牲。"总社得此噩耗后，已去电致哀，并慰勉中原诸同志继承谢文耀同志遗志，为创造江淮河汉间新闻事业而奋斗。

读《彭德怀自述》

一口气读完《彭德怀自述》，思绪万千，感慨无穷。历史何等公正，人民何等幸运，十年动乱之后，终于能读到这样一本惊心动魄、震古烁今的《自述》。

1966年12月，彭老总从成都被揪到北京批斗游街，毒打致残，此后又被囚于暗室，专案审查，直到1974年11月29日去世。去世前已瘫痪，他对最后被允许看望他的侄女说："这怎么办？这怎么办？我瘫了，可我的案子还没有搞清楚呀！"

《自述》是"犯人"的交代材料，作为对"专案审查"者的提问的回答："不准表功，只准老老实实交代。"这些多年反复交代的材料是为了弄清所谓"案子"而问而写的。可是我们现在读到的却是一部中国红军建军史、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三十年革命战争史；又是一个旧军队的士兵，如何毕生征战，终于成长为几百万革命部队统帅的历史；一个农民的儿子，怎样立志救贫，秘密结社，勤奋自学，终于变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历史。总之，这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一个真正的人的历史。

彭老总一生的经历和成就，主要是领导打仗，《自述》写的也主要是军事斗争。他的对手最早是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的军阀，后来是日本的将军，最后是美国的上将。枪林弹雨，出生入死，

何止身经百战。他起义参加红军前，从士兵到当班、排、连、营、团长，打了十二年仗。他是红军当年最有实战经验的军事家之一(还是红军中第一个会打大炮的炮手)。他一生打败仗不多，战场上犯的重大错误也寥寥无几；读完“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两章，使人更加感到这是中外古今战争史上少有的统帅。朝鲜停战协定签字后，联军总司令克拉克曾对他的僚属说：“美国上将在一个没有打胜的停战书上签字，这在美国历史上是第一次。”(引自《自述》。以下引号中文均引自《自述》)

1958 年 4 月从武昌到广州开会时，我同彭总住在一起。他知道我是平江人后，曾同我详细谈了平江起义的经过，还特别谈到他的一个心愿：今后想编写战史。战争是他的职业，他最心爱之物，一生心血倾注于此；往事，故人，战场，无不铭记于心。因此，尽管手边毫无可供参考的材料，身心又遭受如此严酷的摧残(独处暗室，想看见窗外一丝阳光而不可得)，他却能将三四十年的战争经历、戎马生涯写得这样清楚，乃至许许多多地名、日期都准确无误。作为一部历史文献，尤其是那些无其他人能提供的历史事件细节的第一手材料，自然最会为人们所珍视，治史的人更会孜孜研究。读完全书之后，我首先想到的则是所谓“野心家”、“伪君子”以及“一贯反毛主席”的问题。这是 1959 年庐山会议时，林彪、康生等人对彭老总的诬蔑、批斗的主题，直到去世之日，一直戴在他身上的如磐枷锁。在庐山时，虽然彭总的一生我知道得不多，同他本人的接触也很有限，但同许多同志一样，绝对不能接受这种对他的诬蔑。我也被迫作检讨时，坦然承认说过这样的话：彭总伟大，只有他敢于写这样的信。其实，当时这种认识只是晚辈的一种感觉；现在读完《自述》，更清楚了解一些历史关节之后，才使我真正知道彭总伟大在何处。

从《自述》中，可以举出红军初创时期的三件事，以说明彭总是一个何等赤胆忠心、照顾大局的人。

第一件事，率部守井冈山。1928 年 11 月间，平江起义开辟了湘鄂赣根据地，成立边区特委之后，彭总和滕代远等率领红五军中的五个大队(约七、八百人)，前往井冈山与红四军会合。当时湘赣两省反动军队准备再次“围剿”井冈山。红四军约五千人，草鞋单衣，没盐吃，粮食很困难，只有离开井冈山到白区打土豪，才能生存、发展。可是上千的伤病残人员和妇幼无法安置，又不可能带走，势必派队留守。四军前委多次开会讨论，最后决定由五军这五个大队留守井冈山，让彭总兼任四军副军长。这是一个极其严重而冒险的任务 。除彭、滕二人外，五军其他干部都不赞成留下，认为“我们是来取联络的，任务已完成，应立即回湘鄂赣边区，传达‘六大’决议”。彭、滕“说服了不同意见的同志，准备牺牲局部，使主力安全向外发展”。当时敌人约两三万人，敌我力量悬殊达三四十倍。激战三昼夜之后，五路阵地有三路被敌突破，彭总集合三个大队约五百人，带领伤病残员突围。“时值严寒，天下大雪，高山积雪尺许，我的干粮袋炒米丢失了，我不愿别人知道，两天未吃一粒米，饥饿疲乏，真有寸步难行之势。可是枪声一响，劲又不知从哪儿来的。”突围后又遇伏击，在赣南边界几县转战两个多月，巩固扩大了部队，打下瑞金，才跟四军重又会合。“我向四军前委汇报了撤出井冈山的经过。毛党代表说，这次很危险，不应该决定你们留守井冈山。”当时，毛主席是有自我批评的。

第二件事，反对一、三军团分家。彭总领导的三军团原是独立发展起来的，1930 年 8 月第二次打长沙，才同一军团联合成立一方面军。《自述》欣慰地写道：“从此以后，我即在毛泽东同

志为首的总前委领导之下进行工作了。”这之前，中央二月来信，对形势估计错误，要朱、毛离开红军，当时，彭总就给中央写信，表示不同意：“时局紧张，主要负责人不能离开部队。”“信是由四军前委转的，原稿留毛主席处。”1930 年 11 月，第一次反“围剿”开始时，因三军团所部多平江、浏阳与阳新、大冶人，有地方观念的干部反对过赣江，主张一、三军团分家，夹江东西而阵，各发展各的地区。而当时只有两个军团合起来，才有可能吃掉敌一个整师。《自述》说：“为了消灭敌人，必须反对地方主义，在政治上以朱、毛为旗帜，集中统一红军，一、三军团不再分开。我这一票在当时是起相当作用的一票，站在哪一方面，哪一方面就占优势。”彭总分析形势，说明留在湘鄂赣的地方部队，可以坚持并扩大。“有意见到河东讨论，但不能妨碍行动，更不能说一、三军团分家。”毫无疑问，这是关系到第一次（及以后几次）反“围剿”能否胜利的大关节。

第三件事，揭露伪造信件。反第一次“围剿”是空前大战；毛主席制定的方针是“放开两手，诱敌深入”，即把敌人引到根据地内来打。当时，地方正打 AB 团，三军团转向中心地带，以至带路的向导也找不到。原来江西省委中有人怀疑这一军事方针，说是右倾机会主义、退却路线，他们要“打到南昌去”。于是发生封锁红军，散发传单，写大标语：“拥护朱彭黄，打倒毛泽东”等情况。这是分裂党、分裂红军的行动。这时彭总突然接到一封仿毛字体的署名毛泽东的伪造信件，用以挑拨毛、彭之间关系。他根据自己的认识，立即断定：“毛泽东同志决不是一个阴谋家，而是一个无产阶级政治家。这封信是伪造的，这是分裂红军、分裂党的险恶阴谋。”（这时发生的反 AB 团和富田事变，情况极为复杂，有待重新作历史总结。）他当天就召开三军团紧急前委会议，

亲笔写了一个简短的三军团宣言，坚决拥护毛政委、拥护总前委的领导，即刻将宣言和假信送到总前委。第二天，三军团开到离总前委十五里的地方，“我亲自去请毛政委来三军团干部会上讲话，使三军团干部第一次看到毛政委。”

红军初创之时，党中央远在上海，各地红军揭竿而起，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如果说有“野心家”，这正是历代农民战争最容易发生“火并”之时。然而从以上三件事，我们能从彭总身上看到一丝一毫“野心家”的影子吗？恰恰相反，他完全不顾一己安危、局部利益，而完全、彻底服从全局。他自从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革命品质和正确领导之后，就敬佩之、服从之。当然，他不是一个喜欢盲从的人，对某种主张还没有认识清楚时，也许要保留一时；某些具体问题，也许一直有争论。但纵观全部《自述》，彭总在整个革命战争时期是执行了党的正确路线的。在决定出不出兵援朝的那次中央紧急会议上，在大家着重谈了出兵不利的情况之后，彭总(从兰州飞来)进入会场晚了一点，听到别的同志转述了毛主席讲的这一段话：“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样说，心里也难过。”接着读下面这段《自述》，能不感动吗？“我刚到，未发言，内心想是应该出兵，救援朝鲜。散会后，中央管理科的同志把我送到北京饭店。当晚怎么也睡不着，我以为是沙发床，此福受不了，搬在地毯上，也睡不着。”(失眠者仔细分析了国内外形势之后)“把主席的四句话，反复念了几十遍，体会到这是一个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相结合的指示。……我想到这里，认为出兵援朝是正确的，是必要的，是英明的决策，而且是迫不及待的。我想通了，拥护主席这一英明决策。”这就使人想到，整整二十年之后，“这一票”又是相当重要的。

彭总的老战友、老部下所写的怀念文章，不约而同多用这一类的标题："丹心昭日月，刚正垂千秋"；"神威不灭，浩气长存"；"忠心耿耿，铁骨铮铮"；"英雄气魄垂千古，国际精神召万民"……。这自然是几十年的亲身感受，发自内心的由衷赞美。

可是，庐山会议却说彭总同毛主席的关系三、七开(三分合作，七分对抗)，说他执行了立三路线和王明路线。《自述》对后者有如实的说明。1930年传达立三路线，命令打武昌。彭总精通军事："前有坚城，后无退路，侧长江，背南湖。"真要打，"有全军覆灭的危险"，因此拒不执行。后来"妥协"一下："割据鄂南六县，打开岳州。7月，何键派三个旅进攻平江，三军团以八千人对三万之敌，三天打四仗，追歼溃敌，迅雷不及掩耳攻占长沙。"这在军事史上是不多的"。然而彭总却作了检讨："由于红三军团攻占长沙的胜利，对于立三路线，也起了支援作用。"8月，成立一方面军的会议上，经过讨论，总前委决定第二次打长沙。当时三军团半年内扩大了六倍，连续作战，没有休整。彭总说："我未发言。从三军团本身来说，迫切需要短期整训。"结果围攻长沙月余未下，后来经过毛泽东、朱德同志的说服，才撤出战斗，佯攻南昌，巧夺吉安。对此，彭总是坚决拥护和执行的。他是一个谦逊的人，从不掩饰自己的过失。在反四次"围剿"前后，由于执行了当时中央领导的打赣州等错误命令，《自述》中有深刻的检讨。他是一个刚直不阿的人，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尤其遇到重大关键问题，决不计较个人得失而率直陈言。反五次"围剿"前后，他已逐渐认识到王明路线的错误，从军事到政治，有过一系列抵制，而且每次都是直接给当时的中央领导人打电报，其间还写过长信，只是从未得到过答复。彭总被人看作是张飞，他也以此自许，有时不免脾气暴躁一些。打仗的人，谁没有个脾气？由

于不断唱反调，他被撤掉军委副主席职务。形势越来越严重，对比以前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彭总对当时中央的错误看得更加清楚了。1934年春广昌战役时，中央领导人亲自到前线督战，强迫三军团打阵地战，固守广昌，遭到惨重损失。在指挥所里，面对面争执，彭总"大胆地准备个人的不幸"，历数指挥的错误，指着鼻子痛斥他们"是图上作业的战术家"，"崽卖爷田心不痛"。请看《自述》中正气凛然的记述："那次，我把那套旧军衣背在包里，准备随他(李德)到瑞金去，受公审，开除党籍，杀头，都准备了，无所顾虑了。"

抗日战争初期，彭总是否执行了王明路线呢？请看《自述》："至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这一条，原来思想上就没有准备实行。在当时，我们想，在日军占领区，蒋介石是去不了的，也管不着我们，一切还是照毛主席的独立自主方针办。到1938年秋六中全会时，八路军已发展到二十五万人，成立了许多暂编、新编、教导旅。这些从未通过国民党，如要通过它，一个也不会准。"

从长征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许多重大历史关节，彭总起过什么作用，众所周知，无庸赘述。所有这些，《自述》都有记载。但也有一些不为人知的细节。例如1939年冬彭总过西安，在程潜(时任国民党军委会委员长西安行营主任)处当面大骂何绍南："再去绥德当专员，老百姓抓了你公审！"何未敢再去，绥德从此成为陕甘宁边区一部分。他还对程说："今天谁要反共，他先放第一枪，我们立即放第二枪，这就叫做礼尚往来，还要放第三枪。"1940年第一次反磨擦战役，全歼朱怀冰两个师。当时处境严重，彭总来不及事先请示。"事后报告了中央，得到了认可。"又如，1947年3月，胡宗南进攻延安时，敌我兵力十比一，这时是彭总自动请缨的。

彭老总自幼没有读过多少书，在旧军队中靠自学提高了文化。在江西时，他曾觉得自己理论知识不够，颇有点“自卑感”。从童年起，他认识社会，体会人事，都是从自己的生活实践中来的。他的志向、思想、感情也大都不是从书本中来的。也许由于这些原故，他似乎很不习惯，更不善于为自己辩护。这可举长征时的会理会议为证。由于林彪想要改变军事领导的一封信，会议对彭总发生了误会。彭总并不知道写信之事。虽然“当时听了也有些难过”，“我就没有申明……，采取了事久自然明的态度”。庐山会议又重提此事。因此，《自述》总结了这种不爱申辩的教训：“在这二十四年中，主席大概讲过四次，我没有去向主席申明此事，也没有同其他任何同志谈过此事。从现在的经验教训来看，还是应当谈清楚的好，以免积累算总帐；同时也可避免挑拨者利用。……像会理会议，我没有主动向主席说清楚，是我不对。”这是一个多么纯朴、多么过分自洁的人呵！

直到庐山会议，尽管种种诬蔑、斥责、非难铺天盖地而来，彭总仍然是照顾大局，不愿多作申辩。其实，“大跃进”时的种种问题，他早有察觉，部队中反映的有关材料，都及时给主席送去。1958 年 12 月，武昌会议公布粮产七千五百亿斤，他有所怀疑。随后到湖南视察，到了自己的家乡，情况更加清楚。他担心群众饿肚子，立即给中央打电报，认为不能征购一千二百亿斤，只能九百亿斤。会议初期，在小组七次发言，想找主席面谈未果，才一个通夜亲笔写了那封有名的信。通观彭总一生言行、性格和为人，不难了解，这完全是一件自然而正常之事，何况信中还肯定了“大跃进”的“伟大成绩”。《自述》最后这一段话，真是令人不忍卒读：“在会议发展的过程中，我采取了要什么就给什么的态度，只要不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就行，而对自己的错误作了一

些不合事实的夸大检讨。唯有所谓'军事俱乐部"的问题，我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对于这个问题，在庐山会议期间，就有追逼现象，特别以后在北京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时期(8月下旬至9月上旬)，这种现象尤为严重。"有一次，"逼得我当时气极了，我说：'开除我的党籍，拿我去枪毙了罢！你们哪一个是"军事俱乐部"的成员，就自己来报名罢！'"，"在庐山会议结束后，我就想把我在军队三十年来的影响肃清、搞臭。""我只能毁灭自己，决不能损害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

同所谓"野心家"是诬蔑之词一样，所谓"伪君子"，主要是对彭老总出名的生活俭朴、厌恶奢侈的一种故意颠倒黑白的诬蔑。彭总的童年和少年，是在讨米、饿饭、砍柴、挖煤、当堤工这样苦难的生活中过来的。他的一个弟弟是活活饿死的。大年初二，祖母要带着三个小孙子出去讨米，"我立在门限上，我不愿去，讨米受人欺侮。祖母说，不去怎么办！昨天我要去，你又不同意，今天你又不去，一家人就活活饿死吗!？寒风凛冽，雪花横飘，她，年过七十的老太婆，白发苍苍，一双小脚，带着两个孙孙(我三弟还不到四岁)，拄着棒子，一步一扭的走出去。我看了，真如利刀刺心那样难过。"写这些"交代材料"时，写到伤心的时候，我们威震寰宇的统帅，常常写哭了，眼泪打湿了纸张。"他们走远了，我拿着柴刀上山去砍柴，卖了十文钱，兑了一小包盐。砍柴时发现枯树兜上一大堆寒菌，拣回来煮了一锅，我和父亲、伯祖父先吃了一些。祖母他们黄昏才回来，讨了一袋饭，还有三升米。祖母把饭倒在菌汤内，叫伯祖、父亲和我吃。我不肯吃，祖母哭了，说：'讨回来的饭，你又不吃，有吃大家活，没有吃的就死在一起吧！'""每一回忆至此，我就流泪，就伤心，今天还是这样。不写了！""在我的生活中，这样的伤心遭遇，何止几百次！"

彭总一生不忘本，一生关心、热爱劳动人民，始终保持最朴素的阶级感情，尤其严格要求自己，这同他童年的苦难生活分不开。“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常常回忆到幼年的遭遇，鞭策自己不要腐化，不要忘记贫苦人民的生活。”

在庐山时，彭总说过，他一生不保留笔记与文字材料。可是他却为后代保留了这样一本《自述》。彭总很喜欢《离骚》中的两句：“路漫漫 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离骚》与《自述》相距两千多年，内容与价值自然不同；但两位作者的正道直行，竭忠尽智，志洁行廉，为后人之楷模，可与日月争光，则是相同的。这本《自述》应当向每一个青年、每一个共产党员推荐；这是一部做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一个真正的人的教科书。

1982 年 2 月

一辈子讲真话的人

——我认识的黄克诚同志

第一次见到黄克诚，是1948年3月在东北局平分土地运动的总结会上，那时我刚从热河调来。哈尔滨是后方，大家衣着都比较整洁不那么土气了，只有黄穿一身枯黄色旧军装，特别显眼。至今留在记忆中的是他同凯丰的激烈争论。高岗去了热河半年，这段时期土改工作由凯丰主持，许多地方执行政策“左”，“贫雇农打天下坐天下”，侵犯了中农，杀人也过多。黄的纯粹湘南土音，我是每句都听得清楚的，有一句话记得最清楚，他最后站起来，声色俱厉地说：“左”得跟江西差不多，这种严重错误，是被战争的胜利掩盖了。

会开完后，黄即调到热河任冀察热辽分局书记，这是一个艰苦地区，我原在该区任报社社长。后来南下时听报社的同志说，黄一到热河，处事雷厉风行，如干部一律吃大灶，分局负责同志只有个别有肠胃病的例外。报社班子随黄进天津，后又南下湖南。在湖南三年中，我先后主持报社和省委宣传部的工作，省委的大小会议始终参加，还常去黄的家中，同他逐渐无话不谈。在湖南，大家亲切地叫他“黄老”，他时年不到五十，大概由于高度近视，人又显得苍老，这个称号沿用已久。我入党之后，经过抗战前后地下党时期，延安六年，热河东北四年，以及在湖南这三

年，上下级和工作关系中，熟识的老同志包括中央领导同志，不在少数；但敢于没遮拦，随便交心，明明知道对方不会同意，也敢于表达、敢于坚持己见的，黄老是头一个。大家知道，多年来风风雨雨，同顶头上司建立这种信任，多么不易！为什么能够这样做到？不摆架子，平易近人，为人耿直等，这种优点，不少老同志都具备，但光有这些，还不一定能建立上述这种关系。同窗老友见了面，往往可以随便交谈，不怕走火；但上下级之间，总是戒心多一些。一同黄老接近，就使人从骨子里感到，他是一点领导气、官气（俗话叫“首长架子”）都没有的，是一个从思想作风到生活小节，在待人接物上，非常随便随和，真正平等待人，也从不掩饰自己观点的人。他身上既没有农民习气，也没有知识分子习气和军队干部习气，是一个什么“气”都没有的人。在他面前，百无禁忌，使你敢于直言，敢于顶撞。

湖南刚解放，是新区，报纸的作用大，天天有社论，社会重视，群众关心，那时还有民主党派的报纸。朝鲜战争爆发时，群众关心国际形势，疑问极多，尤害怕三次世界大战，对此，报纸不能缄默不言，尤其对同行还有个舆论导向问题。可是，按照惯例，地方报纸对国际形势无发言权。鉴于广大读者的迫切需要，不及等待中央报纸的声音，我接连发表了许多篇由自己执笔的社论和评论，这也同平时省委对我的信任和放手有关。但关于三次大战等问题，我同省委领导也同黄老发生了很大争论。于是，只好向中央请示。中央宣传部随即回电：同意报社的做法。记得黄老将回电给我看时，笑着向我说：李锐，你胜利了。还有一回，在他家里，谈起我军刚到东北时的困难形势。他率领三万五千华中部队，长途跋涉，历时两月，从出山海关到辽西时，部队非常疲惫，还有减员，不休整无以作战。关于当时东北的战略方

针，他认为必先建根据地，站稳脚跟，作长期准备，不能急于求成；没有巩固的后方，不能作战。他将这些看法和当时困难情况，两次电告中央，同当时林彪、高岗等人意见不谋 而合。于是就议论到高岗其人。根据自己在热河和哈尔滨时（住在高的家中），同高密切接触中的印象，我谈起高的严重缺点，其中一条是用人有亲疏、有小圈子。黄虽不以为然，但也并不介意于我。刚到湖南时，省委内部人事关系，有过个别不协调之事。由于黄老威信高，没有发生什么问题。

在学生时代，我虽然读工科，但对历史一直有兴趣。在延安经过整风抢救，很想多了解些党内斗争的历史情况。于是同黄老的谈话中，常问及这方面的问题，如“AB 团”到底怎么回事。还问过这样的问题：在江西反“围剿”时，毛泽东威信高，为什么王明路线一来，夺了他的权，中央高层中无人挺身支持他？黄谈到党内“左”的病根很深，大家惯于盲目服从，也谈到毛的性格脾气以及用人缺点，因此失掉一部分人心。关于用人缺点，《黄克诚回忆录》（上）有一段这样的记载：有一个原反对毛的一军团的干部何笃才，下放到三军团黄那个师当宣传科长，何很称赞毛的本事，没有人能超过。“我问他，既然如此，你为什么要站到反对毛泽东的一边呢？他说，他不反对毛泽东的政治路线，而是反对毛泽东的组织路线。我说，政治路线正确，组织路线上有点偏差关系不大吧？他说，不行！政治路线、组织路线都不应该有偏差，都是左不得，右不得的。我问他：毛泽东的组织路线究竟有什么问题？他说，毛泽东过于使用顺从自己的人，对待不同意见的人不能一视同仁；何笃才还举例说，像李韶九这个人，品质很坏，就是因为李会顺从，骗取了信任，而受到重用，被赋予很大权力。结果，干坏了事情也不被追究。这样的组织路线，何以能服

人?"李韶九可谓江西时期的康生,此人采用逼供信,大肆捕人,刑讯逼供,屈打成招,因而激起富田事变,造成大打"AB 团"的错误肃反。

这种记不清次数的漫谈中,黄老谈过他自己一生中的重要经历,说他被批判为"右倾"、"右倾机会主义",以及受降职处分等,总不下十来次。这些情况在他的《回忆录》中,有较详细的叙述。在过去漫长的战争年代,由于"左"倾盲动、立三路线、尤其王明路线的长期干扰,同时党有纪律约束,必须服从上级的形势下,使得人们惯于服从,不敢讲真话。可是,不论教训有过多少次,吃过多少亏,黄克诚始终是一个一贯敢于讲真话的人;如果碰上一个不整人的上级,意见不一,他就会争论不已,吵架不休。

早在大革命失败后,黄离开唐生智部,辗转回到家乡湘南永兴县时,特别支部决定组织暴动,夺取县城。他以为力量过于单薄,主张先发动群众,准备条件。尽管事实上暴动没能起来,他还是受到严厉批判。这是他第一次被说成右倾机会主义。那时湘南特委积极推行瞿秋白的左倾盲动路线,命令各县大烧大杀,不仅要烧掉县城和土豪劣绅的房屋,还要将沿衡阳至广东乐昌间大路两侧村庄,统统烧掉。黄不顾县委领导批他右倾机会主义,还是设法保住了永兴县城,没有烧掉。他的哥哥是老实农民,很不赞成烧房子,说地主房子为什么不能分给穷人呢?他深知农民群众对乱烧滥杀,非常反感。从井冈山回来的人说毛泽东也是不赞成烧杀的,这使他对自己的看法更加坚定,于是将不许烧房子,规定为部队的一条纪律。当时由于坚决反对乱杀无辜的作法,黄还一再同县委领导唱反调。县委开会批判他右倾,责令检讨,他拒不认错,于是被撤销县委委员职务,不准他参加党的会议,只让他带兵守城。

朱毛在井冈山会师后，湘南五县共有八千农民武装撤退到井冈山，后因环境困难而仓促决定，将这八千子弟兵编成四路游击队，仍分散回到敌强我弱的湘南各县去打游击，黄任第二路司令。领导无经验，农民恋故土，这支初出茅庐的队伍，除开保留少数干部和人员外，很快就被敌人全部打垮了，并且遭致各县的大屠杀，一片白色恐怖。黄克诚与一个同伴从永兴孤身出走，浪迹四方，求食宿，找组织。从 1928 年 10 月到 1930 年春，他从武汉到上海到天津一带，最后又回到上海。其间目睹大革命失败后，大城市中党组织惨遭破坏的情况，自己饱尝流浪孤独之苦。这一段生活，使他深深感到敌我力量的悬殊，没有根据地作依托，不能发展武装力量，革命很难前进，连个人的生存都成问题。最后在上海接上组织关系后，中央军委派他到红三军团工作。

这时立三路线提出了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的计划，传达到三军团。黄克诚预感到情况不妙，以为拿现有的力量去攻打大城市，无异以卵击石。于是给军团总指挥彭德怀写信，陈述自己的看法。三军团打下平江之后，讨论下一步的行动，黄再次提出反对攻打大城市的意见。他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知道城市决不可能举行暴动，根本不具备夺取武汉的条件。他也不赞成暴动夺取长沙的主张，以为只能相机智取。黄的这些意见受到严厉批评，认为他不宜担任重要领导工作，撤销了原定委他为纵队政治委员的任命。

1932 年初，苏区中央局决定红一方面军夺取赣州，黄时任三军团一师政委，为主攻部队。事前他极力反对打赣州。后来赣州久攻未克，伤亡重大，敌军反攻，始被迫撤围。战役进行中，黄曾数次建议撤退，并批评彭德怀为“半立三路线”。敌反攻时，未接命令，主动撤走，幸未追究。后来开会批判，被认为对抗中

央路线，还说他一贯右倾，如反对中央的土地政策，支持打“土围子”扩大苏区（这都是毛泽东的主张）等，黄不服气。部队过赣江西岸之后，一路行军，一路挨批判，黄也就同批判他的军政治委员贺昌争吵了一路，拒不作检讨，并表示要同他们争论二十年。这次没有受处分。这年十月，开了批判毛泽东的宁都会议之后，三军团随即在广昌开会，贯彻宁都会议精神。因为黄支持毛的路线，就把他拉出来批判，会后并撤销了他第三师政治委员的职务。

长征途中，黄一直作三军团先头部队第四师的政委，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斩关夺隘，浴血奋战，先后两位师长阵亡，一位师长重伤，他几度遇险，千钧一发，幸免于难。在第二次占领遵义后，他看到主力红军受到如此重大削弱，再也经不起消耗了，便向领导同志提出：当前保存革命力量为第一重要，应当尽量避免打硬仗。他还具体谈到有几次战斗，其实是不必打的。黄的这次谈话，又一次被认为是右倾和缺乏信心的表现，又认为他已不宜于带兵打仗，调离所在部队，回军团司令部试用。后经他恳求分配点工作，才任命为司令部侦察科长。在会理会议之后，批判右倾机会主义时，黄虽已不担任领导工作，由于是“老右倾”，又被当作靶子，被批判了一通。

红军出了草地之后，从一军团调了几名领导干部到三军团。黄不改好提意见的秉性，依旧照常向新来的领导提意见，并坚持自己的看法。于是被认为“狂妄”，“目无组织”，甚至有这种说法：像黄克诚这样的人，年纪大了（当时他不过三十来岁），又不中用，当个普通战士都不够格，还怕他掉队，落入敌手以成后患。这说明他当时处在一种相当危险的境地。三军团多年来在彭德怀言传身教的影响下，不论环境如何变化，始终保持艰苦朴素本

色，上下一致，伙食一律，无人搞特殊化。对新来的领导聚在一起改善伙食，干部和战士看不惯，难免讲些怪话。加以个别战士有违反纪律的行为，值此部队极端疲惫和减员之时，新来领导却准备审查干部、整顿纪律，要处理所谓问题严重的人。黄于是又找领导谈：经过千辛万苦，刚走出草地，有问题应以教育为主，不能再搞这等脱离群众之事。军团领导本来准备安排黄担任纵队组织部长之职，也因此而告吹了。

在军事行动方面，黄克诚“一贯右倾”；在肃反斗争方面，黄克诚也“一贯右倾”。中央苏区开始打“AB 团”的肃反运动时，黄时任三军团四师政委。最初他也盲从过，虽然比较保守，但也肃掉了一些。上边一号召，下边一哄而起，就是搞逼供信。他在《回忆录》中说：“我对‘AB 团’的存在及其危害性，对‘阶级决战’的口号和所谓‘地主富农钻进革命阵营内破坏革命’的事实，开始一段深信不疑，对上级的指示和部署，完全是自觉地遵照执行，从而，铸成了遗憾终生的大错，至今回想起来，犹感沉痛不已。如果要细算历史旧帐，仅此一笔，黄克诚颈上这一颗人头是不够 抵偿的。由于这次错误的教训太惨痛了，使我刻骨铭心，毕生难忘。所以，以后凡是碰到搞肃反、整人之类的政治运动时，我就不肯盲从了。”黄克诚是一个真正不二过的人。

第三次反“围剿”之前，开始了第二次大规模肃反打“AB 团”运动。黄时任第三师政委，上边命令抓捕所谓“AB 团”分子，他就拒绝执行了。可是当时肃反委员会权力太大，三师中还是杀掉了一批干部，其中有不少很优秀的干部，如前面提到的何笃才便是。何是湖北人，师范学生，参加过南昌起义，对一军团的情况很熟悉，黄同他相处中，无所不谈。以后再要抓人，黄就硬着头皮顶住，坚决不从，还对肃反委员会的人说：你们要抓的

人中，并没有一个地主、富农分子。后来实在顶不住了，就悄悄通知名单上的人上山躲藏起来，打仗时再下山参加战斗。但最后这些人还是被找到杀掉了。他为此无限痛心，悲愤地质问肃反委员会，为什么滥杀无辜？同他们大吵了一通。因此黄也被怀疑是“AB团”，“托陈取消派”，决定将他抓起来“审查”。在三军团，黄同彭德怀之间已建立了相互直言的关系，有时吵了架也相安无事。这时幸亏彭深深信任这位打仗和进言都勇敢的部下，进行了干预，他才得免于难。但仍然被戴上一顶“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撤掉了他三师政委的职务，分配到军团司令部当秘书。他对彭德怀的干预从来不知道，彭也从未跟他谈过此事。后来庐山会议上受批判时，说他支持彭的《意见书》，是为了报救命之恩，他才知道这件事情的原委。1959年庐山会议8月1日常委会后，毛主席留我们旁听的四个人吃饭时，就曾问过黄彭“父子关系”的说法。1931年12月，开始纠正肃反“扩大化”之后，黄才又被起用，任一师政委。一上任就赶上前面谈到的打赣州。

1935年9月，长征的红军向陕北作最后的进军。指战员体力消耗很大，伤病员很多，行军时掉队的人仍一路不断。保卫部门怀疑这些人情绪不振，会投敌叛变，决定严办。当时黄已降职担任军事裁判所所长，对这些同志实在不忍处理。有一位受过重伤的管理科长，只因过草地时丢掉几名伤兵，也要交付审判。他就去找上面求情，却遭到了狠狠的训斥，撤掉了他所长的职务。总结了这些沉痛的教训，抗日战争中他在新四军时，在华中局扩大会上作报告，谈到审干和锄奸问题，提出了“宁可错放，不可错杀”的主张。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毛泽东中央的正确领导，在华中新四军

的战斗岁月中，黄克诚的处境比过去内战时期大不相同，得以发挥自己的才能，为苏北根据地的主要创建人。他的严格 的实事求是精神，遇事多从困难处着眼的作风，在实践中自有新的发展；他的好提意见并坚持己见的性格，自然也丝毫没有改变。因此，也发生过同华中局领导意见相左之事。1940 年，同国民党军韩德勤部的反“磨擦”战役，取得黄桥胜利之后，12 月的曹甸之战，从政治到军事，黄都是不同意打的，尤其在水网地区攻坚作战，于我十分不利。后来在打法上，根据历史上的作战经验，黄还作过具体建议，未被采纳。曹甸战役终于没有打好，他却被认为右倾，撤了第五纵队司令员职务，保留政治委员职务，司令员由陈毅兼。陈不能到任，实际上黄仍是一身二任。1941 年夏，日军大“扫荡”，他又同华中局领导发生“保卫盐城”之争，又被认为不服从指挥，开干部会对他进行批评。他不服，坚持自己战前所提意见的正确，战役未达预期目的，不是他不服从指挥，而是上级指挥不当。当时华中局和军部都在盐城，在日军“扫荡”开始时，他建议及早撤离，跳出敌包围圈，分散游击，伺机反击。盐城终于未能守住，仓促撤退，造成损失。他联系上次打曹甸战役，认为两次都是上级处置有误。由于争论相持不下，黄便电告中央，中央将电报转回华中局，仍争论不已。虽然意见未变，黄感到这样下去，极不利于团结对敌大局，于是委屈到底，服从组织决定，在华中局会议和干部会议上作了检讨，还向毛主席发电作了自我批评。事后，他同陈毅交心，终于消除一些误会。1942 年陈毅总结曹甸战役时，从政治到军事，都承认有不当之处。这以后，黄率领的新四军第三师，在苏北频繁作战，不断胜利，建立了巩固的抗日根据地。日本投降之后，他认为这是我军进军东北的大好时机，不顾饶漱石的阻挠，他以自己的名义，向

中央发了一份一千几百字的长电，陈述对当时形势的看法，如何在军事上经略华北、山东，收缩华中，调五万最好十万主力出关争取东北。后来中央的方针和实践，证明了这份电报的起草者是一个卓越的军事家和政治家。

我曾同黄老谈过我在延安被“抢救”，关了一年多监牢的情况。他就谈到他当年是如何抵制这一运动的。1943 年 4、5 月间，华中局奉中央令开展“抢救运动”时，黄就建议，要接受打“AB 团”的教训，不要执行，以免发生逼供信的错误。可是，华中局不能不执行。他没有办法，只好在自己所属的第七旅，亲自去搞试点。有几个人硬逼时极不正常，抓起来一审讯，就乱供一气，不着边际了。黄于是立即让停止“抢救”，将被“抢救”的人统统释放，做好善后工作；同时立即通知所属部队和管辖地区，一律不开展“抢救”运动。从而在苏北和三师避免了这场灾难。他的《回忆录》中，还谈到在华中局汇报审干和“抢救”运动情况时，他如何及时解救了曾希圣（第七师政委、黄在衡阳第三师范老同学）的被打成“特务”的爱人，从而发现“人证”所在的谭震林第二师，每个团都“抢救”了百把人。于是，饶漱石同意黄的建议，对被“抢救”的干部进行甄别平反。

1952 年春，得知即将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我就以在大学学工科为由，向省委坚决要求转业到工业系统。自己在宣传和新闻工作岗位十来年，深感坐而论道、眼高手低的空疏之病，应当去做点实际工作了。可是，我是本地人，省委以为我应留在湖南，黄老甚至认为我应向理论方面发展。后来他自己也奉命调中央，最后省委才同意我的要求。到北京后，同黄老仍保持来往，每年总要去看望他两三次，同他漫谈，获得教益。在水电总局创业之初，为争取部队的转业干部，向他求过援。黄河规划酝

酿三门峡方案时，他曾表示过怀疑。1958 年 1 月，参加中央南宁会议讨论三峡问题后，回来不几天的一个晚上，我特去黄老家，告诉他我的意外遭遇(三峡问题采纳了我的意见，毛主席命我当他的兼职秘书)，自己非常不安，怕以后出事。记得调离湖南时，黄老曾告诫我：发言权不要太高。我还向他反映了胡乔木的一种看法，毛主席这时有一种类似抗战初期的兴奋心态。“大跃进”期间，忙得团团转，同黄老很少接触。1959 年庐山会议之前，我从西南各省转到长沙时，同周小舟有过一次长谈，交换对“大跃进”各种问题的看法。小舟告诉我，黄老三月间来过湖南，到浏阳等地看过小高炉炼铁，认为这样炼铁，浪费资源，劳民伤财，太不划算了；这种不讲经济不讲科学的蠢做法，是得不偿失的。他肯定湖南没有强迫推广密植做得对，粮打得多一些，不像湖北、广东，有些地方已经开始饿肚子。小舟还告诉我，北戴河会议时，通过了全国搞人民公社的决议后，黄老曾向他谈过(在座有陶铸、王任重等)，人民公社挂个牌子算了。黄老这次走了几个省，深深感到，到下面了解真实情况，已很困难。3 月 2 日，他在邵阳对陪同他的地委正副书记和军分区政委，讲了这样一段话：“近年来，在我们党内，在我们干部中，有一种反常现象，不敢说真话；说真话的受压制打击，看风说假话的反被提拔重用。有些假话是上面逼出来的。上面瞎指挥，下面怕戴‘右倾’帽子，就大放‘卫星’，讲粮食亩产几万斤，一个县讲生产钢铁多少万吨。”他最后说：“我见到什么问题，喜欢一吐为快，敢讲真话，实事求是。正面的意见，反面的意见我都听，不主观武断，不无理压服别人。”(《湖南党史》1988 年第 1 期)

1959 年庐山会议，黄老是 7 月 17 日上山的。这时彭德怀的《意见书》已经印发。18 日一早，周小舟、周惠和我去看望他。

我们都谈到，在小组会上还有不能多谈缺点的压力。黄说，在书记处的会议上他也讲过，我黄克诚总还算一个敢讲点真话的人，但现在也不好讲了。谈到彭总的信，黄说粗看了一下，有漏洞，有问题，还有刺；按照实际情况，缺点还可以说得更重一些，但这话不能对彭说。他明明知道会议对“大跃进”的看法，还有分歧；他尤其清楚毛彭之间存在历史上的恩恩怨怨，有些老疙瘩一直没有解开；他也知道这时要他上山来，自有特殊原因；但他还是在19日的小组会讲了真话，以支持彭的意见。他大谈“大跃进”中的缺点，说有缺点不可怕，可怕的是有缺点不讲。当时河南最早放炼铁“卫星”，中央工交工作部副部长高扬去调查，向中央报告了真实情况，河南省委大为光火。他说，这就是报喜高兴，报忧就不愉快。他用这样一句话结束他的发言：毛主席讲过开动脑筋，放下包袱；缺点不讲，总是个包袱。

关于庐山会议的情况，其中彭黄张周和我这个“追随者”的详情，我已如实在《庐山会议实录》一书中交代。这里只重提两件事。一是7月23日毛主席批彭讲话后，当天晚上，我思想不通，去找周小舟、周惠交谈，这已是很不应当的了。不幸的是，周小舟硬要再去找黄老一谈，我说了这样担心的话：“人家会说我们还有小组织活动”，也未能阻止住，黄老只好同意我们去。黄一直劝导我们，有意见可以再去找毛主席谈清楚。小舟和我仍激动，小舟说了“斯大林晚年”的比喻。此事最后被捅开，当然更是火上加油，定案成“反党集团”。弄成这个局面，23日晚之事有很大关系，至今仍感到内疚无已。二是，我们三个人（我与二周）几次作检讨写交代，关于黄老，我们都无一字一句贬语，都是实事求是地讲他为人处事的长处，尤其民主作风好，对干部宽厚，以及我们对他的敬重等。这是至今感到的一种宽慰。庐山

会议最后阶段，迫于形势，必须维护党的总路线，维护党的团结一致，维护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威信，彭德怀、黄克诚和张闻天只能“缴械投降”，“要什么给什么”，把一切都兜揽起来。他们做这种违心之事，当然痛苦万分。那又有什么法子呢，这是历史铸成的。黄老后来对他的儿女说过，庐山会议后期，他还是违心地认了帐，虽说这是万不得已，出于服从决定、服从上级的惯性，但总觉得自己讲了不实事求是的话，心中一直耿耿。正由于这个教训，在“文化大革命”中写检讨交代时，他就变得更加“顽固不化”了。这里我想附带说一下黄老的家风，他是怎样教育四个儿女的。他的“家训”有：“你们要靠自己的努力奋斗成才，不要靠我的什么‘关系’‘后门’，我黄克诚是没有什么后门可走的。”“你们要学革命，不要学世故。千万不可不学革命，却把世故学会了。”(《新观察》1987 年第 15 期)这四个儿女我都认识，且小有往来，他们作风朴实，都是“寻常百姓”，都有“乃父之风”。

1979 年初回到北京恢复工作后，仍然同五十年代一样，每年总要去看望黄老几次，回忆旧事，评论人物，更多的是议论形势，关心国家大局。有时仍然免不了争论，乃至相持不下。1980 年尾讨论《历史决议》前后，我们也谈过毛泽东的功过评价问题，对我教益很大。他的《回忆录》关于这个问题有一篇《附录》，从历史上许多重大关节之处，来阐述毛泽东无可替代的功勋；说明没有毛的领导，就不可能诞生一个新中国。他也实事求是地谈到毛晚年的错误，但反对以轻薄的态度、感情用事的态度来评价。最后从古往今来的历史出发，得出结论：必须捍卫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我们的精神武器。这篇文章发表后，对全党和全国人民正确地认识毛泽东的一生及其功过，起了很好的教育作用。

1986年黄老病重时，我几次去医院看望。最后病危时，他反对再进行抢救，认为毫无意义，要拔掉身上那些管子，经过医护人员保护才止住。1979年回到北京第一次去看他时，他就谈到彭老总去世前的种种惨状。这时他不免又想起彭老总来，说自己也不料能活到八十四岁。病危时我去过医院两次，已只能隔窗探视，病床周围架满各种医疗器械，不得近前。医生说：独心脏坚强，尚能搏动。隔约半月，12月28日正午，电话中得知噩耗，赶到医院，入病室，始见瘦削面容。在遗体前久久伫立，不禁悲从中来：近四十年来可以交心的人，从兹永诀！

这天晚上，久久不能入睡，吟得八句，以寄哀思，并在《人民日报》刊出：

可以交心人永诀，难于握管我伤情。
忘年交谊兼师友，忆昔狂潮共醉醒。
九畹贞风当世仰，一身正气有公评。
更聆教诲今无及，时下何堪失直声。

几年来，一直想写篇文章怀念黄老，来稍稍说明诗中的意思。今年是黄老九十岁诞辰，不能再拖了。上面所写的这些琐琐碎碎，也只是主要从讲真话这个侧面，来介绍黄克诚这个不是凤毛麟角，也是难于遇见的真正共产党人、真正的人。不讲真话，听不到真话，我们曾经付出过多么巨大的代价；大家都知道，其原因主要在我们一直缺乏应有的民主生活。如果今后能够做到，大家都愿意都能够讲真话了，相信我们的黄老定会含笑九泉。

1992年10月下旬

重读张闻天的《庐山发言》

去年9月刘英同志来信说，“闻天同志含冤去世已经八年多了。明年是他的八十五周年诞辰，有关方面计划为他出版一本纪念文集。你和闻天同志同在庐山受难，很希望你能写一篇文章。”不久前，《张闻天选集》编辑工作小组将《选集》文章送了一套与我，其中就有在庐山的那篇有名的长篇发言。重读之后，一方面引起往事的回忆，同时更加深了对闻天同志的敬重。

大家知道，1959年庐山会议的后期，批判彭、黄、张、周“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时，张闻天被目为“武文合璧，相得益彰”的“副帅”，受冲击也是极为严重的。攻击的靶子就是这篇讲了三个小时的《发言》。此时此刻，张闻天为什么要作这样一个长篇的发言呢？

庐山会议的前期是所谓“神仙会”，原来只准备开十几天，产生一个会议的《纪要》就结束的。会议的基本精神是毛主席对当时形势估计的三句话：“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大家遵循少奇同志的两句话：“成绩讲够，缺点讲透。”各抒己见，有的讲成绩多些或者大话还多些，有的着重讲了缺点或面临的困难。总之，无甚拘束，开始确有点象“神仙会”的味道：白天开会游山，晚上散步跳舞。大概在7月15日左右，《纪要》草稿和彭总的信

印发之后，形势就向紧张方面变化了。这时，有些同志认为刮“共产风”等问题已作过检查，正在改正，就不大再愿意多谈、多听缺点，怕因此“泄气”，今后难以维持继续“大跃进”的局面。有些同志则感觉还有一种“压力”，即难以将缺点讲透，认为不把事实和后果摆清楚，找出其根源，认真总结好经验教训，就不利于今后的工作。多数人的观点比较持中，都急着下山抓工作。大概在 1958 年北戴河会议决定钢翻一番之后，张闻天就密切注意“大跃进”发展的形势了。外交部机关炼钢，由于没有原料，他就下令停止。1959 年 3 月在两广参观时，他作了很多调查研究，注意到劳动力和运输的紧张，许多小高炉并未点火，也还遇到浮夸以及粮食和副食短缺的情况。在庐山会议前的两次政治局会议上，他一再陈述自己的意见，认为在宣传中要承认缺点和错误。他同彭总在会前和会议期间（他们住处靠近）有过接触，许多观点相似，“意气相投”。他还找计委和财贸部门的负责同志了解情况，也找地方的负责同志如周小舟等交谈。他对“大跃进”有一套看法，确是忧心忡忡的。彭总的信印发之后，有一天在田家英的住处，我们一伙谈得来的人聚到一起（有胡乔木、周小舟、田家英、吴冷西等和我，还有陈伯达），正谈论信的内容时，张闻天进来了，同我们一起议论起来。记得我还开过一句玩笑，说我们这是“低调俱乐部”（所幸者，这个如追究其名称出典就不得了的玩笑，在批斗高潮时未揭发、坦白出来）。乔木马上接着说：不是，不是，我们这是马克思主义俱乐部。这个细节可以说明我们之间谈话的倾向。这是在庐山会议时，我同张闻天主要的一次接触，因为我们没有编在一个小组。

我没有在张闻天直接领导下工作过。1948 年 2 月，我从热河调到哈尔滨，在东北局工作。5 月间，他离开合江到东北局任

常委兼组织部长。我曾列名于他所领导的巡视团为巡视员，但一直没有参加具体工作，只是在列席东北局的会议时常听他的发言。这个期间，他着意研究经济问题，曾对东北各种经济成分的历史和现状进行过多次细致的调查，常率领巡视组深入基层，用了很大精力研究全国解放后的经济建设方针。1948 年 8 月，他受东北局委托，在东北城市工作会议上作了总结，接着又为东北局写了《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科学地分析了当时东北存在的五种经济成分（国营、合作化、国家资本主义、私人资本主义和小商品）及其相互关系，并据此提出了党对经济建设应该采取的方针路线。应当指出，在这个重大问题上能作出如此全面系统分析的文件，《提纲》在当时可说是绝无仅有的，因此受到了中央的重视。它的许多思想被吸收到 1949 年 3 月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文件中。到 1949 年 7 月这个期间，他还先后就供销合作社的方针、土改后农村经济的发展方向和对待私人资本主义政策等问题，向中央和东北局写了四个文件。其中允许少数新富农的存在和一定程度的发展等意见，曾受到过非难，但他并没有轻易放弃这些经过深思熟虑的意见。1954 年电力代表团到苏联参观时，他在大使馆接见过刘澜波和我，那天见到李德伦来使馆，知道他当时在学点音乐，因此使我产生了一种他在苏联时颇有“闲情”的感觉。在庐山会议前期，毛主席同我们几个人的一次谈话中，谈到遵义会议召开前，先将洛甫、王稼祥争取过来的故事，还说到派洛甫到苏联当大使，来不及事先征求他的意见之事。这就使我证实了当年的这种感觉：张闻天还是想在国内做事的，而且仍然对经济有执着的兴趣。1956 年反急躁冒进后，他就在驻外使馆谈过，国内有冒进，供应紧张，原材料不足，盲目追求高速度，是主观主义，忘记

了国家还很落后。他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不准讲反冒进，是有抵触情绪的。因此，他在庐山作长篇发言，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大跃进”提出全面的看法，是很自然的事情，是题中应有之义。他比较全面地掌握了实际情况，有经济理论修养，因而能抓住问题的本质，站得高，看得远。何况他是过来人，过去犯过严重的左倾错误，按照他后来检讨时说的，对“左”的东西特别敏感；他又是中央政治局的候补委员，在这样重要的历史关键时刻，有责任向党中央阐明自己的看法。

这个长篇《发言》是7月21日在华东小组会作的（组长是柯庆施），距离毛主席7月23日作反“右”报告，只有两天。这时对《纪要》特别是对彭总的信，非难已经很多，如说这封信的矛头是“针对主席”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就是左倾路线错误了”，“路线错误那就要更换领导了”，种种说法都在传开，形势已经比较紧张。正是在这样严重的时刻，张闻天作为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以鲜明的态度，确凿的事实，科学的语言，冒险犯难，直言极谏，完全支持已经遭到非难的《纪要》和彭总的信，作了长达三个小时的发言。后来批斗他时，说他的发言对彭总的信作了“全面的系统的发挥”，是“进攻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反党纲领”。小组会的发言，《简报》中一般只刊要点。7月23日之后，这个“副帅”的《发言》记录稿就全文印发下来。批判时有人统计：全文八千多字，而成绩只有二百七十余字；用了三十九个“但”字（“‘但’字以前虚晃一枪，以后便大做缺点的文章”），十三个“比例失调”，十二个“生产紧张”，一百零八个“很大损失（或损失）”，以及“太高”、“太急”、“太快”、“太多”等一大批“太”字。

《纪要》讲了“大跃进”三个方面的缺点，即比例失调，“共产风”，虚报浮夸和强迫命令，但没有对这些缺点展开论述。《发

言》说是对《纪要》所谈缺点补充一些意见，实际是对“大跃进”作的一个比较全面的分析和总结：对暴露出来的严重缺点，引起的严重后果，以及产生缺点的原因，作了系统的论述；对政治与经济的关系，三种所有制的关系，民主与集中的关系等根本问题，作了理论的探讨；最后归结到党内民主作风的重要。

当时讨论中有一种较为普遍的意见，即前述多谈缺点，就会泄气，会打击群众的积极性。《发言》针锋相对地说，缺点定要讲透。缺点要经常讲，印象才会深刻。我们那时犯盲动主义，毛主席就经常讲，所以对缺点要采取郑重的态度，不要采取轻描淡写的态度 。马列主义者鼓励积极性靠真理；现在我们觉得有些虚，就是真理不够，增产数字报了那么多，实际上没有那么多。马克思说过，革命时容易办蠢事。列宁也说，要正视这些蠢事。

《发言》指出，关于缺点的原因可以讲得具体一些；比例失调是指标过高，求成过急；“共产风”主要是所有制和按劳分配两个问题；虚报浮夸、强迫命令是不允许讲话、不允许怀疑所致，否则就扣“怀疑派”、“观潮派”等帽子。讲缺点，还应讲具体后果，这样才能取得经验，针对后果提出纠正办法。如钢铁指标太高，其他指标也被迫跟着上，造成全面紧张和比例失调；基建战线太长，“三边”（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做法，浪费太大，工程质量也差；新增工人太多，招二千多万，人浮于事；企业产品不成套，任务朝令夕改，不能实现价值；原材料缺乏，经常停工待料；产品质量下降，技术水平下降，不注意设备维修，等等。从而造成大量资金和物资浪费、积压，市场供应紧张，物资储备减少，财政结余用光，外贸出口不能完成等等恶果。“全民炼钢”不单赔了五十个亿，最大问题还在九千万人盲目上山，使农业生产受到损失，丰产也不能丰收。什么事都提倡全民，甚至要求“全民写

诗”，搞得老百姓不胜其烦。

关于公共食堂问题，当时议论甚多，河南认为食堂有八大好处，全省没一个垮的。大多数人还是要保食堂，以为这是一个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的标志。报纸上曾大批“资产阶级法权”，批按劳取酬。《发言》建议取消“吃饭不要钱”，改为实行社会保险，照顾少数丧失劳动力的人。明确提出：我们不能搞平均主义，还是要按劳分配。现在有些人把供给制、公共食堂等同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其实这完全是两回事，社会主义并不一定要采取供给制、公共食堂这种办法。社会主义要贯彻按劳分配，就要强调保护消费品个人所有权，这到共产主义社会也是存在的。对于穷和富的观念要慢慢改变。劳动好，对国家贡献大，所得报酬就多，生活就富裕，富是由于劳动好。这样的富对个人好，对国家更好，它是应该的，光荣的。由于不爱劳动，好吃懒做而生活穷苦，是活该，是可耻的。《发言》还精辟地谈到当时流行的“共产主义风格”的宣传问题：共产主义风格、为集体牺牲个人的思想，这些可以宣传，可以用来要求少数人、先锋队、先进分子，但是不能当做制定现行政策的根据。如果社会主义不能满足个人物质、文化需要，就没有奋斗目标，社会主义也就建设不起来。

关于产生缺点的原因，《发言》同意《纪要》说的，主要是由于缺乏经验。但不能以此为满足，而应该从思想观点、方法和作风上去找原因，这样才有利于总结教训，避免今后重犯错误。这也是他这篇发言的主旨所在。关于主观主义和片面性，《发言》专门作为一个问题提了出来。讲到主观和客观、精神和物质的关系，强调主观能动作用是对的，但强调过了头，以致不顾实际可能性，这就成了主观主义。好大喜功也是好的，但要合乎实际，否则就会弄巧成拙，欲速不达，好事变坏事。从主观主义进而谈

到政治与经济的关系。领导经济光政治挂帅不行，还要根据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有的人根本看不起经济规律，认为只要政治挂帅就行；有的人公然违反客观经济规律，说是不用算经济帐，只要算政治帐。这是不行的。今天总结经验，尤应该从经济规律上进行探讨。

综合平衡的问题，当时也是很有争论的，有的人以“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这一法则，为“大跃进”出现的严重失调辩护，甚至认为就是要冲破平衡，不平衡是好事。《纪要》中“综合平衡”一节是我参加起草的，内中有四句话：“统筹安排，供需协调，瞻前顾后，合理布局。”记得因字数所限，没有展开讲透。《发言》明确地说，经济建设就是要找出相对平衡，利用相对平衡，按照相对平衡办事。我们利用相对平衡制定经济计划，要使之大体是个平衡的计划。遇到某一方面被突破，便要做到及时平衡，这就是积极平衡。还建议在《纪要》草稿中加一条“经济核算”。任何产品，都要讲成本；要算帐，这跟“算帐派”是两回事。用毛主席的话，经济工作要越做越细，就是要精打细算。不算帐，社会主义是建设不起来的。有一个时期，我们的建设有不计成本、破釜沉舟的偏向，说是要算“政治帐”。其实，“政治帐”同“经济帐”是统一的，不能把它们对立起来。我们的国家还是一穷二白，资金有限，必须根据节约原则，严格控制资金使用，最合理地使用每一块钱。毛主席提出要大家学政治经济学。领导经济建设，不懂或不熟悉经济规律是不行的。中国的经济建设有其特殊性，但是有关的普遍规律仍然起作用，问题在于两者相结合。政治经济学，不仅高级干部要学，广大干部也要学。

“大跃进”时期，不按科学精神办的事太多，报纸上放肆地报道，随便吹牛，放卫星，超外国，引起很大的混乱，国外影响也不

好。庐山会议前夕，在外交部的务虚会上，张闻天就讲过不要吹，说有些东西我们自己认为是正确的，但究竟正确与否，还有待实践证明。因此，《发言》强调，必须学习科学技术知识。许多东西我们缺乏常识。不能随便把原有的东西推翻，更不能随便吹牛。生产技术措施没有科学根据，光用土办法蛮干不行，蛮干是要死人的。对于已有的科学成果要重视。“一切经过试验”，试验确实成功了，再推广不迟。但实验室里成功了的，还不等于在生产中也已成功。赶超世界水平之类的话，要谨慎，的确比人家高明再讲也不迟，而且以自己不讲、让人家替我们讲为有利。他觉得当时我国的国际威信已经受到影响。

《发言》针对性极强，如此明快而尖锐，几乎毫无顾忌。最后谈到根本关键还在党内民主作风问题时，尤其如此。庐山会议之前两个月，四月上海会议时，毛泽东曾提倡海瑞精神，鼓励大家讲话；说不敢提不同意见，无非是怕撤职，怕开除党籍，怕离婚，怕坐牢，怕杀头，等等。在小组会上，张闻天也曾谈过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的问题。《发言》中这一段话，今天读来也是有现实意义的：“主席常说，要敢于提不同意见，要舍得一身剐，不怕杀头等等。这是对的。但是，光要求不怕杀头还不行。人总是怕杀头的，被国民党杀头不要紧，被共产党杀头还要遗臭万年。所以问题的另一面是要领导上造成一种空气、环境，使得下面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形成生动活泼、能够自由交换意见的局面。”

《发言》还特别欣赏《纪要》草稿中这一段话：“必须在全党干部中间提倡说老实话，提倡实事求是的讨论。对于有些问题的认识一时可能有参差不齐，只要大家在实际行动中遵守纪律，那么这种现象是完全正常的，允许的。应该通过真正同志式的交换意见，逐步达到一致，不要采取粗暴武断办法，不要随便扣帽子。”

《发言》说:“这个问题对我们当权的政党特别重要。我们不要怕没有人歌功颂德,讲共产党光明、伟大,讲我们的成绩,因为这些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怕的是人家不敢向我们提不同意见。决不能因为人家讲几句不同意见,就给扣上种种帽子。是否提错了意见,就一定是观潮派、机会主义、右派呢?这也不一定。一个人是否真有问题,要经过一定时间观察。对一个人,经过长期观察其言论、行动,证明他确实是右派或观潮派,再扣帽子也来得及。这样做,对团结干部有利,对工作有利。总之,民主风气很重要;要造成一种生龙活虎、心情舒畅的局面,才会有战斗力。过去一个时期就不是这样,几句话讲的不对,就被扣上帽子,当成怀疑派、观潮派,还被拔白旗,有些虚夸的反而受奖励,被树为红旗。为什么 这样呢?为什么不能听听反面意见呢?刀把子、枪杆子,都在我们手里。怕什么呢?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群众路线的人,一定能够听,也一定会听的。听反面意见,是坚持群众路线、坚持实事求是的一个重要条件。毛主席关于群众路线、实事求是的讲话,我认为是讲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真正要培养这种风气不容易。”

这段话讲得多么好啊!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我们每一个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要永远记住这段话的精神。当年闻天同志赤胆忠心、不顾个人安危的这种精神,实在值得我们学习。

《发言》的最后,才提到彭总的信,认为信的中心内容是希望总结经验,本意是很好的。针对有些人对信中某些措词的挑剔,《发言》为之辩解。特别是关于最敏感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提法,为最受攻击之处,就是赞成彭总的信的精神的人,也都不敢表示同意这个说法。唯有闻天同志一个人是这样说的:“这个问

题不说可能更好一点，说了也可以，究竟怎样，可以考虑。但是，刮‘共产风’恐怕也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

7月23日之后，硝烟滚滚，风云突变。在7月24日的小组会上，张闻天还是坦然的，发言仍旧从容不迫，讲出心里的话：“我没有经验，是从旁看的。同时觉得你们不大愿意听，我们要讲缺点，你们要讲成绩，这主要是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大家把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意见，经常讲出来，经过争论，认识一致了，问题就解决了。这样的会开得很有味道。现在顾虑的人还是不少的。彭总写了一封信，引起大家争论，能把问题看得更清楚。不怕扣帽子，不乱扣帽子，不怕争论，有话就讲，大家认识一致了，没有负担了，这就是心情舒畅。有什么讲什么，就没有什么紧张了。我有时也想，不关我的事，我讲不讲，我是搞外交工作的，讲了以后还有些后悔，我何必讲呢！紧张状态的确是存在的，养成民主作风很重要。这里都是负责同志，下面更严重些。”

就在他的《发言》被当作靶子印发的当天，我们还有过一次偶然的接触，他问我发言稿看了没有？我说看了，那些缺点都是存在的。在当时的情况下，也不便于再谈什么了。

7月23日之后的一两天，张闻天同彭德怀碰面时，他们还相互谈到：讲缺点竟如此危险。我们总结经验，人家扣帽子。在后来的“检讨”中，闻天同志交代，他与彭总议论的要害，是关于领导作风问题，如何避免一言堂问题。如果只好听好消息，就必然助长下面报喜不报忧，因而容易受蒙蔽，容易头脑发热，也容易骄傲。他们还从南宁会议后个人威信的发展，谈到树立集体威信的重要，以及应防止损害集体领导原则的事情发生。

批斗升级之后，“不仅对事，还要对人”。8月2日，《给张闻天的信》印发了。闻天同志希望不扣帽子，不乱扣帽子，然而，千

钧重帽扣下了：陷入那个军事俱乐部去了。《发言》被指责为："安的什么主意？那样四面八方，勤劳辛苦，找出那样漆黑一团的材料。"张闻天被认为"旧病复发"，遭到尖刻的讽刺与奚落。枚乘的《七发》随之印发，害的病与楚太子相似，这种病"可无药石针刺灸疗而已，可以要言妙道说而去也"。右倾或左倾机会主义这类毛病，是有历史和社会原因的，"所从来者至深远，淹滞永久而不废。"治疗之法，"批判从严"；"讲跃进之必要，说公社之原因，兼谈政治挂帅的极端重要性。"

8月上旬，原来六个小组并成三个大组，分头批判彭、黄、张、周等人。这些"批判从严"之处，就不必多说了。

在后来的"检讨"中，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上，张闻天总结了以下六条，为"两条路线——总路线和反总路线的斗争"，他说自己从这六个方面反了"总路线"：

一、强调发展生产力，即把"以最少的劳动消耗，取得最大的经济效果"，把建立社会主义物质技术基础，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任务。这是把经济放在第一位，这是"三分政治，七分经济"，而政治也只是为了经济。

二、强调改善人民生活福利，强调社会主义国家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在物质生活水平上，进行"和平竞赛"。

三、强调利用物质刺激，即利用工资 等级、奖金制等，来刺激劳动人民和知识分子的生产积极性。

四、强调价值规律及其他经济规律的作用，强调一切生产计划都应服从于经济规律，而不是使经济规律服从于生产计划；强调用经济方法去领导经济；以及强调经济核算、利润指标等等。

五、在生产管理上，强调厂长、工程师、专家等的集中管理，反对在生产中大搞群众运动；反对不断破坏"旧制度、旧规章"；

从此也强调了要向资产阶级管理生产的经验学习，向资产阶级专家学习。

六、主张“平衡论”、“按比例论”，“生产渐进论”，反对“冒进”，反对大跃进。

总结以上所说，闻天同志“检讨”说：“这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是同党的总路线针锋相对的路线，其目的是要反对和修改总路线，是要把高速度、大跃进的总路线改为引导到稳步可靠的路线上来。结果是不要搞群众运动，取消大跃进。”

当年张闻天写这些“检讨”时，相信他心中是坦然的，当然也是痛苦的，因为硬要在纸上把自信是正确的东西写成是错误的东西。历史是无情的，也是公正的，谬误终归谬误，真理终归真理。不是吗，我们的国家现在不是远比闻天同志二十六年前的设想更健康地在生活和发展吗！

从上面详细介绍的张闻天的《发言》和“检讨”来看，当然《七发》等是无的放矢，恰恰相反，楚太子早已“霍然病已”。闻天同志如不是早在遵义会议开始，特别是延安整风期间就将“旧病”治愈，他怎么可能在庐山作这样一篇精辟的切中时弊的发言呢。我听见杨尚昆谈过，在江西的后期，张闻天同博古、李德就有争论的，就已经将他挤到政府部门，离开了中央的核心。现在从公布的文献上已得到证实。这也说明，他在遵义会议上的转变，不单是毛主席争取的结果，而是早有自己的觉悟做基础的。遵义会议之后，他对毛主席是信服的；在后来历次重大政治关节时，他同毛主席都是一致的。据说，曾因此遭受过讥讽。当时，张闻天还处在中央负总责的位置，他这样义正词严地回答：“真理在谁手上，就跟谁走。”据不少同志回忆，毛泽东当时曾对张闻天作过这样称誉的戏言：“你是一个开明之君。”但他决不是只求形式

地“紧跟”，更不是一味盲从的人。延安整风运动开始时，接受毛泽东的教导，他深感有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对中国社会作周密调查的必要，主动要求到基层去。1942 年 1 月，他率领调查团到陕北的神木、府谷、米脂、绥德和晋西北的兴县等地，对农村、城镇的生产和社会关系进行全面调查，长达四百零二天。他亲自主持调查会，长时间地访问农民、基层干部和各阶层人物；查阅、收集大量有关经济和社会的文字材料，家谱、碑记都不放过；亲自或指导其他同志共写出十九篇调查报告。这说明闻天同志一旦大彻大悟过来，何等诚恳地向群众学习，并且在以后的政治生活中一直坚持求真知的科学态度。后来他在延安主持编辑的《参考资料》，对国民党统治区和国际形势作具体分析，文章质量是很高的，许多论文是他亲自撰写的（至今我还保存着这些马兰草纸印刷的珍本）。东北地区土改运动中，同其他解放区一样，一度发生过“左”的偏向。1948 年 3 月，东北局为此召开过一个月的总结会议，自始至终我都参加了。张闻天主持的合江地区的土改，基本上没有受这股左倾思潮的影响；关于团结中农，区别地、富，正确对待知识分子等，他都为省委写了文件，作了一系列合乎实际的规定，防止了可能发生的偏向。所以，闻天同志在王明路线统治时期所犯过的“左”的错误，早以自己的言行证明彻底清除了。他不仅没有再“旧病复发”，而且在党犯新的左倾错误时，能够坚决顶住，明确地、全面地从实际到理论，指出这种错误，分析其原因，提出克服的办法。可是，历史多么不幸，这顶沉重的“旧病复发”的帽子，直到他去世之前，一直戴在头上。然而他并没有就此中断对真理的探索，在庐山蒙冤之后直到十年动乱期间，他还撰写了几十万字的笔记和文稿。从中可以看到，他不仅始终坚持真理，不畏横逆，挺身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

性，而且从理论上总结了“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经验，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上，有过许多真知灼见，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何其相似。这是多么难能可贵呵！这种精神，多么催人奋进，永放光辉。

戊戌政变的第二年，1899 年，被“放归”的黄遵宪，写过一首发感慨的诗：“滔滔海水日趋东，万法从新要大同。后二十年言定验，手书心史井函中。”表明了一代先驱的自信心。黄遵宪深信，他所赞同的那些维新变法的主张，虽然一时在高压之下受到了摧残，但是时间终究会证明它是正确的，二十年之后一定会证明它是正确的。黄遵宪的期望没有落空。二十年后是 1919 年，这一年发生了“五四”运动，提出民主和科学两个口号，已经大大超越了戊戌时代那些维新志士的要求了。

张闻天在庐山的《发言》，当时我是从心底里赞同的，觉得他比彭总的信讲得更清楚，而且作了理论的阐述。在当时的气氛下作这样一篇发言，不仅要有至大至刚的正气，而且要有理论上的自信。他当然是深信自己意见的正确性的。闻天同志在一生的最后时刻，以衰病之身，管制之严，仍奋笔痛斥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谬论，写出那些研究政治和经济，以及党内民主生活的战斗檄文，当然也必定是坚定的自信心驱使他写的。现在，历史的曲折终结了。闻天同志的这个《发言》和《选集》中其他文章特别是晚年所写文章的观点，已经被普遍接受了。这也是在时间过去了二十多年之后，才被承认其正确性的。现在，两个三中全会的文件比张闻天当年所想的更是大大前进了。我们的国家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正在经历第二次革命，正在欣欣向荣地向国家现代化的总目标胜利前进。闻天同志在天之灵当会感到欣

慰。在我们社会主义的中国，正确意见要过二十年才被接受的事，相信当不致再出现了吧。努力做到这一点，是我们后死者、后来人的崇高职责。

1985 年 6 月

实事求是，何惜乌纱

——怀念周小舟同志

小舟于1966年12月26日在广州含冤辞世，至今整整十五年了。

为查勘五强溪工程，1979年初秋到长沙，我去过小舟旧居。当时一阵莫名的寂寞之感袭来：蓉园已是花千树，不见周郎谈笑声。1949年南下湖南时，我与小舟在开封初会。大概由于是同乡，年岁、经历相差不远（他比我大五岁，“一二·九”以前入党），共同熟人不少，好尚又多相似，因而一见如故。湖南有句俗话：“长沙里手湘潭票。”“票”字含义不易说清，硬要翻译，假、大、空近似，即善耍嘴皮的漂浮人物。小舟是湘潭人，跟“票”恰相对立，是一个讲究实际的人。之后约一年半时间，正副职的工作关系，我们朝夕相处，意气相投，凡事直来直去，建立了友谊和某种交心关系。二十年后的寂寞之感，勾引起“大跃进”年代的往事：独自徘徊谁共语？到乡翻似烂柯人。“大跃进”尤其庐山会议这一段史实，最能说明小舟的为人。

1959年柘溪开工，5、6月间，我从四川、贵州、广西转到湖南。小舟约我到家中长谈。他正下乡一个月归来，丰富了第一手资料，在省委常委会上提出农民积极性、公社供给制、大队核算、公共食堂、粮食与钢铁指标以及劳动生产率等十多个问题。

关于“大跃进”一年来的看法，我们毫无忌讳，交换见闻，观点一致。虽是忧心忡忡，仍然谈笑风生。小舟是一个平易而谦虚的人，并不固执己见，尤不愿谈自己。从追悼会的悼文中，才知道1956年毛主席到湖南，见到大好形势，曾夸奖过他：“你已经不是‘小舟’了，你成了承载几千万人的大船了。”这夜的长谈，他却禁不住谈到他的“先见之明”。他说，湖南去年老挨批评，被插过白旗；可是结果插红旗的省粮食少些，插白旗的省多些。1958年11月郑州会议之后，对粮食估产，他跟左邻右舍有过争论：要么你是官僚主义，要么我是官僚主义。因为湖南估得低，邻省估得高。还有密植问题，有的省过密，湖南较稀。从农民的一句老实话，“作了一天活，身上没出汗”，提出农民积极性问题。他不赞成办常年食堂，办食堂浪费物力人力。说公社供给制，穷的时候不能搞，富的时候也不能搞。还谈到1958年韶山大吃偏饭，粮食也只增产百分之十四。他的总的看法是，人心思定，需要冷静下来，总结经验教训。

因此，7月初开始的庐山会议前期，我与小舟来往较多。毛主席在会前视察过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四省，对湖南的工作颇加称赞。小舟带上山的三句话：“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被接受为会议的方针。当时少奇同志也反复讲：成绩讲够，缺点讲透。到7月22日为止，会议还称为“神仙会”：交流情况，各抒己见。周总理三次找国务院各部开会，谈形势，算细帐，强调陈云同志的三个平衡。大家座谈之余，游山赋诗，心情愉快。毛主席的两首诗——《到韶山》、《登庐山》，正由小舟传播开来。这两首诗是主席写给小舟、乔木二人，附信征求意见的。小舟在抗战前后，当过主席的秘书，也爱好诗词（“小舟”之名，即由主席叫他“小周”而来）。我们同在中南组，开会后不几天，他就兴致

勃勃地将两首诗写在我的笔记本上，并将原信给我看。诗中词句，同后来发表的微有出入。《登庐山》还有小序："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九日登庐山，望鄱阳湖、扬子江。千峦竞秀，万壑争流，红日方升，成诗八句。"由此可见当时毛主席的松快心情。我的本子上还有董老亲笔写的一首七律，颈联为："盘桓最好寻花径，伫立俄延读御碑。"这都可说明会议前期大家的情绪。

按六个大区分的小组会，讨论主席提出的读书（读政治经济学）、形势、任务、体制、食堂 、学会过日子、综合平衡、产品质量等十九个问题。小组会上，可说议论纷纷，但一些比较尖锐的意见，如不赞成"以钢为纲"，公社化过早，等等，还不能完全畅所欲言。有不少同志护短，转不过弯，直至反对批评过分密植。小舟是率直而言的。我的笔记本上，记有他 7 月 4 日的发言：一千零七十万吨，不如八百万吨；公社一股风，越包越多；总产值至多每年增长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二十（按：其实这也很难做到）；基本建设搞得太多了，湖南省县以上一千个项目，只有三百个经过批准。他还谈到食堂反对派的六条意见：不利于节粮、养猪、造林、积肥，而且浪费劳力，吃得不愉快。会议原准备半个月左右结束，主席指定乔木、小舟、家英和我等七人起草一个《会议纪要》，论述形势、任务、综合平衡、经营管理、食堂等几个主要问题，总结 1958 年的经验，指出今后方向。

此时发生的影响当代历史的不幸，即小舟同彭德怀同志的往来以及导致彭总写那封信。1958 年 12 月武昌会议之后，彭总来到湖南，由小舟陪同三天，到过湘潭乌石（彭总家乡）、韶山和株洲。沿途看到为搞居民点，有的房子迁拆一空；有上千人挤在一丘二十亩的田里搞深翻；听县委书记汇报粮食的困难情况；还看了一些土高炉。后来彭总又去平江。小舟介绍，这是个"刮

共产风”较严重的地方，干部的强迫命令也厉害。他们之间谈得比较深。上山之后，小舟又找彭总谈过两次话。彭总表示，有些意见，希望同主席敞开谈谈，但由于自己个性，怕谈不好。小舟就根据眼前经验：“我们同主席谈话很随便呀。”怂恿彭总去谈。原来7月11日夜，主席找小舟、周惠和我去漫谈过一次(以后还谈过几次)，谈得很是融洽。主席认为1958年的问题主要出在综合平衡上，说他自己有时也胡思乱想，有些事不能全怪下面和各个部门。还风趣地说，否则，人们会象蒋干一样抱怨：曹营之事，难办得很。小舟乘机而言：高指标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这夜谈话情况，小舟给彭总讲了。彭总于是决定给主席写一封信，反映自己的主要看法。小舟还建议彭总根据在西北小组的几次发言，予以整理，系统写出，这就是后来批判彭总时，追究小舟为“宣传员”、“提供材料”和“当了参谋”的由来。

彭总的信是7月16日印发给大家的。小组会议从此起了一些变化，多围绕这封信和《会议纪要》继续讨论形势。有些对情况了解不深、不全，特别是护短的同志，不很赞成彭总的意见，且多从一些措词 上加以指责。康生和华东那个头头等人，更是兴风作浪。7月19日，小舟在小组会上完全同意彭总的信，认为总的精神是好的，至于某些提法、分寸、词句，可以斟酌。他特别谈到得失问题：从具体问题来讲，得多于失，得失相等，失多于得，都是有的，要加区别。比如湖南搞了五万个土炉，有两万个根本没有点过火；有些地方晚稻并秧，大大减产，这就只有失而无所得。缺点少讲，或讲而不透，是难以正确总结经验教训的。正确地检查缺点，不仅不会泄劲，反而能够更鼓舞正确的干劲。他以为各人由于工作方面不同，接触事物不同，因而看法不同。大家一起讨论，从各方面把问题提出来，经过分析，就可以达到

一致。

大家知道，7 月 23 日主席作了反“右”的讲话之后，会议急转直下。小舟是第四个受到千钧压力的人，他虽然不得不作些过头的戴帽检讨，但没有生造或夸张一星半点事实；相反，他还为彭总辩护。8 月 3 日小组发言中，小舟举出彭总跟他谈的两件事，以说明彭总自己承认“对主席的正确、伟大是逐步认识的”。一是井冈山会师，毛主席不准井冈山的人议论湘南失败，以利团结。彭总说，可见毛主席的伟大深远精神。二是抗战初期运动战与游击战之争，彭总说，很久以后才认识自己的错误和毛主席的正确。这就证明彭总从心底敬佩主席。

这个时刻，我与小舟还碰过面，他非常感慨，说准备撤职，摘下乌纱帽，但希望有机会去办好一个农场。小舟是一个对革命对自己极端负责的人，也是一个重感情的人。由于主客观之势太不相容，许多事他想不通，非常伤心，非常痛苦。8 月 13 日写给主席的信中有这样的话：“解剖我们自己，披肝沥胆，又感觉与实际情况确有出入。我想假若戴上(右倾机会主义)这样一顶帽子，我对主席、中央、全党、湖南党员和人民，甚至对自己的老婆和孩子，都必须说我犯了反党、反中央、反主席……的错误，然而再说下去，势必泪潸潸下，不尽欲言。”

去年到广州，见到小舟的夫人王宁同志，探问小舟辞世前的情况。我们党几十年历次政治运动，大风大浪之中，有许多同志能够立如砥柱，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尊重客观事实。小舟正是这样坚持并以身殉的人。也许他一时有绝望之感，人谁不有一时的迷误呢？这只是说明他的极度认真，执着于自己的信念，而决不是脆弱。要知道，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实事求是。

党已给庐山会议作了正确的结论。与此有关的受过委屈还活着的同志，如今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努力工作，可是小舟（和彭总、洛甫同志等一样）却以五十四岁的盛年抱恨以终。小舟当年企盼的党的集体领导、高度民主生活，正在到来。每逢佳节倍思亲；欣逢盛世，怎能不加倍思念故人呢？神州遍地皆春色，只是词场少一人。小舟是爱旧诗词的。上庐山第四天，我的登含鄱口句："高处为云低处雾，笑谈不觉失群山。"颇为小舟称赏。故人谈笑仍如在，使我伤怀奏短歌。小舟同志，愿将下面这首七律遥祭你在天之灵：

周郎意气永兴叹，抛却潇湘第一官。
举世沉冤皆大白，当年遗愿可长安。
桃符旧岁翻新岁，流水前澜让后澜。
知己平生能得几？心香燃尽泪阑干。

1981年11月

总理在我心中

1979 年 1 月，回到离开了二十年的工作岗位。好些同志跟我谈到，1972 年 11 月间，葛洲坝工程发生问题时，总理为此召开了三天会，在会上讲了这样的话：李锐在哪里？他当年对三峡的意见是正确的，他就不赞成先在干流修坝，主张先开发支流。当总理听到有人说我还被关着时，就接着说：李锐还关着？可以给他做些事嘛，别白吃饭，提些意见，也是劳动嘛！这是 1972 年初冬。总理在国务院的会议上说了这样的话，我仍然只能继续被关在秦城狱中。有关我的这一段话，当时下面都听到了传达，使得关心我的人知道此人还活着。可是，北京反而听不到传达，无人过问此事。由此就不由得不想起 1944 年类似的事情，情况却完全两样。1943 年初，康生在延安大稿“抢救运动”，一大批新老干部被当作“特务”关押起来。我被关在保安处监狱。1944 年 6 月，重庆有一个中外记者团要到延安来访问，其中有一个国民党报纸的记者是我小学同班同学，我向党反映了这一情况。总理立即吩咐有关方面，将我提前释放（释放之后才做正式结论），以便那个记者到来时，我可以做点统战工作。同时对我当时生活上发生的一个不幸也作了照顾。后来总理在重庆，还对认识我的人谈起这件事。因为我是 1939 年底在重庆结婚后去

延安的，在重庆有许多熟人。多少人写文章，怀念总理对干部、对普通人的关心，我这也算一个例子。

“文化大革命”时，在漫长的单监生活中，为了不让自己的脑袋变成木头，精神有所寄托，我于是学做旧诗，其中有不少咏人物诗。怀念总理时，做了这样一首七律：

半多世纪活青史，万里征途挑担人。
十载来回之字路，五朝更迭老臣心。
内忧外患千重变，樽俎沙场百战身。
管乐武侯皆往矣，神州代代沐甘霖。

在狱中前五、六年只有一张报纸可看，每见到总理接见外宾时的照片，总是久久凝视。一方面感到宽慰：有他忍辱负重，维系国命；另一方面有种说不出的难过：何时才能再见到他呢！

我没有在总理直接领导下工作过。由于参加黄河和长江的规划，特别是 1958 年南宁会议到 1959 年庐山会议的一年半中，同总理接触才比较多了，有时还能跟他随便闲谈，有一次他还特别问到我的家庭情况。人们谈到总理日理万机，都有无论巨细，事必躬亲的印象。我也谈两件往事。

关于三峡的上马之风，大概是 1956 年刮起来的。总理受命管了这件大事。他找我个别谈过，听取我的意见，还要我把有关的材料、图纸给他看。1956 年或 1957 年，国务院一次议论三峡的会议上，众口一词认为应尽快动工。我提出了不同看法。总理严肃地看了我一眼，大声说道：有一个人说困难，这很好。毛主席多年来听了主管长江工作的同志的宣传，很赞成修建三峡这个工程(因此写了“高峡出平湖”的词句)。后来 1958 年 1 月

南宁会议上,听取了两方面意见之后,采纳了我的建议,否定了快修大三峡的方案。3 月间,由总理主持,国务院各有关部门、地方负责同志和中外专家,乘轮查勘过一次三峡。这时"大跃进"的高潮正在开始,于是三峡上马的呼声复起。我的狱中回忆水电八年的纪事长诗中,有八句写此情景:"当年大跃进潮头,诸公衮衮峡中游。美人沱觉花岗好,南津关为乳洞愁;评头品足观坝址,阔论高谈坐舸楼。话不投机惊满座,区区总算逆潮流。"七、八两句是说,在船上开会时,总理让我第一个发言,我仍然"舌战群儒",大唱反调。到了重庆,总理主持了这次查勘的汇报会。随后我跟总理到成都,参加中央的成都会议。这次会议为"大跃进"通过了许多决议,唯独有关三峡的决议,没有什么"大跃进"的味道。决议中说:"从国家长远的经济发展和技术条件两个方面考虑,三峡水利枢纽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但是最后下决心确定修建及何时修建,要待各个重要方面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之后,才能作出决定。估计三峡工程的整个勘测、设计和施工时间约需十五年到二十年。"决议还特别指出:"在防洪问题上,要防止等待三峡工程和有了三峡就万事大吉的思想。"并且正确规定了长江规划的基本原则:"需要正确解决以下七种关系:远景与近景,干流与支流,上中下游 ,大中小型,防洪、发电、灌溉与航远,水电与火电,发电与用电(最后两种关系是毛主席加的——作者)。这七种关系必须互相结合,根据实际情况,分别轻重缓急和先后次序,进行具体安排。三峡工程是长江规划的主体,但是要防止在规划中集中一点,不及其他,和以主体代替一切的思想。"回头来看,1958 年初正是吹响"大跃进"进军号角之时,能够产生这样一个切实的决议,二十多年之后依然可以作为长江规划的指导方针,这自然是由于总理亲自抓了这件

大事。

葛洲坝工程举世闻名，技术上有很大成功。但1970年是在没有作出初步设计的情况下，被逼迫仓促上马的。由于泥沙淤积、坝址地质、枢纽布置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没有查清落实，后来只好停工二年。在停工前的1971年11月8日、9日和21日，召集各有关部门的负责人，总理主持开了三天会，从规划方针、设计到施工，逐个问题进行讨论。在讨论过程中，他极其严厉地批评了急躁蛮干、不实事求是、不总结经验教训和不敢坚持真理的思想作风。他讲了很多语重心长的话，批评了海阔天空、好说大话、好"办大事"的人。他说，长江出了乱子，不是哪个人的事，是整个国家、整个党的问题。当问到丹江口工程为什么还没有总结经验时(丹江口因施工质量等问题，曾经停工两年整顿过)，总理说：要不断总结经验，我们不愿总结经验，吃亏很大。水利部门二十年不愿总结经验，是吃大亏的事，走了许多弯路。总理谈到，他二十年关心两件事：一个上天，一个水利。水利是关系人民生命的大事，"我虽是外行，也要抓。"他说，中国水利至少有三千年的经验，"这是科学的事。都江堰总算个科学，有水平，有创造嘛。两千年前有水平，两千年后我们应更高嘛。现在有这么多科学试验，还总是出乱子。长江总是顾此失彼，总是不完全。"总理确实抓了二十年水利。三门峡工程教训很深，其改建也是由总理主持定案的。对葛洲坝的上马，在会议上他作了自我批评，说热心家逼着上马时，"我当时没有顶住，被你们一哄，我就顶不住。每次都是这样。"会议上也反映了一些具体技术问题，对那些好似专家的说法，他都作了独立的判断，不为左右。如关于模型试验，对话是如此精辟：水利是同自然界打交道，与工业机械的模型试验不同，水的变化很大，模拟很复杂。各地水

文、气象等等条件不同，要多作模型试验、水工试验，也不能只在一个地方做。“水那么柔，但又那么猛，势不可挡，模型还不能全面反映。”他还说，“原则大方向对了，具体问题错了，也可能犯大错误。”当长办的负责人谈泥沙问题，“静水通航，动水拉沙”时，总理说，“我对这个问题保留意见”；当这个负责人主张先修三峡高坝时，总理说：“你对高坝说得那么容易，我对这个问题是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可不要太自信。”当谈到修建葛洲坝原先曾有过不同意见时（赞成先修三峡的人曾正确地反对过先修葛洲坝，认为颠倒了次序，建成以后对三峡施工不利；葛洲坝是三峡水电站下游便于航运水流稳定的反调节水库），总理说：不坚持真理行吗？自己如有经验，但不坚持真理，这是党性问题，比路线错误还严重。总理在提到我的时候，还这样说：“总得有对立面，没有对立面危险得很。要有对立面。”他说，一个共产党员要敢提意见，决不能放弃原则。原则问题，一点也不能含糊。要对人民负责。急躁情绪，二十年都在犯！屡犯屡改，屡改屡犯。同志们呵，这是我们的总理的遗言！

三峡，葛洲坝，这是大事。还记得这样一件小事。1956 年，西哈努克亲王来访，宾馆在东交民巷。那年电力部在北海公园内办了一个小型水力发电展览会，有新安江等许多颇为生动的模型。总理来看过，觉得很好，于是叫我选择几个模型，放到宾馆中，让客人看看。模型在宾馆安置好后，总理特地来仔细看了一遍。来时天色已经很晚，我有点抱怨，说等了好久。总理轻声地对我说：有时我还不是跟你一样，我的时间也并不能全由自己支配。尽管已经很晚了，总理还楼上、楼下，逐间房子查看有无什么不妥之处。

1959 年 4 月上海会议时，已开始讨论压缩 59 年钢铁的高

指标等问题。会前我曾给毛主席写过一封信，谈“大跃进”、高指标的问题，此信给计委负责同志抄寄了一份。毛主席在开会之初找我谈话时，批评我胆子小，不敢惹事生非，“怕鬼”。谈话后，我壮着胆子又写了一封信。这就是毛主席在会议结束时的长篇讲话中，有一个题目是“李锐怕鬼”的由来。总理知道我写了这样两封信，是非常高兴的，在工交系统的小会上特作表扬。这时，新安江水电站正在施工高潮，因为水泥供应不足，我曾带总工程师找过总理，得到解决。经不住我的极力动员，上海会议结束后，4 月 9 日，我陪总理到新安江参观了半天，爬上大坝察看了混凝土浇捣的情况。参观之后，他很满意，作了这个在中国水电建设上有历史意义的题词：“为我国第一座自己设计和自制设备的大型水力发电站的胜利建设而欢呼！”是的，新安江水电站的建成是值得欢呼的，这座在当年可算得世界上的大型水电站，其施工质量，造价少于预算，工期不到四年即发电，确实是值得欢呼的。

同总理最后接触的日子，是 1959 年庐山会议。这两个月的经历，记忆犹新；总理的音容风貌，历历在目。彭总的信印发出来之后，议论多集中于此。7 月 20 日左右的一个晚上，在那个小礼拜堂的舞会上，同总理坐在一起。我问他，对彭总的信，有什么看法。他说：那没有什么吧。意思即这是一种很正常的情况，因为每次中央会议总是要印发许多传阅文件的。从 7 月 12 日到 22 日，总理三次找国务院各部开会，谈形势，摆问题，算细帐。特别讲到陈云同志历来强调财政、物资、现金三个平衡，要略有节余。1958 年全冲乱了，综合平衡工作没有做好，单生铁即贴补了十五亿。认为继续跃进，过分紧张，不能这样过日子。当时总理日以继夜，集中精力调整当年计划，安排好基建摊子。

可是7月23日以后，会议的“反右倾”，批判彭总，总理也是缺乏精神准备的。会议后期，我也大挨批判之后，总理还找我谈过一次话(彭真和尚昆同志在座)，严肃而又亲切，鼓励我以后好好学习。

总理逝世时，我在安徽大别山中参加劳动，早晨突然听到哀乐，无限悲痛，无人可诉，暗自流泪。后来看到总理逝世纪录片，做了下面这首七律，以寄哀思：

世间多少悲酸事，未有伤心似此晨；
九万万人齐泪下，三千千界共旌升。
音容宛在春风暖，教诲犹蒙冬日亲。
望断灵车不复返，长号顿作巨雷奔。

1980年2月

活在人心便永生：悼念耀邦

1

1982 年后，由于工作关系，同耀邦同志接触渐多。他视我如平辈，使我毫无拘束，随便交谈，近年尤其如此。党内几十年，感到他是第二个可以交心的人(第一个是黄克诚)。我们之间，还有诗的交往。

1986 年出差山东，到过半岛的尖端成山头；相传秦皇、汉武两次来游，立有李斯碑、始皇庙。耀邦 1984 年到此，题词“心潮澎湃”、“天尽头”，刻有石碑，字亦豪放。这种诗人意气的感觉，曾同他谈过。1987 年岁首，我特送一本《谈艺录》与他，此书自可移精养性，并在扉页上题句：“是非公道在人心”(赠他小诗的末句)。同时并将我写的《论三峡工程》一书，请他一阅。

去年他曾将三首近作交我修正。一首是七律《再登泰山》；两首古风：《赠李锐》、《戏题李锐同志不赞成修三峡水库论著》。七律意境甚好，平仄小有毛病。我于旧诗也是冒充风雅，不过在秦城八年，自己琢磨过格律而已。三首诗勉力作了些修改。还给他时，顺便带了十来本旧诗和讲格律的书送他。他非常高兴，

后来告诉我，这些书都读了。

这里，将《戏题》录后，以说明耀邦的才华和他的谦虚精神。不少人知道，我是几十年一贯反对修三峡工程的；1979 年后，又曾几次上书中央。1985 年春我的《论三峡工程》出版后，将此书序言或另一篇小文，寄报纸发表，清样送到中央后，耀邦批示不同意发表，还对我讲了闲话（好像在书记处会议上也讲了）。着意做这首诗，他当然已了解这个工程的详情，也重视我的意见了。诗中借巫山神女之口，委婉道出莫立石壁的切切情意：

妾本禹王女，含怨侍楚王。
泪是巫山雨，愁比江水长。
愁应随波去，泪须飘远洋。
乞君莫作断流想，断流永使妾哀伤。

我作了点修改，增加了两句，以强化莫立石壁之意。全诗如下：

妾本巫山女，含怨侍楚王。
泪滴三春雨，愁染六月霜。
泪愁应随东逝水，乘风直下太平洋。
乞君莫作断流计，天地灵药八千方。
石壁立，平湖望，
流断永使妾哀伤！

巫山据传为天地放药之处，有灵药八斋（橱），亦称灵山。事见袁珂《中国古代神话与传说》。

就在 4 月 5 日，我到耀邦同志家，作自午到夜的长谈。他兴

致极高，谈到诗词格律时，说，几乎不想再作诗了。

昨天上午，接到新华社朋友电话，告知噩耗，如晴天霹雳。因为前两天还听说，他的病情已好转。哀痛无以自遣，只得做小诗。首先想起的是，我 1978 年 11 月从大别山中先到合肥医院治病，1979 年 1 月 6 日回到北京，彻底平反，恢复工作，都是耀邦亲自批准的。小诗四句：

天下奇冤一扫清，神州莫再有冤灵。
此情此景张家界，活在人心便永生。

人代大会期间，湖南、广西同志来我家时，都谈到耀邦在两省休息的情况。游张家界时，成千游人济济于道，争相握手，要求留影。5 日同我谈及此情时，他说：到南宁后，只好足不出户了。

今日下午，同秦川到耀邦家中灵堂行礼时，特将这首小诗交与长子德平。5 日长谈到晚上时，德平在座，他深深知道我的哀思。

1989 年 4 月 16 日夜

2

耀邦同志遽然辞世，举国震惊。我在 15 日上午电话中听到这一消息，犹如晴空霹雳，简直不敢相信。因为，就在他发病前三天——4 月 5 日，我还同他有过一次长谈，从下午两点半一直谈到晚上九点半。他谈锋很健，精力很旺，吃饭也很香，一点没有显出病象。他的记忆力奇好，这天谈到许多事情，有些细节旧事，

连日期都记得。临别时，我劝他少抽烟，多保重，他还点头答应。

耀邦是为人民立下了不朽功勋的，在国外也有很大影响，属于历史上革故鼎新的风云人物。拨乱反正伊始，平反冤假错案，今天看来，似乎不应该有多少困难的事，在那时却难而又难。他勇挑重担，排除种种阻力，大刀阔斧，披荆斩棘，如山冤案，一切疑难，都迎刃而解。1979 年底，我写了一篇怀念田家英的文章，征求有关同志的意见，劝我不要发表。有的年轻人甚至说："你还挨整得不够吗？"不得已，我把文章寄给耀邦。他立即批示，同意发表。此时，家英的追悼会还没有召开。《彭德怀自述》也是因他的支持，才得以出版。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也同样如此，这必须冲破教条，冲破罗网，具有大无畏的理论勇气，才能办到。耀邦那时先后在中央党校、中纪委、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主持思想、人事工作。没有他的开明与坚定，没有他的胆识与魄力，没有他的理论思维，要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办好这两件拨乱反正首当其冲的大事，是不可想象的。这两大功勋，人所共知。如果没有思想解放与冤案平反的开道，十年改革也是根本谈不上的。因为没有一个民族能够带着枷锁阔步前进，也没有一个民族能够满腔疑怨走上新路。

人们正是从这两件大事，首先认识了耀邦，认识了他的胆略和能力，也认识到他的创新精神和高尚品格。所以尽管他离开总书记的岗位已经两年多，不论老干部新干部，工农商学兵，尤其青年和知识分子，还是一直惦念着他。人代会期间，湖南和广西的同志告诉我，去冬今春，耀邦游张家界时，有上千游人济济于道，向他问好，争相握手。到南宁后，他就再也足不出户了。5 日同我谈话时，他说，张家界这种情景，他不愿再在别的地方出现。耀邦是活在人们心里的。15 日夜，为排遣悲思，我吟了一

首小诗，最后一句为：活在人心便永生”。

耀邦不是完人。他也难免有失误、失言之处。但从改革、开放的国策而言，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路线而言，他是一以贯之、竭诚推行的，而且总是给人以生龙活虎、热情洋溢的印象。近日电视重播的他在青藏高原、长征路上的仆仆风尘，真是催人泪下——他也七十高龄了！为尽快实现四个现代化，他倾注了全部心血。他总是号召在新时期要解决新问题；他不遗余力地推行干部四化的方针；他较早地提出全面改革，经济改革的同时要进行政治改革。他在担任总书记职务时，跑了那么多县、乡，大多是贫困地区(听说他曾立志要跑遍全国所有的县，已到过一千几百个)。他生活朴素，自奉甚俭，对子女要求尤严，心心系念的是人民的安居乐业，尽快地日子过得好一些。

我同耀邦接触中感受最深的有三点：一是他的民主作风；二是他对青年的爱护与关心；三是他的学习精神。

耀邦并非不坚持己见，但他平易近人，从善如流。1982 年十二大之前，关于一位同志的安排，我们曾争论过三次，在充分了解情况之后，他放弃了自己的意见。一个领导人，尤其是身居总书记这样的高位，能让人在他面前毫无拘束，敞开心扉，这恐怕是最难能的一种品质。回顾历史，令人感慨无穷。

耀邦长期从事青年工作，善于同年轻人交朋友。他同年轻人在一起时，把自己当作一个普通人，没有一点架子，从生活琐事到国家大事，都能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我认识一两个同他关系密切的做普通工作的年轻人，有时在他那里，碰巧他在批阅群众来信，就把批语念给他们听，如指出什么不当，他就立即改正。

耀邦家庭贫苦，父亲是挑脚的，十四岁参加革命，只读过初中，是老红军中最年幼的一代。他自学成才，极爱读书，可说博

览群书。他同我谈过纪念毛主席九十诞辰那篇不长的文章，他花了七八天功夫才最后定稿。他访问西欧几国的讲话，外交部有代拟稿，他也是改了又改，最后同原件已面目全非。离开总书记岗位后，他先将自己十年文章、讲话、批件等等，统统细阅一过，认真反思。然后就通读《马恩全集》。他说，过去没有这样的机会。耀邦确实是毕生忠于马克思主义。最后年月，为移情养性，他还学做旧诗词，意境语言，都有自己的个性和风格，古风尤琅琅上口，情思真切，直抒胸襟。这方面也表现出他的才华。不喜欢读书的人是不会重视知识和知识分子的；自己不读书，也不会懂得读书的难处。

今年一、二月间，我曾应哈佛费正清中心的邀请，在美国几个著名学府呆了一个半月。5日畅谈时，美国之行是我谈的主题，我曾谈到留学生的情况，他很关心。他认为我们党所领导的中国改革大业，如何建设合乎国情的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就像一篇大文章，现在刚刚破题。为了做好这篇文章，必须吸收一切先进的、有用的东西，不分国界、制度，引进来予以消化。在国外留学的青年，应当成为改革大业的骨干。他相信留学生中的大多数是愿意也一定会为祖国的昌盛、社会的进步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的。

那天的长谈，还在眼前。他谈的比我还多。真没料到这样一个热情如火的人，就这样匆匆地、匆匆地去了。耀邦是一个真正的人，一个既伟大又平凡的人。他的去世是当代中国很大的不幸，也是一切以他为师、为友、为长者、为楷模的人的很大的不幸。

耀邦同志，愿英灵安息。

1989年4月19日

千万不要忘记陆兰秀

——为陆兰秀传记作的序言

粉碎“四人帮”后，人们传诵着张志新的感人事迹。但是在张志新之前六年的 1970 年，同样因坚持真理、反对“文化大革命”，而倒在血泊中的另一位当代女杰，在全国却很少人知道。她比张志新年长得多，是抗战时期的地下党员，因此战斗经历和思想境界更为感人。现在她的传记终于要出版了，她的英勇事迹和伟大精神终于能从苏州这个地方向全国传播了。

我们的传记主人陆兰秀，出身于名门富家，原是苏州图书馆的副馆长。她 1942 年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乐山武汉大学入党，曾三次被特务追捕而不屈；1946 年在南京下关惨案中被毒打，牙齿被打掉；衣服被撕光；解放前夕为二野做情报工作；因种种阻力，党籍却长期未能恢复。传记的上册介绍她的平凡又不平凡的生平。她在杭州高中和武汉大学时，就是全校的高材生，在大学先读化学后转学经济，因此具有丰富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并掌握英法德俄四门外语。她好读书而不死读书，认真通读过《马恩全集》和《二十四史》，遇事有自己的独立见解。下册写她在“文革”中的遭遇，不论精神和身体受到怎样的折磨和摧残，始终坚持真理，宁死不屈。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陆兰秀很不赞成“造反有理”的口号

和“打倒一切”的做法，认为这些都是违反国情也违反马克思主义的；她认为不能用夺取政权的革命暴力手段，来处理革命胜利后建设时期的新问题，这是截然不同的两个历史阶段。她经过苦思冥想后，自认为找到了一个对此种反常现象的解释：这是毛主席有意颠倒是非，用以考验干部，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能力的“反面教育”。及至刘少奇被打成“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和“叛徒、内奸、工贼”之后，她仍认为这不可能，这不是事实，她从不跟着喊“打倒刘少奇”和打倒其他老革命家的口号。她并非没有矛盾，一方面想力挽狂澜，扭转“文革”造成的混乱；另一方面，又不屑于同没有理性的造反派周旋，觉得不如退出过清静日子。但急流怎容勇退，她只能孤身迎战；造反派对她施加压力愈大，愈增强她斗争的决心，头脑中生产出来的精神炮弹也就越多。进入“斗批改”以后，她被关进了牛棚，备受种种凌辱。她对“以阶级斗争为纲”和“反修防修”等口号，越来越产生了怀疑。不论造反派怎样强制逼迫她承认刘少奇有罪，她决不承认，决不屈服，反而针锋相对地宣布：“我就是要为刘少奇翻案！”党的“九大”召开了，“文化大革命”被说成“成绩最大最大”，林彪被作为接班人写进了党章。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她完全放弃了原来的“反面教育”那种解释，让女儿利用探监的机会，将《马恩全集》带进囚室。经过一个多月的苦读苦思，从理论上进一步加深了关于革命同经济关系的马克思主义认识，以及对庐山会议以来一系列政治事件的正确分析，从而作出这样两个论断：这场“文化大革命”同马克思主义毫不相干，而是相对于右的修正主义的“左”的修正主义；这场“革命”之所以发生，是由于功高盖世的革命领袖毛主席骄傲起来了，已在很多方面既脱离了马克思主义轨道，也违反了他自己实事求是的原则，而犯了严重的错误。于是，她更认真

地研究马克思有关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对当前各个方面所发生的奇谈怪事，一一进行梳理剖析，最后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文化大革命使历史大幅度地开倒车，倒开到解放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状态。""人们如果不觉悟，不抵制，不采取积极行动，这种历史倒退，还将持续不断地倒退下去，象整个国家遭到了不可抗拒的毁灭性的灾难一样。"1969 年 11 月 14 日，她在囚室开始第一次绝食时，交出了包括上述内容的九篇文章，题为《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关于什么是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以及关于干部，关于消灭旧国家机器建立新国家机器，关于消灭工农差别，关于对外政策、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等方面的文章，义正辞严地从理论到实际，系统地批判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11 月 20 日，她被关进以施用酷刑著称的苏州市"工纠总部"，受到进一步迫害。她于是采取"死谏"的办法，直接上书毛主席：为了世界革命人民不致迷失航向，为了马克思主义的事业不致中断，"请即结束文化大革命，解放全国人民，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随 后，她又在造反派反复的折磨中，忍着伤痛，强撑着绝食十多天极为虚弱的身体，又写下十多篇文章，其中还有泼辣的杂文，以正本清源，破除林彪一伙制造的现代迷信。她直指林彪所鼓吹的"毛主席的指示句句是真理"，应该"句句照办"，而批判这种现代迷信："毛主席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政策，对同一问题在不同阶段所说的也不同。那么，到底听毛主席的哪一句好呢？"她针对"文革"读语录的情况，尖锐地指出这种做法的错误和严重后果："无论开会或发表意见，或写文章，都要先读几段毛主席语录，叫做最高指示，然后才在所引用的语录范围内发表一点个人看法，把人们的思想局限在毛主席已讲过的词句的范围内。人们把这种现象叫做政治

挂帅，或毛泽东思想挂帅。实际上，毛主席所讲的话，都是过去经验总结，而人们每天所接触的，都是不同于过去任何时期任何一天的新问题。如果把毛主席的话，变成束缚人们思想的绳索，把人们的头脑一道一道地捆绑起来，就会使人们变得寸步难行。这种学习方法，其结果必然成为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词句，掩盖资产阶级、封建阶级思想的实质，贻害无穷。”“在强大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的压力下，缺乏民主生活，只敢说毛主席已经说过的话，相对于苏联的右的修正主义，在地球上再出现一种‘左’的修正主义，也不是不可能的。”于是，她从理论的高度，谈到“文化大革命”的封建专制主义的实质：“马克思主义不是天生神圣的东西，而是马克思经过科学分析总结出来的一种科学理论。这种理论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越益补充、完善的。所以对某些理论和政策，包括马恩列斯和毛主席的某些理论和政策，提出不同看法，只要是科学的探讨，称不上叛逆、反革命之类。叛逆者，是古代帝王自以为神圣，对于自己的臣民所办的罪名。在科学探讨上，从来没有什么叫叛逆的。”冷静的理性使得她无所畏惧，心所谓危，不敢不言：“从这里可以联系到当前的文化大革命，说全国人民都应对毛主席无限忠诚，并把毛主席的语录叫做最高指示，说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这是把毛主席说成古代封建帝王了。马克思说，把禁欲主义涂上一层共产主义色彩是最容易不过的事；同样的，把封建时代的忠孝节义涂上一层社会主义色彩，也是最容易不过的事。”她这样言简意赅地说到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的要害：“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只搞斗争，不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不去研究如何从根本上铲除旧的思想意识的根源，是舍本逐末的做法。”“文化大革命又使这些非法现象披上了合法的外衣，

使解放以来从理论上已颠倒过来的历史，重新又颠倒过去。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陆兰秀自知这样批评毛主席的错误会带来什么后果。1969年11月7日，她在狱中给丈夫写了诀别信。信中如此冷静而自豪地说：“能够为人民的利益贡献自己的生命，是人生最大的光荣。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我也不可能得这样的条件，用自己的生命，换取一些老大难矛盾的最后解决。这应该是我们一家的光荣。所以你不要难过。人的一生，生离死别总要经历一次的，或迟或早而已。……我是感到很幸福的。所以你也完全不必悲伤。两个孩子，把我的信给他们看看就行了。”当年下关惨案之后，周恩来、邓颖超出钱给她装的假牙和买的一块手表，她也托人送回家中。

1970年3月5日，陆兰秀开始第二次绝食。此前两天，他写了一份给毛主席和党中央的电报稿，激愤地指出，“文化大革命陷全国人民于水深火热的无比苦难中”。再次批评毛主席：“对社会主义社会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内容理解有错误，没有完全摆脱旧统治阶级思想的影响；以至长期以来，排斥不同意见，坚持似是而非的修正主义理论。再不悬崖勒马，后果的严重性，毛主席本人的心里是明白的。”她认为，“只有坚决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才能继续保持毛主席的国际地位和威信。”第二次绝食后被正式逮捕的前十天，陆兰秀带着满口腥血，为自己写下《遗书》和《致毛主席的忠告信》。要求凡我中华儿女子孙，都应该牢记“文化大革命”这场大动乱的教训。她相信“这一代人不替我平反，下一代人看了我的材料，一定会替我平反的。”

1970年3月25日，陆兰秀被正式逮捕。在几次审讯中，由于她决不低头认罪，且侃侃辩驳，受到毒打和多种酷刑。5月20

日，苏州市公检法军管会报告上说："陆犯归案提审3次，每次都与审讯员针锋相对，拒绝在审讯笔录上签字。"6月20日，她对同监的人说："毛主席应向全国人民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他七十七岁了，总有一天要见马克思的，留下这些事怎么办？毛主席如果真听我的话，那就真是万寿无疆。我个人枪毙了也没有什么。"

6月30日，在最后一次审讯中，她表示自己能为真理献身，"死而无怨，人总有一死"。7月4日，苏州市召开四万人公审大会，将她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临刑前还游街示众。为防止她在大会上和游街时有所反抗，竟端下她的下颌骨，使她无以出声。据当时刑场《笔录》记载："陆在宣判时态度恶劣，拒不低头，反革命气焰嚣张。游行时两眼瞪起，表示其反革命气焰。"

陆兰秀被枪毙于苏州南郊的横山山麓。

苏州自古乃人文之乡，气节之地。春秋时，伍子胥因忠谏吴王被处死，临刑前怒目而视："抉吾眼悬东门之上"，以观夫差下场。明朝时，苏州人民奋起反抗魏忠贤阉党，遭到镇压，颜佩韦等五人挺身保护民众，史书临刑前"意气昂扬"，"大呼奸党之名而詈之，颜色不少变"。五人合葬于虎丘山。如今临近虎丘又增添一帼国英雄墓地。

陆兰秀的冤案，曾于1978年第一次昭雪，但当时还存在"两个凡是"的干扰，不能彻底平反。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当时任苏州市委秘书长，也就是烈士传记的作者丁群同志，为此案的彻底平反尽了最大努力。他调阅了陆兰秀全部七大卷档案，包括作为罪证的共十四万字的二十多篇文章。这些审问时的现场记录，尤其是这些笔锋犀利、感情充沛、立论确切的战斗檄文，使丁群大为感动，他认为决不能使烈士的英勇事迹和珍贵思想受到

埋没。为了用全面确凿的事实，纠正还存在的一些偏见，他花了一年时间，编写出一份三万七千字的《陆兰秀被害前后大事记》，经苏州市委讨论后，上报江苏省委。终于在 1982 年 4 月，省市委相继下达正式文件，彻底为陆兰秀平反昭雪，并恢复了她的党籍，追认为革命烈士，在苏州市烈士陵园为之建衣冠冢，设陈列柜。想必是烈士的英魂总萦绕于脑际，似时刻在叮嘱后人“不要忘记历史”，丁群无法平静，于是决心写出陆兰秀的生平传记。他前前后后十多年，主要利用业余时间，走遍烈士足迹所到之处，访遍烈士的亲属友好，核对了所有重要事实哪怕是一些细节，数易其稿，一直到今年 4 月，才最后为传记定稿。

这本传记应当传之天下，传之后世。十年浩劫中，头脑清醒或逐渐清醒的人是很多的，敢于负隅顽抗、斗争到底的人也是不少的，尤其到了后期出现了一批张志新式的人物。但是，能象陆兰秀这样，一开始就敢于站在这场动乱的对立面，以极端冷静的理智和绝对大无畏的精神，以历史代言人的负责态度，如此从实际到理论，层层剖析，深入堂奥，对领导这场“大革命”的统帅，掏抒胸臆，直陈利害，指出其根本错误，天下能有几人？从这个意义上，应当说，陆兰秀是我们民族的脊梁，是我们党的骄傲；她的威武不屈的浩然正气，她的实事求是的理性精神，正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可贵品质。

陆兰秀生前自信的平反愿望，已经实现了。我们党是实事求是的，不仅“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开国以来的冤假错案，也都一一平反了。《历史决议》已经为“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出了总结。烈士所直指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决议》作如此界定：“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

灾难的内乱。”烈士指出的封建专制主义遗害问题,《决议》这样写道:“中国是一个封建历史很长的国家,我们党对封建主义特别是对封建土地制度和豪绅恶霸进行了最坚决最彻底的斗争,在反封建斗争中养成了优良的民主传统;但是长期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仍然不是很容易肃清的。种种历史原因又使我们没有能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虽然制定了法律,却没有应有的权威。这就提供一种条件,使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 长起来,也就使党和国家难于防止‘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发展。”直到现在,封建主义仍是我们身上的一个沉重包袱。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同资本主义相衔接的,必须以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及其文化基础为前提的;而我们的社会主义则是同封建主义的经济文化相衔接的,对于这个先天的弱点我们长期认识不够,这是我们过去几十年犯“左”的错误的一个客观原因。不彻底清除封建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我们仍是不能轻装前进的。

马克思曾经痛斥:“专制制度的唯一原则就是轻视人类,使人不成其为人。”陆兰秀只是希望自己能象一个正常的人一样,堂堂正正地活着;她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还在大声疾呼:“当务之急,是召开人民代表大会,结束文化大革命,解放全国人民,提出新宪法草案,开始新的历史篇章。”民生与法制是一个现代国家的根本标志。新中国成立后,作为执政党,我们长期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于是,冤假错案,曾经出现过三次高峰:第一次是五十年代初期,“土改”、“镇反”、“三反”、“五反”等社会改革运动中大小偏差造成的;当时尚无宪法、亦无刑法,沿用过去群众运动和肃反锄奸的办法,错误难免,情有可原。第二次是反右派运动和

接着而来的反右倾运动，不仅五六十万知识分子和三百几十万干部遭到错误处理，并且严厉批判了“司法独立”的所谓资产阶级观点，从而干脆取消了法制局和司法部。第三次就是“文化大革命”，彻底砸烂公检法，取消一切法律，“群众专政”，刑讯逼供，“无法无天”，冤假错案遍于神州，社会主义国家竟一时成了封建专制国家。“专制国家是无所谓法律的”（孟德斯鸠语）。拨乱反正，“开始新的历史篇章”，自应包括解决民主与法制这个根本问题。改革开放与民主法制是同根相连、互相依靠与并行发展的，谁也离不开谁。由于种种历史原因，要使我们的国家真正成为社会主义的高度民主和严格法治的国家，仍然任重而道远，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总之，这个问题不解决，历史的阴影就仍然会跟随着我们。

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结束已经十六年了。对于共和国，没有比这更粗暴的践踏；作为执政党，没有比这更惨痛的教训。党和国家已经对此作出了总结，我们已经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在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国策下，比较顺当地前进了十来年。恩格斯说得好：“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没有走到崩溃边缘的十年浩劫，也就不可能换来今天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又还是恩格斯说得好：“陈旧的东西总是企图在新生的形式中得到恢复和巩固”。十年改革开放的大潮，似乎将过去的惨痛痕迹都冲刷了；现在三十岁以下的青年，对于十年动乱又何其陌生。回顾这十年来前进的道路，也并不是没有坎坷和曲折；如果不是感觉到问题的严重，邓小平也不会年初作南巡讲话。因此，我们前进时决不要忘记历史，尤其是刚刚过去记忆犹新的历史。人们呵，要百倍提高警惕，切切记住邓小平的话“主要是防止‘左’的问题”。“有右的东

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是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1987 年他就说过：“几十年‘左’的思想纠正过来不容易，我们主要是反‘左’，‘左’已经成了一种习惯势力。现在中国反对改革的人不多，但在制定和实行具体政策的时候，总容易出现有一点留恋过去的情况，习惯的东西就起作用，就冒出来了。”这种“左”的习惯势力至今还是我们改革开放事业的最大障碍，它们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一有机会，就要借尸还魂，兴风作浪的。不是有“理论家”近年还经常在报刊上、讲坛上(包括中央报刊)散布这样一些“左”的论点吗：在改革开放中一定要问姓社姓资；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新的剥削阶级正在形成；实用主义能为和平演变打开缺口；当前我国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比任何时期都要鲜明、激烈、尖锐；我们现在有双重任务——阶级斗争和全面建设，等等，等等。这些“理论家”只差没有公开叫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只差没有挑明“文化大革命还是必要的”。以史为鉴，这是中国几千年来的古训，我们千万不能让历史重演，千万不要忘记陆兰秀的大无畏的理性精神。陆兰秀牺牲 22 年了，我们应当让烈士在天之灵能得到永恒的安宁。

由于我同陆兰秀是武汉大学的先后同学，承蒙作者的信任，要我为烈士的传记作序。我还没有读到烈士的全部遗文，我只是怀着无限敬仰的心情，为传记主人略作简介之外，还情不自禁写了上面这样一些感想。我觉得不写这些话，无以对死者，也无以对生者。

1992 年 7 月 16 日

于北京医院

怀念田家英

跟家英是在延安时就认识的。延安当年是一个“莫道都穿粗布服，称呼同志一家人”的地方；人们相互间很容易熟识，没有什么戒备（整风审干填“小广播”表，那是后来的事情）。1941 年后，我在《解放日报》工作，他在中央政治研究室，有文章寄来，必经我手，于是也就成了“文字之交”。延安的生活，值得人们回忆的事情是很多的。如“粗布服”这个题目，就很值得写一篇文章。那时每年只发一套单衣，衬衣裤是不发的。夏天人们都爱下河洗衣、洗澡或找水深之处游泳。有一次，家英在河里洗澡，碰见一群女同志来洗衣，他在水中起不来了，因为他只有一条裤衩，刚洗过晒在河滩上。

文字之交后来一直保持着。解放初期在湖南工作时，我写过一篇《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湖南的革命与反革命》，家英在《长江日报》上见到，压缩了工人运动等部分，改名《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湖南农民运动》，推荐给《学习》发表了。原来我还以为是《学习》哪一位编辑多事。1952 年调北京后，我转到工业系统工作。第一次见面时，我把过去搜集到的一大批有关近代、现代史的书籍，全部送给他了；表示从此“洗手”，同文字生涯告别。可是仍然留下一个“麻烦”：离开湖南前夕，我匆匆写了

本书,《中国青年》要连载。于是将这个"麻烦"交给了家英,由他全权处理,他的工作岗位也便于处理此事。1956 年此书出版时,对他删改的一些部分,我有不同意见,又恢复了原状,但他并不坚持己见。

由于"隔行隔山",同在北京,却不易见面。大概是 1955 年或 1956 年,有一天晚饭后,我们同另外一位共同熟识的朋友碰到一起了,天南海北,古今上下,乱扯了一阵;意犹未尽,肚子又有一点饿,于是一同到西四牌楼的宵夜摊,吃小菜,喝老酒。家英是四川人,龙门阵摆到深夜两点。七十年代初,在京郊那个所谓隔离审查的地方,有一天忽然想起这件事,感慨系之,哼了四句:

咫尺天涯见面难,只缘都在作京官。
百年不遇龙门阵,西四牌楼宵夜摊。

几天之后,犹感伤不已,估计总有一天会再经过西四牌楼的,于是又哼了一首:

何处再寻宵夜摊?四牌楼下景非前。
曾经有句怜遥梦,相对无人哭逝川。

由于一种千载难逢的偶然机会,从 1958 年 1 月开始,直到 1959 年 9 月,我们得以时常在工作也是开会时见面了。大家知道,这个期间是当代中国发生第一个大折腾的年代。我们比一般同志更直接生活在历史的漩涡之中。作为个人来说,我大呛了几口水,被淹得半死不活。家英还好,得以幸免。这个期间的

交往，就不限于摆摆龙门阵，或者跑跑琉璃厂了；而是经常议论时政，忧心国事，臧否人物，乃至推敲文件了。这是真正的交心，当然也是危险的交心。前些日子，去看家英夫人董边同志，才知道，我们当年交心的内容，有许多家英并没有跟自己的妻子说过。我在工业部门，他则常下农村。在了解情况方面，我们正好互相补充，使头脑比较冷静，有共同语言，能够不留情面地针砭时弊。我们都经过延安的整风学习，有作调查研究的习惯（在延安时都写过这方面的文章），不喜欢说也讨厌听那些空话、大话，很看不惯某些吹牛逢迎的人。我们年纪轻些，在某些人眼中，也许属于“嘴上没毛”之类，但我们保有“赤子之心”。

家英从小失去父母，在哥哥姐姐家中长大，当过中药铺的小学徒，这使他熟悉民间疾苦。他在抗战前，接受成都地下党同志的引导，积极参加救亡活动。1937 年到延安。1947 年他参加过晋绥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深知农村情况。解放后，他住在中南海，很看不起周围那些追名逐利之徒。他早就厌恶江青的一些行为（当然，那时议论的还多属于生活方面）。据董边同志告诉我，他同陈伯达作过长期斗争，针锋相对，寸步不让；因此，陈对他恨之入骨。我们当年臧否人物，就包括此人。他告诉过我：这位“陈夫子”制了一颗“闲章”，曰“野鹤闲云”，特别喜爱，以此自诩。其实，这正从反面露出此人当年的极大牢骚：无权无势。此人在中南海的房子住得很不错了，但还想方设法翻修，中央办公厅的负责同志硬不买账，于是怀恨在心。家英最看不起的是，此人经常向他打听“主席最近又读了什么书？”“注意什么问题？”之类。这种察颜观色、探听气候以“投其所好”的作风，我们非常反感，也觉得是一种危险之事。果然，1958 年 11 月的郑州会议，这位“经济学家”赶时髦，抢浪头，发表不要商品生产、取消货

币的谬论，遭到毛主席严厉的批评指责。摔了这个筋斗，陈伯达痛苦之至，我们毫不同情。

1959年4月上海会议之前，家英在四川农村蹲点，是穿着“便服”赶到上海的，几乎引起进出住处的不便。那次会议，东道主极尽招待之能事。此时此地，他向我描述了在农村挨饿的情景，以及基层干部如实反映的浮夸。那时他领导的一个工作组正在四川有名的全国劳模罗世发的家乡作调查，罗世发谈了他如何被逼讲假话、虚报产量的情况。6月底，庐山会议之前，许多严重的“左”的错误，如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特别是共产风，已经发现，在逐步纠正之中。开会前夕，毛主席提出十九个要讨论的问题，准备纠“左”。会议的初期，是“神仙会”，毛主席找我们少数几个人谈了三次，谈得很融洽，有时满堂欢笑。家英将工作组写的有关罗世发的材料交了上去。我们尽自己所知，作了汇报，也提出了一些建议，比如最重要的一条是：应当让陈云同志重新主管财经工作。

在延安时，我们是革命的晚辈，通过整风学习，更加认识到毛主席的伟大，深刻理解没有毛泽东思想就不可能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我们对毛主席的敬仰、尊重，自信不比许多老同志差。《毛泽东选集》四卷中所反映的毛泽东思想形成的过程，我们也不比陈伯达之流了解得差。尤其家英是《毛泽东选集》四卷九百八十七条注释的主编，更是如此。由于各自有机会接触过主席的一些手迹，以及早年不为人所知的史事，或者直接多年在身边工作，我们对主席的不同凡响、棋高一着，比一般同志可能感触更深一些。可是，我们也确实没有将主席当作一尊神，而是把他看作一个人。因而对主席的某些缺点和作法，私下常有些议论。如在“大跃进”时我们就谈过，主席对经济工作不

熟悉，缺乏这方面必须具备的知识，在经济理论方面尤其没有钻研过，因此，处理有关经济的问题，就远不如处理军事、政治问题那样得心应手。家英当时有一个集中的想法，即主席应当摆 脱日常事务，总结一些重大经验，专心于理论的著作，这样，对后代更有意义。在庐山时，他跟我谈过一副对联："隐身免留千载笑，成书还待十年闲。"即指这个意思。他很惋惜主席志不在此。他早就同我谈过，编《毛泽东选 集》时，主席常有厌于回顾旧作的情绪，而兴趣全在新的事物。

1959 年庐山的大风波，原因很复杂，这同当时有兴风作浪、唯恐天下不乱之人，也有关系。7 月 23 日，正式宣布批判彭德怀同志之后，我和家英等四个人，沿山漫步，半天也没有一个人讲一句话。走到半山腰的一个石亭中，远望长江天际流去，近听山中松涛阵阵，大家仍无言相对。亭中有一块大石，上刻王阳明一首七绝，亭柱却无联刻。有人提议：写一首对联吧。我拣起地下烧焦的松枝，欲书未能时，家英抢着写了这一首名联：

四面江山来眼底
万家忧乐到心头

写完了，四个人依旧默默无声，沿着来时的道路，各自归去。

家英当年跟我谈过，如果允许他离开中南海时，想提三条意见，最后一条是：不要百年之后，有人议论。应当说，这是一人党员对党的领袖最高的关怀。在山上开"神仙会"阶段，由于我的不谨慎，将这三条意见同一位有老交情的同志谈了，开大会时被捅了出来。此事当时虽被"掩盖"过去，仍然影响到家英后来的处境，使我长期耿耿于怀。在山上时，我曾有过一种很悲观的情

绪，向家英流露过。开完会，回到北京之后，他特地跟我通过一次电话，其中讲了这样一句话："我们是道义之交。"不幸被人听见，几天之后，我家中的电话就被拆除了。

1960 年到 1961 年，我在北大荒劳动。前期在一个村子里，同老乡三同；后期调到虎林西岗农场场部，场 部的生活条件稍好一些。由于身体关系，1961 年底调回北京。其后两年，我独自一个在京闲居。两 年间，同家英见过三次面，都是电话约到市内某一新华书店碰面，然后带着大口罩，漫步街头，找到有单间的饭馆，继续过去那种长谈。第一次碰面，我才知道在北大荒调到场部，是他和别的几个关心我的同志作的安排。七十年代初作的杂诗中，曾记述此事："打起精神学打场，忽然意外转西岗，长安故旧多关切，不忍其人葬大荒。"这次在饭馆谈了一个下午，谈到北大荒当时少见炊烟的暮色和农民的挨饿景况时，我很动了感情。家英也谈起庐山会议之后，他所受到的种种冷遇。我们都有这样一个共同的愿望：国家和人民再也经不起折腾了，今后无论如何不要再搞大运动了。分手前，一起哼成了下面这首诗：

闹市遮颜过，胡同尚可行。
人间多雨露，老友系诗情。
冷眼观尘世，丹心向众生。
炎凉何必叹，把酒贱浮名。

1963 年 12 月，我被派到大别山中一个水电站去当文化教员。离京之前，与家英话别，到后海岸边散步，深夜又到一个小酒店喝酒。当然，谈的主要还是当前大事。他正参加起草农村

工作的后十条，说不久后，我会听到传达的。他谈此事，也是让我对形势放心之意。临分手时，走过景山很远了。对我的遭遇，这夜他特别感慨系之，又讲起吴季子来。夜半回到住处时，不能成寐，直到吟得下面一律，才勉强睡去：

客身不意复南迁，随遇而安别亦难。
后海林荫同月步，鼓楼酒座候灯阑。
关怀莫过朝中事，袖手难为壁上观。
夜半宫西墙在望，不知相见又何年。

真没料到，这夜竟是我同家英的永诀！“文化大革命”前的几年，虽然相约，如有事就直接通信，但接受山上的教训，莫再连累他，一直没有给他写过信，上面这首诗他也不知道。

1967 年 4 月，我曾回到北京一次，才知道家英已不在人间了。前些日子见到董边同志时，她比较详细谈了 1966 年 5 月 23 日，家英被迫害致死的情况。21 日“中央文革”来人通知，两条罪名：同当时被批斗的办公厅负责同志关系不正常；一贯右倾。撤职交代，搬出中南海，并收走了全部文件。随即又听到办公厅大会上宣布了另一条罪状：篡改毛主席著作。这是指整理有关《海瑞罢官》的谈话时，他不赞成将彭德怀写进去。他这时面对着两个大敌，陈伯达与江青；还有一个小人叫戚本禹。他很愤慨，对妻子说道：“我的问题是陈伯达和江青的陷害。真想不到兢兢业业十八年，落得如此下场！”“那些坏人、恶人，终会得到恶 报。”记得鲁迅谈到自杀时，说过这样的话：自杀是对环境的一种抗议。家英之死，是对当时环境的抗议。

七十年代初，住在秦城监狱怀念家英时，还作过这样一首

七律：

古柳安详围海边，园中深院院中园。
多时不见忽相忆，无事而来乱扯谈。
世界纵横三万里，古今上下五千年。
戏言犹记料身后，又是黄昏絮满天！

家英专搜集清人字，我则兼搜字画；曾戏约后入土者，有继承权。董边同志告诉我，家英的藏书只收回很少一部分，有些难得的字条已散失，我送给他的一幅郑板桥字还幸存。收回的书籍中找到一本有我签名的日本版《东洋读史地图》，就带回留着纪念了。

这篇琐碎的“怀念”该结束了。但是对家英的怀念是永远不会结束的。

1979 年 12 月

忆六如老伯

1939年"平江惨案"以后，湖南的形势日趋紧张，1940年开始大批撤退干部。我走得比较早，是1939年最后一天到达延安的。到延安后想到的第一件事，便是去看望六如老伯。

李六如是我父亲的好朋友，都是平江东乡人，我家长寿街离他家献钟只有三十里，他比我父亲大概要小五、六岁。我父亲是1922年在长沙赋闲时去世的，那时我还不满五岁。母亲拒绝老家长辈的安排，决不回家乡去，艰难地带着三个幼小的儿女在长沙读书。母子孤苦伶仃，相依为命。由于母亲的经常念叨，关于父亲的一生，他的为人、好尚和品德，包括他有哪些要好的朋友，都深深印在儿女的心中。这不仅是一种人伦的眷念，在那个世态炎凉的社会，更是一种傲于世俗、支持上进的无形力量。

父亲的朋友颇多，有些高官、名流我见到过，但母亲常谈到的六如和竹雅(方维夏，也是长寿街人)，我却从来没有见到过。因为北伐战争前，他们早就到广东去了，大革命失败后，他们是被国民党通缉的著名的"共匪"、"暴徒"。母亲告诉我们，父亲去世时，他俩特别伤心；他们为人同父亲一样正派、耿直，都反对赵恒惕(1920年到1925年湖南的督军兼省长)，都寄希望于广东出兵。父亲是1905年去日本留学的，是同盟会员，民国初年的

国会议员，到广东参加过孙中山的非常国会。竹雅和六如也是辛亥前、后去日本留学的，竹雅还是赵恒惕省议会的议员。平江这个地方，清末即得风气之先，“五四”运动时有过群众性的反日斗争，尤其十年内战时，是湘鄂赣根据地的中心区域，斗争极其尖锐而残酷。国民党高喊“血洗平江”，实施三光政策，烈士之多，居湖南首位，全县人口由七十多万减到开国初的四十多万。母亲告诉过我们，六如老伯家的房屋和器物都被烧光和抄没，两个胞弟和两个侄儿被国民党杀害，一个儿子下落不明。六如伯的元配夫人是母亲的同学，她们一直保持着友谊。

我去看望六如伯是有充分的精神准备的，而他突然见到这个外貌酷似乃父的故人之子，自然十分惊讶和意外高兴。至今我还记得那表情和满口乡音：“呵呀，呵呀，想不到，想不到，你的姆妈好吗？”第一次见面，谈得多的当然是我，关于我自己，以及他所关心的外面情况和故乡人事。在延安六年中，除开“抢救运动”那一年多外，每年总要去看望他一、二次。延安生活苦，每去必留餐，“打牙祭”。他种了苦瓜，有时还杀鸡；苦瓜、辣椒炒鸡，这是道地家乡菜。我在《解放日报》工作时，1942 年要写纪念辛亥革命的文章，特地去找他谈过他参加辛亥革命的事迹，对他的一生才有较多的了解。六如伯是我们党有数的几个老前辈之一，他怎样走上革命道路及其曲折的经历，在清末老一代的知识分子中是非常典型的。难怪他后来非写出一部《六十年的变迁》不可。

六如伯的父亲是富商，他幼年丧父，资财被有权势的伯父吞没。“骤贫难改旧家风”，母子靠借贷卖田维持家计。他虽然饱读经书，获得应县考的资格，但两个弟弟后来却只能当学徒了。

1907 年二十岁的时候，他结识了同乡凌容众。凌是同我父亲一道去日本留学的，也是父亲的好友，因为反对“取缔规则”，被日本政府驱逐回国。凌回来后即传播反清思想，办平江启明女校（我母亲就是该校师范部第一班的学生）。六如伯从凌那里知悉陈天华蹈海事件，并看到《民报》、《游学译编》、《嘉定屠城纪略》等反清报刊和书籍。从此，“报家仇”的愤恨转到清朝皇帝身上去了。“匈奴未灭，何以家为！”他抱着这样的决心，投笔从戎，1908 年到武昌参加新军，结识了同盟会会员刘复基（武昌起义三烈士之一）、詹大悲等，组织文学社，为负责人之一，从事士兵运动。武昌首义时，他被黎元洪委为第四镇十六标标统（相当团长），参加了阳夏战争。由于不满意标统职位，又觉得自己年轻，想出洋深造，几经请求，黎元洪终于同意，赠他三千元出洋费，每月另拨官费八十元，还补了一个“陆军少将”头衔。六如伯用这笔钱买回了过去的几百石田产。到日本后，他放弃了“想当督军”的初愿，热心议会政治，做起“议员梦”来。于是不进士官学校，进了明治大学的政治经济系。后来一心读社会科学书，如《社会问题十讲》、《马克思经济学说》等，还读了《资本论》第一卷，特别受河上肇著作的影响很深。他说，这是他一生读书最多的一个时期。为了反对二十一条，还曾罢学回到湖南，做过宣传救国的工作。1919 年 10 月毕业回国时，他的爱国思想中带有空想社会主义的东西，认为只有把全国占大多数的农民、工人教育起来，振兴实业，国家才有希望。这时正值“五四”运动兴起，他拒绝长沙官方的高薪聘请，回到平江，集资办了一个织布厂，用的是宜昌出产的脚踏铁机。由于军阀勒索，洋布倾销，不久工厂就倒闭了，还欠了债，只好又卖田产。“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梦想终于破灭。值得庆幸的是，他同时办的救贫工厂、工

农夜校，以及农会、工会等，不仅使平江有了第一代产业工人，同时培养了平江最早的一代革命干部。我在延安时，还找吴创国老人谈过这些事。吴是平江人，裁缝出身，当年就参加了办工农夜校和组织工会等活动，是六如伯得力的助手。

1920年8月，经济破产了，六如伯到长沙法政专科等校教书，但不甘于当个教书匠，于是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到处演讲，倡导平民教育运动。他通过省政府、省议会和省教育会中许多朋友、熟人的关系，自上而下向各县推动，成立了全省平民教育促进会，被举为副董事长（董事长为赵恒惕省府的秘书长）。方维夏时任省教育会会长，给的帮助最多。通过平民教育运动，还推动四五十个县办了县报，全省县报联合会由他任会长。在长沙城区，由工厂、基督教青年会等办的工人夜校达一百多处。

他还编了四本通俗的《平民读本》，于1922年出版，其中宣传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思想。这四本小书曾风行一时，一连印了四版，达几万册。他同我谈起这些往事时，说自己当初并没有鲜明的无产阶级意识。

1920年到1921年的平民教育运动，是有影响的进步活动，自然受到毛泽东的注意，便派人与六如伯联系，他们一见如故。结识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原新民学会中的骨干何叔衡、李维汉、夏曦、郭亮等，以后，六如伯所有的社会活动也就同团与党的活动结合起来，如1921年春，平江就办起了文化书社的分社。李立三到安源开辟工人运动，就是利用平民教育会的合法身份。由毛泽东、何叔衡介绍，1921年六如伯先入团，随后入党，那时叫做由“中学”升入“大学”，党对团是很秘密的。入党之后，六如伯任湘区（省委）文委委员，同时负责平江的建党工作。在建党初期，六如伯同毛泽东的关系是很密切的。他的元配夫人跟我的

母亲话旧时就谈起过:毛泽东常来我们家,我给他洗、补长褂子都记不清回数了。

对平江来说,李六如是"星星之火"的第一个火种。1922 年他发展了两个党员,一个是工会会长陈弗章(1928 年被国民党杀害),一个是农会会长余贲民。他们两人由六如伯介绍同毛泽东见面。余贲民参加过辛亥革命,是湖南新军的连长,武昌起义战役中负伤后,即回乡务农,"五四"运动时在启明女校任教,后来是毛主席率部上井冈山时主要的军事领导人之一,也是湘鄂赣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1932 年任湘鄂赣省委的军事部长。1933 年负伤治疗时,他受到错误的肃反政策干扰,在关押中去世。六如伯专门写过《余贲民传略》。据许多老同志回忆,毛主席在长征路上,在延安,在北京中南海,多次谈到余贲民,赞扬他的忠诚和苦干精神。

1923 年平江成立了第一个共产党支部,党员中有裁缝、木匠、中医和小学教员。1924 年,有团员二十三人。平江人前往黄埔军校学习的,一至四期有三十二人,五至七期有五十五人。这年由共产党员为主建立的平江国民党,有党员一百多人。献钟党支部书记罗纳川(1928 年牺牲,时为县委负责人)领导二千造纸工人罢工,取得胜利。1925 年,党员发展到三、四十人,正式成立县委。在北伐战争前夕,平江即展开了轰轰烈烈的爱国群众运动。

由于党的经费奇绌,1923 年,省委(湘区区委)派六如伯作为国民党湖南省党部代表赴广州,向国民党中央求援。先由叶楚伧、邵力子等帮助了一笔款子,后来又由廖仲恺等批准,每月接济湖南一千元。六如伯又找到谭延闿和湘籍军官鲁涤平、陈

嘉佑、张辉瓒等，为党办的湘江学校募了一大笔款子。由于谭延闿等以为六如伯是十足道地的国民党员，坚决挽留。经过党的同意，他受任湘军国民党特别党部常务委员。谭延闿任第一次北伐总司令时，六如伯被任为总部党政处长，在韶关行营曾拜见孙中山。六如伯留下的笔记这样记载了这次会见："孙中山询问了湖南的情形，我报告了夏曦在湖南发展国民党党务的概况。他赞许说：还是共产党行，肯干，三大政策是对的嘛。不联他们联谁？又说：辛亥革命到现在十三年啦，政权操在反革命手里，越来越腐败黑暗。"第一次北伐失败后回到广州，六如伯任第二军军校政治部主任。他在湘军中发展的第一个党员便是方维夏。以后在各个团也发展了党员，成立了特别支部，他任书记，由周恩来直接领导。第二次北伐时，他任第二军(军长谭延闿)第四师(师长为张辉瓒)的中将党代表，方维夏为谭道源师的党代表，军党代表是李富春。在北伐战争中，六如伯随部队在前线，经历了湖南、江西、安徽、湖北各次战役。第二次攻南昌时，他在前线督战几天几夜。

平江是通湖北的要道。1926 年 7 月，北伐军进逼时，党领导的民团成立了敢死队，余贲民任县团防局的总局长。1927 年，党员达七千多人。"马日事变"后，湖南城乡一片白色恐怖。7 月，县委集合团防局、工农武装共一千二百人编为平江工农义勇队，由余贲民任大队长。余部奉命前往南昌参加起义。后来这支部队辗转战斗，到浏阳文家市与毛泽东会合。

大革命失败后，1927 年 8 月，党派六如伯和夏明翰到平江，领导秋收暴动。六如伯带回去两支枪，在献钟找到罗纳川，一共"三支半枪"(有一支打不响)，于 9 月 21 日袭击献钟警察所，获枪四支，镇压反动警官等八人。这以后，县委成立了平江暴动委

员会，由罗纳川任主任，开始在四乡领导对付反革命屠杀的武装暴动，成立义勇队。各乡义勇队的人数几十、几百、上千不等，枪支多不过几支、几十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起来。9 月，暴动委员会还组织几百农民扑城一次。这些初出茅庐的游击队，同国民党的清乡部队进行了极为艰苦而残酷的斗争。由于形势的恶化，全县党员由七千人减到三千七百人。1928 年，国民党派三个团来平江清剿。3 月，县游击总队组织十万农军第二次扑城，因人数太多，过早暴露目标而撤退。这次扑城高潮时，党员又发展到一万一千多人。

这时平江的豪绅纷纷向国民 党政府呈文控告，说李六如是平江的祸根，必须翦除。于是这个“祸根”被悬赏通缉。由于目标太大，组织决定六如伯离开平江前往上海。这是 1928 年初的事。从此直到全国解放，他就再没有回过平江了。

由李六如点燃火种的平江革命斗争，确实是可歌可泣、惊天动地的，值得史家一书。十年内战时期，平江这个地方高潮低潮，汹涌来去；胜利失败，交织起伏；迅猛的发展，惨重的牺牲，常常更迭而至。1928 年 4 月，东乡至南乡，火延八十里。陈光中部在东乡，分配士兵杀人任务，每天交左耳一只。7 月彭德怀起义后，有的村子，群众集体入党，全县党员一时号称几万。8 月陈光中清乡，三天内在龙门杀一千三百余人，为有名的“龙门惨案”。几个月之内，东南北三乡，火光不熄，几万人无家可归。

但革命种子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到 1930 年 5、6 月间，平江的党、团员又发展到一万一千余人。1931 年 3 月，红军攻克县城后，在这里选志愿兵一千五百人到江西补充红军。1938 年，新四军第一支队成立时，傅秋涛率领的第一团，从平江出发，共一千一百人，有二百多支枪，七百马刀。平江同中国革

命的关系，从这样一个数字也可见一斑：1985 年平江县的负责人到北京来找平江的老干部座谈，军以上的还有四、五十人。

六如伯于 1928 年被迫离开平江到上海后，住在友人家中，险遭逮捕。这年冬天，党中央派他到南洋工作。1929 年在新加坡办了一张小报，被英政府查封，人也被捕。他在法庭辩论，因无证据与口供，勒令出境。党又派他到橡胶园做工人工作，办工人夜校，同工人同餐、同宿、同割胶。由于患病，后来回到香港。在南方局工作一年多，于 1930 年进入苏区。先在闽西省政府任秘书长，掌管内务、财政二部。后来调中央苏区，任税务局长，国家银行代行长等职。中央苏区经过几次反围剿战争，部队扩大，税收不足，加以制度紊乱，财政异常 困难。六如伯以自己的专长，主张略微提高土地税，增发货币，整理税务，建立国家金库，度过难关。当时的财政人民委员邓子恢采纳了他的建议。苏区人民生活最大的困难是缺盐。他发动一些老盐行挖土熬盐外，还贷款给商人，组织他们到白区千方百计运回食盐和药品、布匹等急需物资，他自己同营业部人员一起站柜台。可是在王明左倾路线统治时期，像六如伯这样从旧社会过来的老知识分子，当然容易得咎。在延安整风学习时，他曾同我谈到过，邓子恢被指责为“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六如伯自己虽未明受处分，但也受到“商人路线”、“机会主义”、“阶级意识模糊”这类批评。当时传言银行系统“被右倾机会主义所统治”。他也收到过关心他的同志的劝告信。谈到这些往事他很感慨，在江西时，许多党的高级干部会议没能参加过，两次全苏代表大会都没能参加。他认为他之没能参加长征，也类似何叔衡等一样，是被认为“右倾”所致。何叔衡同他分手时，流着眼泪说下这句话：“唉，六如，不料

我这副老骨头还要送到白区去啊!

中央红军长征后,六如伯被留在中央政府后方办事处,仍主管财经工作。根据地一下子变成游击区了,经常随着部队在赣南山林间转移,栉风沐雨,夜行日宿。由于身体与年龄关系,经常掉队。1935 年在一次非常危急的情况下,他被认为再拖下去,会白白送死当俘虏,于是项英命令他和他的夫人王美兰离开苏区,给了一笔路费。这笔钱在过赣江时,几乎全部被白军搜走。流落到吉安后被捕,后来经覃振援救,才得释放。1937 年 8 月到达延安。

1944 年夏天,我害了一场严重的伤寒病,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病愈后去看望六如伯。他谈到对整风、"抢救"中某些人的过左做法,他向组织提过书面意见。他还告诉我,"抢救"期间,保安处曾派人来向他调查我老家的情况,还问我的父亲是不是红军杀掉的。我是在长沙读的小学和中学,老家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六如伯比我熟悉得多;老家的亲属中,有人死于国民党的屠刀,也有些妇孺死于过左政策。有他的证明,这类谣传一下澄清。其实,我进延安时写的《自传》,老家的重要人事,是写得清清楚楚的。奇怪的是,1959 年庐山会议上我受批斗时,康生仍在造谣,说我这个人"有杀父之仇"。后来知道,六如伯向调查者再一次辟这个谣,并对我父亲作了评介:是当年具有爱国民主思想的开明人士,如果活下来,也许会赞成共产主义的。这样的话,抗战前我也听母亲说过。

日本投降前不久,在延安时最后一次看望六如伯,他感慨较多,对自己一生的思想发展作了剖析。他说辛亥革命前,是狭隘的民族爱国主义思想,先受康、梁影响,后受同盟会影响。在日本留学时,先倾向资产阶级的德谟克拉西,读过各种社会主义书

籍后，认为共产主义虽好，恐难实现，倾向改良的欧文主义。自己不尚空谈，较重实践，因此回国后在平江搞了那些活动。办工厂失败，到长沙教书后，感到国内军阀横行，农村经济破产，觉得非走苏俄劳农政府的革命道路不行。虽然那么早就入了党，但对共产主义和党只有抽象的认识，对党各个时期的任务和如何才能走向共产主义等许多问题，长时期中是很模糊的，认为只要把工农群众组织起来了，到处罢工暴动，就可以夺取政权，实行社会主义，而不懂得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曲折性，更不懂得每一时期要有每一时期的革命政策和具体措施。他说，参加整风，学习党史，检查历史，参加新哲学会及其他各种学习，学习了毛主席的许多著作，尤其是有了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亲身感受，思想认识上才真正有所提高，同过去相比，可说有质的不同。

1944 年 3 月，在杨家岭学习会上，关于苏区的土地问题，六如伯作过一个很好的报告，提出了许多值得研究的问题。他说，十年土地政策可分为三个时期："八七"会议到 1931 年四中全会前三年多，是探索时期；四中全会到 1935 年底五年，是土地政策上变更最大，而在各苏区发生问题最多的时期；中央到陕北后，发布《关于富农策略决定》到抗战前夕，是开始转变土地政策的时期。他提出中国农村有否发展资本主义可能的问题。关于中国土地所有制，六大决议认为中国土地大半可以买卖，这便是资产阶级式占优势。他认为这是根本的错误。秦朝以后土地可以买卖，不能据此就说中国是非封建土地所有制占优势。此外，还提出土地国有还是农有？中国是大地主多还是小地主多？中国富农是小地主、半地主性，还是农村资产阶级？等等问题。当时我在《解放日报》管评论工作，接触过这些问题。六如伯是重视理论尤其经济理论的，一九四七年兼职主持东北财经干部学校

时，还主编过《实用经济六讲》一书，第一讲《财政经济总论》就是他执笔的。

日本投降后，我们先后到达承德。我负责报社工作，六如伯是热河省委常委和省府秘书长。见面时感到他有一种极为兴奋的情绪，即中国革命的胜利确确实实在望了。1946 年纪念“七·七”抗战九周年时，我请他写过一篇文章：《蒋介石怎样出卖东北与热河》，内容是“九·一八”到“七·七”的六年大事记。这些历史事实真相，是新解放区人民迫切需要了解的。

1952 年初，六如伯回到阔别二十五年的家乡。当时我在湖南省委工作。我的母亲自己做菜，举行家宴，请六如伯吃饭。陪客有两位平江人：长沙市委书记曹瑛和民政厅长陈再励，他们都是六如伯的老战友；还有一位同乡旧友陈长簇，是父亲的留日同学，旧时多年任湖南高等法院院长，支持程潜起义的。席间话旧，极尽欢愉，意境颇近于王荆公句“草草杯盘供笑语，昏昏灯火话平生”。（长沙当时电力虽不足，电灯还是很明亮的，“昏昏”易“昭昭”更切合当时情景。）这时我正为《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一书搜集资料，他知道我的这个计划后，谈到他在延安整风时，由于思想认识的提高，发现自己一生同中国革命历程，竟是如此紧密相连，因此写了《自传》之后，就将自己各个时期的经历和认识，写了许多札记，这个包包在离开延安后，一直随 身带着。他说这次到湖南来，也附带收集有关资料。六如伯为我提供了极为珍贵的第一手材料。但是他很少谈自己，如关于平民教育运动中他所起的作用，避而不言，以至书中有关此事的年限我推后到 1922 年。他是湘区的首任文委委员，也没有谈及。介绍陈莆章、余贲民二人来长沙这类事，才讲得比较具体。四本《平民读

本》也是这次借给我的。这四本书的内容，在我写的书中作了较充分的介绍：写法由浅入深，由短而长，文字通俗，每课由几十字到三四百字不等；内容包括与日常生活有关的问题、社会文化、科学知识和国内国际大事，介绍了各派社会主义，尤其着重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粗浅知识和俄国十月革命的方向。

五十年代在北京，整天忙于事务，看望六如伯反不如在延安的次数多了。《六十年的变迁》第一卷出版之后，他在扉页题签，送了一本与我，我至今保存着。当时虽没有细读，其中人事、乡情、风俗，却多么熟悉。凌雍雄（凌容众）在甲山办启明女学堂，最初招来的五名学生中，有“姓李的媳妇”，岂不就是指我母亲？“大跃进”那两年特别忙，似没有再去看望过六如伯，对《变迁》一书有什么想法自然也没有谈过。回忆中只有这样的感想：“三卷书怕完不成。六如伯身体瘦弱，写完第一卷已是古稀之年了。这本书出版之前，曾将打印稿本送与一些老同志审阅。他告诉我，彭老总特来看望他，对此事倍加赞赏。1959 年庐山会议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过六如伯。1979 年初回到北京，去看望黄克诚同志，才知道这十年中，加上六如伯，我们三个人归“专案一办”同一个人管。1980 年 7 月 2 日举行六如伯的追悼会时，我正在南方出差。一直到前不久，才听说王美兰夫人仍住在北池子故居，自己也有了握管的时间，于是去看望她。二十多年暌违，彼此还能认得出来。我们谈了大半个上午，才知道六如伯去世前的情况。她知道我要写这篇文章，将手头有关资料都交给了我，还送我《变迁》的第二卷和未完成的第三卷。同时我也收到平江寄来的有关六如伯的材料。

六如伯曲折、光辉的一生，前面只叙述了一个轮廓。他的经历如此丰富：武昌起义，北伐跨党，白区红区，国内国外，军事、政

治、财经、文化、教育、司法各种工作，翩翩公子与共产党员，北伐将军与割胶工人，灯红酒绿与枪林弹雨，三次坐牢，经受酷刑……波澜起伏、艰难险阻集于一身。六十年的中国革命与个人经历，其追求、探索，理想、实践，后退、前进，挫折、胜利，失败、成功，两者溶为一体，如形影之相随，中国革命的惊涛骇浪中有他这一片耀眼的水花。五十年代中期，他由于年事与身体而离开工作岗位，虽然得的是脑病，但脑子却平静不下来，皓首病躯，日夜伏案，开始了一生最后的一场战斗——创作三卷《六十年的变迁》。夫人说："深夜，'铁马冰河'的回忆，会使他披衣下床，欣然命笔。为了核对某一史实，他要翻阅大量资料、书籍。有时为选择一个恰当的词，他会在院子里走上几十个来回，反复比较推敲。1961年，他更不顾自己年迈多病，竟长途跋涉，先后走了三个省，行程数千里，为第三卷收集资料。当同志们劝他注意身体时，他总说：'怕时间不够用！'他无时不意识到必须为自己有限的余生争分夺秒。'不完成《六十年的变迁》我死不瞑目。'"

六如伯在衰弱的晚年如此执着于此书的完成，他必是有满肚子的话要说，他要把自己六十年间的立身行事、是非功过，都展现人前；要把六十年中国的变迁，从他个人经历这个侧面留与后人知晓。我想，他在回顾自己一生经历的时候，必定是有些宽慰，有些追悔，有些庆幸，有些惋惜，也有些遗憾甚或委屈。这虽是一部自传体的小说，但虚构的成份是很少很少的。主人公李六如在书中是变成季交恕了，可是众多的人名、地名都是真实的，许多情节几乎是按照历史事件的原貌描述的。在一定的意义上，小说就是历史，难道《红楼梦》不也是历史吗？记得恩格斯说过，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所给予他的关于法国社会历史的知识，甚至比历史家和经济学家的著作还要多些。我的理解是：

《人间喜剧》对当时法国的动荡形势、社会风尚、人事纠葛、人们心理状态的栩栩如生的描写，为我们具体了解那一段历史提供了丰富的感性材料，这是以诉诸理智的科学概括为主要叙述方法的历史著作无法提供的。当然，《变迁》就艺术性而论，不可以同《人间喜剧》比肩，但其中确实提供了大量中国革命史的感性资料，我甚至认为直接把它看作是一部历史著作也无不可。从反映时代来说，作家也应该是历史家，必须自身有丰富的生活经验、渊博的知识和生花妙笔，才能叙述确切，有血有肉，引人入胜。六如伯正是具备了这些条件，才决心最后当“作家”的（我这里加引号，是他曾对我说过：“我怎能算作家。”他认为《变迁》结构上、艺术上都很差），才能使《变迁》出版后受到国内外的重视，第一卷印行七次，有英、日、俄译本。“文化大革命”的罪恶千千万万，《六十年的变迁》没有完成（只写到 1928 年上半年撤退到上海为止），作者“死不瞑目”，也是其中之一。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每从报纸或广播中得知江青又发表讲话时，六如伯就向老伴叮嘱，要做好思想准备，随时应付最坏情况的发生。王美兰夫人的回忆说：在延安时，“六如任毛主席的秘书长期间，目睹江青专横跋扈、反复无常。服务人员十分为难，敢怒而不敢言。六如为了维护毛主席的威信，经过反复考虑，决定把大家长期积压在心头的对江青的意见向毛主席作一次汇报，提请江青注意，以便挽回影响。他认为，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也是当秘书长的职责。但是正当六如同毛主席谈话之间，江青走了进来，有些话被她听见了，当即大哭大闹……事后，毛主席要江青向六如道歉，江青执意不肯。”“五十年代初，六如任最高人民检察署副检察长兼党组书记时，一次在天安门

城楼休息室见到毛主席，江青也在座。六如以为事过境迁，出于礼貌，问道：‘江青同志身体好吗？’江青下巴一抬，扭头他顾。毛主席忙从旁插话，才把这尴尬局面圆过。”

果然，1967 年康生一次接见湖南造反派时说：“李六如是叛徒、反党分子。”还补了一句，“就是写《六十年的变迁》的那个李六如。”“反党分子”的罪名是由于六如伯参加编写《平江革命斗争史》，被推为主编。这当然就是“为彭德怀翻案”了。至于“叛徒”的问题，自是指 1935 年江西被捕之事。这件事，过去六如伯没有详细同我谈过，只说到是由覃振营救出狱的。原来 1935 年，几乎讨饭流落到吉安时，为了谋生，考入《吉安日报》当校对，后来被一个认识他的人告密，被国民党驻军逮捕。敌人出示刊有他的照片的通缉令，终于无法掩饰身份。经多次谈话逼供，强迫登报自首，以孔荷宠（曾为红军军长）投降受优待相诱，而均归无效之后，即开堂大审，动用酷刑。六如伯在他的《自传》中写道：“始而上用杠子踩着，继而下用铁链跪着，终而兼用皮鞭抽着，香火烧着，我晕死过去。到复苏时，已遍体血肉模糊，躺在囚室中。”六如伯以“要犯”被判处死刑，加上镣铐移押专署，候回文一到，即执行枪决。死刑判决乃根据国民党所谓《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六如伯熟谙法律，即动脑筋写“辩诉状”，说明自己并非“要犯”，根据条律，亦无死罪。他考虑若改判“无期徒刑”，则等待形势发展，有出狱可能。六如伯的老朋友湖南人覃振，时任国民党司法院副院长兼“中央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委员长”，他即将这个“辩诉状”副本寄去，求其设法以免死刑，但并未请求保释。覃振极力疏通，并给国民党江西省主席熊式辉去信保释。信是 1936 年 11 月 18 日寄出的，直到西安事变后，1937 年 3 月六如伯才被释放。他随即和夫人到南京，住在覃处，获得优养。

覃探知尚未公开的八路军驻宁办事处地址后，即让六如伯与党组织取得联系，于 1937 年 8 月到达延安。一到延安，他即将被捕经过，“辩诉状”原底，以及在吉安时与覃振的来往信件，交与党组织。这样酷刑不屈，经旧友援手得以出狱，与“叛徒”何干？按照康生们的逻辑是：瞿秋白被捕后牺牲了都要算叛徒，李六如被捕而又出狱就更是叛徒了。“文化大革命”期间，真还在江西国民党旧档中查到“伪司法院副院长为保释李六如给伪江西省主席熊式辉的信”。原信如下：

天翼吾兄主席勋鉴：敬启者，李君训生（这是六如伯当时用的假名）前以共党嫌疑被捕，羁押吉安将及一年。弟以李君曩曾效命本党，不无微劳。现已年逾五旬，室家多累。经此一度，必能反省。特此函恳，务乞念其衰老，转饬吉安该管机关，从宽开释。弟对于李君今后行动，当完全负责保证。耑函奉恳，无任感祷。敬颂勋绥。

覃振真是党的不忘旧情的好朋友，对这样一位被通缉的“老共匪”死囚，敢对他今后行动，“完全负责保证”，真是难能可贵，义重如山。我没有调查，不知当年的“专办”对信中“必能反省”四字是否仍做了文章，据此以定“叛徒”；也不知道现在是否还有人对此四字以为不然。当年两个国民党的大员之间为此“棘手”之事交往，一方要达到救友的目的，总不能不用他们之间的习惯用语吧。实际情况却是：覃振所“负责保证的行动”，是设法送他的老友回到共产党中去。据六如伯的《自传》说，到南京后，覃振曾让他就近做点事，他没有同意。人各有志，覃振遵守了中国士人的古风。

1970年，八十三岁的六如伯和他的老伴，被流放到桂林，过着软禁的生活。一次听说邓子恢就住在附近，他去探望时，相互抱肩，真是说不出的欢快。可是再次探视就被禁止了。王美兰夫人对我说，那时六如伯的体重只有八十斤，身体已很衰弱，心中的愤懑之气无处发泄时，常常仰天长啸，声音凄厉。此情正是“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林彪摔死后，六如伯1972年返京时很是兴奋，“漫卷诗书喜欲狂”。哪知走出北京站，迎接他的竟仍然是“专办”人员几张卑视的冷面。当年法堂的酷刑忍受得住，可是以“叛徒”、“反党分子”的身份，长期面对周遭的冷遇与凌辱，八十多岁的衰病老人实在难以忍受了。夫人告诉我：他长期得不到正常的医疗，病情终于日渐恶化，人越来越瘦，脚越来越肿，大病房的嘈杂更难休息，只好回家待毙。最后病危时，要不到车，她只好到附近借一辆三轮车，将老人拉到医院。咽气时，六如伯拉着四十年共患难的老伴的手，用发硬的舌头，喃喃呼唤着：“毛主席、周总理、老同志……”神情极其凄苦，最后，流下两行泪水而停止呼吸。时在1973年4月10日。

六如老伯的这种临终情景，使我想起关汉卿《窦娥冤》中窦娥临刑前哭诉的句子：

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

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

不！六如老伯的临终情思应是宇文虚中《在金日作》七律的末两句：

人生一死浑闲事，裂眦穿胸不汝忘。

虽然怀着无处可诉的无限忧愤，六如伯最后的呼唤，最后的眼泪，仍是对党、对革命、对祖国的耿耿忠诚。

1985年8月中旬

忆 吴 觉

1981 年夏，我到南京出差，特去看望一别二十多年的老友吴觉。这时他任南京工学院党委书记和江苏省政协的副主席，因哮喘痼疾发作住在家中。一进客厅，就看到墙上挂着李一氓遒劲书法的一帧条幅：

主人颇有江湖气，坐客能谈山海经。

抗日战争时同吴觉同志共事淮海区，曾撰书此联以赠之。三十五六年后重遇南京，虽历劫无重数而雅兴不减当年。回京后曾直同志告以联语，因重录寄之，当共哄笑。然这一段历史不可没也。李一氓于北京。一九八零年元旦。

这两句话真是把吴觉写活了。我最初认识他是 1938 年 1 月在徐州，那时我正负责组织公开合法的第五战区青年救国团。战区司令长官是李宗仁，政治上比较开明，成立有第五战区民众抗日总动员委员会，吸收了一批地方开明士绅和进步人士。当时党的苏鲁特委负责人是郭子化，他有较多的上层关系，也被聘请为委员；特委成员郭影秋就在动员委员会内工作。吴觉是淮

阴人，他同谢冰岩代表苏北的抗日青年，从淮阴来徐州找党的关系，同时带了地方上层人士介绍信来找总动委会，取得成立地方群众组织的合法权力，以便回到淮（阴）淮（安）涟（水）泗（县）一带开展抗日活动。他们由郭影秋安排，来找过我，说起他们的活动情况，知道苏北有一批人刚从监狱和反省院中出来，还有从外地流亡回来的进步青年，急于找到党的关系。这次他们只带回总动委会的认可，而没有能接上组织关系。吴觉被任命为淮阴动委会的指导员，受权组织县动委会，他们已成立的抗日群众团体也得到承认。

1938年5月，徐州突围前夕，我奉特委命，率领青救团组织的三、四十人转到东北军于学忠部队，新组建一个战地工作团。于部突然改变挺进山东敌后的计划，我们也只好随部队突围。在突围中被冲散，与总部失去联系，我们一支小分队辗转向东突出敌人包围。后来我只身来到淮阴，在吴觉处住了三、四个星期；其间并到涟水东北军五十七军常恩多师同党组织联系过。由于我的介绍，吴同他们早有来往。

吴觉是“七·七”事变前两天，通过国民党上层关系从苏州反省院保释的。他回到淮阴时，日寇已逼近南京。这时国民党的江苏省政府、省党部正搬到淮阴。省主席顾祝同未到任，由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韩德勤代理。省党部书记周化鹏是他父亲的学生，为世交。吴利用这些上层关系，争取组织进步团体的合法地位，开展独立自主的抗日活动。他同夏如爱、宋振鼎、谢冰岩等一批失掉关系的党、团员同志，将淮阴、涟水、淮安、泗县、灌云一带进步青年都团结在他们的周围，尽量扩大抗日进步力量，准备在苏北敌后打游击。为此，吴觉还与同族人的帮会领袖、土匪头目、国民党上海暗杀团的枪手等三教九流联系，以防止这些地头

蛇跑到敌人那边去。他自己弄到七支枪，埋藏在农村的家中。周化鹏等人也知道，以吴为首的这一批从监狱、反省院出来的共产党员或"嫌疑分子"，有活动能力，在青年中有威信，在即将来临的敌后游击战争中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当吴觉等准备成立苏北抗日同盟会时，周化鹏便主动找吴等开座谈会，想把他们拉过去，说是要起"化学变化"，国共两党统一战线要"联合为一体"。当即遭到吴觉等人的拒绝。于是周化鹏也不同意他们成立苏北抗日同盟会。吴随即找到他父亲的朋友、江苏省有名的士绅、进步人士朱德轩，同国民党顽固派作合法斗争。朱是上海的名律师，顾祝同、韩德勤是他的同乡后辈。吴觉到徐州，就是带了朱的介绍信去找李宗仁的。他们从徐州回来，带回第五战区的"令箭"，正式成立淮阴县动员委员会，由朱德轩任主任委员，朱的亲信淮阴县长胡海泉为组织部长，吴觉兼副部长，掌握组织大权。于是合法地成立了苏北抗日同盟会，由大革命时的老同志宋振鼎任理事长，谢冰岩任秘书长，骨干有李干成、陈书同、万金培等。同时还创办刊物，翻印延安的出版物。由于获得了合法地位，活动就便利多了。这个群众组织很快向乡下发展，各区乡陆续建立起抗日自卫武装，吴觉还与朱德轩一起到各乡检阅。后来吴觉筹集经费，秘密购置枪支。

我是5月上旬到达淮阴的，当时因敌机骚扰，常有警报，吴觉以城郊农村他岳母家为活动场所，我就同他们住在一起。3月间全国学联在武汉开成立大会时，我曾去参加，弄到了大批书刊，包括许多介绍红军游击战争经验的小册子，带回徐州传播了，自己也因此学得一点皮毛。在我们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影响下，这时国民党公布了《抗战建国纲领》和关于召集"国民参政会"的决定。国民党这个具有两面性的《纲领》，在内

外政策上较过去有了一些变化，有其一定的积极意义。我到淮阴时，正遇上国民党的淮阴县长要请吴觉等人吃饭，韩德勤八十九军的政治部主任李岐鸣等人参加，商谈对统一战线的看法问题，“以求得意见一致”。在这之前，江苏省的保安司令（二十四集团军的副司令李守维兼）和韩德勤本人，都分别找吴觉、谢冰岩他们谈过话，也请吃过饭，表示愿意听取进步青年的意见。这些国民党分子对统一战线有他们的理论，就是所谓“化学性质”的，所有党派都要融为一体，由国民党领导，奉蒋介石为“民族领袖”。这一次吴觉一定要拉我一同去赴宴，借重我这个“不速之客”，以张他们的声势，表示他们并非纯地方性质的力量，而是与外面已取得一定联络的。参加这次宴会的，记得还有宋振鼎、谢冰岩。他们要我作主要发言。1984 年 4 月 30 日吴觉去世后，他的儿子将他 1955 年在安徽受审查期间所写的详细自述和其他有关重要资料寄来，其中记述了这次宴会：

> 同年夏，国民党江苏省当局要淮阴县长胡海泉出面请我们吃饭，同时请他们省方要人，如李岐鸣等，想利用吃饭举行一次交换意见，主要想在对统一战线认识方面求得一致意见。我们参加作客吃饭者，是我及宋、谢三人，另外还有李锐同志，因他曾听了党内关于统一战线的重要报告，我们准备在座谈时以李锐同志为主发言，李今年尚在中央任水电总局局长。在宴后开始座谈的时候，国民党人开了话题后，即由李锐同志发表了长篇意见。李的一席话是说得很生动，说得国民党人哑口无声，而不敢继续发言了。

这次宴会后，吴觉等人很想留我在淮阴工作。由于苏北这

一带还没有建立党 的地方组织，我于是到涟水常恩多部的党组织联系，考虑是否先留在该部。吴觉等曾经介绍过一批当地的进步青年给该师办的学兵队，内中已建立党的支部。到常部后，同师长常恩多长谈过一次，在旅长唐君尧处住了几天（唐是西安事变时捉蒋介石的指挥官，跟我谈了当时的详情）。由于国民党的政训处对东北军监视甚严，以至常师长很谨慎，在晚上坐床垂帐读进步书籍。我也不便在该部留下。最后只好仍只身离开淮阴，经上海回到大后方。临别时，吴觉特为我换了服装，介绍了泰县的熟人关系和一路情况。这是一个真空地带，长江的港口同上海有轮船来往。从此与吴觉即不通音讯。

“文化大革命”时，我在秦城的单监生活中，枯坐无聊，追怀往事，作了些怀旧的诗。记述抗战爆发到徐州突围的长诗《转蓬曲》中，有几句讲的也正是这一段经历：

失伴只身走淮阴，敌后孤悬一死城。
当地新交欲揭竿，苦于蒋党阻重深。
借我外来不速客，席间舌战群丑惊。
走访涟水“杨开多”，亲耳临潼捉蒋情。
（“杨开多”为常恩多师代号。）
师座读书犹垂帐，众目睽睽难久停。
万里云罗一孤雁，江淮涟泗人留恋，
半月勾留别依依，不敢扁舟远搁浅。

这次和吴觉相聚半个多月，留下的印象是很深的。后来知道苏北沦陷后到我军主力东进前，这一年半当中，在党派来的淮盐工委的领导下，吴觉等组织了一支开始只有几百人的抗日义

勇队，吴担任总指挥（谢冰岩为秘书长，宋振鼎为政治部主任，夏如爱为教导大队队长），成为淮阴地区最强大的抗日武装。后来这支武装逐步扩大为八路军南进支队第八团、第三梯队（对外名淮河大队），吴任团长、大队长等。淮阴是1939年2月沦陷的。当时淮海地区的情况极为复杂，他们的处境极为困难。除日、伪、顽（国民党）军外，还有为各方争取的地方游杂武装。吴觉率领这支部队周旋其间，同日、伪、顽军浴血奋战，给日伪军不断打击。在国民党军的“清剿”中，部队日渐扩大，吴觉本人则被张贴布告，悬五千元的赏格捉拿。他在《自述》中说：“与国民党特务进行了残酷无情的斗争，这是我亲自掌握的，被我镇压的特务是难以数计的。”随着部队的扩大和改编，吴觉最后担任了八路军一一五师教导第五旅第三团团长。直到1940年，虽然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吴觉还没有正式解决党的组织关系。他自己说：“这一年半的斗争是尖锐、残酷、艰难、困苦的。我们没有根据地，我们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及日伪统治区内活动，既要防顽，又要防日，实处于日伪顽夹击之中。同时我们没有经济来源，数百人的游击队完全依靠分散在老百姓家吃饭，这就需要有最高度的自觉的纪律。群众条件好有基础的地方，虽然可以隐蔽，但因吃饭问题，难以停留两天以上。我们经常日伏夜出，灵活跳动；常夜行七八十里，穿插于淮海、盐阜两个地区；常饿着肚子行军、打仗；没有卫生人员，病号、伤员最难处理。这一年半的坚持斗争中，牺牲了许多领导干部。……为了保存我们这支力量，当时刘少奇同志曾决定让我们撤到皖东北根据地去，但我们表示可以坚持，而且可以坚持到迎接主力东进。由于我们完成了坚持的任务，保障了苏北地方党组织的建立与发展。（黄克诚同志率领的）八路军的主力，终于顺利地于1940年夏季进军苏

北，建立了淮海与盐阜两根据地。这时我已二十八岁了。”这一段描述，不禁使我想起那半个多月同他相处的日子，他的豪迈气概、潇洒风度和英发才干，历历如在眼前。吴觉后来从部队调到地方，曾担任淮海行政区专员等职。

解放初期在湖南工作时，黄克诚和金明同志都同我谈起过吴觉在开辟和坚持苏北根据地时作出的贡献和他的突出才能。黄老还特别谈到，少奇同志说过，当年金明从山东到苏北后，一大功绩就是放手使用了吴觉这一批从监狱和反省院出来的老同志，从而进一步打开了淮海地区的局面。

我第三次见到吴觉，是一十八年之后的 1956 年秋新安江水电站开工之前。我到上海找谭震林同志，请求支援技术干部，华东局派张灿明同志同我一起到蚌埠找吴觉，请淮委支援。这时正是吴觉被错误“肃反”，关押一年之后，刚恢复自由。他陪我参观佛子岭水库和正在施工的响洪甸水库，畅谈了分手后各自的经历。

第四次见面是 1958 年，我到三门峡出差，他刚调去任工程局副局长。他有哮喘老病，患肺气肿，仍力疾陪我到工地各处跑动，还艰难地同我一起爬上混凝土拌合高楼。这次他才比较详细谈了他在淮委挨整的一段经过。这种滥施专政手段，随意残酷整人，在吴觉身上的这一段往事，是早在 1955 年发生的，扼要记述如下，颇有史料价值。

1950 年秋天，浩大的治淮工程开始时，华东局调吴觉到安徽，担任治淮委员会秘书长和党委副书记，负责日常工作。由于党委书记比较主观武断，淮委的许多干部意见不少，淮河流域几省之间，也因此不甚协调。吴觉总是帮着劝说疏导，以求搞好团结，做好工作。开始倒也相安无事。可是好景不长，矛盾逐渐发

生和发展了。1952 年初秋的一次会议，这位党委书记组织了一些人对当时的淮委主任和工程部副部长大加责难，吴觉认为这些责难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就在另一次会议上作了公正说明。当会议材料整理上报时，这位负责人让人转告吴觉，要他修改发言记录，吴没有同意。果然，不久报复就来了。1953 年新三反运动中，就有当事者投书《人民日报》，说吴觉官僚主义，毫无群众观点，压低民工工资，造成工地紊乱……。这份材料是如此“典型”，正合乎新三反报道的需要。报社十分重视，派了记者到现场调查。不调查倒也罢了，一调查就发现原来情况完全弄颠倒了，会议记录和有关文电表明：吴觉多次主张提高民工工资，而总是遭到了那位负责人的拒绝！

1953 年夏天，在北京开治淮会议，涉及到淮委和水利部高层人事安排。会议期间，党委书记对吴忽然表示好感，似乎有封官许愿之意，且示意到上面谈谈（与他不合调的）某某的小话……。吴是一个刚直耿介的人，毅然拒绝了，说：“我一生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由此，矛盾越积越多。例如，按照“经费尽量用在工程上”的原则，没有在佛子岭水库上游建筑别墅式的招待所；关于洪泽湖拦洪蓄水的水位问题，中央批准了吴觉照顾苏皖两省的建议；华东局对淮委领导比较支持吴的意见等等，都招来对吴的怨恨之心。当时水利部领导有意将吴觉调出安徽，到黄河水利委员会工作，这位负责人先是认可，后来又坚不同意。到

1955 年 8 月，由于发生了对苏北抗日同盟会这个组织的一些诋毁和误传，终于一纸逮捕证突然放在吴觉的面前叫他签字了。逮捕的理由有两条：一是与淮委一位领导干部的关系问题，一是本人的历史问题。淮委那位领导干部告过党委书记的状，由于历史问题在受到审查（后来被打成“反革命集团”）；至于吴觉本

人的历史问题，华东局于五四年已作出结论。对于这两条理由，吴觉都不服，当即声明：他与淮委那位领导干部的关系尽人皆知，有目共睹，是正常的工作关系；至于本人历史，华东局已作过处理，此外再无可交代。可是事情并不这样简单，因为吴觉不仅从1930年起先后四次被捕，两次进反省院，而且在抗战前后同那么多国民党的上层人士有往来，亲属关系也极复杂，有的已跑到香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呢！

吴觉一被捕，他的亲戚朋友凡是可以逮捕的都逮捕到安徽来，强迫他们写“检举材料”。他的家遭到了搜查，妻子被捕后曾一度神经失常。家里雇用的一个保姆，也被逼着“检举”，几乎上吊。在淮委召开的有党内外干部参加的大会上，宣布吴觉是那位被审查干部的幕后指挥人，而且还是“大特务”。为了弄清楚自己的问题，吴觉写了几万字的材料，详细交代了自己一生的政治历史。例如前面提到的他曾经要我陪他去同国民党方面谈判这样的事都没有遗漏。虽然他在材料中提到了我，但是当年始终没有人向我调查过他的情况。现在想来，这大概是由于目的只是要打击吴觉，并不是真要全面查清吴的政治历史，所以有可能证明其历史功绩的人就都不去找了。充满杀机的是，要吴交代抗日战争初期他们搞武装斗争阶段的两桩历史悬案：一位上级派来的参谋长的失踪；淮阴县委书记被人暗杀。利用这样悬着多年的无头公案，文章是很好做的。吴觉不幸中的万幸是，正好这时候，这两宗悬案都在江苏破案了，找到了真凶。尤其荒唐的是，放在办公室用的收音机，被没收后诬为收发报机，造成一个“现行犯”的疑团，派出大批外调人员，跑遍大半个中国，以查证这个“现行特务”。后来由于实在找不出题目做文章，“大特务”无从证实，加以有中央同志过问，只好不了了之。到1956年

9月1日,即关押了整整一年之后,吴觉才获得自由。他从此杜门谢客,不与任何人往来,有人劝他到外地休养,也怕引起疑虑。我那次向淮委要干部,看来是华东局领导有意让吴觉出面接待的。当时吴没有同我细说这一段灾难。吴觉这样韬光养晦,倒也过了两年清静日子,到1958年7月,终于让他离开安徽,到三门峡工程局了。后来到1962年,吴觉应召到安徽申诉,那位负责人才完全承认这是一桩错案。

从1930年起,吴觉曾四次被捕,二次进反省院。第四次还几乎判了死刑。他在监狱受过酷刑,带过大镣,几乎瘐死。他在应付敌人时,也不是没有过错误,例如1933年第三次被捕,他承认了共青团员的身份。但应该看到更重要的事实是:大夏大学的一百多党团员和进步群众,没有一个因担任党支部书记的吴觉被捕而受到牵连。而且,这种错误吴觉从来没有隐瞒过。

他的儿子给我的信中说:"爸爸十分珍惜自己的政治生命。在'文革'关押的最困难日子中,他每天偷偷地记叙自己的历史,利用我们送饭探望的机会,一点一点地带出来,让我们子女了解他忠诚耿直的为人,了解他顽强战斗的一生。""几十年来,爸爸常同我们谈及您及您和他的相交的往事。今从他遗下的上百万字材料中,按各历史时期摘出一部分寄上,以便您了解爸爸的为人和他辛酸的一生。他曾向谭震林老伯保证过,几十年专案审查也证明了,他对党交代的真实性。"

在干部的历史审查中,如果审查者带有偏见,或不够实事求是,或情况过于复杂,许多问题往往就难以如实解决。经过二十多年的内查外调,直到1978年,吴觉的历史,才恢复了本来面目。他的入党时间从1932年算起,是直到他逝世之后,才由组织重新审议解决的。

吴觉的自述材料中有一个细节，在党的干部审查工作中，我认为很值得注意。这是1954年12月写的有关反省院中的一个看来很复杂的问题，摘录如下：

结论草稿最后引录“自新人评议语”中，有谓“吴觉非但积极反省，而且供出其他反省人情况，足证是彻底转变”。并谓我对此坚不承认。我第一次入反省院，是我第三次被捕以后的事，我以承认曾参加共青团不久即自动退出的托词，骗过特务的追讯，复经淞沪警备司令部军事法庭判处徒刑送反省院。在出反省院前，大夏支部曾有人来监狱看我。我在被捕之初，于敌人强暴胁迫利诱下，尚能坚不暴露组织供出同志，而反省院是执行感化机关，既无死亡威胁，又不审讯犯人，我又从未为其审讯，何能供出其他反省人的情况呢？若谓可能在敌人面前暴露了其他反省人的学习情况，其实反省人的学习，敌人了解最清楚，也不需要问反省人的，因为各个反省人的日记、作文、读书笔录，都直接交给敌人审阅，反省人之间是互不传阅的。院方对反省人管理极严，反省人之间不准交谈，反省人之间也是互不暴露思想与案情的。当时我在反省院第一组学习，与我长期同住一室的人，表现极坏，出院后即当特务去了，这种情况，也不需要我去谈。我在反省院时曾被人控告为不肯反省学习的。因此敌人的评语是不可置信的。根据我当时情况，不可能蹲满六个月期即释放的，敌人之所以能将我期满释放，主要是由于我的父亲通过他的学生邱有珍、周化鹏二人帮的忙。邱、周是国民党江苏省党部的委员、部长，曾情托反省院的思想考核主任王进珊，要王到期将我释放。在我出院前，王

进珊曾找我谈话，说院中很多人都反对放我，可是他仍设法决定放我，使我可以继续求学。我出院后曾与同出狱人薛味五(薛现仍参加革命)亲到王进珊家及周化鹏处表示谢意。十数年来，对这个情节，我已向党作了三次报告，苏北淮海区根据地初开辟时(一九四〇年)，我也曾与刘瑞龙同志谈起。据刘说，他是认识王进珊的，并说王过去是左倾分子。在我第一次出反省院后不久，王就为反省院院长逐出反省院。因此，敌人对释放我的"评议语"，固不能设想为敌人伪造档案，以准备二十年后的今天来陷害我，但是在旧社会内，反省院思想考核主任徇情伪造评语或欺瞒上峰的事，也是可能的。事实如此，绝非坚不承认，请组织上能详加查考，判其真伪。

吴觉一生的坎坷，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革命历史环境的复杂与党内斗争的复杂。在三十年代上海这样的地方同国民党的斗争中，在抗战初期国民党的腹地江苏建立根据地，一个共产党员如果没有一点所谓"江湖气"，即没有处理复杂的社会人事关系以及同狡猾凶残的敌人作斗争的一套本领，是办不成事情更成不了气候的；一个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如果没有座客来谈山海经，没有民主作风，不能容纳各种人才，听取各种意见，也是不可能成为一个好的领导的。这两种品质凝聚于吴觉一身。李一氓、曾直等同志，曾在艰苦斗争的环境同吴觉共过事，故体会极深，因而才有如此概括如此贴切的评价罢。

吴觉卒年七十二岁。我收到的讣告说："遵照吴觉同志遗愿和家属意见，决定丧事从简，不开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我没有同吴觉同志一起工作过。我这篇东西只是就与我有

关的回忆,以及他的儿子寄来的材料中稍作摘要(读这些材料时,我是很受感动的),草草写成,不过是有关吴觉的二三事而已。在二十多年的不断受到审查的过程中,吴觉为了申述自己革命的、战斗的一生,留下了成百万字的材料,我认为这些材料的史料价值,不只是属于吴觉个人的,而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革命斗争历史的复杂与残酷。我希望江苏党史研究的单位,能够将这些材料整理出版,这对现在的青年也有教育意义。

1985 年 4 月

附记

这篇文章的草稿曾寄与惠浴宇、管文蔚、金明、夏如爱、谢冰岩等同志,请他们审阅。

惠老回信说:"过去一般同志认为吴觉同志有'江湖气',其实是他海阔天空,谈笑风生,引人入胜;但对原则问题和大是大非是从不含糊的。知道的人固然不少,但毕竟不多不详。"

管老回信说:"吴觉是一位正派的好同志,他留下的史料,我们当与其家属商量后,加以整理,并争取出版。你的建议很好。"管老还在文中批注:"吴觉同志很重视统战工作,并很善于做统战工作。"

金明同志来同我作了一次长谈,回忆他 1939 年 5 月从山东南下淮海的种种情况,以印证吴觉当年的作为。他特别谈到抗战初期淮海地区斗争的特殊复杂和异常艰难,因为这是国民党严密统治过的腹地,又是平原、河网地带,韩德勤部有几万人,韩是反共专家,我军处于日伪顽夹击之中。在八路军、新四军主力南下、东进之前,吴觉等创建的这支地方抗日队伍,主要由当地的青年学生组成,秀才造反,孤悬敌后,能够坚持下来,是很不容易的。他们为苏北根据地的创建立了大功。他还谈到,

吴在晚年一直要求对他的一生有一个公正的评价。

谢冰岩、夏如爱两位虽然都在北京，但自从 1938 年在淮阴和 1952 年在湖南分别之后，就一直没再碰过面。这次他们约好一起来我家，同我详细谈了文章涉及的许多细节。他们正受命编写苏北抗日根据地创建的历史，带来了已经印出的总结资料。关于苏北抗日同盟会的问题，他们两人曾联名写过一个材料，因 1955 年和后来的十年动乱期间，对这个组织的历史和性质，有过严重的歪曲，对其中几个骨干成员有过不实之辞。他们向组织写的这个材料都一一予以澄清。关于吴觉和当年在苏北的有关活动，他们作了如下评价：

吴觉是一个感情浓郁、对人诚挚、非常健谈的人，“有他在场，满屋生风。”他尤其善于同各种人相处，善于同旧社会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他很好地利用了他的家庭关系和亲朋关系，当初主要活动是做上层统战工作。后来建军打仗，发展到淮河大队的这支队伍，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是进步青年，实际是一支干部队伍。我军主力到达之后，这个大队的成员大都转到县区当地方干部，也有少数留在部队。江苏省的好些负责人是这个大队出身的，在部队的有的现在已是军长了。这支队伍坚持淮海地区，同日伪顽浴血苦斗，从而使地方党组织得以顺利发展，保护了地方干部，而且将国民党大批区乡政权人员都争取过来了，使汉奸根本站不住脚。因此对苏北地区来说，吴觉同志是一位值得大家怀念的有功之臣。

吴觉去世后，他的家属为我寄来南京工学院的悼念专刊。最近又寄来治淮委员会去年出版的《治淮》（第四期）与《淮河志通讯》（第二期），其中有编辑部写的《人民治淮的先驱与功臣——吴觉》，有转载《安徽日报》上张祚荫写的文章：《杰出的才干，高尚的情操（忆吴觉同志在治淮战线上）》。所有纪念文章都称赞吴觉的才华出众，精明强干，品质高尚，有远见卓识，以及实事求是、平易近人、豁达大度的作风，颂扬他善于团结知识分子，尊重他们，信任他们。那篇编辑部的文章说，吴觉当年“要求所有党员干部都要同知识分子交朋友，尤其要同旧中国过来的老知识分子交朋友，并作为一项政治任务。他在淮委机关规定，有好房子要首先让

老知识分子和工程技术干部住，在生活上要尽可能地照顾他們，他经常找工程技术干部谈心，一起边吃饭边聊天。在工作上，他更是虚心地听取工程技术人员的意见和建议，碰到自己不懂的问题就真心诚意地向他们请教。他每次出差，都要带技术干部当自己的参谋。他提出要大力培养青年工程师、党员工程师。所以，当年参加治淮的成千上万名新老知识分子和工程技术人员，一致感到生活在党的怀抱的温暖，心情十分舒畅”。

吴觉的一生，反映了中国当代革命知识分子所走过的曲折道路，最主要的是他们没有在任何困难、任何逆境中屈服过。是的，吴觉是一个能干的人，一个才华出众的人，然而他生前有多么漫长的时间未能尽展其才呵！也许，吴觉在离开他所眷恋的这个人世时，心中有某种遗憾。这种遗憾让我们活着的人来消除吧。今天的中国要腾飞，最大的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现在还在呼喊这八个字，确实使人感到惭愧)；要唯才是用，人尽其才。我们一定要使每一个有才干的人离开这个人世时，不再有丝毫遗憾呵！

1985 年 4 月

怀郭子化

1938年1月，我从武汉到徐州，党的组织关系只带了湖北省青委书记杨学诚给王文彬的介绍信，说找到王就可找到地方关系。杨与王是北平学联时同在党组中负责的。王是丰县人，卢沟桥事变后就回到家乡，开展上层统战和群众工作。殊不知见到王后，才知道他的组织关系尚未转来，好在他同苏鲁豫皖特委书记郭子化已经有了工作联系，也认识在铜山县委负责的郭影秋。我为什么到徐州去呢？1937年11月在泰安时，由于我原是武汉大学的学生，受山东平津流亡同学会和省民先队部的委托，到武汉去募一笔钱和买一批书回山东，准备上山打游击。在武汉时泰安已失守，我只好先到徐州再说。这时王文彬同我一起见到郭子化，我向郭谈到我的情况，并将募到的一笔款子和书籍交他转山东，他要我先在徐州留下，待机再去山东。

当时徐州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是李宗仁，在坚持抗战与国共关系上比较开明，已经成立了一个半官方半群众性的民众总动员委员会，由李兼任主任委员，下设组织、宣传、战勤三个部，主要负责人都是比较开明的。郭子化以社会名流身份当委员，郭影秋任组织部总干事，掌握组织大权。郭子化是本地区邳县人，二十年代初徐州学生运动的领袖，大革命失败后，以行医、

开药铺作掩护，一直在苏鲁边一带坚持党的地下活动。1937 年初他到延安，参加苏区党代表会和白区工作会议后，回到徐州。通过地方的上层关系，就以延安回到地方抗战的共产党员身份，同李宗仁交谈过一次，从而取得合法身份和半公开活动的方便。他给我的印象，颇像个中产商人，留有胡子，身穿长袍，言谈温和。他的住处在城内北关的牙税局内，这个地方似是半公开活动场所。

1937 年 12 月我在武汉时，平津和各地流亡学生云集于此。武汉青年救国团刚成立不久，已是一个有很大影响的群众团体。这个团体的主要地方基础是“一二九”运动后的武汉秘密学联，原有成员约四百来人，我原是学联的负责人。因此到徐州后，我即同王文彬以及平津同学会、本地的青年积极分子一起酝酿，仿照武汉青年救国团的组织办法，成立第五战区青年救国团。由于苏鲁豫皖特委的支持，总动委会组织部的方便行事，我也见到过李宗仁，很快在 2 月初就成立了这个团体，成立大会还是在动委会的大礼堂开的。随即苏鲁豫皖边二十多个有党组织的县，都成立了分团。这样一个公开合法的青年组织，对地方群众抗战工作的开展自有很大便利。我主编团刊《救国青年》（四开周刊），写过一篇谈战区青年工作特点的文章，当时武汉出版的《战时青年》（由蒋南翔主编）曾予以转载。徐州这时是前方的南北通道，留驻的群众救亡组织和来往战时团体很多，流动的青年学生也很多，青救团一时成为活动的中心。台儿庄战役前后，许多民主人士来此，各大报的记者来采访，动委会举行扩大宣传周，演剧、歌咏、开大会等，有过一段高潮。国民党的特务虽加破坏，也没能起什么作用。

为了解决正式的组织关系，接到全国学联召开代表大会的

通知后，王文彬又从丰县来到徐州，同我商量，由我代表五战区青救团等青年组织，去参加大会。于是我于3月间再次来到武汉。开完大会后，长江局组织部开了关系介绍信，并让我带领十多个同志的关系信（多数是党员，有几个是从陕北公学出来的）到徐州，由特委分配工作。我现在记得的只有文立正（原名文立征）、郑琳和乔彬。文立征是我的好友，辅仁大学学生，由我介绍入党的，1945年2月在鲁南牺牲，他的坟墓在滕县烈士陵园。王文彬的组织关系，也由我带上。3月下旬回到徐州，当即到牙税局，向郭子化作了此行的报告。那时的关系介绍信都还是密写的，当时就交给秘书丛林显示原迹。这以后，王文彬即参加特委的工作，我仍暂留在青救团。我继续要求去山东复命。这时于学忠的五十一军等东北军部队，正在五战区作战。东北军中有党的组织，负责人项乃光（后被捕叛变）原是北平西城区区委书记，同王文彬有过组织关系。我到徐州时，为了便于开展工作，我也认识了项，并且同解沛然（解方，常住徐州的于学忠部上校联络官）发生组织联系。在徐州突围之前，东北军曾受命进入山东敌后。项找到王文彬和我，要求我们组织一支三四十人的进步青年队伍，到东北军做政治工作。这正符合我到山东去的要求。此事即由我负责，物色人选。当时特委的工作重心在准备苏鲁边敌后游击战争。王文彬要求东北军派一懂军事的干部作交换，于是派出张如到苏鲁豫皖特委做军事工作。

我同郭子化以后再没见过面，但这位“中产商人”的模样，始终留在我的记忆中。那是何等紧张战斗的年月，大家都想直接参加武装斗争，愿意为革命做出自己的一切。1988年在青岛消夏，恰恰同丛林同志在一个小食堂吃饭，过去五十年了，相互还认得。在话旧中，当然谈到郭子化老人，才得知他后来遇到的种

种不幸和不公平待遇。1990 年 10 月，丛林同志来北京，让我看 4 月间山东省委《关于撤销对郭子化同志处分为其恢复名誉的通知》，并交我一些有关史料，说徐州党史工委一再要我写一篇关于回忆郭子化的文章。可是，我只能写出上面这么一点有关他当年在徐州活动的背景材料。这是半个多世纪以前的事了，由此也可看到，郭子化当年以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鱼水相容的地方关系，利用徐州特殊有利的形势，老谋深算，掌握时机，以半公开的身份，在国民党几十万军队的前沿地区，成功地开展了党的各条战线的活动，这是很值得在党史上大书一笔的。

最后我还想借此机会交代一下个人的一种“命运”，回想起来，真是安危相易，生死为邻。当年我同王文彬处得很好，他很愿意和我一起工作下去的，特委似也有此种打算。可是，在徐州突围前夕，东北军又奉命不去山东而突围了。突围后，我辗转回到大后方。谁能料到呢，真是天有不测风云。1939 年的“湖西肃托事件”中，王文彬和张如都惨遭杀害。1941 年 2 月，我在延安看到中央《关于湖西边区锄奸错误的决定》，所列死难烈士的名单，第一名是王文彬，第二名是张如。当时他们分别任湖西区党委的统战部长、军事部长。看到丛林同志交给我的材料，才知道郭子化是七大代表，他到延安后为湖西冤案向中央作了详细汇报，才产生了中央的决定。我在延安抢救运动被审查时，关于在徐州一段的工作以及同王文彬的关系，组织上从来没有问过，想必同郭子化就在延安有关。丛林同志留下的他当年在徐州接受组织关系的名单中，有陕北公学的樊步霄、白坚、卢石流、于公等同志，都是在“湖西肃托事件”中被杀害的，他们可能都是那次同我一起坐铁罐车，从武汉到徐州向特委转关系的同志吧。

1991 年 1 月 20 日

一个在晚年大放光芒的人

——怀念刘澜波同志

去年11月，我从云南回来，听说澜波同志病势转危，捱了近一个月，才被允许进医院探望。他紧紧拉住我的手，声音虽然很弱，还是不停地谈着，而且有点兴奋。他的秘书告诉我，他梦中还念叨着水电，叫唤着我的名字。这以后到临终前，我还去探望过两次，他已经不能说话了，但还有眼神，似乎认得出是谁来了。看到这个只是靠现代医学维持着的战斗的生命，在一分一秒地接近死亡，明明知道这是无可避免的规律，可是站在病床前，总还是免不了无边的怅惘和沉重的悲哀。

澜波于我，是兄长，是忘年之交。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在一个工作岗位上，上下级，正副职，共事最久，相知也深。早在五十年代，就敢于相互谈点私房话，最后这三年多就更是经常交心，无话不谈了。

我是1952年调到燃料工业部主管水电工作的。澜波分工管电。那时水电还提不到日程上来。水电局不仅不是一个独立的事业单位，而且几乎被合并到火电总局去（总是有人轻视新生事物的）。老的水电技术骨干，全国不过几十人，最感困难的是只有一个地质工程师。1953年分配地质专业的大学毕业生时，在澜波主持的会议上，他主要考虑煤炭理所当然的需要，还不了

解地质是水电建设的要害，水电只分配到两个人，我愤而中途退席，表示强烈不满。他从来没有介意我这一无礼举动。

1954 年，黄河规划告一段落之后，我就动员澜波率领一个代表团去苏联参观电力工业。水电方面去的人最多，我任副团长。我们在苏联漫长的冬季中一共呆了四个月，在各地以参观水电为主。从此以后，关于我国水电的发展，我们两人的意见就完全一致了。在莫斯科的基辅旅馆，我们共居一室一个多月，白天已经很疲劳，晚上还常常谈到下半夜。谈的范围很广泛。1949 年毛主席赴苏之行的内情，我知道得多一些，他是当作新闻来听的。这时正逢苏联政局有变动，马林科夫改任电力部长，关于中苏关系等等问题就议论得比较深。在苏联这四个月的观光生活，我曾逐日记载一点什么在一个小本子上，其中大约记了一些在基辅旅馆中的夜谈。1964 年后，我在大别山中一个水电站当文化教员。“文化大革命”初期，这个小本子在北京旧居被水电部的“红卫兵”抄去了。1967 年 3、4 月间，他们两次到这个水电站来找我，要我“交代同刘澜波的关系”。关于我同澜波的关系，大概那时北京的知情者揭发了不少，我不得不写出详细的交代。1979 年重新工作以后，有关方面把我当年写的这些材料的存底全部退还给我，其中就有关于澜波的材料，这些材料——许多往事，现在是想不起来的。我就照当时原貌（只是有的词、句加了引号）节录如下，借此也可从一个侧面了解澜波的为人。

交代开始就写道，从 1952 年到 1959 年庐山会议为止，七年之中，我与澜波的关系是比较密切的。其原因，除开工作关系之外，我认为主要由于在思想感情上有某些相通之处，即“右倾情绪”的东西。我认为，他为人比较厚道，作风较民主，尤其不喜欢整人。因之，逐渐与他建立起一种讲一定的“知心话”、“私房话”

的关系。以下举了些例子：

访苏回国时，在飞机上，我深有感慨地同他谈到，希望以后不再搞大运动了，并谈到儒家的恕道问题。这实际上是怀疑群众运动，害怕阶级斗争的思想。刘虽没有多答言，也未反驳我的观点。

1956 年或 1957 年，一次同他从国务院开会后一起出来，因为会议谈到三峡问题，我狂妄地说："主席又不是圣人。"他当时虽责备我的自由主义、无组织观念，实质上只是怕我乱讲话的毛病捅出乱子，而并不是从思想认识上来作批评。他是一个很谨慎的人，从不乱讲话的，尤其在重要场合，更是如此。

1957 年反右派时，他对一些划为右派的人是表同情的。如对编译室的一个老俄文翻译，就特别表示过惋惜之意。前辽宁"反党集团"中成员，刘同他们都是老熟人，谈起来就叹息，很不以这种"斗争"为然："怎么观点不同，有点议论，就成了反党？"（他在东北老一辈同志中是一个中心人物，有人说他像一块磁铁样吸引人。）

1958、1959 两年"大跃进"时期，我认为刘对"三面红旗"的看法同我差不多。如 1958 年夏，上海华东区计划会议，对 1959 年指标大加码时，我在上海与刘通电话，很不赞成，说只有电力顶住了，他完全同意我的看法。我当时给毛主席写的一封信，寄给他看过。由于电力部未能跟上"大跃进"指标，毛主席一次见到刘时，曾半打趣地指着他说：就你没有出息。1958 年 12 月武昌会议后，大家去麻城参观（湖北"大跃进"的典型），看了一块棉花地和新盖的一个生产队的集体宿舍。他却跟我谈他的农家生活回忆，似是一个富裕农民的持家之道，思想感情上同当时公社化运动是格格不入的。一次司局长会，有人对公社化怀疑，刘一

言不发。关于当年计划不能落实，他向我说过这样的话："这好象吊着脖子走路，脚后跟不着地。"

庐山会议时，我们住在一栋宿舍，但不是一个小组。会议前期，刘少奇提出"成绩讲够，缺点也讲透"。大家对缺点还是津津乐道，"泄气思想与泼冷水现象"还是严重存在的。工交系统埋怨情绪最大，记得刘也发泄过这种埋怨情绪（原话已记不起）。对我当时来往的人和活动，刘是很清楚的。延安时期，刘在"柯老"领导的统战部工作，跟柯很熟。7月23日之前，柯等率领的"左派"很是活跃，刘很担心我卷入被攻击的靶子中。当时对于彭德怀的信有各种议论，"左派"认为彭的矛头是对着毛主席的。他和我一起估计形势的发展，问我的看法。我说，主席讲话，可能是"左、右"两边各打五十板子。我当时心情很沉重，还有点愤激的情绪。刘也表现得跟我一样心情沉重。会议初期，一次同工业各部长游山，大概是在植物园，大家谈到农村的一些困难情况时，我冒了一句，"中国的农民好"，意指要是在东欧，早闹事了。小组会上斗争我比较紧张时，刘特地告诉我，张霖之将这话告诉他，张并没有在小组会上揭发。这当然是明显的包庇。我写的交代材料也交刘看过，他为我出过主意，找薄一波帮忙，过关过得好一些，因为薄在主席前曾讲过我的好话。

以上，是我1967年写的交代材料的部分节录。从中可以看到，甚至所用的语言都带有浓厚的当年色彩，至少在写的时候是作"交代"，决不是那种常不免有点谀词的纪念文章。可是，就从这些交代材料中，岂不是可以清楚地看到澜波同志的风貌、品德、是非观念和原则精神吗？

这是无可非议的：在过去的年代，人们不得不学了许多"乖"，难免为自己涂上一点保护色，"逢人只说三分话"，甚至在

至亲好友面前，也不能不存点戒心。1979 年初回原电力部工作之后，同过去相比，我感到澜波似乎判若两人：那种遇事谨慎 为先，说话平和为上，乃至沉默以待的明哲保身味道，已一去不返，而换成了一个言谈容易愤激，喜怒形之于色，甚至“爱放放炮”，有点偏激的人了。当然，最根本的是，他比过去更关心党和国家的命运。他的外形已是一个面带病容的老人，然而精神却是一个心藏烈火的青年。他是中纪委的常委，在有关会议上，一些人们心照不宣，不便捅开之事，他往往无所顾忌，一针见血说出来，把会议讨论引向本质。他从复任电力部部长直到去世之前，三年间基本住在医院，病房是会客、看信、谈话、批阅文件、召集会议之所。他常常在深夜手捧文件，在沙发上入睡。1979 年来信多，部党组曾规定少送，终归无效，最后同秘书达成协议：每天最多看十封。这一年，他亲自批复的来信有一百几十封。每遇重要会议，总要拖着病躯同大家见面，讲短话或讲长话。1979 年后连着三年的三次全国电力会议，他都出席作报告，常常离开讲稿作即兴发挥，而这些讲话，反而是最为生动与深入人心的。由于严重的心脏病，他每次参加这样的大会必定缓缓走上二楼，在会议室稍事休息，同大家聊聊，然后再到会场去。他不愿意在会场上一千多人目光中是一个病夫，总是衣冠整齐，注意仪表，似乎还想显出精力不减当年。他非常关心群众生活，建议召开全国电力系统职工生活会。会议期间，一周内他参加了四次会，会场设在四楼，上楼当然极其吃力。

澜波历来重视知识分子。燃料部时期，他负责筹建了北京矿业学院和石油学院，他分工管电，最后才筹建电力学院。当时教学人才极端缺乏，他甚至找到北京市公安局长，从在押人员中寻求教书之人。“文化大革命”中，水电部所属许多学校、科研、

设计机构，特别是水电系统的一些骨干单位，被拆散、捣毁，资料烧光，人员下放，每一谈及，他真如切股挖心之痛，愤恨不已，乃至垂泪（他的女儿在十年浩劫中死去，他也没有这样动过感情，念念不忘）。听说承德电厂有一位五十年代清华毕业的“摘帽右派”，由于“没出过差错”，还在卖饭票，便特地请到北京面谈，亲自干预，调到电力学院任教。类似的事有过好几件。每次电力工作会议，他都要谈知识分子问题，认为普遍存在的情况仍是知识分子使用既不当也不够，重用更差，更谈不上让他们担任一、二、三把手。他不胜感叹地说：“不少工科大学毕业生是窝在那儿了，把他们‘风干了’”。有的单位虽然提拔技术干部当领导了，但他们的名次往往排得很后，实际上没有什么权，特别是没有“人”权，不过作作陪衬而已。甚至讨论重大技术问题，也不倾听他们的意见。很多领导只是使用他们，不同他们谈心，不做思想工作，不关心他们的生活疾苦，更不关心他们的入党要求。他认为把知识分子当“臭老九”的流毒仍在许多人的头脑中作怪，实际上还是唯成分论，什么“历史问题”，“社会关系”，“家庭出身”，“没有组织能力”，等等。他认为这些框框可以说是一种排斥知识分子的派性。他常常向地方来的同志说，不把具有各行各业专长的知识分子提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四化就无法实现。他常敦促领导干部努力学习业务，认为一个领导干部必须具备与自己职责相称的科技知识。当他知道电力系统有些领导干部连“周波”是什么也答不上来时，在 1980 年 2 月的全国电力工作会议上来了一次“突然袭击”：全体人员参加有关业务知识的考试，引起很大震动。所有的主要试题（大小问答五十一道），都是他亲自拟定的，为此熬夜到了两点。他还抽阅了部分答卷。在这次会议上，他语重心长地说：“这对重视学习会起点促进作

用。应该承认，我们的领导干部是非常缺乏管理现代化生产和建设的知识和经验的，我就是其中的一个。毛主席一再教导我们要变外行为内行，我到现在还称不上内行，对一些业务只是一知半解，我希望大家不要像我这样，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在工作的最后三年中，澜波同志紧紧抓住了干部问题，特别是调整好领导班子。他常在各种场合说：“三种人”和风派人物，决不能留在领导岗位上。他在1980年二月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事先送给耀邦同志看过，得到称赞，并批示：“这个讲话请送宋任穷同志一份，以便使中组部了解干部的一些动向。”澜波同志两年半以前所作报告中的下面这一段话，确实还值得我们深思：

> 特别值得警惕的是，在我们各级领导班子中，从思想到行动，还有没有极少数人一直到现在为止，跟党的路线、方针是对立的？这种人同对三中全会精神不理解的人是不一样的，是有原则区别的，不能把他们看成只是认识问题。
>
> 还有没有极少数人对我们党中央制定的一系列重大政策，如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平反冤假错案政策等，顽固地进行抵制，一直抵制到现在？
>
> 还有没有极少数人对我们的党纪国法，根本不放在眼里，他们胆大妄为，无法无天，甚至还在搞派性活动？
>
> 我看可能都会有的。当然，要认真深入调查研究后才能确定。这种人是不安定的因素，或者是潜在的不安定因素。对这种人我们决不要掉以轻心。你不敢碰他，他就要碰你。当然，我们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但决不能允许不改正错误。要给犯错误的人以改正错误的机会，但决不能允许继续重用那些坚持错误的人。我们必须分清是

非，赏罚分明。这件事，我有生之年，一定要一抓到底。因此我希望还能多活几年。

后来在一次会议上，听到有的同志谈到，对过去犯过错误的人不要过分计较，可采取“俱往矣”的方针时，澜波是很激愤的。他同我议论过这个极关重要的问题，提出某些名字：“对他们也俱往矣？”上述报告中，他还讲了这么一段话：

从一些人民来信和我所接触到的一些同志的谈话中，反映一些单位的领导成员中，还有打砸抢起家的，有闹派性的，有风派人物等，这些人还没有认识错误，更没有改正错误，甚至也没有作过公开的检查，这些人继续留在重要岗位上，同志们是不放心的，我也不放心。

在离开讲稿发挥时，他情绪很是激动，声音也颤动：“整顿领导班子这件事办不好，我死不瞑目！”

关于澜波主动要求退居二线，推荐李鹏同志为前电力部部长的事，是大家都熟悉的，曾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多次表扬，誉为“党内开明人士”，《人民日报》、《红旗》等都为此发表了评论文章，宣传这一范例。1954 年到苏联参观访问时，新中国最早一批留苏学水电的学生，正好毕业，他们参加了我们的观光队伍，李鹏就是其中的一个。澜波当时就是一个有心人，对他们的培养、爱护，几十年如一日，尤其对李鹏有更多的关注，使他熟悉水、火电生产的全部业务，从总工程师、厂长、党委书记到局长，一个一个台阶上来，最后作为接班人，完全符合中央提出的干部四化的标准。

这种同过去判若两人的敢作敢为，勇于提出和坚持自己的正确意见，还可举出不少事例。如必须加强电力工业的集中统一管理，澜波是坚持到底的。早在 1979 年 5 月 19 日，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题为《电力工业必须变落后为先行》的文章，其中七点方针之一就是这个问题。陈云同志认为这是一篇非常好的文章，接连读了两遍，让秘书给澜波写信说："坚持按文章的方针办，完全支持你。"在十年内乱中，全国电网的集中统一管理体制曾受到严重破坏。1979 年水利、电力两部分家之后，使这个问题的解决更增加了困难。为此，他不顾病情，向国务院领导和有关部委陈述意见，说明利害。

他向国务院领导写信说："丹江口水电站装机九十万千瓦，占鄂豫两省电力容量的五分之一，是华中电网的枢纽电站和唯一联结点，担负全网调峰、调频和事故紧急备用等重要任务，尤其事故处理是分秒必争的，因此电站的生产和调度必须由网局统一管理。""水电是电力工业的一个越来越重要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我已年老体衰，似不妨'清闲'，但此事有关国家电力事业的合理发展，不得不提出这个问题。对以上几个问题，我既不是争权，也不是争利，争的是一个'理'——为迅速实现四化的大道理。"随即国务院召开了有关这个问题的会议，澜波同志亲自出席，在会上慷慨陈词，据理力争，简直像一个少年气盛之人。

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召开之前一段很长的时间，我们之间的谈话，常涉及到各级领导如何进一步解放思想的问题，都深深感到二十多年来左倾思想为害之深之广。每谈及这些大局，他常愤慨不已。这种议论的结果是，他本着对党和国家，对子孙后代，也对国际共运负责的态度，给中央领导同志写了一封信，坦率地说明了自己的忧虑，以及不能不感到忧虑的原因。这个问

题，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上终于得到妥善的解决，使他得以心安。

他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常对身边的人表示，要把该做的事做完，该说的话说完。病势已经非常沉重，最后一次谈到工作时，声音已经微弱：

“水电要争，速度要争，核电也要争……”

澜波是今年3月5日15时最后停止呼吸的，我相信在最后时刻，他的逐渐衰微、逝去的思维和感情，必是极为安详的。近日我常想，我所见到的最后这三年的澜波，这光彩照人的澜波，才是他的本来面目吧。过去这光彩，是被过多的拘谨（也许还有一点韬晦）掩盖住了。有些不幸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就去世的老同志，也许终其一生也没能够完全显露出自己的光彩来。这是真正的不幸——个人的，更是历史的不幸。澜波能够在一生的晚年——最后三年显出自己的本色，总还要算是一件幸事。可惜的是，这时间太短了，就像一支燃得明亮的蜡烛，一瞬就成了灰烬。

三年中住在医院里，澜波是病房最“不守纪律”的人。许多同志特别是医务人员都曾劝他少看文件，少接待客人，少说话，最好不要出去开会。如果认真这样做了，我们的澜波同志也许还能参加党的十二次代表大会。我们可以埋怨澜波不懂得“少做就是多做，多做就是少做”的辩证法，这确实是许多年迈的同志应当汲取的教训；但这也是没有法子的，多年来不可能伸展的抱负与奔放的本性，一朝如愿，怎么又能顾及到哪一天要去见马克思呢！

1982年9月

怀　丁　玲

丁玲在我心中一直受到尊敬，是从中学时期开始的。1928年到1934年，我在长沙岳云中学读书。

大革命时期的长沙是轰轰烈烈的，我正读小学五年级，是班上童子团的小头头。蒋光赤的《少年漂泊者》、《鸭绿江上》，那时就读过。从此，就爱看左翼小说。大革命失败后，长沙很难买到左翼的书刊了，商务的《小说月报》倒是常看到的。记得是1931年，在《小说月报》上读到丁玲的《田家冲》，一下就吸引了我。这篇小说是从一个佃户家的女孩幺妹的眼睛，去看一个临时隐蔽在她家的革命者（东家的三小姐）的活动。在当年读过的进步小说中，这篇印象特深，大概也同自己的家庭出身有关。老家平江长寿街是老苏区，红白斗争极为尖锐，家乡不时传来这方面的信息。

1931年我随母亲去过老家一次，到过乡下佃户家，父亲的坟墓在那家附近。因之对丁玲笔下的三小组，有一种藏之内心的特殊感情，似乎她的血也在我身上流着。当然，这种革命意识是很朦胧的。我投身于革命，是“一二·九”运动开始的，但少年时就爱好左翼文艺，无疑有很大关系。1933年丁玲被捕之后，《良友》出版的《母亲》、《记丁玲》等，以及记载她的事迹的出版

物，我都是怀着关切的心情读过的。

1941年《解放日报》出刊后不久，我就调到报社。1942年改版之前，编辑部的分工是一、二、三、四版，一、二版是要闻与国际，三版是国内，四版上半截陕甘宁边区、下半截文艺副刊。我是国内版编辑，丁玲是文艺主编。我们同住在一排新打的土窑洞，大家都在几个新砌的烧地炕的大石窑洞中办公，每人一张小白木桌子。我最初值夜班，文艺版不值夜班，但大家天天见面，也有机会闲谈。我同丁玲谈起过读《田家冲》的印象，又都是湖南人，在湖南地下党活动时我去过常德，二十年代她也在岳云读过书。因此，共同的话题甚多。有一天晚上，我到她的窑洞中闲坐，谈得很晚。她详细谈了软禁在南京的情况，逃出来时得到当时在南京教书的方令孺的帮助。这次谈话，是我有意扯到这个题目。

丁玲在延安发表的作品，我都是及时读了的，有的内容很有同感。如《在医院中》这个短篇，写上海一个产科学校的毕业生陆萍，在离延安四十里地一个刚开办的医院里工作的经历，真实地反映了当时边区生活的一个侧面。对于要求把革命根据地写成黄金世界的观点来说，这篇小说当然不合胃口；但在延安生活过的人，不能不承认小说描写得相当真实，而且是充满着善意的。显然，作者是希望消除某些消极的和不健康的东西，才写这篇作品的。医院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主要的还不是战争环境和物资匮乏造成的，更多的是主观上的因素。小说中一些不合理的现象，今天也不能说完全消除了。例如，医院的院长是一个“在军队里工作很久，对医务完全是外行”的人。一个什么处长的妻子，只认识几十个字，“对工作既没有兴趣，也没有认识”，却可以安排在这里做技术性很强的护士工作。陆萍提出了一个发

人深省的问题:“革命既然是为广大的人类,为什么连最亲近的同志却这样缺少爱。”后来,比这篇作品遭到更为严重的一再批判的,是1942年的《三八节有感》那篇杂文。在这之前的1941年10月的文艺副刊上,还有过她的一篇《我们需要杂文》,其中有这样的话:“即使在进步的地方,有了初步的民主,然而这里更需要督促、监视。中国几千年来的根深蒂固的封建恶习,是不容易铲除的,而所谓进步的地方,又非从天而降,它与中国的旧社会是相连结着的。而我们却只说在这里是不宜于写杂文的,这里只应反映民主的生活,伟大的建设。”不是吗,这些话今天读来,也还有现实的意义。

我到《解放日报》之前,在中央青委工作。当时机关工作不甚紧张,知识分子干部聚在一起,年纪、经历差不太多,都有些少年气盛,曾在机关所在地的大砭沟口,立了一个大木牌,办过当年有名的杂文大墙报——《轻骑队》,直言不讳地批评一些认为是落后的或不顺眼的现象。我也是积极分子之一,最初几期写过文章。上述丁玲几篇文章留在记忆中,就是因为当时思想观点有相同之处。当然,整风运动开始之后,我们都检查了自己的“小资产阶级偏激思想。”《解放日报》文艺副刊闯了大祸的,是登了王实味的《野百合花》。近年话旧,丁玲还谈起过,发王实味的文章时,她已离开报社到了“文抗”(延安文艺界抗敌协会),住在乡下。这以后在延安,我们就没有再碰过面。

1948年初,我从热河调到东北局工作。丁玲前往苏联访问,经过哈尔滨,我们又见了面。她到我的住处坐了一阵,谈《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写作经过,原稿曾送与毛主席过目,还把当时东北刚出版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送了我一本。这本作者签名的初版本,1949年南下到湖南后,就被人借去了。这一别,就

是整整三十年！解放初我在湖南工作时，康濯同志曾持她的介绍信来找过我。1952 年我调到北京，改行到工业部门工作，五十年代在北京也没有见过面。1959 年以后，我 同她有着近似的命运。我们同时在北大荒呆过，同时在秦城呆过，不过彼此都无从知道罢了。

天回地转，到了 1979 年 3 月，有一个月时间，我与丁玲同住在医院，于是又能串门闲谈了。刚入医院，我是在脑神经科做检查时，突然遇见她的。白头相对，当然她的头发比我的白得多。令人安慰的是，她精神甚好，谈锋仍健。“屋破又逢连夜雨”，“文化大革命”初期她在北大荒吃的苦头，那些皮肉之刑，我还没有经历过，她居然活了过来，真是不易。我觉得这同陈明同志的长期照顾有关。他俩如“涸辙之鲋，相濡以沫”，被隔离时，也千方百计通点信息。没有这种精神与感情的支持，在这样漫长的“风雪人间”，古稀高龄恐怕是难以熬过来的。

在医院时，她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关于两个“反党集团”的决定尚未撤销，这是“毛主席批的”)，不免谈些不愉快的往事。她给我看了《新文学史料》上赵浩生写的一篇访问记，内中还涉及延安文艺界的所谓“宗派纠纷”。她认为这不利于安定团结，现在不应当再这样来回顾过去(在第四次文代会上，她总结文艺界几十年的经验教训，在讲话中曾着重提到宗派主义的危害)。出院后，在万寿路招待所，我遇见周扬同志，便谈到丁玲对这篇访问记的意见，建议他去看望她。后来丁玲告诉我，周扬到她家来了，可惜的是事先不知道，她不在家，没能相互畅怀一谈。在医院中以及后来多次闲谈，她跟我详细谈过她在左联时期的情形，包括同冯雪峰的交往，以及为什么文艺界因 1936 年的争论而形成如此长期的门户之见。谈起这些似乎是无法解开的历史

疙瘩，虽然我是局外人，但我觉得丁玲的态度是诚恳的。她也常谈自己遇事过于天真等等缺点。

1979年的下半年，我们都搬到同一幢公寓大楼，走几步路，上下电梯，就可以到彼此的家。来往的次数是记不清的，闲谈的内容很广泛，总是在晚上，有时谈得很晚，来我家必与陈明一起。有时也相互送些土特产，或是出差带回的，或是别人馈赠的。有一回同海婴来，请海婴为我们拍了好多张照片。他俩同我的老伴也很熟了，我家老阿姨也最关心丁大姐的身体。

有一次谈到1936年到保安时的情况，她说，那时同志间都很亲热，无甚拘束，谈话随便得很。她谈到对边区的观感：像个小朝廷，说林老就是财政大臣。毛主席对这个说法很感兴趣。过去不知道毛主席赠给她的那首《临江仙》词，这次谈话才知其详，她当时在红军中有个军职。词中说的："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可见当时毛主席和中央同志对丁玲的到来，是何等高兴；毛主席的欢愉之情是溢于言表的。丁玲不无感慨地说，这首词的手迹是由胡风保存下来的。由此谈到过去同胡风并不认识，胡风在重庆办《七月》，才有了交往，她的稿费，胡风设法寄给她在湘西的母亲。

有一次话题从平生得罪的人谈起。她说，这只怨自己马虎大意，"也不会做人"。于是谈到江青结婚请吃饭之事。当时她听说女儿生了病，心里急得很，好不容易借到一匹马，就赶着到安塞保育院去了，而没有去赴宴。其实，脑子多转一下，安塞完全可以晚一天去。这样就可以免去引起的误会：被认为敬谢宴请，是对于婚事的态度。这大概是结怨江青之始。《三八节有感》中写的："而有着保姆的女同志，每一星期可以有一天最卫生的交际舞"，当年就传说是讽刺江青的。关于不会做人之事，谈

过不止这一例，她的感慨甚多。

在我同丁玲的接触中，感触最深的是她对党的一往情深。二十年代，她曾经在上海平民女子学校、上海大学念过书，同李达、瞿秋白等有很深的关系，但那时她并没有入党。她入党是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 1932 年，是在胡也频牺牲之后不久，就同战场上拿过阵亡同伴手中的枪继续战斗一样，这是怎样的悲壮和勇敢。不论是敌人的幽禁，还是自己同志的委屈（长达二十多年呵），都没有动摇她对党的信赖与深情。这从她 1979 年回到文坛后写的文章看得出来。1982 年，她访美回来，来过我家两次，谈美国见闻，美的与丑的，赞扬与厌恶。第二次同江丰一起来，谈到美国某些人对她的“失望”。过去有人对她的出国是有戒心的，还设过障碍。这次令人担心的美国之行，她说，也算是不辱使命吧。她还同我谈过，当听到中央领导同志在报告中讲到，右派不能留在党内时，她哭了一上午。下午，见到一位同志，对她说：“今后不能以同志相称，你有什么感想？”这真是向伤口上撒盐。她说，这些创伤多年来埋在心里，很少同人谈过。近年的接触中，我深深感到，毫无矫柔造作，对党一往情深，这才是丁玲同志一生最基本的方面。

在丁玲的家中，前后看到过几幅她的油画像。最早看到的一幅半身像，背景为北大荒的冬天：千树梨花，神态极其安详。我深知北大荒的冬天，曾为此像写过一首七绝相赠：

北大荒人十二冬，惯于雪夜白毛风。
三千白发何须问，掬出心肝依样红。

这首诗也可作为我上面这段话的一个补充。

1984年8月1日，中央组织部发出了为丁玲同志彻底恢复名誉的通知。这个通知经过一年多的调查落实，几次慎重讨论，最后由中央批准。通知高度评价了她为党做的工作，赞扬她是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是的，比起她半个多世纪对党的执着的爱，即使她有过什么过失，又何足计较呢。党给她彻底恢复名誉，推倒一切强加在她身上的不实之词，她是很感激的。她觉得从此她可以不再受到那些若明若暗的歧视了，那些嘁嘁喳喳的非议也可望消除。她同我谈过，有位美籍华人女作家想写她的评传，有人竟认为：作品可以介绍，评传可难写。收到这个通知后，她对陈明说：我可以死而瞑目了。她曾经想给中央写一封感激信，底稿给我看过，信中充满了激情，表示要在余生中为党作更多的工作。后来也许是认为实际行动比言词更加重要，这封信没有发出。

1984年10月，丁玲八十寿辰时，我书赠了一首七律：

多情湘女总多愁，风雨华年苦索求。
处子文章惊海内，平生抱负蕴心头。
纹身刺面寻常事，雪地冰原孺子牛。
笔底波澜随老壮，晚晴无限耀高丘。

这首诗，最初得七、八两句。这也是几年来我们的交谈中，我常常提到的一个题目：希望她在晚年集中余力，多写一些东西，尤其是回忆录。可是在生命的最后日子，她却以一种只有年轻人才有的狂热着手创刊《中国》文学杂志的工作。那时她住在医院里，就整天想这件事，找人到病房里来商量，邀哪些人来合作，刊物的名称、刊期、篇幅，等等。自己出面写信、拜访，请求有

关同志支持。我总觉得像办刊物这样繁重的工作，决不是一个八十老妪能够担当的了，她主编《北斗》，那是五十年前的事情。因此，我对这件事是持观望态度的，认为与其办刊物，还不如利用这最后有限的时间和精力，自己多写作一些。也真是有志者事竟成，只不过几个月的筹备，这个大型刊物就问世了。

1984 年 11 月，她邀请我参加了在新侨饭店举行的《中国》文学杂志创刊招待会，还“强迫”我这个文学界以外的人讲了几句话。我只讲了一个意思，请作家们特别关心经济，发展生产力是我们的根本国策，写我们民族第三次腾飞经济生活中的新事物。

据我理解，丁玲最后以自己的全部热情和精力来办《中国》杂志，也是她一贯爱护青年人的最后一次表现吧。1985 年第一期即创刊号，发表了她自己写的报告文学《一代天骄》，记北京市集体企业的先进人物：京海计算机机房装备公司经理王晓晖，这是团中央向她推荐的一个二十四岁的年轻人（她还介绍这位青年到我家来谈过。）这个刊物重视发表知名或不甚知名的青年作者的作品，包括一些“有争议的”青年作者的作品，也可说明我的这个理解。就我知道得不多的情况来说，她近年曾帮助过一些青年作家、艺术家，还有一些与文艺无缘的青年人。她给他们看稿，作序，送书，帮助解决工作问题和调动问题，直到予以资助，这些，都是很感动人的。对有些青年作家乃至有了名望的中青年作家的作品，她看到的缺点，也是直言不讳的。她不止一次同我谈过现在某些年轻的作家和刊物编辑之间的不正之风，互相交换发表作品，她说，这种走后门会坑害一代青年。

在作协四次大会上，中央领导同志谈了创作自由问题之后，1985 年春，丁玲在西安向记者讲到文艺界的一些敏感问题，中

央领导同志认为她讲得好，不愧是一位革命的老作家，号召青年作家向她学习。她说，作家要正确理解创作自由，正确理解党的号召同行政干预是不同的。近年新人新作的涌现，说明党对文艺界没有太多的行政干预。违反文艺创作规律的行政干预，确实非摒弃不可。她说，党号召作家走向生活，反映时代，反映群众干四化、搞改革的崇高思想。但作家自己思想不解放，也不可能有真正的创作自由。只有真正了解社会，了解生活，真正掌握了时代脉搏、客观世界的本质，既懂政策，又善分析，那才能如鱼得水，无往不胜，在创作的天地里自由驰骋。她还说，创作一定要百家争鸣。创作要自由，评论也要自由，允许批评和反批评。

今年春节前不久，我老伴去医院看望丁玲后，回来对我说，精神很不好了，自己说懒得动，什么都不想动。2 月 18 日我赶到医院去时，她已住进急救室，人已入昏迷状态。陈明详谈了春节前后病情的变化，她自己知道将不久于人世，除夕告诉家人：我将成佛。广播中听到她逝世的消息时，我正在南方出差。对于一个年过八十、饱经摧折而又患有多种疾病的人来说，这并不使我感到突然。我同丁玲相识四十五年，近年又过从甚密，对于她的离去，家中失去这样一位能随便闲谈的长者和朋友，我不能不感到深切的悲哀。3 月 15 日，我同我的老伴到八宝山向她告别，看到拥挤着的人群，一个个忧戚的面容，挂满灵堂内外的挽辞，特别是看到北大荒人送的覆盖在遗体上的“丁玲不死”的红幛，心中似乎代死者感到一种宽慰。

一个人的生命，无论怎样长寿，总是有尽的，而一个作家的生命却长存于他的作品之中。在这个意义上，丁玲并没有离开人间，她还将通过她的作品在今后的世代中发挥作用。说起她的作品，我有一个感觉，如同江河一泻千里，就不免泥沙俱下，而

不能像山泉那么纯净。她的创作，常常是充满着昂扬的激情，文思泉涌，奔赴毫端，也就不暇字雕句琢了，因此偶有使人感到不够整饬之处。记得 1981 年我收到她的《生活、创作、时代灵魂》（她近年出版的所有作品包括六卷本《文集》都送我的），看到一两篇文章中有语法不妥之处，我竟到她家中当面指出过。其实这也不足为病。似乎在一本巴尔扎克的传记上看到过，巴尔扎克也有类似的情况，大概他的法文也有不甚考究之处，可是这决不妨碍巴尔扎克的作品成为文学世界的瑰宝。古诗所谓“天然去雕饰”，鲁迅诗说的“扫除腻粉呈风骨”，大约就是这种境 界吧。那种缺乏思想与激情，而徒事雕琢、刻意求工的诗文，是不可能传世的。

丁玲是走进历史里去了。她留下的，不仅有几百万字的著作（有的遗作还待整理出版），六十年的文学活动，还有她的思想演变的道路，从一个旧中国感到徬徨苦闷的知识青年变成一个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二十多年纹身刺面、受尽磨难而不变初衷、痴情如故，这都有典范的意义。我深信必将有更多的人研究她的作品和生平，必将有人为她写出传记的。因为，这是时代的需要。

这篇文章写完之后，我又习惯地来到丁玲的家中，又到了她住的房间，这间工作室兼卧室被陈明收拾得更加整洁，只是增加了一幅大型照片。丁玲同志，我的尊敬的朋友，你仍然同我们住在这一幢楼，我并没有感觉你已经离我们而去。

1986 年 4 月下旬

最后一天的书案
——哭黎澍

11 月 29 日下午，接到王元化同志从上海打来的电话，要我向黎澍同志催纪念五四的文章，《新启蒙》丛刊等着用，又问到他的身体情况。我说，最近我们共同参加过几次活动，他身体还好，可以放心。我还来不及转告，便接到徐滨夫人的电话，声音恐怖：黎澍摔倒，一大滩血，快来！ 我让老伴急告附近医院的医生，即赶到邻楼黎的家中。面前的情景叫我几乎惊呆：黎澍仰面直躺在卧室与客厅门中间，头下淌的血可以用盆盛，徐滨正用两只血手托着他的头，人还清醒。医生来做心电图时，急救车也来了，送到协和医院。经检查，脑侧后有裂开伤口，医生判断摔倒的原因并非滑步，而是晕眩所致。1983 年 11 月，因受到不应受的刺激，他曾心肌梗塞，好不容易抢救过来。这次全身动脉硬化，肺、肾与心脏诸病并发，终于不起，于 12 月 9 日下午 2 点 25 分长逝。发病的直接原因我很清楚，即近日来血压升高，不以为意，仍持久伏案，赶写文章，从书桌边站起来，不过走了两三步，就猝然倒下。进医院第三天，即入急救室 ，人已完全昏迷。

12 月 6 日晚，我与老伴怀着无法言传的痛苦心情，同徐滨商谈后事。我才再次走进他的卧室兼书房。这是近几年来成为邻居后，我们无数次高谈阔论的地方。这十年间，不论感到欢欣

或抑郁，我们都是共享的。我总坐在小沙发上，他坐在桌旁的转椅上。地面上的血迹已经清洗干净了，单人床上的薄被没有叠折，就像他的主人刚刚起床还没有来得及收拾。我先让他的女婿居高临下将书桌拍了照。然后，就来清理我的半个世纪的至友，一代思想家和史学家，在这个多难的人世的最后一天，他在做些什么——是什么使这颗无比智慧的头脑最后失去知觉的。

他的书桌并不大。正像许多辛勤的著作家一样，桌面上总有些零乱，靠墙角的边沿放着一些书报和稿子。正对着坐位的桌面中央，摆着一篇正在写的稿子：《新文化与传统文化——纪念五四七十周年》。右手边是 11 月 28 日的《人民日报》，露在上面的是王元化的《论传统与反传统》这篇文章。这是元化在他自己主编的《新启蒙》丛刊第一辑发表的论文《为五四精神一辩》的一部分。沙发旁的茶几上，就摆着这一本薄薄的新出版的书。从旁边的一大叠稿子中，可以看出这至少是第三稿。第一稿的标题是《新文化与旧传统》，用八开稿纸写了四页，没有写下去了。第二稿的标题原来也是这样，写好之后，圈去了“旧”字，末尾添上“文化”二字，添写的字明显小些。这一稿只发现写满的三页，第三稿也就是正在写的这一稿，还只写了六页半，即不到四千字。第一节的小标题，在第一稿上最初写的是“五四运动一词的历史内含”，涂改为“五四运动的打破传统的历史意义”。第二稿上，在“历史意义”前面加了“伟大”二字。在正在写的这一稿上，只是“五四运动的历史作用”了，这一节写满了三页。稿子旁边有一张小纸片，上面写了五个小题目，是：“1. 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2. 传统在近代中国发展中的作用问题；3. 体用问题；4. 吸收与消化问题；5. 革命与建设问题，革命非暴力论。”看来，这是这一篇未能完稿的论五四运动的大文章的大纲。可以看出，

他是在按照这个计划写下去。在第四页的开头写了“传统在近代中国发展中的作用”这样一个小标题，但不知为什么又划掉了。可以注意的是，在桌上，另有三份标题为《传统在近代中国发展中的作用》的未完手稿，或一页，或二页，或三页。现在已经很难猜测，作者是否有意将它发展为一篇独立的论文。在这第三稿上，“中西文化的作用问题”这一节已经写了一部分，看来还没有写完。

除了这一篇，他似乎同时在写另一篇大文章，至少写过四稿。第一稿的标题，原来写的是《同光新政：封建中国变革的开端》，涂改为《论清末自强新政为封建中国变革的开端》。第二稿标题改为《清末新政：封建中国变革的开端》。第三稿更将标题中的“开端”改为“开始”，并加上“（洋务，还是新政？）”这样一个副题，或一页，或三页，或四页。所有这几稿都作了多处添改，最后一稿还只写了一页半，誊抄得很清爽，只在开头处有少许改动，还没有标上题目。

似乎他还在计划写另一篇大文章：《论全盘西化》。在一封信稿的反面写了此文的简单提纲。提纲的右上角有两行小字：“电话耿云志问胡适此文”和“借联共党史”。桌子旁边放着耿云志的《胡适研究论稿》，打开在第一百五十六页。我拿起来，在这一页上看到“那么，胡适关于西化的主张究竟是怎样的呢？”一段，耿云志这本书的旁边，还有一本《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和一本《英华大辞典》。

从桌上，还可以看到他不久前完成的一项工作：应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之约，为他们要出的“学术精华”丛书编了一个自选集。誊抄清楚的序言和包括四十二篇文章的目录都摆在那里。序言只有二百多字，道出了作者多么沉重的心曲：“解放以来，政

治运动频繁，动辄卷入旋涡，不但与学术无关，甚至连政治也只剩了捕风捉影的空谈。比较起来，可以认为发表了一些颇具独立思考、并非人云亦云的文章，还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选文即以此为范围，旧作除个别外，不入选。”

桌上还有许多大大小小的纸片。一些是他常用的三十二开的便笺纸，一些是半张或四分之一张的稿纸上面写了或多或少的话。有些显然是准备插入正在写的文章中去的。看来他是把思维着的东西，即人们惯称的思想的闪光，随时捕捉下来。我觉得，有些意见是极其深刻的。例如：

封建王朝总是因有一个英明的或者坚强的领导和团结的军事集团而兴起，以世袭君主制度而衰亡。

欲求社会进步，必须敢于打破传统，还必须善于利用传统，才能推动进步。但利用传统还必须预防为传统所利用。

利用传统与屈服于传统。利用传统往往可以使革新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是传统的利用也意味着与旧势力的妥协，放弃反对它们的斗争，延缓某些改革的进程。如果延缓改革渐变而为放弃改革，那就与旧势力合而为一了。

我们过去以为只要宣布革命的胜利，理想也就随之实现。错了。革命的胜利意味着敌人已被打倒，理想未必因敌人被打倒而实现。理想能够实现，还有一个实践检验的漫长过程。不到这个过程结束，不会有终极的结论。过早的欢呼声，无非说明我们全是易受欺蒙的群氓而已。

现在设想未来的道德观念，往往是不实际的。恩格斯认为公有制将使偷盗的动机归于消灭。列宁提倡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我们所见所闻的所谓“共产主义道德”，往往不过是过去的回音，并非未来的理想。

抄录这些片语断想时，就使我想到我的这位使许多人(包括钱默存先生这样的学者)尊敬的朋友，我们之间近年来的上下古今、纵横世界的无数次漫谈，从暴力论，阶级斗争论，“左”倾思潮的历史根源，封建恶俗为何至今仍到处再现，直到电视剧《家、春、秋》似乎是《红楼梦》的近代版，无所不谈。可惜没有录音，没有记下来。

这十天来，时刻萦怀的，无比痛苦的，就是我就要失去这位朋友，是我所认识的人和我的朋友中，最为信服的真正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他不仅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读得熟，想得深，而且能够在一般人不假思索就接受了的地方提出问题来。十一月十七日，他把刚刚出版的新著《论历史的创造及其他》签名送我(稍觉宽慰的是，这本他生前出版的最后著作是我题签的)。虽只薄薄一小册，却处处可见他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贡献。书中有这样意思的话：必须有马克思主义最基本原理的根据，才可以说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他不同意那种随意把自己的什么意见，都称为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那种狂妄态度。作为一个严肃的勇敢的学者，他对“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这两个似乎是绝对正确的命题，提出空前的质疑，他认为无论从古代到现代的历史实际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有关论述，都可以证明这两个命题不恰当，很难说得通，而提出自己独到的看法。前人论治史要有学、识、才，黎澍是兼而有之的。

去年他七十五岁寿辰，我书赠了一首七律：

说古谈今五十年，相思尤在史无前。
羽毛羞照风幡转，轩冕从来敝屣看。

一卷文章惊海内，三番思考问先贤。
笔头犀利因忠谔，梅老花香自苦寒。

写这首诗时，我是多么希望他能多活十年、五年也好呵！黎澍常说，认识的正确性只能是暂时的，相对的，穷究其真理，永远是不可能的。然而他终于为了重新思考，探索真理，猝然战死在他的书桌前了。看到这张书案最后一天的模样，我们这些后死者，这些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包括我们这些年过古稀的人，应该用怎样的努力来填补他留下的空缺呢？

1988 年 12 月 9 日深夜

附

我们的悼念

我们敬重的朋友黎澍同志，于 1988 年 12 月 9 日与世长辞了。他是 11 月 29 日在长时间伏案写作之后，突然摔倒，送进协和医院。经过十天抢救，终于不治。

他的书桌上放着他未写完的纪念“五四”七十周年的长文和其他遗稿。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还在关怀着民族的命运，思索着新文化与传统文化等等问题。

我们得知这个噩耗，感到十分突然和极为悲痛。过去他身体一直还好。只是在 1983 年那个严冬时刻，发作过一次严重的心肌梗塞，体质从此日渐衰弱。然而病后他仍以过人的精力写出一篇又一篇充满新意的力作。最近一个时期，他频繁参加各种学术活动，言简意赅地发表自己的独到见解。在纪念戊戌变法九十周年的座谈会和现代化理论研讨会上，他的发言就给人以很大启发。他率先提出纠正长时间流行的“左”的观点，给清末维新运动应有的评价。我们本来期待他会写出更多更好的

文章，可惜他那睿智的大脑却要永远休息了。

黎澍是1936年入党的老共产党员。1949年以前，他在国民党统治区长期从事新闻和杂志编辑工作。在艰险的环境中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同时他开始研究中国近代历史。他把对历史的思考和对现实的思考统一起来。1948年出版的第一本史学著作《辛亥革命与袁世凯》（解放后修订改题《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政治》），对启发读者认识国民党政权起了良好的作用。

黎澍长期在白色恐怖下经受了严峻的考验，然而更大的考验却是在革命胜利之后。不需要“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仅仅是自身地位的变化，就足以使许多革命过来的人发生变化了，把“坐江山”视为自己当然的权利，黎澍曾经引用孟子说的“居移气，养移体”来描写这样的人。某些知识分子党员也崇拜权力甚于信仰真理。黎澍在革命胜利之后，却从未改变初衷，并不考虑自己要在新政权中占一个什么位置。他一直把自己看成一个老百姓。他几十年如一日珍视自己人格的独立和尊严，不肯随波逐流，更不屑趋炎附势。正是这样蔑视权势的态度，使他在学术研究中敢于独立思考，敢于向权威挑战。他的高尚的人格力量，是他丰硕的学术成果的重要支柱。作为一个有正义感和使命感的学者，黎澍用他严谨治学的实践，实现着对真理的执着追求。他文如其人，不写空洞的应景文章，每有所作都言之有物而又朴实晓畅，使读者感到作者的亲切和真诚。他写文章总是仔细推敲，反复修改，虚心同朋友商量，决不把自己还感到不成熟的东西拿出来。

“文革”以前，黎澍早已是享有盛誉的历史学家，但他最关心的还是现实问题。例如1964年为反对压抑青年、鼓励青年勇于创新的《让青春放出光辉》一文，由于切中时弊，而受到有组织的批判，时间证明了他是对的。他思想上最光辉的时期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这十年。他积极反对两个“凡是”，鼓吹思想解放，努力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在此基础上，他检讨了自己过去某些观点的错误。在1979年的理论务虚会上，他大胆提出：新民主主义阶段结束得太早了。当时语惊四座，还

引起了某些人的不快;今天这已是大部分人的共识了。那时由他主编的《历史研究》杂志,经常突破"左"的框框,提出新的问题、新的观点,对理论战线拨乱反正起了重要作用,受到广大读者欢迎。他的重要论文《中国社会科学三十年》,深刻总结了社会科学领域"左"的教训,从理论高度反对了两个"凡是"。可是,正是这些卓越的贡献引起了某些权威人物的反感,说是缺乏"学术性",这倒从反面说明黎澍是战斗的学者。

黎澍第一个论证了"四人帮"实行的是封建专制主义。他认为中国反封建的历史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而这正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重要障碍。他多次大声疾呼要反对封建主义。他不赞成把"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任务放在反封建之上,也不赞成对资产阶级的东西一概排斥,书桌上还摆着《论全盘西化》的提纲。在思考中国历史问题的时候,他不赞成过高评价农民战争的作用;对于被称为洋务运动的清末新政,他认为应该重新评价。这些都表现出他不盲从权威的独立思考精神。

1983年曾导致心肌梗塞的刺激,并没有使黎澍退缩,他依然不断提出新的观点来。1984年他对教科书中所谓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提出了异议,用充分的论据指出这一命题站不住脚。人们对这个问题还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但在黎澍的文章之后,一个严肃的学者再不能像过去那样习焉不察地对待教科书中的阐述了。

作为一个历史学家,黎澍用他的笔写下了许多近代人物的历史;作为一个人,黎澍用他的言行写下了他自己的历史。他不只是一个勇敢的敢于独立思考的学者,也是一个勇敢的敢于坚持真理的人。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他对蒙冤挨整的人毫无歧视之心,依旧坦诚相待,他还曾经因为竭力保护了"右派",而使自己受到严重的牵连。他的这种行为应当使那些为了保护自己而不惜牺牲别人的人感到惭愧。

黎澍同志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淡泊明志,宁静致远。他不止一次表示过身后不要有任何纪念活动,不要进八宝山。他的精神遗产为他树立了不朽的碑铭。我们写此纪念短文,也并不是为了他,而是为了我们自己。

永别了，亲爱的朋友和同志！

于光远、王元化、王若水、王惠德、戈扬、朱正、李锐、李普、李洪林、李慎之、胡绩伟、秦川。

1988年12月18日

记甘祖昌将军

1973 年到 1975 年，由于有了笔墨纸张的代替物，在秦城监狱学做旧诗的兴趣越来越浓，几乎从不间断。常常取材于报纸上的新闻和通讯，绝句一天可做几首，几十句的长歌几天就可以哼成。绝律如胰岛素、马铃薯种、登珠穆朗玛峰、南京大桥、西藏山崩、西贡解放、收复金边、赤脚医生、上山下乡等等；长歌如林县谣、沙石峪谣、太行愚公谣等，还有一篇五言六十四句的《甘祖昌》。但 1980 年编《龙胆紫集》时，这一类短句、长歌都没有收进去。其原因主要是觉得缺乏诗意，不过是将散文变成韵句而已。或者当时还有别的顾虑，如上百句的《林县谣》，记林县十年苦战，惊天动地，修成“红旗渠”之事，听说该项工程的规划不无问题，就删去了。

去年 4 月 2 日报载，八十一岁高龄的甘祖昌将军于 3 月 28 日在家乡江西莲花县去世，心中不免一动，想起哼这首长歌时深受感动的心情来。当然，那时久在缧绁，也还有一种羡慕之情：老红军回到故乡，能自由自在地过劳动生活，是多么好呵！甘祖昌在战争年代，颅脑曾两次负伤，1951 年任新疆军区后勤部长时，又因车祸留下严重的脑震荡后遗症，难以坚持工作。1957 年回江西老家时，他只有五十二岁，医生认为他应争取活到六十

岁，这就是说，他只能活七、八年了。将军能战胜医学常规，多活了二十来年，更为退休老干部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我以为主要可归结为两条：一是他的胸怀宽广，只计较大我——国家公益，而不计较小我——一己私利。将军决计返乡务农时，国家还没有退休制度，他认为自己既然不能正常工作，便执意要求退位，重新当一个自食其力的农民。回到家乡后，他不要特殊照顾，盖房派车，一概谢绝，平时还医药费自理。七十岁以前，十八年乡居中的种种感人事迹，“俸钱充公益，家属忌铺张”；“朝夕教儿女，艰苦事农桑”；“能文又能武，新型田舍郎”等等，长歌中记得很详细。如此宽广胸怀，自然不生烦恼，有益于身心健康。二是生活规律，适当劳动，“能治百病”。将军七十五岁以前，坚持下地干活；七十五岁以后，除看书读报外，种菜除草，扫地喂鸡，也从不间断。他从来也不吃什么补品和营养药物，七十岁以后还戒了烟酒。农村的生活环境，新鲜的空气和菜蔬，自然也都是有益健康的。

将军刚回到家乡时，长歌中没有说到的事情，有的还值得补叙。如他一回到家，人们就议论开了：“不当个省长，总得当个县长”；根本不相信“放着官不做，回来晒黄日头，吃苦”。他一到家，就在家边的一座坟山开荒，向自古抛荒的红土壤要粮、要菜。过路人看见就说：“祖昌叔打仗我是不懂，讲生产，红土种不出东西。”长征路过云南时，甘祖昌曾看见红土长过南瓜。他挖一尺多深泥肉，1958年就收了南瓜、红薯和豆子各几百斤。最初因身体不行，一天挖一小块，手上起了血泡，用布包扎一下，头发晕就歇一歇。这样挖了三年，锄头断了十把，挖一块下足一块用杂草沤的粪肥。到1960年，在这座坟山开出四亩地，种果树三百六十棵，这年收南瓜、冬瓜五千多斤，红薯二千多斤，引进了东

北、云南、湖南、山东、福建等地寄来的良种。有了这四亩地，他一家二十三口人的杂粮和菜蔬就不愁了。

1960年底，北京各报有过一次宣传甘祖昌“将军当农民”的高潮。谢(觉哉)老以此为题写过一首白话诗，其中说道：“历史上做武官的回归故里/叫“解甲归田”/做文官的回归故里/叫“解祖归田”/他们所谓“归田”/只是置田添产剥削农民/今天的将军，则是戴月披星，同农民一样地耕耘劳动/将军本来就是农民/三十年前为了农民的解放，丢下锄头，拿起了枪/从没有想过：当了兵就不是农民/当兵的三十年中，时而肩枪，时而荷锄，军队开荒种地，帮助农民春种秋收/是兵士也是农民/也从没有想过，兵士和农民有什么大不同。”“将军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但又是一个身经百战的将军/人们说，红土壤丘陵地怎能长得出庄稼/将军说，不，可以把它变成良田/小伙子们说，困难太多了，不易搞/将军说：‘有办法，你看……你想……’一席话，小伙子们又都昂起头来/实干，巧干，示范、引导/农民耶？将军！将军耶？农民！”谢老说得很对，甘祖昌回到家乡，不只是旷古奇闻又当了农民，而是在农村建设中仍当了将军。

大概在1973年底，北京各报又再次掀起宣传甘祖昌模范事迹的高潮。我的长歌，就是读了《人民日报》的长篇通讯后哼出来的。

从近日报刊的报导中得知，将军后来的如下事迹，我的长歌中不及叙述，如在家乡带领群众建了三座小水电站；营造了一座花果山，植各种果木四千多株；修了二十多座山村小桥；个人投资贡献八万多元，等等。这些，都表现了将军一以贯之的办实事、办好事的精神。

《中国老年》杂志的编者索稿，我就检出这首旧作，以表达我

对老红军甘祖昌将军的尊敬。诗写得不好，但当年在狱中的感情是真实的。我现在的感情也同十多年前的一样，特补写了上面这样一些话。一字未易的《甘祖昌》原作如下：

甘　祖　昌

一首小歌谣，献与甘祖昌：长征二万五，转战三十霜；
再难肩重任，颅脑三负伤。高官享清福，战士岂当行。
病残赤胆在，复员回故乡。回乡即拾粪，挥锄如握枪。
家山旧土地，老将新战场。依然豁出命，首战田冷浆；
跳下冰凌水，刺骨却热肠；五冬始告捷，经验传四方。
望天丘苦旱，拦河筑陂忙；熬硝造炸药，运石编箕筐；
挑灯连夜战，服药自然忘；天天闲不住，只要能起床。
正反典型在，歧路不徬徨。星火燎原地，插翅猛高翔。
粮棉稳高产，绿满红土岗，一派新气象，赖此柱顶梁。
功臣辞照顾，谢绝盖新房；打砖自筑屋，何用玻璃窗；
国家虽厚禄，淡饭粗衣裳。养身衰斗志，今昔时比量。
一条毛线裤，补成布挎裆，动手便丰足，自栽烟叶香。
俸钱充公益，家属忌铺张。继承权应废，学习得规章。
朝夕教儿女，艰苦事农桑；能文又能武，新型田舍郎。
回乡十八载，心志更坚强。七十敢云老？征途万里长。
前浪带后浪，日夜流大江。夕阳无限好，满天霞彩光。

1987 年 6 月 11 日

记沈毓珂

沈毓珂同志去世后，他的夫人田绿萍将她抄正的这本老沈的诗集交我，要我写篇序言。这是无法推辞的。

日本投降后，随着各地区进军东北的干部队伍，1945 年的 10 月和 11 月，老沈从冀鲁豫，我们从延安，先后来到内战前线的承德，参加报社的工作。当年只有黄钢、廖经天我们几个人在解放日报工作过，其他老区来的都是第一次走上这个岗位。老沈原来是鲁西南专署的教育科长。这时蒋军沿锦承铁路进攻，占领了离承德只有四十公里的平泉。由于战略地位的重要，在和平谈判中，承德与张家口同为必争之地。我们可说就在前线办报，后来向北撤退到农村，其条件之艰苦，决不亚于抗战初期的敌后根据地或游击区。在承德时，常受停电的威胁，新华社电讯长期抄收不好，老沈当时是编辑，校正错漏字句，要花费很大精力，电码本子都翻破了。

承德终于 1946 年 8 月 27 日被蒋军占领。26 日我们还出版了报纸，当天上午，老沈在内的最后一批撤退人员，才坐一辆卡车北去。报社已搬运一空，墙上写了大标语："我们不久就要回来的！"华山以此为题，写承德撤退情景的报导，在全国曾引起很大反响。报社印刷器材笨重，最先运走转筒机设备途中，遭受

过土匪袭击。26 日晚上大雨，我们的卡车停在北去围场的路上。老沈等一批人，离车找到一个破庙休息，我与总编辑朱九思和警卫员带着枪枝，守在车上。司机是临时找来的本地人，怕他将车开回承德。这些情况，1949 年 3 月 21 日热河《群众日报》千期纪念时，老沈在《艰苦成长中的群众日报》一文中，都曾述及。两个月左右，我们一直处在转移与撤退之中，但油印的《每日电讯》，只要能架电台，就没有停止过。报社最后随冀热辽分局撤退到热北林西，这是草原中没有电的城市，取暖烧牛粪，墨水瓶常常冻住，用手摇马达和手摇机器，继续出版《冀热辽日报》。同时，编辑部与电台人员先后分成三个小支队，到热中、热东和热辽三个地委，在马背上办报。所有这些困难，都挡不住全国与热河之间声音的传播；原来不会办报的人，很快都变成内行了。1947 年 6 月反攻大潮中，报社迁回赤峰。因分局改为冀察热辽分局，报纸名称改为《群众日报》。在赤峰刚过了几天有电的日子，又被日本侵略者留下来的猖狂鼠疫，赶到农村，依旧过“手摇”的日子，报纸却恢复到对开版。我是 1948 年 2 月离开热河的。报社的班子，于天津解放时进入天津，后又南下湖南；留下的少数人，由老沈率领回到承德，报纸归热河省委领导。热河省委建制撤销后，1953 年，老沈调到北京，任朱总司令的秘书，直到六十年代末。

为了多知道一些老沈主持《群众日报》时的情况，我翻看了二十多期《报史资料》，在一些老同志的回忆中，都谈到这个报纸同广大群众的密切关系，不仅是在工作和思想作风，以及发扬批评等方面，还包括文风的通俗化。有一位副刊编辑，由于常发些大鼓、快板、民歌之类的通俗文艺，缺乏“有分量”的作品，心中闷闷不乐。“有一天傍晚，大家在院里乘凉，和社长沈毓珂谈起此

事，他说，眼下没有写小说的，大鼓、快板有什么不好？群众喜闻乐见嘛。就算你说的‘有分量’的作品是‘阳春白雪’吧，可是‘和者寡’；快板、大鼓是‘下里巴人’，却‘和者众’，是给群众‘雪中送炭’，比‘锦上添花’更为重要。他不但这么说，自己还身体力行，亲自写了不少通俗的故事、通讯，深受群众欢迎。像《三才童子扶鸾记》，讲一个破除迷信的故事，我至今记忆犹新。”还有一位1950年来报社的青年记者，回忆老沈这样鼓励他：人都是学而知之，而不是生而知之。问他读过陆游的诗么，用纸写下这两句：“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沈社长对古典诗词颇有研究，谈话时总喜欢引用上几句古诗词，以说明他的观点。”由此可见，老沈在青年时就爱好旧诗词。

五十年代在北京，同老沈只有一次接触。1956年，电力部水电总局在北海办了一个水电展览会，许多中央领导同志都去参观。朱总的题词，鼓励大办中小水电。我便给老沈去信，请总司令加一个“大”字，“大中小结合”，说我们需要也有能力马上建大型水电站。结果如愿以偿。之后直到八十年代，都进入了晚年，我们才又互通音讯。在热河时建立的那种亲切关系，肝胆相照，是老而弥坚的。老沈从湖北来到中日友好医院治病，遗体告别也是在医院中举行的，那天见到热河办报时的不少老朋友。《生平简介》中所言老沈的为人：忠于职守，埋头工作，任劳任怨，实事求是，注重调查，坚持原则，作风正派，生活简朴，严以律己，等等。我深切知道，这决非一般谀词。老沈最后的工作岗位是汽车名城十堰市的市委书记，《简介》中说他，“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地忘我工作，带领广大干部和群众，自力更生，披荆斩棘，克服各种艰难困苦，是车城十堰的创建者之一，在十堰的土地上遍布着他的足迹，浸透着他的汗水。”他的“祝十

堰建市建厂二十周年”七律中，有这样的句子：“芦席搭棚闻雨漏，土墙打垒颤机声。”离开领导岗位后，“他仍经常给市领导提建议出主意，毫无保留地谈出自己对工作的意见和想法。他不顾年迈多病，珍惜时间，孜孜不倦地伏案写作，写出了大量宝贵的历史资料。”

老沈弥留之前不久，我到医院去看望他时，追思往事，议论时政，没有谈到他酷爱诗词，还担任十堰市诗词协会主席之职。由此可见，多年来，老沈不过以诗词为余事。这本《沈毓珂诗词稿》约近百首，登高，远游，读书，观剧，怀友，奉和等等，不外言志与寄情。如梅花岭史可法墓句：“山河破碎日，阁部誓成仁。荒塚一腔血，红梅万颗心。”1979 年游正定龙藏寺遇国外游客句：“弥勒胸怀大，观音方寸清。万国同瞻仰，古迹正翻新。”又如 1984 年 5 月晚登黄山清凉台：“云动惊山走，泉鸣疑石吟。清凉台上坐，岂不是仙人。”1960 年，他随朱总到四川仪陇县探亲，朱总旧居大弯村后山名关刀岭，因山顶独立一古柏，形似青龙偃月刀。他有《赞关刀岭》五律：“山顶百千冬，盘根土石中。仰天承雨露，立地傲霜风。扁叶摇青黛，长柯响古铜。嵬嵬梁栋在，烈烈映朝红。”集中也有这类忧时之句，1989 年 9 月 26 日读报有感：“坑民害国发横财，假酒劣烟蜂拥来；先哲曾言三倍利，奸人不怕断头台。”

沈毓珂同志留下这样一本诗词集，更增加故人后人对他的怀念。

1992 年 11 月 30 日

请读《胡杨泪》

李荒同志来信

前些日子，收到李荒同志的一封信：

“向你推荐一篇报告文学，再提一个小小建议。

“《文汇月刊》1984 年第四期刊载孟晓云写的《胡杨泪》，如你还未看过，建议抽时间看一遍。从文中可以看出：‘左’的思想如何埋没和摧残人才，我们现行的人事制度的某些方面又如何压制人才。

“建议你设法将《胡杨泪》这篇文章让全党县以上干部，特别是组织人事部门干部，都认真看看，并仔细想想自己的工作。这样做，不仅有利于人事制度改革，可能还会促进组织工作的新发展”。

李荒同志是个有心人，为了干部队伍的年轻化，他前年就主动退居三线。他同我们许多老同志一样，确实是人退心未退。

《胡杨泪》其人其事

《胡杨泪》写的是中年知识分子钱宗仁二十年间的坎坷经历。我读后忍不住索性向《人民日报》作文推荐。下面且将文章主人公的简历予以摘录。

钱宗仁是湖南湘乡县长丰公社浒州大队人。全国解放那一年，他只是个五岁的儿童。土地改革中，他家为了一点什么纠纷得罪了农会主席，成分就从贫农变为“佃富农”。从此，钱宗仁就叫做“地富子女”，一切好事他都没份，一切灾难他都有份了。

他勤奋好学，1963 年考大学，成绩是全省前十名，就是没有被录取。第二年再考，虽被哈尔滨工业大学录取了，可是公社书记宣布：富农的儿子上大学，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于是写材料说明“该生政治表现不好”，应取消入学资格。学校不愿失去这个高材生，派人去当地调查，原来材料全系凭空编造。这时，这位书记留下如此警句：“要是我们公社一级党的领导机关还搞不过一个地富子女，这会产生什么影响？”就这样，钱宗仁虽然到哈工大念了三个月书，最后仍旧只得回到家乡来。第三年想再考，请求九回，公社没有让报名。

在如此严酷的形势之下，这个一心想求学上进的青年，只好背井离乡，成了新疆阿克苏县实验林场一名没有户口的工人。辛苦的劳动，微薄的收入，都不能遏止他求知的渴望。星期天，他跑三十里路到县城阅览室去读书；也学习写作，在《新疆文学》上发表过一些短篇；还能写意境、格律俱佳的诗词。正是他填的一首“江城子”，抒发了热爱边疆的感情（“扎得根深，此地是家乡。望我成材如树木，宜红柳，宜白杨。”），无意中被专区“四清”工作队一位同志看见了，了解到他的情况后，建议他回原籍甄别家庭成分。他筹措不出路费，只好写了一份详细报告寄到家乡。这可不得了：为家庭成分翻案！长丰公社九次发函阿克苏的林场，要求送回原籍劳动改造。十年动乱中，一系列的罪名，我们的主人公更是遭受批斗、吊打、酷刑、反省、坐牢、进“学习班”……可是，这都无碍于这个人的勤奋好学：坐牢时默诵古

文和诗词，推演数学公式；在“学习班”研究语法修辞。终于得到一个机会，他从土牢中逃跑，在新疆其他地方过流浪生活。在没有条件进行任何研究的时候，他就凭一本字典探索汉字构字的规律，到 1975 年底，终于编成了一种“汉字笔顺号码排字法”，这在当时是比较先进和有发展前途的。可是这一成果在商务印书馆里积压了两年之后，更先进更适用的汉字编码方法已经出现不只一种了。

终于到 1978 年，大学和研究生又恢复招考。由于年龄关系，钱宗仁决心自学大学课程，报考研究生。他的命运只能找到什么书就学什么。他在近处找到了一本残缺不全的《高等数学》上册，于是就学数学。从 1978 年到 1981 年，在不到三年时间里，他在繁忙劳动和沉重家务的间隙中，自修完毕八门大学课程，以几乎全是满分的成绩取得了新疆广播师范大学的毕业证书。1981 年 9 月，他报考西北大学数学系刘书琴教授的研究生，在二十六名考生中成绩第一。可是不能录取：大了两岁，这一年他已经三十七岁了！七十四岁高龄的老教授看中了这个考生，可是教师无权录取他的研究生，老教授只好一次、两次地资助钱宗仁旅费上北京，帮助他向有力者奔走呼号，终于也没有结果。然而热心肠的人毕竟很多。在林场的时候，一些青年支持他研究汉字编码；在流浪中，老同学不顾风险介绍他做木工；在苦闷中，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小漆匠跟他谈哲学；为了当上研究生东奔西走时，还有数学家张广厚，报社记者，教育部的接待人员……都希望能给他一些帮助。这里特别应该提到阿克苏地委宣传部长宣惠良，他觉得合理安排钱宗仁的工作，使人尽其才，是自己的责任。可是，一个地委的宣传部长只有那么大的权力，为了把钱宗仁由工人转成干部，为了找一个愿意接受他去教书

的学校，为了让林场同意放走他……这位宣传部长几乎花了二十个月的时间，才把钱宗仁调到塔里木农垦大学任教，结束了他二十年的坎坷生涯。

为什么题名《胡杨泪》呢？胡杨，在新疆大沙漠的边缘偶尔还可以见到。这树有着顽强的生命力：耐干旱，耐盐碱，抗风沙，体内有储存水分的特别本领，要是划破树皮，就会有水分渗出，好似伤心流泪一样。作者这样介绍这篇报告文学的主人公："握住他那粗糙的手，看到他黝黑多皱的脸，绝不会认为他只有三十九岁，也绝不会想到他是一个知识分子。"他，是不是同胡杨树有着某种近似之处呢？

读后感想

可以乐观地说，钱宗仁的厄运已经终结了，他今天已有可能为祖国和人民施展自己的才华了。但是，还有没有赵宗仁、孙宗仁……？还有多少知识分子的厄运没有结束？

那种随意定人"成分"，随意把人列为专政对象，随意剥夺他人公民权利的现象，相信今后可不再出现。但是，要消除埋没人才、摧残人才、压制人才的现象，要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要按照中央的精神，全面地、彻底地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我们确还有许许多多工作要做，还要走一段相当的路程。

面临城市经济改革发展的形势和新的技术革命挑战的世界，知识与人才的重要性变得更为突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还应加上一句："人才就是资源"。人才的开发和充分运用，将决定我们经济发展和国家强大的速度和程度。小平同志说，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没有知

识，没有人才，怎么上得去。可惜，这个平凡的真理，至今还有不少人不懂得。我们这个国家人才本来就不多，再容不得半点积压和浪费，更不用说压制和摧残了。当今迫切之事，就是上上下下应该切实树立一种观念，培养一种感情，形成一种习惯，就是要惜才，要求才若渴，爱才如命。中华民族从来有这个传统。“萧何月下追韩信”，刘邦逐鹿中原，不能没有韩信这样的帅才，萧何深知此情此理。“刘玄德三顾茅庐”，没有诸葛亮，刘备即不能同吴、魏争雄，鼎足三分。太史公说：“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我国古代就把“野无遗贤”当作治世的一个标志。封建政权，中央六部，以吏部为首呵。

我们各级组织、人事部门，是识才、聚才、生才、用才的部门，在这个部门工作的人员都应当具有求才若渴、知人善任的品质。我很赞成李荒同志说的，请各级组织、人事部门的同志一读《胡杨泪》，加倍珍惜人才；请再普遍检查一下，一个单位一个单位检查一下，你那里有没有《胡杨泪》之类的事，知识分子政策落到实处没有？尤其要从思想认识上解决种种“左”的遗留问题。

李荒同志的信中还提到：“我们现行人事制度的某些方面，又如何压制人才”。这是确实存在的。对于那些不合理的、不适应今天经济发展形势的人事制度，必须坚决予以改革。对此，中央作了有关决定，首先是下放管理权限。我们的组织、人事工作必须更好地为党的总任务、总目标服务，必须更紧密地围绕经济工作进行。人事制度改革是个大题目，我这里只想提个小意见。领导机关制定各种政策时，是不能完全顾及个性因素和各种特例的，而且常常要规定一些确定的界限，诸如年龄、文化等。但在执行中，就必然要遇到是否允许有一定的弹性的问题。这就是如《胡杨泪》中反映的，指导教师无权录取自己中意的研究生，

工人转干部的困难，尤其是调动的艰难，等等，大概都受既有规定的限制，而办不成功。当然，过去与现在，也并非全无弹性，弊病在往往只对有特殊关系者适用，而对如钱宗仁者，则是铁面无情。我们应该颠倒过来：不要再给那些光凭特殊关系者以破格照顾，而对于类似钱宗仁者，却须圆情度理，适当通融。关键就在执行者事事出以公心，还要有满腔热情。这方面，大家应当向阿克苏地委的宣惠良同志学习。

读后感想，只是就李荒同志信中提到的两点说了这么几句，其他应当从《胡杨泪》中得到的教训和启示，是很多很多的，希望组织、人事部门的同志大家来讨论。

1984 年 9 月 4 日

附记

在我刚刚结束这篇短文时，了解到新疆的领导同志和组织部门，在 1982 年就关心过钱宗仁调到高等院校任教的问题。同时有机会读到钱宗仁和他的支持者之一宣惠良写给《胡杨泪》作者的信。钱宗仁对作者没有把他写成一个“奇才”表示满意；宣惠良则因文中把他写得太好而多少有些不安，好像已经开始听到一点流言。难道举才的伯乐也要遭到非难吗？但愿我这担心是多余的。

附

钱宗仁同志的来信

李锐同志：

您的文章《请读〈胡杨泪〉》发表以后，我收到许多读者来信。

我想向您汇报这一情形，我本人已深为这些信所感动。我认为这些不是一般的赞辞或祝贺，也不是一般“好奇心”、“赶时髦”或者“凑新闻”所致。它们毕竟从一个角度说明了您的文章在全国所引起的反响。

一个月来，共收到国内外来信三百二十多封。除西藏和台湾外，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都有来信。比较多的是湖南、广东、福建、河北、黑龙江、新疆等地，还有少数几封来自香港和美国，也都是华人或华裔写的。写信的有各部门、单位的党政领导干部，有教授、工程师、技术人员、作家、编辑、记者、文艺工作者，有经理、厂长以及个体劳动者，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大、中、小学的教师和学生，有待业青年、临时工、失足青年甚至劳教犯人，等等。

从来信可看出《请读〈胡杨泪〉》和《胡杨泪》这两篇文章对人们所起的震动。百分之百的来信都说自己是流着眼泪读这两篇文章的。人们怎样激动，怎样互相传阅、推荐，怎样议论和吁叹，在这些信中有很多描述。许多人叙述，读了《请读〈胡杨泪〉》一文后，如何到处找《文汇》月刊，在收听到广播后，如何连夜找报纸原文，纷纷写信给报社或电台要求转载或重播。许多家庭和个人争相保存载有《胡杨泪》的报刊，用以作为教育子弟认识人生，努力发奋的材料。许多信中都可见到类似这样的话：“这是我读过的上百篇关于知识分子经历的报道中最感人的一篇”（暨南大学杨贻书）。“我看书是从不流泪的，今天，这是二十一年来的例外。”（河北沧州农校郭焕敬）。河南省林业厅厅长张企曾开会途中在车厢里看了《胡杨泪》，全车厢震动，报纸抢购一空，只好组织读报，全车厢请他作为代表给我写信。南京建材机械厂陈哲昌出差回来，尚未放下行李，妻子就递给他《人民日报》，他读着，其它什么也顾不上做了，说了。一个工人叙述他去分肉时，顺便在办公室拿了张报纸包肉，回家路上一边走一边看报，“胡杨泪”！……不知什么时候把肉掉了。

来信普遍谈到读了《胡杨泪》后，“思绪万千，心情激动，难于言尽……”“食不甘味，夜不能眠……”“不知是伤心，还是激动；不知是同情，还是受到感染，……”

“我为你的不幸遭遇而流泪，为你所走过的坎坷道路而感叹，为你亢奋地搏击命运的挑战而鼓舞，也为你今天充满希望和光明而高兴，……”（解放军艺术学院暴剑云）

“我读过许多描述人生经历的作品，可从来没有这样激动过，你的事迹对我来说是一部生活的教科书。”（四川师院中文系朱立群）

“你坎坷的历程，百折不挠的精神，使每一个正直的中国人内心激动，使每一个有志于献身祖国、振兴中华的志士仁人从内心感到悲愤……从你身上，我看到炎黄子孙由古到今的道德、品质、智慧和创造力，生的信念，活的欲望，艰苦卓绝的吃苦精神。”（河南孟津八〇七四一部队冯长福）

“我们深为你那顽强的进取精神所感动。你的思想集中反映了千百万走自学成才道路者的心声，你的经历充分揭示了当前人事制度的某些方面对人才的压抑和摧残。”（江西恒湖垦殖场王岭、顾玉铃、周国柱）

“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胡杨树的一切品质都在你身上得到体现，人生道路的种种艰难险阻，坎坷崎岖不但没有使你萎靡，而是以更高的姿态出现在人民面前。……你对生活，对社会的信任是使人挺立的源泉，而现实生活中许多人正是缺乏这一点……。”（浙江江山汗头农技站占才水）

“您的性格正如胡杨树那样，不畏弥漫的风沙，严酷的冰雪，在沙漠中坚强挺立，您在漫长的岁月中，长年如一地为着事业像老黄牛一样辛勤劳动；您充满信心与毅力，不顾一连串的政治迫害，升学挫折，尝尽了生活的漂泊痛苦，一直顽强地学习；你像一颗被乌

云掩没在茫茫天际的亮星，始终保持着对人间大地的希望，放射着充满生机的光辉；您像浪花，冲击着一切前进路上的顽石，心向大海不停地奔流，发出自己力量呼唤。……”（广西平南六岭金矿谢朝蒙）

以上这类评语显然是把《胡杨泪》的主人公理想化了。但许多确切可见的真情实感则也许更为动人：

曾经是我教过的学生，现为新疆石油管理局财务科青年干部的王华来信写道：“……当我知道文中的主人公就是我的老师您时，我哭了，泪水流个不停。您不幸的前半生，使我悲伤；您倔强的性格，强烈地感染了我，……钱老师，您在教我书的时候，您有这样大的痛苦却从未向我们诉说一句，而您却总是那样孜孜不倦地教诲着我们，自己还夜以继日地学习。那时，幼小的我怎能理解老师的心情呵！我们不听老师的话，时常给老师添麻烦……现在想起是多么不应该！我不知道该怎样才能表达我现在的心意，……”

安徽颍上新庙中学高中学生李莉代表全班写信说：“当你的事迹在我们班传开时，没有一个不流泪、不感动。我们为我们祖国有这样的儿子，为我们在即将面向人生征途时有这样的榜样而骄傲和自豪，……我们没有什么可奉献给您，只有几百颗火热的沸腾的心。”信中表示要用实际行动迎接祖国的挑选，打好高考这一仗，考上大学，学更多的知识，去建设大西北，“我们都希望将来在大西北和您见面。”

《胡杨泪》在鼓励青年艰苦奋斗自学成才这一点上确是起了较好的影响。“你的经历代表了许多人，也将鼓励许多人。”“你的事迹给我带来了巨大的动力。”这类话很多很多。四川成都龙泉镇医生艾宗焕说：“一篇《胡杨泪》，胜过百十篇大道理的说教，它比任何口号都更能启发每个自学者的心灵。”福建南平下马甲道班杨东国说：“你那勇于拚搏，敢于攀登的精神和毅力，使我们许多正处在

'半山腰'上犹豫的人下定决心要继续往上爬了。"还 有诸如"你为我们这些彷徨中的青年从内心开拓了一条清晰可见的弯曲小道。"(张家口周素平)"使我一颗即将冷却的心又燃起了希望的火花。"(湖北孝感陈利华)"您的那些诗句,像誓言,也象钟声,击鸣了我们心中似乎消逝的奋斗曲。"(三六一〇五部队张洪奎)

广东省机械工业厅伍星荣、吴键在信中说:"……一个个拦路虎就是要阻挡你进入大学门,而你却以自己的自学得来的才能终于在大学任教,这在中外历史上也是少有的。你的自学之路给千万个由于种种原因未能进大学门的年轻人树立了榜样。"

江西进贤李渡镇的陈思说:"……其中最能触动我的心灵的一点是,您的非凡意志和毅力,也许正是那些因遭受挫折而走向倒退的人所没有具备的。"他记述了他现在的困难处境之后接着写道:"我不应该沉沦! 虽然我已经在艰难的自学沙滩上跋涉了六个冬春,似乎没有看到边际,但是,我现在相信,只要我坚持下去,前面一定会出现绿洲的。"

浙江玉环县文化局张一芳来信说,他们局里许多青年有感于社会上许多不平之事而气恼、不满,又无办法,都不想再学习。"我也是一个! ……我们的宣传部副部长和组织干事组织我们读了《胡杨泪》,触动了许多人的隐痛。……太好了,这就是力量,是信心,许多人当即作了抉择,立即报名自学考试。"

云南昆明八九七三〇部队钟建这样写道:"我看了《胡杨泪》,一宵未眠。我在想,想,我在埋怨什么? 还埋怨什么? 我若有这精神的一半,我就肯定考上了大学! ……"他寄来一片云南青松叶,表示他的决心,要像这青松一样与新疆的胡杨共存。

许多读者在来信中还详细地具体地谈了自己将如何克服困难,坚持一边工作,一边自学的打算。有的寄来自己的学习计划或书目,时间安排等请我提出意见。

从四川、上海、大港油田等地来的十余封信没留详细地址，也没有署名，都表示：我不希望您回信，只想让您知道，“胡杨”精神将移植在千千万万人的心中，我也是其中之一，……

对于人生的道路和价值，也有许多信谈得很深刻，和我产生共鸣：

“《胡杨泪》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人生长途跋涉的真正的活生生的事实。二十年，委屈的二十年，人生有几个二十年啊！但你那闪耀着理想、事业的心灵，以坚强、执着而艰难、沉重的步伐在人生道路上留下的深深的脚印，会使千万人看清自己应走的路。……”（海南大学干修班陈仪侠）

“……诚然，你的令人钦佩的艰苦奋斗精神是每个中青年知识分子都应该学习的；但我想你走过来这二十年的坎坷曲折，一定伴随有一种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才使你没有在这漫长的岁月中失去信心和迷失方向，这些更是值得我要学习的。”（抚顺高湾农场张福昆）

“……一个人在世界上追求、奋斗一辈子，也许什么也没有建树，但这样的人同样是伟大的。因为他的追求、奋斗本身就是一种伟大的行动。……虽然您一生最美好的年华被历史无情吞没了，但我相信，不管您将来怎样，您表现出来的高尚的求知精神和百折不挠的进取意志将深深地激励起新的一代自强不息的斗志。”（湖南铁合金厂工人丁超）

“我们之间的共鸣点在于，能够为中国千千万万诸如这种不甘沦落的人中之一并能为社会所理解和相容。……鲁迅先生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虽然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辉，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一个人也许看不到他的出名，不等于他不是‘胡杨’，能做一个正直善良的人，做一个对国家民族有所贡献的人，这便是我

们于人生的最大要求。”(大连工人大学王礼德)

说不完来信中的动人感叹,可喜的毕竟还是都有着乐观的结论,令人充满期望,如湖南科技出版社胡海清说:“您终于胜利了,您是强者,这说明了‘有志者事竟成’这一千古名言,也说明了我们党确实是代表人民,关心人民的。”广西《红豆》编辑部刘浩说:“应感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使我们才都有了光明的今天,……即使是经历了磨难,付出了代价,但激励我们的,应该是为国家贡献更大的力量。”上海同心路小学教师尚根云(她是全国知名的特级教师)所说:“我为您流泪,为您惋惜,为您不平。但,更多的是为您欢笑,为您庆幸,为您高歌!”可以作为这种心情的高度概括。

许多同志诚恳地要求与我交朋友,拜我为老师;要我答应保持通讯联系。信中提出的共同关心的问题是“你能长期坚持奋斗的信念是什么? 动力从哪里来?”“你在经历每一个挫折之中及之后是怎么想的?”“许多决心是怎么下的?”“你有哪些有效发掘智力和自学的经验?”等,殷切希望我在回信中谈一谈或希望能在报刊上见到这方面的介绍。许多报刊如《南方日报》、《书林》杂志、《山西教育》、《新疆文学》等盛情向我约稿;许多单位或个人热诚为我整理所写过的诗词。

来信中另一方面的内容正如李荒同志和您所指出的,是对长期“左”的思想摧残人才的严重性的感触和议论,对现行人事制度中压制人才的那些方面的指责和希望。人们沉痛地感叹着:“读了《胡杨泪》使人更深切地痛心感到,十年动乱的悲剧,实在是不能再重演了!”(江西恒湖垦殖场王岭等)“极左路线捆住了多少人的手脚,使他们无法施展自己的才华。”(广西南宁刘洁)“你的遭遇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们民族的命运。”(辽宁铁岭周宏)“我们这一代人,原来都是想奋发有为的,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洗礼’,使得一些人经不起创伤,不再努力上进了,……”(哈尔滨东安机械厂赵学

儒）

江西省德安县香屯中学裴公昌的读后感采用“一读……，二读……，三读……”的方法。其中“二读《胡杨泪》，我痛惜在极左路线的横行下，使您，和许许多多的人埋没了……，我也是一样，也经历了一番类似的厄运……，现在我的想法也和您一样：‘希望现行的政策稳定下去！’……”

河南孟津八〇七四一部队首长冯长福的来信说到：“看完《胡杨泪》，内心异常沉闷，因为我知道，确实存在多少像你这样的人（暂且不说是人才），或许已经改变了处境，或许仍然还在艰难地爬行着……产生这么大大小小的官僚主义老爷的原因，我想不外乎：①封建的家长作风的影响；②缺乏知识的愚昧和嫉妒。使他们认为，党的工作岗位是他们滥施家长淫威的座椅，我没有知识你也别指望有知识。”

贵州万山特区林牧则对人才问题发表了长篇议论：“……我们欣喜地看到，党和政府及一些有识之士已经明了了人才的重要性，怎样用人，怎样培养人，已成为迫在眉睫的重要问题。我国经历长期的极左路线，特别是十年浩劫在人们思想中形成了视知识为邪恶的偏见，……十一届三中全会纠正了长期的极左路线，使许多人才重见天日。然而真正做到‘野无遗贤’，让春风吹遍每个角落，却不无困难。”他接着论述我国历代人才情况，之后说：“历史证明，一个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以及人民的命运、遭际、思想行为方面许多迹象都和人才的合理使用程度有关。”他还议论了人的才能的发挥问题，他说，“一个心理学家说过：‘一个人在通常情况下只发挥了其智力的十分之一。’智力 的发挥一在于勤奋，一在于人们为他创造的条件。”他还说，“炎黄子孙有一股凝聚力，他们尽管受过不少挫折，仍然热爱自己的母亲——伟大的祖国。”他举了一个例子说，贵州遵义有一个出身不好“自己也不知怎么回事”的青

年，受尽压制、歧视。他在自卫反击战中，身受重伤，还是毫不犹豫地冲进雷区打开前进的通道，牺牲了。当他成了英雄，成了烈士时，有些人才想到平常对他的不信任。

哈尔滨车辆厂李玉亭在叙述了许多事实和抒发了一些感想之后提出："研究如《胡杨泪》相似的许多事件，有两方面的问题值得重视：㈠如何使那些确有真才实学的人能有用武之地，组织人事部门要把这些好钢用在刀刃上，对那些压制人才的组织人事干部或其弊病，应设法医治。㈡对过去留下来由于某种无关紧要的原因（有的纯乎得罪了某个头头）而变成了专政对象中的人才，特别需要尽快给以复查纠正，作出正确的结论，使这些人的心更向着党中央……虽然这种人是极少数，但很重要。"

湖北省荆州地区环保站林烨说："……由于社会上存在的道道'关卡'，有时即使'千里马'已在'伯乐'面前，'伯乐'也无法认领。许多'千里马'在马棚里空叹，'伯乐'掩面而过……难道我们的社会就有这么多绳索来约束人才的提拔吗？……当今的社会应该是以知识、人才作为资本的社会，应该是'人才云集型'社会，但是还有许多'科技流浪汉'。"

还有在组织人事部门工作的干部在信中叙述他正在这类问题上与许多人"顶牛"，《胡杨泪》的发表是"助了一臂之力"。

您尖锐指出："还有没有赵宗仁、孙宗仁……？还有多少知识分子的厄运没有结束？"回答应该是肯定的。来信中也叙述了许许多多这样的事实，许多信件详细地叙述了自己或所知的某人的经历和近况。揭露了许多打击、迫害他们的人的恶行（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往往是属于"三种人"型的，就更为猖獗！另一个事实是，这类信南方多于北方，而以福建省最多），有些人寄来大叠的材料，希望我能够帮助他，这事使我很为难，退回不忍，留下又怎么办呢？可以摘引暨南大学杨贻书的信中的一段话说明这些人的心情："读

者这么热情，这么激动，一方面是说明人心所向，对正义事业得到伸张莫不高兴，一方面还隐藏着一种渴望，自己所知的许多被践踏打击的人才都能如你那样有个正当的结果，不一定要上报，只求有人来处理。”他说宣惠良这样的部长“是这些人多年来一直渴慕的人”、“李荒、李锐等领导同志为文推荐《胡杨泪》，振动民心，感人肺腑，……人们因此充满希望，和盘托出，……”

哈尔滨车辆厂李玉亭述说，他从小爱好体育，1956 年考进哈尔滨体校，1958 年获市体操赛冠军，参加了第一届全运会集训，信心百倍，刻苦训练，但只因“左”倾路线，即“政治”原因使其未获比赛机会。难得他在后来二十年时间内想尽不少办法，梦寐以求参加体操训练，自信只要有机会一定能取得好成绩而为国争光，可惜一次又一次愿望未遂，并历遭打击迫害。他说：“现在虽然落实了政策，享受中专待遇。但想想自己，总觉得没有发挥我的体育才能而饮恨终生。我想，类似这种现象一定很多，扼杀多少人才啊！”

湖南湘西金矿张声凯，三十八岁，宁乡人，“文化大革命”前因出身问题未获上学机会。刻苦自学至今。已在该县当没有户口的高中代课教师多年，临时工资，连转正都难办手续。他写来许多愤愤的诗，如“执着追求性也痴，此中遭遇费寻思。世风争信登龙术，当道谁怜抱玉辞？……”

有几封信说的几乎是同一问题。都是因为某种原因耽误了青春，致使超过了某种“杠杠”年龄，现在虽然被“录用”，并在岗位上充当骨干多年，却总是解决不了学习、转正、转干等这些基本问题。“年龄”成为别人排挤的“正当理由”，是中学教师者发出同一叹息：“我教过的几届学生都毕业回来一道工作了，虽亲切地仍称我为老师，可是我还是临时工，工资不到他的一半！……”相比之下，值得提到另一封信：河北省崇礼县的范玉芬，是个四十四岁的妇女，大儿子已上高中。她沉痛但欢快地详尽叙述了她二十年的坎坷遭

遇，但去年县上考虑她的特殊情况，破格让她报考师范学校，现在是“二年级学生”，她是充满激情地在信的末尾写道：“现在全家都感到很幸福，都有了奋斗和前进的目标，欢笑代替了眼泪！我从心眼里感谢党，感谢邓小平同志。还有什么理由不下决心把毕生精力献给祖国的教育事业呢？”

还有些信和材料涉及刑事问题。由于难以判断其真实程度，就不一一转述了。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我想起这诗句，希望他们的问题也终于得到解决。

摘编仓促。实则这许多来信中还有其他值得汇报的多种内容，且同时还在不断收信，不能尽言。关于我自己的一些感想，待下次再呈。

致以

诚挚的敬意

钱宗仁

一九八四、十、二十　于塔里木农垦大学

《胡杨泪尽》序

在向钱宗仁的遗体告别时，我们聚在灵堂的几个人就商定，要为这个猝然去世的人出一个纪念集子，包括他自己写的诗文和别人为他写的诗文，让他继续活在人们的心中。我认为出这个集子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是让人们知所鉴戒，不要忘记过去，即本来是万物繁生的沃土，为何长期出现过戈壁；更重要的一方面是让人们知所效法，如钱宗仁因具顽强不屈、奋斗不已的精神，即令是戈壁，也能生长出胡杨。湖南出版社的同志深情地为这个集子命名为《胡杨泪尽》，但我相信，钱宗仁虽然离开了他如此眷恋的十亿神州，然而胡杨的泪水仍会常滴在人们的心头。

钱宗仁有点像一颗掠过天际的陨星，当人们刚刚看到它夺目的光焰，就戛然消失了。从这本书里，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气质、风貌、雄心壮志和多方面的才能，可以看到他百折不挠、孜孜向上、拚搏不已的惊人毅力，可以看到他对国家和人民命运的关心与信心，可以看到他无时无刻不在想如何更多地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我看完他写的全部诗文、手稿和书信之后，最使我感动的，还是他那任何精神与肉体折磨都无法挫伤的顽强的学习精神。这种精神正是当代青年、乃至中年、甚至老年，都应当向他学习的。因为我们大家都曾至少失去十年的宝贵年华，我们

要像钱宗仁一样奋力追回来。钱宗仁说，他耽误了二十年，这几年挽回了五年，还差十五年！

钱宗仁在小学和中学读书时，是全县出名的高材生，可是他被“成分论”剥夺了读大学的权利，从此就因不愿屈服于命运，而历尽千磨万难。不论处于怎样的逆境，他所想的只是如何增长才识，多做点有益之事，而置个人安危于度外。干农活时，他的力气、技术与巧妙功夫得到乡人的赞赏。大办水利时，他不顾身卑，挺身而出，运用数理知识，带头选择最佳方案。连学手艺也不得批准时，他硬是用一个月时间，自成木匠，并兼雕刻与油漆，能以此谋生。在戈壁滩修路，冒风沙，铲石头，喝泥水，啃窝窝，虽与世隔绝，书影寥寥，但“天生我才必有用”，他在劳动之余，笨中巧取，终于创造了汉字笔顺号码排字法，以施展自己为社会服务的才智。十年浩劫时，日夜吊打，脚带重镣，“游团”示众，酷似农奴，几次奄奄一息，身上有伤疤，头上留裂缝，脸上余烙痕，他处之泰然，仍然珍惜时间。或假装晕迷，背古文诗词，念数学公式；或利用写检查，推敲音韵语法，证几何难题。如此刻苦学习，使他锻炼出惊人的记忆力和理解力，能一气背几百首诗词，记住中学时期 的全部数学推理。待到大地春回，他已三十五岁了，身居僻壤，茕茕孑立，连书本也难找到。他慨叹“谋生尚且艰难，求学谈何容易”，因为他的业余时间，还要做木活维持家计。但他认为“纵使青春已逝，且喜丹心无损”，于是竟实行五小时睡眠制，连吃饭、上厕、看孩子的时间也利用上，这样三年学完大学八门课程，通过毕业考试，并以最优成绩考上高等数学研究生。后来的归宿是在农垦大学教授复函数。人们呵，这是何等的毅力！这是不惜生命，去换取知识。

去年 3 月，钱宗仁第二次到北京进修时，我们得以见面，他

找我几次商谈今后的去向。他的专业是一个纯理论的数学分支，没有应用前景，且缺继续攻关的环境和条件；又由于《胡杨泪》一文引来的社会关注，以及千百读者来信探讨社会问题的启发，他想离开可能“成名成家”、“安居乐业”之路，而转向接触社会斗争的风口浪头。他觉得自己的半生经历和思想文字能力，允许他作这种选择。他的这个转向的想法，也正是我在通信中向他提出过的问题。他获得学校的同意后，得以进入人民日报社工作。在生命的最后两个月时间，他学习新闻理论，熟悉报纸业务，实践记者采访，同时还涉猎社会学和人才学，同各方广泛联系，开始写这方面的心得和文章。钱宗仁在数学方面的根柢，我无从评价；从他的文章和书信，显现的不仅是文字水平，主要的还是他观察问题和独立思考的能力；诗词虽是余事，也露出风骨与才华。我问过他的身体状况，回答只是：平时难得感冒。谁料到他正以一个肝癌晚期扩散的病躯，在新的岗位上忍痛坚持工作，直到突然摔倒，住入医院后，半个月就离开人间。医生诊断，他的肝癌已有五年病史。大家知道，精神与肉体的折磨是致癌因素。钱宗仁之死，又是一次教训；对受过磨难的知识分子，还得关心他们的健康，不要再事后惊叹他们的倔强而已。我是在他去世前两天才去看望他的。我的老伴曾代我先两天去医院，他企求地说道：“我希望还能活半年，我有许多事要做，有许多东西想写出来。”说完这句话后，他用手捂住了眼睛，泣不成声。钱宗仁只活了四十一岁！他是多么留恋我们这个既古老又年青、满是伤痕却前景灿烂的中华大地。

令人痛心的是，钱宗仁同我最后接触的时候，虽然避免谈到他的身体情况（他跟别人是提过的），却谈到他的一种新的心灵痛苦。《胡杨泪》事在全国传播之后，在新疆就有人散布他的流

言蜚语，当地负责方面为之澄清后，在他正要到人民日报社工作时，由于他曾为一个复杂案件的当事人鸣过不平，竟又遭到捕风捉影的恶意中伤。中伤者大概是不愿意让此人当记者的。诽谤虽未达到目的，钱宗仁的心情实难平复。他向我谈及此事时的悲愤神情，如在眼前。祖国大地虽然春光灿烂，万物向荣，但总还不免有朵朵乌云，甚至某处突降冰雹。借这篇序言，请允许我再次饶舌发出以下呼吁：我们经历了多么痛苦的年代，人们经受的创伤够多了，不知浪费、埋没和摧残了多少人才，今后再也不能做扼杀人才的蠢事了！爱贤惜才，求才若渴，选贤任能，唯才是用，是我国自古以来的好传统；当今之世，更应该大大发扬这种传统，使之成为全社会的风气。人才与改革是相辅相成的。只有人才源源涌现，如活水长流，各方面的改革尤其是城市经济改革才有保证。我们要抓紧发掘人才，培养人才，爱惜并保护人才，真正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这样，我们的国家才能富强，我们民族才能腾飞。

1986 年 2 月

附记

1985 年 10 月 1 日，钱宗仁逝世后，10 月 3 日曾作悼诗两首，刊 10 月 10 日《人民日报》：

九月下旬，忽闻钱宗仁同志（报告文学《胡杨泪》的主人公）住院，诊断为晚期肝癌扩散，27 日，我的老伴先去看望时，他希望“还能活半年”。说，“有许多东西想写出来。”29 日我到医院看望，已入急救室，见我时神志清楚，犹言：“我病如用中药，或仍可治。”隔夜得电话：人已昏迷。10 月 1 日凌晨得知，晨两点逝世，得年四十一岁。钱宗仁今春来京

进修，几度相商，决心弃数学专业，改行到《人民日报》边学习边工作。10月3日，收到《群言》第六期，上刊钱文《愿伯乐常有，千里马常有》，文中《水调歌头》词早示我。读毕潸然，成诗二章，难表哀思。

劳骨伤筋尤苦志，飞沙走石立胡杨。
铮铮铁打自成器，疾疾风摧弓挽强。
热血男儿多智勇，痴心逆子尽忠良。
既然造化有深意，忍夺斯人咒上苍。

灯火家家望月圆，高楼此夜不成眠。
方兴国运山花烈，未展君才蜡泪干。
决意改行从笔政，何期开卷读遗篇。
伤心事问几时了？最怕衰年哭壮年！

纪念宋教仁

今年是辛亥革命先驱、为袁世凯杀害的宋教仁诞生一百零五周年。他的家乡湖南桃源县政协要出一本纪念专辑，让我写点什么。我五岁失怙，自幼从母亲口中就知道“宋遁初”这个名字。父亲于 1905 年到日本留学，为同盟会会员，日本早稻田大学经济科毕业的，宋教仁则是该校法律科的；他们是同学，又是同庚——都是 1882 年生的。民国二年父亲当选为众议院议员，正是在宋教仁遇刺后，从湖南上北京参加国会的。父亲于 1922 年去世后，他的遗物中有黄兴、秋瑾、宋教仁的许多相片和纪念书刊，他们自然成了我当时心目中最崇敬的人物。

不过，关于宋教仁其人其事，我所知甚少。1952 年写《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一书时，探究上世纪最后三十年，湖南为什么会成为“新旧斗争最尖锐的地方之一”、“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的原因时，曾接触到一些辛亥革命时期的史料。书中自然要谈到当时湖南青年学生最有影响的革命事件及其领袖人物：“1900 年唐才常自立军起义失改后，顽固派曾屠杀湖南维新人士一百余人。后来黄兴、宋教仁等建立了革命团体华兴会，它以后和兴中会、光复会合并为同盟会。”关于宋教仁，注释中这样写道：“宋教仁(1882—1913)，字遁初，湖南桃源人，一个出身贫苦

的知识分子。1903 年在武昌文普通学堂读书时，致力于组织革命团体，后同黄兴一起组织华兴会，参加同盟会的活动。辛亥革命以后，成为著名的政治活动家，醉心于在中国实现议会政治，联合几个小党派，改组同盟会为国民党，以争取国会议席的多数，成立所谓责任内阁。1913 年，他亲赴各地发表竞选演说，被袁世凯派人刺杀于上海。宋教仁是资产阶级议会政治的诚恳的拥护者，他用自己的血证明了这个制度在军阀统治之下的中国是不可能实现的。”

这个注释的论点大体合乎事实，但对宋教仁这个当年的风云人物，这个才华横溢、有远见卓识，三十一岁即以身殉国的大政治家，我的认识还很不够。时势造英雄，对于宋教仁来说，正是如此。辛亥革命开天辟地，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革命党影响很大，而力量太弱，迫于内外形势，尤其是帝国主义的干涉，不得不将总统职位让给袁世凯。但独夫当国，革命党人当然是不放心也不甘心的。宋教仁作为追求“中华民国政权属于人民”这一理想的代表，想利用宪法，利用议会，来约束袁世凯，实现中国破天荒的民主政治，这在当年无可厚非；而不作这种努力，不在即将召开的国会中同袁世凯作政治斗争，自然是不对的。因为当时中国正处在如同恩格斯在谈到 1848 年维也纳起义时所说的，可使一个民族经过五年激烈震动走完通常一百年还走不完的途程的时代。

宋教仁学识渊博，尤长于写作，间岛问题发生时，迅速写出《间岛问题》一书，为清廷交涉取胜起了作用。他精心研究日本和西方的政治体制，有专门著作。他深知造舆论的重要，在日本时，办《二十世纪之支那》，主持《民报》，随后在上海办《民立报》。他既是革命实行家，又是革命理论家。辛亥革命前，他是黄兴在

国内多次起义的得力助手;辛亥革命后,他就成为民主政治理论的热烈鼓吹者。袁世凯任总统后,他奔走各省,协调南北,联络政党,全力以赴进行竞选活动,主张责任内阁制,国务总理由众议院选出,主张省议会有立法权,省长民选。他又擅长演说,言论风采,倾动一时。国会选举结果,参众两院的国民党人占议席的多数。组成国民党一党内阁,宋教仁为内阁总理,几乎成为举国定论。这当然引起袁世凯的恐慌,必欲清除而后快。

1913年初,宋教仁在汉口演说时的一段话,说明他对议会政治的信念何等诚恳。他说:"以前,我们是革命党;现在,我们是革命的政党。以前,是秘密的组织;现在,是公开的组织。以前,是旧的破坏的时期;现在,是新的建设时期。以前,对于敌人,是拿出铁血的精神,同他们奋斗;现在,对于敌党,是拿出政治的见解,同他们奋斗。我们此时,虽然没有掌握着军权和治权,但是我们的党是站在民众方面的。中华民国政权属于人民,我们可以自信,如若遵照总理孙先生指示的主义和方向切实进行,一定能够取得人民的信赖。民众信赖我们,政治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世界上的民主国家,政治的权威是集中于国会的。在国会里头,占得大多数议席的党,才是有政治权威的党,所以我们此时要致力于选举运动。"

当时即有谣传,袁世凯要对宋教仁下毒手。大家都为他的安全担心。他对友人说:"暗杀之事,防之不胜防,怕也怕不了,只有处之泰然。我若真被暗杀,或足以激动同志们的奋斗,而缩短袁氏的政治生命,也未可知。"

果然,在国会开幕前夕,3月中旬,袁世凯急电邀宋教仁入京,"共商要政"。3月12日夜11点,他由上海动身,在车站被手枪击倒。时黄兴、廖仲恺、于右任等都在身边。

辛亥革命前后，同盟会始终没有形成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也没有建立起严密的组织制度，内部政见分歧，争执不断。武昌起义后，《民立报》社论即指出，革命党人中“牟私利之人多”，“内部时有龃龉”。章太炎公开说：“革命军起，革命党消”；“若举总统，以功则黄兴，以才则宋教仁”。南京政府刚成立时，由于宋教仁同立宪派人张謇、汤化龙、熊希龄等有来往，深受同盟会中人的攻击。他的“调和南北，统一全国”的主张，以及热心于议会选举等活动，不为同盟会中一部分人谅解。在22日弥留之前，他对黄兴、于右任还说到内心的这种痛苦：“为调和南北两方关系，费尽心力，我只希望能够有一个和平统一的中国。但造谣生事的人不知原委，每多误会。我虽然受些痛苦，也是值得的。现在就是因此死了，也没有什么好后悔的。”

宋教仁之死，全国哗然，引起滔天巨浪，激发南北各地一片反袁之声。正如他自己的预言，这一事件缩短了袁世凯的政治生命。

沪西静安寺路曾立有宋教仁的铜像，石座上刻有感人至深的于右任撰书的铭文：“先生之死，天下惜之。先生之行，天下知之。吾又何纪！为直笔乎？直笔人戮。为曲笔乎？曲笔天诛。嗟嗟九泉之泪，天下之血！老友之笔，贼人之铁！勒之空山，期之良史。铭诸心肝，质诸天地。呜呼！”

我的老友黄乃（克强先生的幼子）同时应约，写了一首“念渔叔”（宋教仁号渔父）的七律，以为纪念。前四句为：“浊波渔侠抗横流，唯法唯民第一筹。说游南北期全票，协佐孙黄复汉瓯。”黄乃不幸，开国之初即双目失明，这首诗要由我代书送去。为结束这篇小文，我步老友原韵，也写了这样四句：

独夫子弹震神州，恸哭人才第一流。
谁道英雄长寂寞？民权社会共千秋。

我的父亲

多年以来，湖南尤其平江编志书的人，总催我为先父作传。可是我一直拖着，其原因是很难找到文字资料。父亲是1922年去世的，我还不满五岁，对父亲的印象都是从母亲口中知道的。如果早有这个打算，五十年代时，父亲的许多朋友还活着，必定可以搜集到一些有关资料的。

关于父亲生平的文字资料，现在只有两处：一是《民国之精华》一书中，约三百字的李积芳小传；二是《凌容众日记》中的一鳞半爪。前者1916年由日本北京写真通信社出版，日人佐藤三郎编，内收民国初年参众两院四百四十三位国会议员的小传，中日英三种文字，有照片，并日文中华民国议会史。后者先在《黄兴年谱》（毛注青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中见到。

小传前面，例行的人品赞誉中，有这样的话："君秉性诚原笃实，痛恶浮华，居常以俭约自持，能耐劳苦；与人交直而不数，喜闻忠言。"后半是简历："前清时，以湖北仕学馆学员，由张文襄选送日本留学，毕业于经纬学校及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归国应学部试，授法政科举人。辛亥武昌起义，回湘光法制局参事，筹办地方自治，旋组织湖湘法政学校，兼充公立法政各校教员。二年，被选为众议院议员。国会解散后，专力经营商矿，不问政

事。及国会重开，始入京仍为众议院议员。”

《黄兴年谱》载，1905 年 8 月 13 日“发起组织并主持东京留学生欢迎孙中山大会”这一条中，记有凌容众日记云：“未初，偕小溪（父亲号筱溪）赴富士见楼，因开会欢迎孙逸仙也，不期而会者千余人。警察原限准三百人，继许九百人。楼中只能容千人，踵门而退者殆又数百人。日本之白浪滔天演说云：吾倾家以谋中国之革命，不成，无以为生，为优人以求食。所以不忍饿死者，欲留一命以见支那之革命也。”

凌容众是父亲的同乡好友，他们一起去日本的。《凌容众日记》（载《湖南文史资料》第十辑）中有他们去日本的具体时间：1905 年 1 月间，平江四人同长沙一批人，“于武汉会齐，九十三人去日本。16 日乘轮离汉口，21 日抵上海，30 日上日本邮船，31 日开船，2 月 2 日抵长崎，3 日在船上度过阴历除夕，4 日抵神户，5 日抵东京。”1905 年 2 月 11 日记有除辫事：“早起改装剪辫，小溪继之。此次鄂中同寅来东者六十人，均结发于顶，独角前峙，若獬貌然。固谓不忘本也。”这也就是鲁迅在《藤野先生》一文中描写的形象：“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

我的老家在平江长寿街，这是湘鄂赣交界处的一个大镇，商业往来直通汉口，略得风气之先。祖父是地主兼茶商。据母亲说，父亲考秀才不第，就到武昌读书去了。戊戌变法期间，湖南开始有人去日本留学。1902 年以后，官费和自费赴日留学者逐年增加，成为全国最多的省份之一。据 1904 年统计，全国留日学生二千八百五十二人中，湖南四百零一人；到 1905 年全国留日学生增至八千人左右，湖南增长更多。这是由于当年的青年读书人，已不热心于科举，有志之士痛清廷之腐败，多好西书，议

论时政，以谋救国。黄兴、宋教仁都在湖北读过书。1902 年，黄兴由张之洞派去日本留学，1904 年回国，和宋教仁、陈天华等组织华兴会，长沙起义失败后，都来到日本。1905 年，他们创刊《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鼓吹民族革命。8 月间同盟会成立后，这个杂志改名《民报》，成为同盟会的机关刊物。陈天华是 1903 年由湖南到日本留学的，著有《猛回头》、《警世钟》等鼓吹反清革命的白话文小册子，影响极大。据统计，头两年在东京参加同盟会的八百六十三人中，湖南籍最多，有一百五十七人（广东一百十二人，湖北一百零六人）。

当年除辫是一件大事，在留日学生中也只有少数人做到，这表示革命精神，同清廷的决绝。凌容众和先父这两位志同道合的朋友，一到日本，还没有上学，就先除辫明志，这说明他们在国内早已接受了黄兴、陈天华等的反清革命思想。因此，同盟会成立后就加入了，成为第一批会员。他们的生年都差不太多：黄兴、凌容众 1874 年（31 岁），陈天华 1875 年（30 岁），宋教仁、李积芳 1882 年（23 岁）。关于凌容众当年的情况，平江县志和有关史料记载颇多，他大概比我父亲行动更激烈一些。1905 年冬，日本政府循清廷之请，颁布《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禁止中国留学生的各种革命活动。留日学生群起反对，陈天华蹈海自杀，以绝命唤醒国人，一批留学生被日本政府驱逐回国，其中湖南来的有秋瑾、凌容众等十多人。1906 年凌回到平江后，特制一铁丝灯笼，上书“凌容众奉旨驱逐回国”，遨游县城大街小巷，痛斥清廷腐败，轰动全城；同时向友好宣传革命主张，传播陈天华的著作及《民报》等书刊。1907 年，凌与日本留学归来的夫人李樵松，毁家兴学，办启明女校，学样正式开学时，第一班只有八个女生，其中有我的母亲李张淑和李六如的元配夫人钟桓英。

关于凌容众的这些事迹,李六如著的《六十年的变迁》第一卷中,都有所反映。凌容众于1929年去世,谭延闿为凌撰墓表,开首即说:"清光绪乙巳,"考送日本留学。居二年,以同盟会会员,触清廷忌,驱逐回国。"新修《平江县志》为凌立传,不忘他启迪新风、早年办学的贡献。

父亲一生重视教育,在日本安心读书七、八年。当年留日学生万余人中,因多入速成科的学校,进大学而毕业的为数很少。宋教仁在早稻田与父亲同班同科,他主要从事革命活动,大概是没有毕业的。父亲不仅自己兢兢学业,还提携兄弟到日本求学。他们亲兄弟共四个,大伯在家经商。据母亲说,二伯抽鸦片,父亲强行让他去日本,学的造纸,后发现他仍进日本的鸦片烟馆,愤而驱之回国。二伯还带回一架小型造纸机,一直搁着,生锈报废。四叔名李积芬(号葵林),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同阎锡山同班,且是好友。(阎锡山是同盟会员,四叔想必也参加了的。)回国后,任北京陆军测量学校校长,为陆军少将,1917年在上海去世。对四叔的英年早逝,父亲非常伤心,在日记中记述他亲自料理丧事的情况(我在大学读书时,保存过这个小日记本)。父亲在北京当国会议员的那几年,还将两个堂弟(六叔、七叔)带到北京读书,1918年送七叔到法国求学。我母亲能到启明女校读书,当然是由于父亲的极力坚持,才能冲破封建大家庭的牢笼。婆婆每学期只给媳妇一吊钱零用,丈夫从自己官费中节省出钱,支助妻子。儿时母亲同我们谈起这些旧事,还常掉泪。母亲很聪明,文言作文在班上总是第一名,还跟着父亲学会做诗,互相吟和。父亲在日本读书时,寒假回过家。我现在保存的父亲手迹,唯有一张破损的诗笺,上面写的四首旧诗,下端一小截由母亲贴补,将脱落的三句填上。

“宿望仙桥”三首，前两首正是写这种春节回家省亲，短短欢聚又言离别的依依情景：

才是离家又说归，一肩行李总相随。
夜长不寐围炉坐，且数鸡鸣到几回。
世事如棋我不知，望仙桥下水依依。
此行犹忆离家日，道我归来腊尽时。

同这页诗笺一起保存的，还有我母亲的半页手迹，这是旧时的一种九宫格毛边纸，其中有一首“春夜”，大概是回赠父亲的：

幽房独坐意绵绵，剔尽寒灯尚未眠。
纱窗月黯花无影，惟有钟声到耳边。

这两页手迹，是十年浩劫后的幸存物，1979 年春节，我平反复职后，回长沙看望母亲，没有问清楚母亲是怎样保存下来的。父样的遗物中有一部李义山诗全刻，广东三色木刻版。看来父亲很喜欢玉溪生的诗，也受其清词丽句诗风的影响。

“宿望仙桥”第三首，涉及时局，大概是学成回国后（1912 年三十岁），到长沙参加法制局，并同宋教仁、谭延闿等组织国民党等活动时，匆匆回乡又急返长沙时作。

三十韶华容易过，一官奔走为谁忙。
若非时局艰难甚，那得偷闲返故乡。

这页诗笺上另一首五律，题为“送江浴民之蒙古”：

边塞烽火急，男儿渡玉关。短衣三尺剑，
匹马万重山。（缺一句）传书有雁还。
楼兰犹未斩，莫唱大刀环。

这首诗的风格，同“宿望仙桥”的儿女之情完全不同了。江浴民是平江人，可能也是留日归来的朋友，其人其事现在已无从打听。录下这一首诗，只是想说明父亲当年的政治思想气质。

从仇鳌（字亦山）写的《辛亥革命前后杂忆》（载《回忆辛亥革命》）中，可大略知道一点这时湖南的情况：“1912 年 8 月 10 日，国会组织法和参议院、众议院选举法公布后，国民党为了争取选举的胜利，随即开始布置各省的选举工作。宋教仁要我回湖南去作司法司司长，以便掌握选举，支援国民党的竞选，同时改组湖南同盟会为国民党湖南支部。”“等我回到长沙以后，才知道办理选举属于行政范围，是民政司的事，与司法司无关。那时湖南民政司司长是刘人熙，不是国民党员。湘督谭延闿便设法将刘调开，让出民政司司长给我。我即着手筹备选举事务，自兼选举总监督，并按湖南五道，派出监督五人。结果，湖南国民党在这次选举中大获胜利。宋教仁为了竞选，这时也回到湖南，到处演说，博得各界人士的称赞和同情。他以百分之百的票数当选为参议员。”国民党当时是由宋教仁在北京组成的，以同盟会为主干，拉拢了统一共和党和其他几个小党派，合并改组而成，成分极其复杂，远非同盟会可比。属于清末立宪派的谭延闿，这时也已参加了国民党。参议院议员主要代表地区，每省选十名；众议院议员代表人口，八十万人选一名，湖南应选二十七名（平江当时的人口过 60 万）。当年选民有年龄、教育、财产等限制，不过

占人口百分之五左右，选民选出代表，再由代表选出议员。父亲由平江县选出，为众议员。湖南国民党组成时，谭延闿、仇鳌任正副支部长。儿时听母亲说过，仇亦山是父亲的朋友。1952 年我从湖南调北京任水电总局局长时，曾接到仇老的一封信（向我介绍一位老技术人员），可惜我当时未能前往拜会。

宋教仁遭暗杀之后不久，1913 年 4 月，国会于北京召开。母亲已经考入了稻田女中第一班，只能放弃入学，随父亲北上。母亲谈过生平坐“花车”（当年称火车“专列”）进京的荣耀。我们姊弟三人都是在北京出生的（1914 年—1917 年）。母亲常谈到父亲这时有两个最要好的朋友，湘阴的众议员陈嘉会（号凤光），岳阳的众议员李锜（号莼荪），同属岳阳道的同乡。《民国之精华》中有两人小传。李锜在时务学堂读过书，同焦达峰、谭人凤友善，参加过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前后的活动。“赋性豪爽，有侠士风，不屑事举子业。”反袁二次革命时，“潜与陈嘉会返湘，勷都督谭延闿独立，再谋改革。事败，走日本，居数月，更名返国，企图再举。迨滇黔起义，往返沪湘，与各旧同志联合响应。”陈嘉会“前清毕业两湖书院及日本法政大学。归国创立湖南法政学堂。辛亥武昌起义，参与南北议和。与黄兴共筹进行。民国元年，南京新政府成立，任陆军部军法局长，旋任南京留守府秘书长。是年，袁世凯任为国务院秘书长，辞之。”黄兴到北京同袁世凯谈判时，陈随行。黄一欧的“回忆先君克强先生”文中谈到此事：“据随先君入京的秘书长陈凤光告我：先君至京时，袁世凯表面上殷勤接待，礼遇甚优，并请中山先生和先君提出组阁人选，而暗地则密派心腹随时侦察先君的行动。”（见《回忆辛亥革命》）母亲同我谈过袁世凯对陈伯伯的关注。袁大总统接见全体国会议员时，礼仪隆重，大多着大礼服，袁一一握手。见到陈时，手握得很

紧，而且连说“仰仗、仰仗”。陈伯伯当时同父亲议论过这一情节：决非好兆头。陈嘉会在北京的几年，即住在我们家中，这是我从小传前面“住址”条目中见到的：“北京都城隍庙街(现名成方街)李宅”。母亲谈过当年国会开会时发生争吵的情景，议员间互相摔墨盒，以致后来墨盒就固定在桌子上了。在袁世凯的统治下，国会议员常受到恫吓和人身威胁。有次威逼着通过一个议案，让军警把住议会的大门，逼到深夜，议案通过，才放议员回家。因此，这三位曾经是同盟会员的岳州同乡，就各自寻求自己的业余爱好吧。母亲说：莼荪好京戏，成了戏迷；凤光跑琉璃厂，专好收藏字画；你父亲好打麻将，劝不听，有次回来太晚，气得将房中可打碎的器物全部摔到地上。父亲在朋友中是有名的“惧内”，母亲则一直以此自豪。我在长沙读中学时，莼荪伯到过家中一次。听母亲说，这位京戏迷后来在南京当寓公时，正式成了票友。父亲去世时，陈伯伯为首操办丧事。1949 年湖南和平解放，南下到长沙时，陈刚去世，得知程潜当省主席时，他曾任省参议会议长。陈的长子去看望过我的母亲，谈到土改时，他父亲所藏书画全部被毁。此事使我长久耿耿于怀。土改时注意保护了曾国藩故家，而忽略了陈嘉会等这些人物。陈送我父亲的他自己画的一幅山水，由我大姐保存下来，现在由我藏着。

1917 年我出生后不久，张勋复辟，举家南迁到平江，那时国会已被黎元洪解散，孙中山在广东举起护法的旗帜，欢迎国会议员南下广州集会，后来到广州议员不足法定人数，于是举行非常会议，选举孙中山为军政府大元帅。父亲去广东参加了非常国会。母亲提到过的父亲朋友，如谭延闿、孙洪伊、周震鳞、覃振、彭元彝等，这时大体都在广东或同孙中山的军政府有密切关系。这些人是否当时都属于国民党的右翼，因而我父亲的政治倾向

同他们相似，我难以断定，也没有必要就此作什么推测。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我的父亲一直盼望广东的军队能够北伐，推翻北洋军阀的统治。父亲从广东带回的纪念物，儿时印象最深的是磨墨用的注水器，伴随我读完小学和中学。那是一个没上釉的本色陶器，水牛趴在地上，牧童爬在牛背上，牧童的背上有个斗笠，将斗笠取下，水由小孔中注入，从牛嘴中吐出。这一类的佛山陶器和其他广东小特产，父亲带回很多，分给我们姊弟和老家的孩子们。谭延闿在广东送我父亲的四幅字条，上书苏轼《张先词跋》"张子野诗笔老妙"这一大段话，一直挂在家中，儿时是能背诵的。

父亲从广州(或上海)，母亲从平江带着三个孩子，来到长沙定居，大概是 1920 年。我幼年的记忆中，有湘军援鄂战争失败，黄一欧从前线狼狈回到长沙，到过我家中的情景。这次战争是 1921 年夏季发生的。战争的结局是赵恒惕与吴佩孚握手言和，吴佩孚的势力直接伸到岳阳。这次战争揭穿了赵恒惕标榜的"联省自治"的戏法，也暴露了南北军阀间权力地盘之争的丑态。赵恒惕原为谭延闿湘军的旧部，这时湘军内讧，分成几派。1920 年 6 月张敬尧败走，谭延闿入驻湖南后，11 月间，即被赵逼走。谭到上海后，赵每年馈以生活费二万元。这就是我父亲短促一生最后两年定居长沙时的政治环境。这时家庭并无可靠的经济来源。前引小传中有"国会解散后，专力经营商矿"一语，据母亲说，父亲曾有意于此，但未实现。对兴办实业，父亲是极力赞成的，例如范旭东(湘阴人，留日回来的)是父亲的朋友，初创久大精盐公司时，父亲买过四百元股票。父亲最反对老家的子弟靠地租生活，分到自己名下的田地和店铺，全归祖母掌管。在旧社会，虽然赋闲，还得维持官僚场面，家中这时还有轿班和"听差"。

当家的母亲，已开始变卖首饰等积蓄来维持生活。父亲对赵恒惕完全采取不合作态度，赵曾拟委父亲为省榷运局局长（食盐专卖的“肥缺”），坚决不就，连过年节送来的几百元“节费”，也当来人退回。父亲曾同母亲有过不接受任何人礼物的约定。有次一个找父亲谋差事的带来礼品，母亲碍于情面收下了，父亲回来后大发脾气，对母亲说：你去给他找差事。父亲脾气急躁，谁都怕他，只有母亲能制服。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母亲是完全尊重父亲的。

父亲是1922年阴历正月11日（阳历2月7日）凌晨去世的，还不满四十岁。头天晚上在一个朋友家打牌，父亲赢了，输家硬要违约加四圈，父亲身体已很感不适，额头擦了些薄荷酊，勉强奉陪，最后倒输了才结束牌局。回家已是午夜12点。由于是过年，这次母亲没有生气。临睡前，还同母亲谈到时局，表示对孙中山北伐的希望。父亲实际患有心脏病，又严重贫血，可是多年大意，当胃病治。章太炎来长沙时，朋友们陪着游岳麓山，父亲拄着手杖，只能到爱晚亭，上不了山。后来的判断，大概死于心肌梗塞，发病一个多小时，就去世了。父亲的好朋友，田秋明，是日本留学的医学博士（开有秋明医院），匆匆赶到时，父亲还说了最后一句话：“田博士，要救驾呀！”我同父母亲睡一张床，这个情景一直留在记忆中：早晨我悄悄站在床头，从铁床栏干的空隙中，摸着父亲冰冷的脚板。还记得开吊“点主”时（灵牌“主”字上头那一点，要从孝子手指上扎出血点上），我没有哭。出殡时，执绋的人群很长，我披麻带孝，骑在别人的肩上；经过内务厅时，穿过围墙门，接受厅长吴景鸿（父亲的朋友）的路祭，我下地跪着。

母亲这时只有三十二岁。我还有个不满周岁的妹妹。不久

后，因照顾不周而死去，更增加了母亲的悲伤。父亲去世后的头件大事，是这个家怎么办？母亲常说的话是，“你父亲去世时，身后萧条，没有任何积蓄。”她还对我们讲过，老家的大伯寄来一百元钱，信上要弟媳携子女扶柩返乡。母亲非常生气，马上将这笔钱退了回去，立下决心：继承夫志，将三个子女教育成有用的人，为丈夫争口气，决不能回老家吃租谷，让儿女成为游手好闲的子弟。在长沙的丧事料理完后，就搬住到租金少的房子，除留下一个老女工外，辞退一切佣人。大姐、二姐继续读书，母亲教我认方块字，我是认识了一千字之后才进小学的。为了将灵柩运回家乡安葬，第二年的冬天，母亲带我上北京，向国会索取了好几千元的抚恤金。归途经过上海，由我的五叔（他到过广州，见过世面）领我去见了谭延闿，此事也一直留在我的记忆中。我进到那所大洋房的客厅后，向谭行三鞠躬礼，谭抚摸我的头，同五叔交谈后，送了二百元奠仪。母亲平生的蠢事之一，是用这一大笔恤金，将父亲的灵柩运回长寿街，大办丧事而花光。这也许是她的责任心、自尊心和带示威性的傲慢心理所致：我要凭自己的本领，为死去的丈夫在家乡最后风光一下，以符合他在世时的身份。丧事完毕，母亲理直气壮，“舌战群儒”，同祖母分家。这在当年是一场了不起的斗争。分家结果，田地祖母分三分之一，店铺各分一个。田租和铺租，每年约三百元左右。土地革命时期，平江红白斗争厉害，田租收入常不可靠。因此，在长沙读书的十来年中，维持一家生活尤其是姊弟三人的学费，主要靠借债和变卖衣物，母亲为此而经历的辛酸苦涩，真是一言难尽。债户是父亲的同乡老朋友，也有多年要好的邻居和房东，还有雇佣过的年老女工。母亲对儿女管束得极其严厉，我们常挨打，打人时总念叨，要尽严父之职。

在广东的两年多，父亲给母亲写过许多信，这些信都贴在一个皮纸钉的厚本上，这是母亲的宝物。我曾经翻看过，称呼是“存真吾爱”，内容多有关教育子女的方法。两个女儿，母亲因一个顶嘴、一个乖巧，而有不同对待。母亲常向我们诉说父亲的为人和种种细事。如老家后园的金橘树，是父亲从日本带回来的树种。多次郑重说过：日本是一定要灭亡中国的。日本从小学教育即作此种熏陶，如说橘子好吃，笋子好吃，这些东西都长在哪里？都在中国，中国物产丰富，日本地方太小。父亲留下的书籍不多，记得有《饮冰室文集》等，秋瑾、黄兴、宋教仁等《荣哀录》有好多本，还有他们的照片。在黄兴的照片上，有父亲写的一句话：“壮志未酬身先死。”这些人物以及父亲同他们的关系，在少年的心理中自然留下深刻印象。我继承了父亲用的一张大书桌，《民国之精华》这本厚书，就是放在书桌小框中的，后来由我大姐保存着。

在延安抢救运动时，就有误传，说我的父亲是红军杀掉的。当时父亲的朋友李六如在延安，问题很容易查清楚。可是1959年庐山会议时，康生又放出这一指责，说我这个人家庭有“血债”，坐定是“阶级异己分子”。当年在部里挨批斗时，刘澜波为了解我的父亲和家庭情况，又去找李六如详谈过。

父亲、母亲和老家人事，1960年我被开除党籍时，都成为交代的问题。1967年11月关入秦城，12月写《历史自传》，68年7月又再写对自己历史的“反省认识”时，对此都要求有最正确的认识。1979年1月6日平反复职后，这些《历史自传》等都交还给我了。现将其中有关段落抄下，以结束这篇小文。

“同家庭有关应予说明的有三件事：一是父亲确于1922年病故。延安审干时，不知怎么传说，我父亲是被红军杀死的；庐

山犯错误时又有人提过此事。在延安时，向李六如作过调查，证实是1922年死去(李六如同我父亲有朋友关系)。关于我的家庭情况，水电部党组后来大概又向李作过调查。

二是老家"移民"死人事。1931年红军攻入平江长寿街时，老家中留下的妇孺约十人，被"移民"送去江西。途中两个祖母和一个堂嫂因体弱死去，其他人后来辗转来到长沙我家中，有一个婶母(即四叔母)，两个堂嫂、一个堂姊、两或三个小孩，这些人都害重病，在我家中短时间内先后死去。由于这些人一直在老家，同我们没有什么感情联系，当时我并没有因此发生过思想上的什么震动。从延安写《自传》起，此事从来没有向党隐瞒过。但1959—60年审查时，乃至开除我的党籍的决定上，都是作为一个问题提出的。

三是家庭(主要是母亲)对我的影响问题。我母亲是一个封建意识、权威思想很浓厚的人，但有些文化，懂得教育子女成人。十年内战时期，平江地区红白斗争极其尖锐，按常情我们在家庭中应当受到一些反共思想影响的。不过事实上，母亲并没有给我们这种影响，相反的，向我们说过父亲的朋友方竹雅(即方维夏，1936年在湘赣边区牺牲)、李六如都是大好人。我们童年时最亲近的一个表哥方国华，大革命时是地方上党的一个负责人，1928年被国民党杀害，这件事对我们影响倒很深。我父亲大概有些民主思想。在武汉大学读书时，母亲曾对我说过：你父亲在世，也会赞成共产党的。在许多封建意识方面，我受母亲的影响很多，但在政治影响上，必须作上面一点说明。"

我在高中读书时(十七岁以前)，就有些模糊的革命思想，喜看左翼小说，还写过平生唯一一篇左倾小说，应当说，都同父亲其人留下的影响有关。在秦城哼旧诗时，关于方维夏、李六如有

过两首绝句,“方维夏”、“父执”:

反戈一击赴南方,北伐从军出豫章。
夜半罗霄山月照,头颅掷地发苍苍。

常闻竹雅六如名,父执当然毋美称;
竹雅抚棺而恸哭,六如两弟已牺牲。

母亲常同我们谈起父亲这两位同乡至交。方维夏是长寿街人,乡下称“方圣人”,日本留学学农业的,当过赵恒惕时期的省议员,第一师范的学监。父亲的灵柩从湘江起运时,方伯伯到河边,扑在棺材上放声痛哭。1924 年到广东,由李六如介绍入党,北伐时是谭延闿第二军一个师的党代表(李六如是另一个师的党代表)。母亲也常同我们谈李六如的往事,这同夫人钟桓英是她的同学又是朋友有关,一直到解放前,母亲回平江老家时,总要到距长寿街 30 里的献钟,去看望她的这位老朋友,并从经济上予以接济。母亲过去还同我们谈过这样的事,钟桓英跟母亲谈过,当年住在文运街时,毛泽东常到他们家中来,她不知多少次为毛洗过长褂子。当年敢于谈毛泽东其人其事,这也反映出一种对共产党的认识吧。社会与个人总是非常复杂的,历史也是非常复杂的。我们过去简单化搞惯了,阶级斗争这根弦绷得太紧了,以至走过那么长而曲折的道路。也是从这一观点出发,我不辞罗唆,写出上面这些有关我父亲的一些材料和回忆。我所知道的就是这样,这当然不是他的传。

纪念齐白石

1983年12月25日为国画大师齐白石一百二十周年诞辰。他的家乡湖南湘潭各界于今年元旦至4日举行纪念活动，出版纪念专集，并筹建湘潭齐白石纪念馆。去年9月间，我就收到筹委会《募征书画金石诗文专函》。犹豫到11月初，终于冒充风雅，写了一幅字条寄去，略说因缘："拄杖闲庭喜小休，新雏掌上正啁啾。后生略得先生意，眼底风光笔底收。右题画家刘宇一绘赠白石大师弄雏图绝句。余自幼酷好美术，五十年代为琉璃厂常客。得画渐多，大师精品不下十帧。尝有句云：白石选精品，鸡雏可谓神；门人牛补柳，此画挂小厅。惜李可染写牧童骑牛、白石补柳条幅，随所藏书画，皆毁于十年动乱，今幸存者才二帧及餐菊楼题画册而已。乡人纪念，征稿于余，不辞谫陋，录以报命，略抒追慕之情云耳。"

我是1934年才知道齐白石的名字的，那时我在武汉读书，收到在北平读书的好友文立徵（1945年初在鲁南游击区牺牲）来信，说他请齐白石刻了一方图章，高兴得不得了。1949年南下途中路过北平，购得黎锦熙、胡适、邓广铭三人合编的《齐白石年谱》，才对画师的生平和为人有了一些了解。对于这一位从细工木匠自学成才的艺术大师，对于他潜心绘事敝屣尊荣的风骨，

敬慕之情不觉油然而生。1952年调北京工作之后，才有机会逛琉璃厂。依我的偏见，就书画而论，齐白石的画逊于他所崇拜的徐文长、石涛、朱耷以及近人吴昌硕诸家，这些人的存画已稀而值昂，齐画价较廉且量多，大有挑选余地。自然，我的多选购齐白石作品，更是出于对其人的崇敬。

到1959年春，我购藏的白石精品共约十幅。就像茨威格小说《看不见的珍藏》中所写的那一位名画收藏家一样，这些已经不复存在的名作依然历历在我目前。如我尝在诗中提到的那一幅《鸡雏》，绘小鸡可一二十只，或觅食，或追逐，只只毛茸茸，有质感，神态飞动，栩栩如生，且有题诗，是我及今所见鸡雏图中之最佳作。李可染绘牛、白石补柳一幅，当年荣宝斋欲收回制版，我想以孤本传世而不许。谁料这一念之差，竟使此作毁于文化浩劫。我爱艺术，但并无据为私有之心，所有藏品，最终总是要交给适当的单位，使其得以保存和流传。几十年来，我失去的东西甚多，书画自是身外之物，失去就失去了吧。只是想到这些艺术珍品虽不是毁于我之手，却是在我的手中被毁掉的，总不能不对白石老人有一种负咎的感觉，对于艺术有一种负咎的感觉。

差可庆幸的是，我还保存着他的两幅精品和一册《餐菊楼画册》。餐菊楼是桐城方子易的画室名。五十年代，我问过荣宝斋的老杨(现已去世)，他知道方子易其人，是二十年代的画家，似曾学过西画。此册收画十帧，白石各附以题跋，或诗或文，饶有情趣。如题山水云："墨点作为归鸟迟，江村晚树远无枝。故乡有此湖山好，可惜翁衰离乱时。"画渔人担网过小桥，白石题诗："江边最好晚凉幽，荻外闲盟水上鸥。莫使江桥空寂寞，肩担鱼网且勾留。"都是清新可喜的小诗。也有题跋忆及童稚时事，如题垂钓图云："阿芝少时喜钓鱼。祖母防其水死，作意曰：'汝只

管食鱼，今日将无火为炊，汝知之否！’令其砍柴，不使近水，余以为苦。岂知衰老干戈，故山无置樵柯渔钓之地耶。”也有题跋论画，如题山水云：“四百年来画山水者，余独喜玄宰、阿长（按即董其昌、徐文长），其余虽有千岩万壑，余尝以匠家目之。时流不誉余画，余亦不许时人。固山水难画过前人何必为。时人以为余不能画山水，余喜之。子易弟誉余画，因及此。”《餐菊楼画册》作于庚申（1920）年，白石五十八岁，已经知名于故都了。他为画册作的跋语说：“老萍最喜餐菊楼写真，能得神似。居于京师，同趣者皆莫及。来京无闻，乃先人非显宦，自家未年尊故耳。余怜其与余少有同病，出此索跋，书而归之。”可见其提携后进之心。大约也是因为忆及自己青少年时代的艰辛，才更对青年艺术家的困顿有同感吧。使我尤为欣赏的是，题跋用了多种书体，有习见行书，有冬心体，有类瘦金体。我同湖南的同志说，俟湘潭齐白石纪念馆建成，当将此册送去，让大家欣赏，也可当作研究齐白石的一种资料。

前面提到《齐白石年谱》，是研究白石其人其事的一部重要文献，其中不少极可珍贵的材料，曾使我生仰慕之情。如记他学画的经历：“他在家一直的养草虫——纺织娘、蚱蜢、蝗虫之类，还有其他生物，他时常注视其特点，做直接写生的练习，历时既久，自然传神，所以他的画并不是专得力于摹古。到壬寅，他四十岁，作远游，渐变作风，才走上大写意的花卉翎毛一派（吴昌硕开创的风气）。民初，学八大山人（书法则仿金冬心）。直到民六、民八两次避乱（按指 1917 至 1919 年间，南、北军在湖南的混战），定居北平以后，才独创红花墨叶的两色花卉，与浓淡几笔的蟹和虾。”又如记他学篆刻：“……一日问铁安：‘我总刻不好，奈何？’铁安答曰：‘南泉冲的础石，挑一担归，随刻随磨去，尽三四

点心盒，都成石浆，就刻好了。'白石默识其言。自是至庚戌十年间果成名。"《年谱》并引了他自述练习刻印情景的诗句："磨石书堂水亦灾。"自注："余学刊印，刊后复磨，磨后又刊。客室成泥，欲就干，移于东复移于西，□于八方，通室必成池底。"白石是花了如许工夫，才成为艺术家的。

至于其为人襟抱，《年谱》引《自记》中谈到光绪二十九年(1903)的一件事："春三月，午诒(即夏寿田)请尽画师职，同上京师。樊山(即樊樊山)曰：'吾五月相继至。太后爱画，吾当荐君。'……璜平生以见贵人为苦事，强辞午诒，欲南还。午诒曰：'既有归志，不可强留。寿田欲为公捐一县丞。……'璜笑谢之。"给慈禧太后去当一名宫廷画师，在一些人大约是求之不得的，而齐白石却鄙弃它，以为苦事。他就是秉着这样的气质和情操才成为一代艺术宗师的。

在那以衣饰取人的年代，这一位卓有成就的艺术家却一直不失农家本色，致为流俗所轻："时有某巨公称觞演剧，坐中皆冠裳显贵，翁被延入坐，布衣褴褛，无与接谈者，梅畹华后至，高呼齐先生，执礼甚恭，满座为之惊讶。翁题画诗云：'曾见先朝享太平，布衣蔬食动公卿；而今沦落长安市，幸有梅郎识姓名。'有感而发，一时传为佳话。"梅兰芳曾向大师学画，两位艺术家声应气求，有相似之处。齐白石与陈师曾、徐悲鸿之间的深厚友谊，互相尊敬与师法，最为人们称道。陈师曾将他的画带到日本，广为宣传，才名动海外。

抗日战争期间，齐白石久居沦陷的北平，写了一纸有名的《画不卖与官家窃恐不祥告白》，表示了对占领者的敌意："中外官长要买白石之画者，用代表人可矣，不必亲驾到门。从来官不入民家。官入民家，主人不利。谨此告知，恕不接见。"在沦陷

区，他往往用诗画寄托心绪意境。如《西江月·重到陶然亭望西山》之下半阕云："城郭未非鹤语，菰蒲无际烟浮，西山犹在不须愁，自有太平时候。"表明他对战争的胜利满怀信心。又如1944年作《题画蟹》云："处处草泥乡，行到何方好！去岁见君多，今年见君少。"表明他看出敌寇已到日暮途穷的境界了。

这一本《年谱》编至1948年为止。新中国成立之后，白石老人更为世人所重，获得崇高的荣誉，这是大家所熟知的。1950年，毛主席曾接老人到中南海住所，作几小时长谈，畅叙乡情，共进晚餐。老人也将他新的力作献给主席。老人深感晚年的幸福，激发了新的创作热情，常日日作画不已，逝世之年尚未歇笔。

《齐白石年谱》是1949年3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已经很不容易找到。我以为很值得重印。不知编者中的邓先生是否有意于此：将白石老人晚年事迹补写进去，使成全璧呢？

1984年.1月

怀念范寿康先生

著名的爱国人士、老一辈教育家和哲学家范寿康先生，离开他刚回归的祖国不觉一周年了。

去年 11 月武汉大学校庆七十周年时，曾向我征稿，特将范先生书赠的字幅原件转送母校，以为纪念。范先生写道："祖国中兴，富强在望。今后只要安定团结，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建设必可完成。余年老体衰，以言报国，心余力绌。但在有生之年，躬逢其盛，生平快事，莫过于此。"字幅后面附有我的跋语："此范师手泽也。犹记'一二·九'运动时，尝代表学生救国会往候，深感长者之同情爱护，足征先生忧国之心，不独师生之私谊也。嗣后云天远阻，趋候为难。壬戌春，先生归来，曾往机场迎接，并躬与校友欢迎盛会。又接德邻，得以请益。一日，公子岱年同志持赠此幅，拳拳以祖国中兴富强相期；老骥伏枥之心，跃然纸上。越二月，先生辞世。呜乎，壮心未已，留付后人。谨以此帧，转赠母校。庶几后辈知前辈付托之重，共励振兴中华之志。"

范先生于 1933 年受聘武汉大学，任哲学教育系主任。我于翌年入学，从新结识的哲学系同学中传来空谷足音：范先生讲授马克思的唯物论。我是工学院的学生，无缘去听讲，但从校刊上读到他写的文章。当年国民党政府的国立大学讲台上，有这样

一位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授，这对思想左倾的学生，正如黑夜摸山路的行人看到前面有人打着灯笼一样高兴。最近武大寄来1932年至1937年几种校刊上发表的范先生的十四篇文章，使我回味当年受到的教益。先生不仅讲授马克思学说，而且宣传救亡图存的爱国思想。《哲学的两个基本方向——观念论与唯物论》(载《文哲季刊》三卷一号)是一篇近两万字的长文，考察了唯心论与唯物论的基本观点和主要学派的发展史，最后谈到富有辩证思想的唯物论。主张“人类的实践乃系检定真理的规准”；“唯物论者承认客观真理的存在”，可以“逐渐加以认知——逐渐向之接近”；这种“新兴的哲学”“总有一天会有光华灿烂的发展的”。范先生在日本留学时受河上肇的影响很深，认为经济学的圣典书籍只有亚当·斯密的《原富》与马克思的《资本论》。他在《近代经济学界的两大伟人》(载《珞珈月刊》1933年创刊号)一文中，介绍了两位伟人艰苦奋斗的一生。最后这样谈到当前世界与中国的问题：世界上贫富悬隔，阶级对立，生产过剩，成为国际纷争的根源；中国生产落后，经济上不平等不自由，受帝国主义侵略，必须唤起民众，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来与帝国主义作斗争。

“一二·九”运动时，我作为学生救国会的代表到范先生家中，向他求教，他完全支持我们的爱国行动。这是我与先生在校中唯一的一次接触。我于1937年5月离校后，即再未见到先生。抗战初期过武汉时，欣闻先生在政治部第三厅负责对日宣传工作。1949年南下过开封时，在旧书铺买到1936年开明版《中国哲学史通论》，这是我当年读过的范先生的讲义，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阐述我国历代各家思想，解释社会发展的规律，敢于这样结论：“真欲为人类全般谋幸福的增进，社会组织的根本

改造是很迫切、很必需的。”“生产关系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演变，也是一件虽欲避免而无可避免的事实。”（见《绪论》）作为一种纪念，这本书我一直保存着。

1979年我重回电力部工作。1980年，范先生的幼子乐年夫妇自美国回国定居，恰在水电科研院工作。乐年同志是台湾留美学生，得加州理工学院的博士学位，自幼受父亲的熏陶，热爱祖国，要求进步。从他那里得知范先生多年来的情况。这年秋天，乐年的姐姐令云从美国回国探亲，要去台湾看望父亲。我请他们兄弟姐妹聚餐，托令云将珍藏的《中国哲学史通论》一书带交范先生，请她转告：我们这些珞珈山的学生惦记着当年的启蒙老师，希望他回来看看新中国的建设，这是他半个世纪前的理想。

我深信范先生一定会回到祖国来的。他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修养，1920年在日本读书时，即向《东方杂志》投稿，介绍《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他还继承了中国传统的优良士风，当年在珞珈山，我们就有此感觉。岱年同志告我，范家的祖先是范仲淹，留有家训“先忧后乐”（先生赠我的字幅盖有闲章“后乐堂”）。范先生的父亲清末留学日本，与陶成章、经亨颐等交谊很深。1926年经亨颐长中山大学时，曾聘范先生为秘书长。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先生又随经回上虞故乡，担任经创办的春晖中学校长，一批知名学者和进步人士曾在此任教。1930年，可能有国民党反动派打击春晖进步势力的背景，曾发生土匪绑架校长与另一教师一学生的事件。范先生的父亲毅然以巨款将三人一起赎出，自此，先生才离开故乡。虽然遭此巨变，在弥天黑暗之中，先生显然没有丝毫动摇以马克思主义传教终身的志向。

果然，1981年9月，范先生终于离开台北到了美国，在华盛

顿女儿家住了下来。他极其兴奋地阅读报道祖国大陆建设成就的出版物，向回来过的华裔学者任之恭教授等询问故土情况。一次友人宴会，他即席赋诗言志："报国应忘老，人间爱晚晴。欣逢中兴日，愿作鼓吹声。"1982 年 4 月 18 日，先生以八十八岁的高龄，由乐年夫妇陪同侍奉回来了。我很高兴，那天深夜，约了叶君健同学一起到机场迎接这位阔别近半个世纪的老师。范先生虽然坐在轮椅上，依然精神矍铄，毫无长途飞行后的倦容。5 月 6 日，我们三十年代的武大学生男女二十多人，聚会欢迎范老师。大家一一作了自我介绍，十分欢快。昔日学子现也垂垂老矣，此情此景，大家都有一种幸福之感。

范先生回来后的新居，正好与我的住处相邻。去年春节前夕，我去问候。他朝南坐在客厅中间，红光满面，谈锋很健。他告诉我，那本《中国哲学史通论》，他又带了回来，已交三联书店重版，并为《通论》重版本写了序言。序言不长，而热情洋溢，最足以表现他回国以后的兴奋心情："目下祖国中兴，生气蓬勃，富强远景已在目前，国人扬眉吐气之日已经到来。际此盛世，凡我同胞更应淬厉奋发，对提高今后精神文明及物质文明作出更大贡献，而且在于未来，国人不应妄自菲薄，要使祖国之精神文明及物质文明居于整个世界人类先进之行列，发扬示范之作用。"

最近岱年同志将他父亲的一些有关资料交给我看，其中有一封逝世前四天收到的国外学生来信，足见范先生作为教育家感人之深。信中回忆了 1954 年在台湾大学听范老师上哲学课的情景："先生讲授辩证唯物论虽然只有短短一百分钟，也没有用唯物辩证等词儿，在 1949 年以后的台湾却是绝无仅有的。学生的印象因之也特别深刻。"他为什么要给范老师写这封信呢："学生出生于日据时代的台湾，据家谱是漳州渡台第八代，在祖

国大陆并无亲人。老师虽只教过学生两年，也无深交，但是基于思想上长期以来对老师的敬仰，可能是目前在国内的学生心许的最近的长辈了。”

抗战胜利后，范先生应台湾行政长官陈仪之邀，前往台湾参加接收工作，任教育处长。他在美国停留时，可能由于年事已高，曾为自己一生写了一篇简短的自述，其中记述了初到台湾时的情况：“台湾自割让以来，为时已五十年，日人实施皇民化教育，雷厉风行，无微不至。称日语为国语，讲日本语，看日文报，读日文书。台湾同胞不准任小学教师。台北帝大(即今之台湾大学)只准台湾学生攻读农、医、理、工，不准习文、法，且名额仅占学生八百人中四分之一。此外，又有所谓‘国语家庭’，虽在家中，亦只准使用日语对话，‘改名姓’，则须将原来之姓改成日本之姓，如小林、井上等等。余针对时弊，乃以一切‘中国化’为号召，组国语推行委员会，普及国语教育，创立师范学院，积极培养合格教师；提倡讲中国话，看中文报，发扬祖国文化，宣扬血统一致。举凡能促进‘中国化’之一切，无不尽力推行，期望台湾同胞皆能不忘祖先，真能投入祖国之怀抱。”这是范先生对我国家民族的一大贡献，显现了他的远见卓识。1946 年夏，他负责的教育处还考选了一百名公费生，到大陆的大学学习，使他们进一步熟悉祖国文化。其中约一半左右回到台湾，有半数留在大陆。留在大陆的这批台湾知识分子，解放后多成为宣传、外交等工作的骨干。1947 年“二·二八”事变，台湾知识分子被株连的很多，范先生各方奔走，多所保全(如原台北建国中学校长陈文彬，即由他保释后，经日本回大陆工作的)。这年 5 月，他从政界引退，到台湾大学哲学系任教。许寿裳被害时，他立即赶到现场，悲愤异常，回家整日默默不语。

据岱年同志说，他父亲回国后，虽然只过了短暂的十个半月，却实现了他在台湾三十多年梦寐以求的许多愿望。这些他都在日记中一一予以记载，并同儿女们常谈到的。

他第一次来到古都北京，游览了紫禁城和颐和园；观赏了景山的牡丹和北海的秋菊。“五一”前夕，为《北京晚报》写诗：“华府樱花谢，东飞燕市来；神州无限好，喜见牡丹开。”

他又回到了阔别三十五年的故乡浙江上虞，祭扫了祖父母、父母亲的坟墓。白马湖畔春晖中学的活泼的少年，对这位五十年前老校长的热情欢迎，使他十分激动。他在台湾时曾写诗怀念老家和白马湖：“衰年更切故乡情，汉有曹碑晋谢茔，最是傍湖花似锦，柳荫三月啭流莺。”而今这一切以新的面貌重现在他眼前。他兴奋地写下新的诗句：“半生飘泊东归客，喜见故乡万象新。”他重游了杭州西湖，楼外楼的醋鱼和莼菜更胜似当年。

他见到了分别三十五年的长子、次子，见到了从未见过面的两个儿媳、四个孙儿与长婿。他与在京的儿孙们欢度了他的八十八寿辰，又一起欢度了去年的春节，这是他漫长的一生中第一次与如此众多的儿孙共度佳节。这天晚上他同晚辈谈了范氏家训与家风。

他终于见到了分别半个世纪左右的老友叶圣陶、胡愈之、吴觉农、徐逸樵、沈兹九、董聿茂、汤佩松、陈礼节、胡子婴等等。到京后第二天早晨，经普椿来看望，他还认得这就是“普妹妹”。经普椿是经亨颐的女儿，他的学生。廖承志夫妇在他的生日，还特地来为他祝寿。成仿吾第二天就急着要来看他，因为几十年来他们彼此都不知道老友还在人间。他曾到年逾九旬的顾寿白的卧室促膝话旧，会面不久，顾老就去世了。他把仍在台湾的许多亲友的口信、近况，一一告诉了他们在大陆的亲友。许多相识或

不相识的人来信向他打听在台亲人的地址和近况，凡是他知道的，都一一回信作答。骨肉分离、长相思恋之情，他有最深切的感受。

他参加了郭沫若故居的开幕典礼，回来后写了《怀沫若学兄》的诗篇："福冈惠书一朵云，申江远别见深情，半生飘泊今归去，遗恨无缘再见君。"他亲笔写了《经亨颐先生传》，这是他敬仰的长辈；写了《忆达夫学兄》短文，表达对故友的深切怀念。他十分敬仰1949年慷慨就义的陈公恰先生(陈仪)，本想为他写传，后来得知福建的故旧钱履周已经写好长篇传记，感到十分欣慰(遗憾的是不及见面，钱先生就已去世)。

他最为感奋的是，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常务委员，被邀请列席党的十二大开幕，还受到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邓小平、邓颖超、廖承志、胡愈之、杨静仁等，以及民革、民盟中央的宴请。他写信给国外的子女说："国家待我至为优渥，当以有生之年报效国家，为祖国统一而努力。"

范先生回国后，心情愉快，耳聪目明，外出不再用轮椅，自信还能再活十年，希望能看到祖国的统一。儿女们劝他写回忆录，他却准备与原武大学生方攻石合写一本新中国建设的成就，已拟定提纲，自己动手剪报，收集资料。他说，我在台湾和海外是公认说老实话的，我写出来的东西，别人是会相信的。

范先生坚持记日记到逝世前夕。去世前五天，他手抄于右任的两句诗句："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这可能是表达他自己晚年终于回到祖国的庆幸，是对于右老晚年思乡之切的哀思，也是对还留在海峡那边的亲友故旧的怀念吧。

1983年元宵节(2月27日)第二天早晨，我突然接到岱年同

志的电话，说他的父亲昨夜因心力衰竭而溘然长逝！他弥留时没有什么痛苦，遗容十分安详，犹如熟睡。子女们已把父亲的一份骨灰安放在八宝山纪念堂；一份已安葬在故乡，与早在三十年代初去世的胡氏夫人合葬，廖公亲笔写了碑文；还有一份骨灰准备将来送到他生活过三十六年的第二故乡台湾台北，与 1979 年在那里逝世的唐氏夫人合葬。

一代师表范寿康先生留给后人的东西是很多的，除开一个终身信仰马克思主义、热爱祖国的知识分子的真诚心灵以外，据不完全统计，他的教育和哲学等方面著作近三十部，文章约二三百篇。与《中国哲学史通论》同时重版的有《朱子及其哲学》。闻有关方面正在搜集范先生的著作，准备陆续出版。范先生逝世时唯一的遗憾就是没有看到祖国的统一；但他生前曾一再表示，经过海峡两岸同胞和全世界炎黄子孙的共同努力，祖国是一定会统一的。

1984 年 2 月

纪念何炳麟先生

今年4月22日，为湖南岳云中学建校八十周年，越二月为创办人老校长何炳麟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学校和有关方面将举行庆祝活动。从1929到1934年，我在这个学校读书，是高中第十一班的毕业生。学校负责人嘱我写一篇纪念何校长的文章，实义不容辞。

岳云是当年湖南办得最好的私立中学之一，有“北有南开，南有岳云”之誉，这同何校长的辛勤办学和远见卓识分不开。在创办初期，何校长即提出“延聘好教师、招收好学生、办成好学校”的三好目标。如1920年从北方聘来的体育教员朱恩德，曾获远东运动会十项全能奖牌，月薪高于文理科教员，体育从此转入现代田径球类，一时开风气之先。五四运动后，学校锐意革新。如1921年招女生，杨开慧、蒋玮(丁玲)、许文煊等六人，因参加社会活动，不容于原校而转学岳云，震动长沙，报纸称为“学界的光荣”。如初中、高中三三制，湖南也从岳云开始。如因感体育、艺术、教育人材奇缺，先后设此三种专修科(贺绿汀即艺术专科毕业)。何校长用人唯贤唯才，有口头禅：“误人子弟，男盗女娼。”所聘教员不论名位多高，如果不负责任，断然解聘。二十年代初，徐特立、何叔衡等都曾来任教。何校长又倡导校友治校，

有许多老校友在校任职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有的终老于校。

岳云重视体育,实行德智体全面发展,尤以数学著称,这同何校长本人有关。他于 1903 年赴日留学,习工科。1908 年回国后,在湖南高等实业学堂并几处中学任教,自编《几何图学教科书》,1910 年出版,名噪一时,为各校教本。数学教材自成体系,早年多由教师自编。我们读高中时,高等数学、解析几何、物理、化学等均用英文原本,以交大等第一流大学为升学目标。数学习题用纸为学校专制,学生演习无不力求工整,乃至划等号都用界尺;通过作业,包括各种实习报告,养成学生一丝不苟的认真作风。文亚文、谭创余两位数学老师,讲课严谨精练,丝丝入扣;化学老师张德粹兼训育主任,待学生至严,注重传授新的原理知识(张先生于抗战前赴北欧留学,为波尔门生,抗战胜利后,一直在台湾大学执教)。他们的高尚风貌至今留在记忆之中。学校规定数学、体育一科或其他两科不及格者,一律留级。如此重视体育,使我们一生受用:我与我的同班同学汤钦训(在延安即从事军工事业,已从航空工业部离休)、李升震(原福州大学副校长)在岳云和武汉大学时,我们三人都参加球类校队,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现在年逾古稀,身体都没有摧垮,我与老汤还常在游泳池共游千米。毕业考试,则一科不及格者,不给证书。考勤也极为严格,缺席晨操一次或作业一次不交,即作旷课一节论,学期旷课满十八小时即除名。还记得长沙原校址办公大楼正厅中,悬有大幅各班学生旷课记录表格,旷课一节划一红道,触目惊心。何校长立法执法,不徇私情。他的儿子何国福某期旷课十八小时,教务主任迟迟未执行规定,他知道后,亲自书贴布告,开除出校。严规、严师自出高徒。1924 年,湖南中等学校选优会考,各校选派十名学生参加,一、二、三名均为岳云学生,

总名次也列全省之冠(第一名谢伯俞,同年以第一名考入北师大,旋参加共产党,1926 年与李大钊同时就义)。1932 年后,全省高中毕业生都参加统一会考,岳云共参加十一届,总成绩都名列前茅,升学率也高。我们高十一班约三十人,会考列甲等者半数以上,半数考入国立大学,未能升学的多因家境困难。高八班的李薰(原科学院副院长,已去世)、刘克(刘相尧,原铁道兵副司令,因脑病致残),高九班的李镇湘(前华东军区卫生部长,已去世)和高十二班的孟少农(孟庆基,著名汽车专家,不久前去世)等,在校时都是有名的高材生。我的同班文立徵(文立正),抗战八年一直在鲁南打游击,任军分区副政委,兼任过铁道游击队政委,于 1945 年初牺牲。高十三班的杨一楚,抗战时为飞行员,1941 年重庆空战中,打下三架日机后追至宜昌,因油尽撞敌机同毁,壮烈殉国。这两位英雄人物,在校时也都是高材生。还有同班李震勋,毕业于湘雅医学院,抗战初即去延安,从事医学教育,曾任大连医学院院长,"文革"时不幸辞世。

当年湖南的私立中学,校方多靠官场以取得捐助,何校长却不为此,而依靠朋友与校友。长沙经武门毁于大火的原校址,进大门的花坛正中,立有《陈宜诚先生纪念碑》。陈先生为名中医,岳云校董,早年捐银二万余两建校,并捐赠五个班级若干免费名额,以录取家境贫寒品学兼优学生,个别无力升大学者也得校方资助。何校长尝激昂地说:"办学敛钱,天诛地灭。"三十年代,他本人薪水每月一百元,低于教务主任。1931 年校董会决定校长室每月开支四十元办公费,他坚持不领。这笔钱积久后终转入学校基金。他个人生活异常俭朴,经常穿一件旧蓝布长衫,六十岁时还是棉袄过冬。有些老校友过意不去,送他一件皮袍,直到去世,家无余财。真可谓满门桃李,两袖清风。

何校长坚持“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的宗旨，最钦佩蔡元培的民主办学精神，自认教育清高，反对学校成为达官贵人追名逐利之所，一生不加入国民党，同国民党始终保持距离。1935 年，国民党湖南省主席何键曾以巨款为媒，想作岳云的董事长，何校长以校友会、董事会未能通过为辞，予以拒绝。抗战初期，国民党一部分军政机关迁至南岳，此时岳云办有南岳高级农业职校。正来南岳的蒋介石闻说此出名学校，下条召见何校长，他称病就医，马上躲到白果农村去了。抗战前后，何校长思想日趋前进，南岳农校就聘请有共产党关系和思想进步的分子主持校务。1938 年，还由长沙八路军办事处派来三个党员到校任教（长沙大火后，学校全部搬到南岳），从此岳云建立了地下党的支部，曾由党员带领六个进步学生到延安。解放前夕，在何校长支持下，党支部领导留校学生护校；在白崇禧军进逼下，他表示要与学校共存亡。

长沙和平解放之后，我在《新湖南报》工作。何校长等来到长沙，要我挂名为学校的董事长，老校长很看重我，我非常惭愧，一直未能为母校做何服务，当时只是将学校旧址由报社买下来，以解学校经济的特殊困难。1936 年，何校长在南岳创办农校时，志在办“有土地的学校”，他在文章中说：“嗣今以往，人材教育与生产教育，兼程并进，而皆以民族复兴为归。”学校曾开辟三个林场，租地建柑桔果园，现已松林参天，柑果累累。可是在 1950 年初的减租退押运动中，地方工作组以果园田土问题，逼令何校长负责退押，使学校发不出工资，且有断炊之虞。何校长召开职工大会，将自己仅有的一件皮袍、一块怀表和一双皮鞋拿出，交公处理：“希望大家共度难关。”于是学校师生开荒种地，蔬菜柴薪做到基本自给。这些事情，都是这次学校寄来的资料中，

我才知道的。随后发生的一件冤案，几乎动摇了学校的根本。1951年初，由于我的介绍，省教育厅派原第二师范校长杨朴庵（武大教育系毕业，我的同级同学）任岳云副校长。是年5月，地方公安部门杯弓蛇影，以杨为首的“反革命特务案”被捕师生二十余人，此事对全校师生自如地震。省委得知后，随即调来全部案卷，我参加了研究，显系捕风捉影，纯属假案，很快予以平反。地方有关领导干部因此受到处分，在学校召开了平反大会，对老校长自是极大宽慰。1959年三届全国政协开会时，何校长以八十三岁高龄出席大会，作了发言，说：“我年未老，心更未老；体未衰，志更不衰。”我去看望他时，他正同周世钊一起受到毛主席的接见，非常兴奋，谈到同毛主席谈话的详情，最后还议论到以游泳锻炼身体的问题，说他在日本时，常到海滩游泳，沐日光浴。

何炳麟先生一生致力教育事业，毕生精力奉献给岳云中学。建国后，先生历任湖南省人民代表、省人民委员会委员、省教育工会副主席、省政协副主席、民进长沙市主任委员、全国政协委员，1966年10月2日病逝于长沙，享年九十岁。骨灰原葬南岳半山亭下，1985年移放于长沙革命公墓。

去年12月29日，曾书怀老校长五绝寄母校，略表心意：

衡岳白云耕，春风桃李情；
悠悠八十载，能不忆先生。

1988年4月4日

楚怡校长陈润霖先生

——序《教育家陈润霖生平事略》

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维新志士倡导新学，湖南得风气之先，新学校如雨后春笋，私人办学的尤多。新化陈润霖先生留学日本回来后，于 1906 年创办楚怡学堂，此为湖南最有名的私立学校之一。今年，将庆祝学堂创办八十周年。先生毕生致力于教育事业，曾参加辛亥革命和倒袁、驱张诸役，不为高官厚禄所动，艰难创业，勤俭办学，历经坎坷，奋斗不已。长沙大火，楚怡校舍化为灰烬。抗战胜利后，为学校迁回长沙，先生不顾病躯，往返奔波，劳累过度，于 1946 年 2 月卒于舟中。先生与楚怡生死相依，被安葬在新化楚怡工业学校校园，因治丧费绌，至今墓碑未立。

中国近代以来的落后，是由于国家社会制度的腐败和经济文化的落后。志士仁人前仆后继，都是为的改变这两种状况。中国知识分子受过程度不同的科学与民主的洗礼，具有爱国精神。从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大革命、一二·九运动、抗日战争、直到后来的解放战争，可以这样说，他们总面临着一个选择道路的问题。其情况大体是：除开极少数同反动统治者共命运之外，始终参加革命斗争、成为共产党员的是少数，而大多数则在旧社会从事某种职业，许多人以“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科学救国”

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坚守岗位，终其一生。

北洋军阀与蒋介石都维护封建文化和实施独裁统治，对科学与民主采取敌对或排斥的政策。因此，知识分子在旧社会道路艰难，报国不易。在旧社会中生活的知识分子，他们对改变腐败的社会制度虽然无能为力，但是他们在各自岗位上从事的实际工作，特别是教育、实业、卫生和科学技术等等，为国家人民所需，都是必不可少的有益工作。尤其普及教育，培养人才，乃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百年大计，不可一日或断。可是，过去我们囿于“左”的思想，总是批评他们那些“救国”思想为改良主义，指责他们“为反动政府效劳”，抹杀他们为国家、人民所作的贡献。陈润霖这样一位办学四十年的著名教育家、爱国人士，为教育事业鞠躬尽瘁，死后四十年墓碑未立，是使人感到不安的。先生早年同毛泽东、何叔衡等一起同北洋军阀作过斗争，后来白色恐怖时还保护过共产党人，尤其令人怀念。

教育是一门科学，科学是反映客观规律的。教育有自己的规律，教育工作应遵循教育规律。读过润霖先生的《生平事略》后，这点感受特深。先生是一位出色的教育家，深知教育规律。八十年前，他就主张由基础教育办起，先办小学，由简陋到完善，办成一所六年制十二个班级的完全小学，并附设幼稚园。他不怕标新立异，及时引进当年西方各种先进教学制度和方法，使楚怡终成为湖南乃至全国的第一流小学。办好小学之后，为振兴实业、培养工业人才，1914 年先生又创办楚怡工业(高中专科)学校，设有土木、机械、矿冶三科，并附职工班，对学生重视实际技能的训练。1923 年又增办楚怡中学(初中)。从幼稚园、小学、中学到工业专科，互相衔接，如此三校一园的完整体系，当年在全国亦属罕见。

我是楚怡的学生。1923 年进小学,1928 年毕业。“文化大革命”时,在狱中忆旧作诗,关于楚怡的有好多首。《龙胆紫集》中收了两首,其中一首这样说道:“激励孩童向上心,间间教室挂红星;手工劳动好习惯,办学当年善创新。”注解中说:“学校有创新精神,学生劳动课有木工、泥塑、种菜等。《好习惯》列有生活、学习、礼貌、互助、劳动等几十条,硬纸印出,人手一张,定时开会,学生之间民主讨论评定。”楚怡确实是德智体美四育并进,有各种完善的专科教室,有体育馆,有校园。还重视劳动教育,让学生参观工厂,春游写生,自制标本。教师都是一流的,极为认真负责。我一直记得我的启蒙老师韩竹筠、陈奎生夫妇(我的母亲也是他们的朋友)。记得五、六年级时还实行过道尔顿制,让学生有自学、自治能力。我在小学由于学习成绩优异,曾连跳过两班。我至今喜欢运动,爱好美术,追求知识,也是在楚怡受的熏陶。我即届古稀之年,回顾一生,足堪自慰的是自己始终尊重科学与民主精神,饮水思源,首先幼年时期即得益于楚怡的教育,得益于润霖先生的办学精神。楚怡确实是一所好学校,在基础教育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应当很好总结,发扬光大。

志刚学兄是润霖先生的长子,楚怡事业的继承人,我的同学。他撰写了《先生生平事略》,嘱我写篇序言,匆匆写上这么一点意思,真是挂一漏万。好在楚怡桃李满天下,润霖先生一生业绩,会有很多人来记述评说的。

一个献身教育事业的人

——记傅任敢教授

傅任敢先生的译著要出版了，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虽然我不懂教育，也没有读过他的文稿，但深知傅先生为人的真诚，治学的严谨，像这样一位言传身教、毕生不懈、鞠躬尽瘁的老教育家的译著，很有必要留传。

由于家庭的关系，我很早就认识傅先生。1934 年上北平升学时，曾在清华园傅先生的家中度过一次周末。抗战时在延安，就听说他在重庆主持清华中学，成绩斐然，学生可以订阅《新华日报》，地下党在该校有基础。1949 年南下到长沙时，我们终于又会面了，他的家就在我母亲住所的隔壁。我回家探望母亲时，他的夫人杨仁(我大姐的同学)特为放了一挂鞭炮。傅先生当时欢庆中国的教育事业也得到解放，对党是无条件的信任。在中等教育方面，他是一个很有抱负的人。1950 年初教育界的友人约他到北京，发挥他的才能。

1952 年我也转业调到北京，由于隔行，大家都忙，五十年代似很少来往。六十年代初，我们同处于逆境，于是有过一两次往来，他也没有更多诉说他遇到的不幸与不公平，只是非常同情我的遭遇。他还送了《〈学记〉译述》给我，本子很薄，但很严谨，知道他仍在从事学问，这就很好。

1979 年 1 月回到北京后，听说他身体不好，特去看望，当时谈到许多想做的事情，后来又寄来文章与我。《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一书的增订本出版，他一定要去一本。在他去世前不久，我曾到医院去看望，他还将读了《龙胆紫集》后写的一首诗送给我，这时他躺在床上，已无力多说话了。他的夫人告诉我，他还在挂念着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写稿的事。追悼会上，看到他的老朋友与弟子们的许多挽联、悼词，使人深受感动。

最近由于湖南教育出版社要我为傅先生的译著写篇小序，他的女儿平生送来了许多有关材料，包括他在解放初期写的自传，以及他去世后一些同学和学生写的回忆文章，使我更清晰地看见了一个勤勤恳恳的教育家在半个多世纪中走过的艰难道路。傅任敢教授只不过是“五四”以后的万千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中的普普通通的一人，并无赫赫之功与籍籍之名。但正因为如此，他就有了代表性，我们就可以把他作为认识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广而言之，也可以作为整个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标本。下面，我就从有关材料中摘抄一些，稍作文字整理，按时间先后排列如次。

傅先生求学时代的情况，在他本人于 1950 年 5 月 1 日写的一篇自传中讲得比较详细。

中学时代：

> 我是一九一九年进的长沙明德中学，一九二三年冬读完四年毕业，那时正当五四运动以后，毛主席在长沙一师附小教书，组织文化书社，传播新思想。同班有位庞人侃①

① 庞是被湖南军阀赵恒惕杀害的黄、庞二烈士之一的庞人铨的弟弟，后来也参加了革命。

君，每周周末要从北门跑到南门去与毛主席相聚。我受了他的影响，也爱看看新书新报，后来夏曦当长沙学生联合会会长，我是明德的出席代表，与夏曦、刘梦苇等常有见面机会。

一九二三年冬考完毕业考试，我因平时有感于学校风气之坏，作了一篇短文投给长沙《大公报》，批评校政。不料付排的那天晚上，学校负责人在报馆看到了原稿，回校召开会议，决议扣留我的毕业文凭。这个打击使我后来决心学习教育。

这回因写批评稿而扣发文凭的事，后来他在 1955 年 9 月 15 日写的另一篇材料中，说得更具体些：

毕业考试后，我写信给长沙《大公报》，批评校务，被主事谢祖尧发觉，报告了在京的校长胡子靖，扣留我的文凭。（按：其中提到的谢祖尧，是后来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的负责人）

1925 年傅先生考取了清华大学及北京交通大学。他进了清华大学的教育心理系，至 1929 年毕业。这几年里的情况，他在自传里说：

我参加了二次清华的校政改革运动。第一次是北伐军快到徐州的时候。清华本来是个留美预备学校，从一九二五年起才改为大学，我们便是大学部的第一级，当时留美预备部还剩下一九二八和一九二九两级没有毕业。北伐军到

了徐州，留美预备部的同学着了慌，恐怕北伐军到了北京以后，他们出不了洋，于是暗中要求校长曹云祥，准他们立即提前出国。曹与外交部部员组成的校董会也乐得借此多领一笔经费，大家分润，估计可达数十万元。不料在开校董会的前一日被校内教授们知道了，又传到了学生中间，我们便起而反对。我们的主张是：不能提前出洋，不能动用基金；我与另外二位同学作为代表，去见当时的外交部长王荫泰。王一见面便说："我已与曹校长说过了，你们大学部也应当选派一部分出洋才公道。"想收买我们，我们感到受了曲解与侮辱，一气便回校公开了王的谈话，并加以驳斥。后来这件阴谋便没有实现。第二次是北伐军到京以后，我们主张清华改为国立（以前是外交部部立），基金独立（以前被外交部少数部员把持），和欢迎罗家伦做校长。我不是国民党党员，也与罗无一面之缘，只因在中学时爱看《新潮》之类的杂志，对他有番仰慕之心，加以清华校友中有人以大清华主义为号召来反对他，激起了我们的反感，因此更要欢迎他。不料我与另外二位同学作代表到南京去接罗的时候，他一见面便把他的校务计划中的某一条给我们看，那一条的内容也是要把大学部的学生选派一部分送出洋。我们当时又感到了被曲解与被侮辱，回校又公开见面的内容，以后我与罗便再没有来往了。

我在清华最后的二年的生活是靠自力支持的。① 支持的办法是写点文章投到杂志上去，主要是《教育杂志》与《中华教育界》，其中有几篇比较艰涩的译文被改登在《民铎》杂

① 那时傅先生的父亲叫他停学回乡，他不肯，父亲就断绝了同他的经济关系。

志与《学衡》上，这些杂志的编辑人除吴宓教过我翻译术以外，至今与我都不相识。此外与同学办过一个《弘毅月刊》，登的都是国学家王国维、梁启超等人的讲稿，一个《认识周刊》，登一些零碎论文。

看来，傅先生的这篇自传乃是为了交代历史人事关系而写的，所以着重写了那些带有政治活动性质的内容，而一点也没有涉及日常学习的情况。特别是由于他的谦逊，羞于为自己评功摆好，好些事情都没有写上，因此从他的自传中并不可能看出他的全貌。当年的清华同学、现任财经学院教授曾炳钧，在《对任敢学行的片段回忆》一文中说：

任敢原名举丰，一九二五年考入清华大学，一年后专攻教育心理，学习成绩优良，甚得教师赏识。任敢沉毅有识，明敏笃实，遇事独抒己见，侃侃而谈，不畏强力，不喜阿附，故改名任敢。好读书，尤其读罗素著作，有文才，每有写作，构思成熟，即奋笔疾书，短时立就，不多改易，而明畅曲达，文彩斐然。

任敢既善于学习，又干练多才，待友诚信，以此为同校学友所推重。与同年级同学牟乃祚、汤象龙、刘心铨、曾炳钧、袁翰青等尤友善。任敢在学生时期无党派，只加入当时校中一、二学术友谊团体，如“青年励志学会”，“弘毅学会”，参加编辑《弘毅》会刊。一九二八年，与曾炳钧、徐士瑚、牟乃祚等创办一知识性刊物《认识周报》，并与曾先后担任总编辑。该刊虽刊行不久，但在读者中反应良好，当时清华大学著名教授翁文灏、吴宓及北京大学教授陶孟和等，对该刊

均交口称誉。

任敢在清华学习时，正值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革命的学生运动风起云涌。任敢此时注意力虽集中在学习，但经常参加进步的学生运动。一九二六年三月北京学生发起了反抗军阀，向段祺瑞政府请愿的运动，遭到武装镇压，发生了“三·一八”惨案，死伤学生数十人。同年级学友韦杰三烈士中弹死，汪燕杰（振儒）受伤，任敢当时是在请愿队伍中亲历险境的幸免者。任敢在校内还积极参加了驱除腐恶势力改革学制的学生运动。

当年清华同学、现在四川财经学院的汤象龙，在《关于傅任敢教授的历史资料》一文中有类似的介绍：

一九二五年考入清华大学第一级本科教育心理系，在校学习成绩优异，深受校系领导器重。三年级时担任第一级学生会主席兼学术委员，经常为《清华周刊》撰写论文，并翻译过有关欧美教育心理学论文多篇，刊在《教育杂志》和《大公报》等刊物。四年级时担任清华大学学生会主席，主编过《认识周刊》半年，写过一些论文。当时学校师生称他为一个“著作等身”的青年学者。在三四年级学习期间，适值国内政治动荡不安，而他仍专心学习，未参加任何党派组织活动。但一九二八年学校掀起反对乔德福校长的风潮，他曾代表全校学生赴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请愿，坚拒乔德福来校，深受全校师生赞扬。

在清华大学毕业后，傅先生回到湖南，在他的母校长沙明德

中学担任教员和教务主任。1933 年他又回到清华大学，任校长办公室秘书并兼任成府小学校长，直至抗战爆发、北平沦陷时为止。关于这一段情况，当时的同事汪健君写给傅平生的一封信中说：

我和令尊论交，始于他留校任校长秘书职务时，他办事明敏有条理，待人谦虚和蔼，所编《清华同学录》，创立规模，详而不繁，简而不漏，一时称善，嗣后即遵为楷式。那时我在清华教务方面任职，得常接晤，对他非常钦佩。从他那里，我受到了许多教益。芦沟桥事变突发，学校南迁，我和他均被留在原校址内任清华大学保管委员会委员，护理校产并处理善后事宜。

在入侵者的铁蹄之下护校，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何况他当时还远不只是护校，还实际进行了支援抗日军队的活动。他在自传中说：

> 抗战第一年，学校把我们留下保管校产，那时我为清华教职员公会兼办成府小学，剩有一万六千元基金，经由叶企荪先生接济了冀中吕正操将军。我们在校内受过日本军人多次的压迫与侮辱，其中最危险的一次是敌酋寺内要来驻扎。我关照了同事美国人温德，转告美领馆提出口头抗议，驻校的牟田口一定要我们限期交出报信的人，幸多方调解拖延，才算不了了之。

1938 年日寇侵占清华园，傅先生间关万里，从沦陷区到了

大后方，在重庆创办了清华中学并担任校长。关于这个学校创办的背景，现重庆第九中学（原清华中学）致校友的信中，作了如下的说明：

一九三八年七月份，董必武同志指示当时中共重庆市委委员罗清同志："应该在重庆这个地方创办一所我们党领导的中学，培养大批思想进步、具有党的优良作风的青年。"罗清遵照董老的指示，与地下党其他同志及清华大学校友经过两个月的紧张筹备，又得到了社会知名人士的襄助，九月，终于在重庆江北胡家湾成立了清华中学（后迁到重庆士桥现校址）。清华中学开学不久，即成立了中共清华中学党支部。

傅先生是怎样担任这个学校校长的？在他去世之后，该校在京校友写了如下一份材料：

傅任敢先生是一位爱国主义者，是进步的热爱民主的教育家。他热心于教育事业，抱着教育救国的思想，兢兢业业，把清华中学办成一个进步的、具有优良校风的、教学质量高的、在西南地区比较有名的学校，为国家和民族培养了一大批人才。

傅任敢先生"较开明，不大干涉学生思想活动，学校里的教师中多进步分子，学生甚活跃"。这是一九五〇年十二月重庆市委政策研究室编的《解放前重庆概况》一书对他的评价。傅任敢先生在清华中学办学十年的情况，的确是这样的。他对国民党教育当局规定的一些反动措施，采取抵

制的态度，坚持不设童子军课、军训课和公民课。国民党企图在学校建立党部和三青团部，他予以拒绝，从而掩护了进步势力，使学校地下党组织得以发展，学生运动中师生未遭到逮捕。解放前夕，为了保护学校，傅先生利用当时在国民党军界中有名望的一位人士、也是学校的董事长吕超写了一块“学校重地，禁止驻军”的木牌，竖立在校园内，使学校免遭国民党军队的破坏。

傅任敢先生号召学生“关心时事，不问政治”。这个口号看来似乎是矛盾的，在当时却起了很好的作用。“关心时事”要求学生不要闭门读书，要时刻关心着国家大事；“不问政治”是一个策略的提法。实际上，他对学生参加反饥饿、反内战的罢课、示威游行等运动，并未加以干涉。学校既订《中央日报》，又订《新华日报》，图书室也有不少进步书籍，不少同学当时就读到了一些马列主义的书。

应该怎样理解这个看来有点自相矛盾的口号呢？1980 年国庆期间，在北京工作的八十多位旧日清华中学师生举行过一次聚会，会上有人作了确切的解释：“‘关心时事’，活跃了我们同学的生活；‘不过问实际政治’，起到了保护同学的作用，这也是为什么解放时清华中学地下党团员那么多，而始终没有遭到迫害，国民党三青团也始终打不进清华中学的一个最有力的注脚。”

清华中学教学等方面的情况，该校在京校友写的那一份材料介绍说：

> 傅先生非常注意教学质量。聘请的教员中，大多是清

华大学的优秀毕业生，教学上对学生要求很严格，因此，清华中学读书风气甚浓，涌现了一大批勤奋好学、成绩优良的学生。历年升入北大、清华、南开、交大等全国有名大学的毕业生人数，在西南地区的中学中名列前茅。这些毕业生，许多已成了今天祖国四化建设中的骨干力量。

傅先生注意培养学生的民主作风，支持学生创办各种刊物、墙报，因而，学校中学术空气和讨论时事的空气非常活跃。他提倡学生自治，全校设有学生自治会，各班有班会，民主选举领导人，学生的事情由学生自己办。

傅先生还非常重视文娱体育活动，支持学生办歌咏队、话剧团，每学期都要搞几次歌咏比赛，演几次话剧，如《雷雨》、《家》、《棠棣之花》等。为了加强学生的体育锻炼，学校规定每天下午第四节课是体育活动时间，学生一律到操场里去，不准在教室里看书。为了促进体育运动的开展，每学期都要举办一次校内运动会或游泳比赛。

傅先生倡导艰苦朴素的作风。他勤俭办校，把募捐来的钱买建筑材料，动员师生自己盖校舍。规定学生要穿学生服，不得穿奇装异服。提倡学生洗冷水脸，自己洗衣服。还组织同学们利用课余时间劳动，历时数年，修成了一个大养鱼池，取名“愚公池”。

总之，傅任敢先生在清华中学任校长期间，治校是严谨的；采取的措施，在当时是进步的；他重视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思想，在今天看来也是正确的。我们这些从这个学校出来的学生，三十几年来对母校一直怀有深厚的感情，对傅校长十分敬重和深切怀念，因为我们不少同学革命人生观的初步树立是在这个学校，基础知识的获得是在这个学

校，优良作风的形成是在这个学校。

重庆清华中学第一届学生严伟年在写给平生的信中回忆说：

重庆清华中学是一九三八年八月下半月开始招生的，招了两次，我是第二次考进的。当年九月开学。地址在江北鸳鸯桥胡家湾，校舍是租用王姓地主的院子。我们第一届入学时有七十二人，称为“七十二贤人”。学习环境的确艰苦：住茅屋，点油灯，伙食也差。

傅任敢校长是一九三九年初来学校的。

高中学制是三年，两年内将全部课程学完，第三年加课学习及复习。第一届学生除几个同学成家立业外，全部升入大学。其中有现在的原子能专家朱光亚，最后一个学期转南开中学毕业。

聘的教师以清华大学毕业生为主，教材多采用国外有名的教本，如《范氏大代数》、《英文典大全》，用的都是英文原本。布置作业较多，也经常考试，以促进学生的学习和复习，巩固知识。

学生的英文水平都高，特别是文科班，傅校长亲自授课，并购置不少英文故事小册，供课外阅读。我入大学后，就能看英文本的医学书籍，用英文写信。

当时抗战，购书困难，他劝说王姓房东向学校捐赠了一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万有文库》，同时发动同学捐书，这样办起了图书室。

在校舍院子前，买得王姓一大块水田，作大操场。我记

得在教导主任魏泽馨的带动下，全校师生手挽手，高唱义勇军进行曲，踏着步伐，压平操场。操场落成后，他规定下午四至六时锁教室门，大家一律出来运动。当时组织有篮、排球队，体操队，我也是队员，参加单、双杠。您母亲杨老师指导我们打排球，她的声音仍在我耳中回响。

傅校长也重视音乐教育，动员房东捐赠了一台立式钢琴，由蒋宪端老师任教。由于缺少音乐和图画课的教师，他还创造了一种“教生”制度。什么叫“教生”？老师教，叫教师；学生教，叫教生。当时我被聘为“音乐教生”，还有一个同学做“图画教生”。他还请重庆管弦乐团来校演奏过。

他提倡学生关心时事，独立思考。他还创造了一种督促学生学习报纸的办法，每天晚饭前集合时，拿出一个饼干桶，里面是每个学生的小名牌，抽签，抽到谁，谁就上台讲时事。

后来学校在重庆士桥盖起了新校舍（即现在的重庆九中）。刚刚盖好教室，还没有学生宿舍、没有桌椅黑板时，开学时间到了，怎么办？于是，学生睡教室，白天卷起行李当凳子，膝盖做桌子，白纸贴在墙上代黑板，老师蘸墨汁板书。

我同傅先生的多年接触中，他从没有谈过他当年靠拢党的政治态度，更没有标榜过他有何进步功劳，他的自传中对此也只字未提。可是，当年重庆的清华中学就像是党办的一所中学，不，也许由党员直接来办，说不定会被查封的。请看有关这方面的一些回忆。先是清华中学学生，后来又在那里任教，并且担任地下党的支部书记的汪国桢，写给傅平生的信中说：

我最不能忘记的是，你父亲在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白色恐怖局面下办学，顶住了反动当局的压力，不允许国民党、三青团进入学校。如有个别特务混进学校，一经察觉，即予解雇。还有一件令人感动的事，那是一九四九年四月八日，我们清中全体学生、地下党员和进步教师，集体步行到沙坪坝去和重庆大学、南开中学等大、中学校师生，合开几万人的大会，声讨国民党政府血腥镇压请愿学生的南京"四一惨案"。你父亲第二天也来了，到我们的住处南开中学、树人中学来看望，他非常关心师生的安全，可见他是支持学生的正义行动的。他办校十年，清中没有一个地下共产党员、一个进步师生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残害，这是我们在清中学习过、工作过的共产党员永远要感谢他的。

另一个地下共产党员黄继武说：

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九年，这是从黑暗的中国到光明的中国的关键时刻。在这历史性的时刻，我是在清华中学度过的。傅校长不仅没有让反动党团进校，而且在校内培养了一种既讲科学又讲民主的作风。傅校长规定每个班必须办一墙报，它的内容学校不加干涉，随你去写多进步的东西都可以。当时同志们的思想总的说是在党的领导之下，但是这样一个民主自由的学校环境，也是起了不小作用的。

当时清华中学第六级学生张其锟、辛代高合写的一篇回忆材料说：

抗日战争期间的重庆，处于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之下，傅任敢校长在这种形势下主持清华中学，教育学生用了两句话，叫做“要关心时事，不要参与政治”。他的用心是良苦的：既要学生关心国家大事，又不要被国民党抓住把柄。当时在重庆能公开订阅《新华日报》的中学是很少的，在我们校内就可以公开订阅、零售。当时一般中学都有国民党或三青团的组织和活动，在清华则没有。这在当时的重庆，可能是仅有的。

抗战末期，国民党发动知识青年从军，但当时清华中学学生参加国民党青年军的极少。这与校内的政治空气是有关的。当时除了重庆市教育局派人到学校作过一次动员外，学校当局没有再做其他工作。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利用当时国际国内的复杂形势，蒙蔽青年学生，在重庆煽动了反苏游行，清华中学也有学生参加了。游行前，傅校长曾加以劝阻，告诫学生说，情况复杂，不要被人利用。游行后，他又请人来校作有关蒙古情况的讲演，使学生明白蒙古在一九二一年就已革命成功而独立，并不是苏联侵占了蒙古。

教育的重要职责是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要使受业者明确学习的目的，学会如何做人。作为一个进步的教育家，傅任敢先生在这两方面都是做得很出色的，前面已有不少介绍。经过十年内乱之后，请看当年他的学生的有关感想。当年清华中学的学生胡甫庥（现改名胡平，在国家科委政策研究室工作）写的一份回忆材料中说：

学校常用“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来激发青年人的爱国心，每天清晨，天还没有大亮，校园上下到处响起了琅琅读书声。这种刻苦好学的精神，并不都出自“学而优则仕”的动机，而往往出自一种自觉性和责任心：复兴中华，需要一代有知识的新人。清华中学教给学生的，与其说是丰富完备的知识，不如说是热爱知识、追求真理的进取心。而恰恰是这一点，成了学生们日后最大的财富。

原来重庆清华中学教务主任、现在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王介平写的《一位平凡而伟大的教育家》一文，这样介绍了傅先生这方面的成就：“重庆清华中学以独特的优良学风著称。一般肯定它升学率高，对学生要求严格，慎选师资，三育并重等等，却很少谈到傅任敢同志所提倡的家庭式教育这个核心环节所起的潜移默化作用。傅任敢同志提倡家庭式教育，匠心独运，创设出一套具体措施。如在每个教室旁特筑导师室，规定导师专教该班语文，全面负责，为密切师生联系、师生打成一片、言传身教提供了条件。浸润既久，学生好学而不极端，活泼而有礼貌，全面发展而不没其爱好，师生同学间亲如家人，互敬互助，蔚然成风，历久不败。傅任敢同志重视自我教育，充分相信学生经过亲身实践，足以获得知识启迪智能。在课堂内重启发，多测验考试，课外让学生参加各种活动和体育运动，提高觉悟，改正缺点，在时代潮流的洗礼下探索自己应走的道路，对此学校不加干预。同时又尽量防阻恶势力侵入学校，以免妨碍学生的正常成长。这便使校园里弥漫着一派生机勃勃、活跃向上的气氛。”最为难能可贵的是，傅先生的民主办学精神，他让学生干预校政。王介平的文稿接着说：“最集中体现学校民主作风而富有教育意义的是

'期终意见表',每值学期终了前,为了收集学生对学校的意见,每人发白纸一大张,上面印四句话:'善意批评,积极建议,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不记名,只填班级。从学校行政、教学到膳食,从校长、教师到校工,学生都可以毫无顾忌地畅所欲言,提出意见和批评,学校根据这些意见总结改进工作。这个办法不但保证了学校工作的不断改进,又对学生进行了一次意义深刻的民主教育。"傅先生这种放手让群众监督领导的做法,同多年来"左"的失误,实成一种鲜明的对照:许多人由于对领导提了点什么意见,就会挨整,就会在运动中戴上一顶什么帽子。某些"宁左勿右"的共产党员,面对这位民主人士,实在应该感觉惭愧!

从上面所引的当年师生的回忆材料中,人们对于傅任敢教授在重庆清华中学办学的情况,可以获得一个颇为清晰颇为完整的印象了。可是,在当时国民党统治中心的重庆,为了取得这些成果,必须抵抗多么强大的政治压力,这就不是当年一般师生所能具体知道的了。为了了解这一点,我们不妨看看他本人写的自传:

> 首先我们与国民党的关系始终是绝缘的。我自己自始至终没有加入过国民党,中间有一次全川中学校长集体入党,我没有到会得免,有两次中央训练团指名调训,我称病没有去。在当时的陪都,象我这种情形,恐怕是唯一的例外。学校里面自始至终没有成立过国民党党部与三青团团部,中间有一次社会局叫我们组织三青团,我们也一拖了事。这在当时的陪都,也怕是唯一的例外。我们的训导主任多数不是国民党党员,最后一个且系中共党员。我们最初只是觉得大环境太腐恶了,想保持一片小天地中的清洁,

后来才进展到有意掩护在学青年的自求进步，所以师生订阅《新华日报》的达二三百份，伪政府几次密令禁止，我们始终没有执行。进步书刊学生几乎人手一册，学校图书馆也购藏不少。

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后，傅先生除了继续办重庆清华中学之外，并于1946年秋天又创办了长沙清华中学，作为重庆清华中学的分校，并由他本人兼任校长。当年长沙清华中学一级学生、学生会主席、现任东北电业管理局技术改进局工程师谭昌铭写的一篇回忆录说：

长沙清华高级中学是在一九四六年秋季由校长傅任敢教授创办的。实际上它是重庆清华中学的一个分校，因为学生的学籍都在重庆清华中学。学校的教育方针和规章制度都和重庆清华中学相同。傅任敢教授兼任这两个中学的校长。创办长沙清华中学的动因是这样的：抗日战争初期清华大学在长沙岳麓山南麓左家垅盖了两栋校舍，打算在华北沦陷后迁至此地，后来这计划未能实现。这两栋校舍的产权属于清华大学。抗战胜利，清华大学迁回北平，校长梅贻琦建议傅任敢利用这个校舍创办长沙清华中学。

长沙清华中学始终没有国民党和三青团的组织（至少没有公开的组织和活动）。由于学校远在郊区，又没有在当地政府备案，国民党地方政府基本上对它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可能由于它有某些上层人士（清华校友）如梅贻琦、新一军军长孙立人等人的赞助，当地国民党政府也就一直没有来碰它。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它是国民党鞭

长莫及的一个管不着的单位，进步力量发展很快，到一九四九年长沙解放，这个学校的多数学生立即参加了革命。

身教重于言教，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古今中外教育家都这样主张，可是要真正做到是很不容易的。前面已经谈到傅先生创导的“家庭式教育”特别注重德育，谭昌铭的回忆对此也有记载：

> 清华中学特别重视德育。傅校长德育教育的主要方法是以身作则，并要求所有的教师作学生的表率。他提出学校家庭化的口号，视学生如同自己的子弟一样，但他又不搞家长制，提出了另一个口号，那就是管理民主化。他把德育和智育密切结合起来，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无不注重德育。别的学校有公民课，也即国民党的政治课，清华中学没有。别的学校每星期举行一次纪念周，名为纪念孙中山先生，实际上是进行政治教育，清华中学也没有这项活动。校规很简单，只有遵守作息制度、课堂纪律，不吸烟，不喝酒，不蓄发等几条。学生全部住校，多数专职老师也住校，同学生打成一片。这样的教育影响很深远，多数学生保持刻苦好学、勤恳工作的作风，几十年如一日，生活俭朴，有的至今不抽烟，不喝酒。
>
> 智育方面，傅校长把重点放在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上，课程的安排特别注重三门基础课：语文、数学和英语，分量特别重，每周各八节课，占了全部课时的三分之二。语文教学以语言为主、文学为辅，古汉语和现代汉语并重，每周命题作文一篇，在两堂课的时间内完成，当场交卷。英语采用

直接法教学，课堂上一般不用汉语讲解，以养成学生理解和使用英语的能力。我至今记得傅校长常常强调的一句话：A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is a habit transformation（外国语学习是一种习惯的转变）。课堂上除讲课外，还进行英语问答练习和听写练习。为了培养 学生阅读英语书刊的能力，高中二年级用的《范氏大代数》、《霍尔乃特解析几何》等教科书都是英文原版，三年级理科用英文的物理学课本，这是针对清华大学一般新生入学头一年看不懂英文科技课本的现象而采取的措施。在清华中学的图书馆阅览室里，还订了几种英文报刊，除了上海出版的《密勒氏评论报》，还有《Times》、《Reader's Digest》等。清华中学与教会无缘，傅校长是主张无神论的，但却常常请外国传教士在星期六下午或星期日来校演讲，目的是让学生有听外国人说英语的机会。

傅先生是很重视美育的，将它与德智体并重。他力求提高学生对真正的美的感受力，尤其是在抗战艰苦环境中，在日常生活和艺术作品方面，如何理解和欣赏美好事物。这种潜移默化的熏陶可以影响人的一生。谭昌铭的回忆说：

清华中学十分重视美育；学生穿着规定的简单朴素的制服，学生都剃光头，要求整齐清洁。学校里办公室、教室、礼堂，陈设都很简单，一切都讲求实用。傅校长提倡的是一种朴实的美。他本人的风格也是朴实无华的。高中三年一直有音乐课，歌咏活动很活跃，学生都能识谱。到一九四八年以后，革命歌曲在校内大流行，并且公开演出《兄妹开荒》

等节目，课余常举行音乐欣赏会，播放西方古典名曲，其中有反映劳动人民疾苦的《伏尔加船夫曲》等。

清华中学在教学中，力图把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和欧美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结合起来，既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而又不排外，对古今中外一切优秀的文化和科学知识，采取兼收并蓄的方针。

总之，傅校长的教育思想是德智体美四育并重，引导学生追求真理追求知识，为社会造福。重要的不只是传授知识而是培养学生的能力，自学的能力和自治的能力。他的理想是造就体魄健全、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和高度的文化素养献身社会的人才。他也是这样塑造他自己的。他本人不追求名利，不做官，以教育为毕生事业，否则他也不会放弃清华大学的职位来办中学了。

1949 年，傅任敢先生欢欣鼓舞地迎接了全国解放。这一个在教育事业上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并且在政治上追求进步的人，并没有以功臣自居，以进步自居，相反，他十分严肃地考虑自己是否适应新的时代的要求。他在自传中说的这一段话，现在读来还是非常感人的：

> 我在解放后即对师生说："我们以前多少有点自由主义的、与政治绝缘的作风，这在解放以前是我们的一个大优点，因为它掩护了大家求进步；解放以后却变成了一个大包袱，必须赶快丢掉。"

从他的这篇自传中可以看到，当时他思考着的，是原来做的

有哪些不足。回顾自己走过的道路，自己作了十分严格的解剖：

我曾冷静地分析过我自己，对革命，最初我是不了解它的必要性的，我是个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旧知识分子，一方面极端憎恶伪政府时代的一切作风与表现，因此绝不与当日的官府有往来。一般的社会交际官场，我也深恶痛绝，但是我总希望国事能够不流血而得到改良，甚至我还提出过一句矛盾的口号“关心时事，不问政治”，因为我知道纯技术观点是不对的，学生应有正确的政治认识，但是自己既无参加革命的勇气与决心，又怕学生行动起来，遭受牺牲。无庸讳言，最初我是一个改良主义者，想走中间路线，后来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失望，我才知道革命是不可避免的了。解放以后亲身目击，一切从前办不到、望不到的事，现在逐渐一一实现了，我才懂得革命的必要，加以多看了一些理论书籍，我算是明白了革命的必然性了。

过去二十一年来，我一直专心在做教育工作，从不外骛，可惜出身与环境限制了我的工作内容与方式，现在我决心从头学起，并从头做起。自信可以诚诚恳恳老老实实地为人民做点事情。

1950年北京市人民政府决定在劳动人民聚居的龙须沟地区建立一所私立中学(即第十一中学)时，根据副市长吴晗的推荐，傅先生被调来北京任该校第一任校长，负责筹建工作。雷通儆在一份回忆材料中记述建校时的情况说：

在建校初期，没有得力师资，他就从南方聘请了教语

文、数学、生物等科的多位教师；没有操场，他就带领全体师生，自己动手平整坟山，并在上面洒了厚厚的一层生石灰消毒，使三百多学生有了上体育课的场地；没有礼堂，他又和全体师生一道，将神殿改建为礼堂，仅仅这一项工程就为国家节约了一万二千斤小米，受到了市人民政府的嘉奖。

他也注意请社会上知名人士和英雄模范人物来校作报告，老体育专家马约翰的报告推动了学校的体育活动；历史学家吴晗勉励学生好好学习，成为建设新中国的有用人才；吴运铎也来作了报告，学生们从他的事迹中激发了更加刻苦学习的热情，决心把自己的一切献给党的革命事业。

1954 年，北京师范学院开始筹建，傅任敢被调来参加筹建工作。这是一个新的工作岗位，在他，也是一个新的起点。以前，他办中学，是为大学准备合格的、优良的学生，现在，他要来直接培养师资了，他原先的许多抱负得到了施展的大好机会，他关于教育科学的理论探讨和实践经验，有了用武之地。我们也应该为这个新的学府深庆得人。请看他是怀着怎样的激情投入这个工作的。师院的屈惠英、吴山梅、邓兰如、谢惠玲、雷文娴、张特民、高滨、林兰芝等人合写的一篇纪念文章回忆说：

傅先生是我院元老之一。早在一九五四年我院筹建时期，傅先生奉命筹建教育教研室。创业难，一切都是从零开始。为了集中精力，他从城里搬到学校宿舍住，日以继夜地投入工作。不论是饭后的休息时间，还是紧张备课后的夜晚，傅先生经常把我们这些人叫去，商量如何收集整理有关资料，如何开好教育课程，提出他对教研室今后的设想和打

算，并仔细听取我们的意见。

一九五五年秋天，我院从东郊迁到现在校址。有一次傅先生站在新建的教学楼前，满怀深情地说："党为了培养师资建了这样好的校舍，我们一定要好好干哪！教育教研室要做出成绩和贡献，就要协助院领导办好学院，办好附中，将来有了条件，还要办好附小和幼儿园，要办成一条龙，我们一定要把各级附校办好，办成教育科学研究的阵地，办出北京师院的特点来。"我们当时在场的人，无不感到傅先生是位有远见的老教育家。他对祖国师范教育事业的责任感和事业心使我们深为感动。在傅先生言传身教的熏陶下，我们这些"新兵"更加热爱自己的本职工作，决心象傅先生那样为祖国的师范教育事业奋斗一生。

建院初期，傅先生身为教育研究室主任，负责编写教育学讲义，还担任着两个班的教学任务，但他仍拿出很多时间和精力放在对我们的培养和提携上。他认真审阅我们的讲稿，听我们试讲。从教材处理、教法选择、课的组织结构以及教态等方面进行具体指点和示范。我们这些青年人是在傅先生具体指导下走上讲台的。

留给我们最深刻的印象是傅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理论联系实际的好学风，不论是在理论研究、著书立说方面，还是在教学实践上都是这样。他经常讲："理论研究是为了指导实践，学习古代外国的论著，也是借以为鉴，指导我们现实的工作，如果离开了这一点，那么从事理论研究，学习前人经验又有什么意义呢！"

不久以前，胡耀邦同志在他的那篇纪念马克思的报告中，对

解放前我国知识分子的状况作了这样的估计：

> 新中国成立以前，我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虽然知识分子按其社会地位，大都是从属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但是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同时也受着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因而一部分知识分子直接参加了革命，一部分同情革命，还有许许多多知识分子怀有反帝爱国的志向。

这个估计是完全符合实际情况的，傅先生岂不正是千千万万怀有反帝爱国志向、同情革命的知识分子中的一个吗？可惜的是，情况又正像耀邦同志在这篇报告中所说的一样：

> 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我们在对待知识和知识分子的问题上，逐渐离开了正确方向，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它的主要表现，就是轻视知识，轻视专业，给广大的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并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的知识分子戴上“资产阶级”的帽子，排斥和打击他们，使许多知识分子遭受压抑，以至蒙受冤屈。

事情就是这样。在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中，傅先生成了扩大化的受害者。他是因为什么原因而被划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的呢？他的大女儿傅平生是个有心人，她把她父亲划右派的“罪证”保存下来了。那是两份油印的《北京师院整风专刊》，北京师范学院院刊编辑室编，一份是1957年6月7日出版的第十四期，另一份是第二十七期（具体的出版日期不详，当

较前者稍后)。上面登载了傅先生在师院教师座谈会上发言的详细摘要。这是一份有代表性的材料,很值得一读。人们就此可以知道,当年一个人只要发表了一些什么样的言论,就会被硬推到异己的、敌对的方面去。现在我把第十四期所载的他六月五日的发言摘抄在下面:

我今天谈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对运动本身的意见。……要使这次运动搞得好,一定要坚持和风细雨的原则,只有和风细雨才能细致分析问题。我不相信两人互相大叫大骂后团结会更好一些,我认为指着鼻子大叫大骂后反而会产生新的问题。心平气和地来谈容易使对方接受。报上登载某教授发言说:过去你们粗暴对我们,我们是向你们学的,而且学的还没到家。这种态度我不同意。

每一个不怀成见的、公正的人都可以作出判 断:傅先生的这个态度究竟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呢,还是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他旗帜鲜明地表示不能同意一些有偏激情绪的人的态度,不赞成以粗暴的态度对党提意见。

傅先生讲的第二个问题是师范学院究竟应该归教育部领导,还是归高等教育部领导的问题。他是主张由高教部领导的。由于高等教育部早已和教育部合并,此刻已经完全没有必要来介绍他所申述的那些理由了。国务院所属的这两个部都是共产党领导的,不论主张由哪个部来领导,即使这个主张不恰当,也决不能说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第三个问题是高师体制问题。现存党委制有一定缺

点，如：一、别校党委工作一把抓，一方面是忙不过来；另一方面高等学校工作面广，几个党委委员不可能胜任所有工作。据说个别学院几个党委同志没有受过高等教育，自然不懂业务，不能领导业务。二、以党代政，势必使学校民主成为形式，党委的决定交给会议讨论，实际只是布置工作而已，大家不可能提出不同的意见。同时非党领导同志会感觉有职无权，只参加演出，不参加排练。这涉及到党能不能领导科学、文化教育和高等学校的问题。我认为在方针上党完全可以领导，这些方面也不能脱离党的领导。至于具体业务能不能领导？这要具体分析，如某方面党有能领导的人就领导，否则就得倚靠党外专家。

我不赞成教授治校理由有四：一、解放前教授治校的主要是北大、清华，我只谈谈清华的情况，当时提出教授治校的方案意味着反对当时政府和当时的校长；当时也有宗派主义情绪，清华教师多是清华毕业美国留学的，有大清华主义。目前这个提法是不恰当的。二、除历史原因外，教授治校也为本身条件所限。教授在业务上是懂得多一些，可是领导学校还有其他方面的工作，教授不见得能完全胜任。三、过去教授治校有宗派主义，你争我夺。教师经过思想改造后觉悟大大提高，但是学校全由教授来管理，还可能缺乏全面观点，会削弱领导。四、教授不只是不能完全胜任领导，实际上教授也不一定愿意管理许多行政事务。

我赞成民主办学，这不意味着过去不民主。民主办学的内容如何？我认为应该是“党委领导、校长负责、依靠教师、发扬民主”。

党委如何领导？领导方针、政策的实施，是起监督作

用，不是执行；领导思想教育工作。如何实现领导？可参考中央办法，党委决定以建议形式提交校务委员会，通过出席会议的党员贯彻党的意图。

校长负责一方面是对上级负责，负责贯彻上级的方针、政策、决定；一方面是对校务委员会负责，负责执行校务委员会的决定。如作出与上级政策相反的决定，原则上接受上级决定；如作出的相反决定是结合实际的具体办法，原则上按决定执行。如校务委员会决定与校长意见不一致，由校长建议再讨论一次，如仍不一致，校长应服从会议决定。在行政会议上校长有最后决定权。

如何依靠教师？校务委员会应有各级教师代表参加，教授名额可多一些，讲师次之，助教又次之，但我院讲师是中坚，应多一些。有些权力要下放，如聘请教授可否由系务会议提出初步意见，再由院务委员会决定。

如何发扬民主？一、教研组长、系主任等至教务长由民主选举产生，苏联莫斯科大学已这样作，这应当作为我们的方向，逐步实现。二、院务委员会应采取多数表决办法，过去会议布置多，今后应多进行讨论。三、党委决定通过党员贯彻，但当党员的看法与决定不一致时，应鼓励党员表示个人意见。四、民主党派可联合选举一、二名代表参加院务委员会，工会也要有代表，有人提出由共产党与民主党派联合决定学校大计，也不妥。

上面所引的意见虽不能说全都是适当的，但是其中许多意见就其精神来说显然是很好的。例如，关于党的领导问题，耀邦同志在前面引过的纪念马克思的报告中就指出：

党的领导是政治、思想和组织的领导，是方针政策的领导，是对于各方面工作的检查督促，不可能也不应当包办代替各项具体业务、技术和行政工作。

在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正确的政治领导，就是要在各个领域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把党的方针政策同本地区、本部门的具体实际和具体业务结合起来，调动和组织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卓有成效地实现党所提出的战斗任务。而要做到这一点，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不但要具备一定的科学文化基础知识，而且要熟悉各自领导范围内的必要的专业知识，了解有关业务领域的具体情况，掌握它们的特殊规律。不然的话，只能是空头政治，只能不着边际，无所作为，或者瞎指挥。依靠这样的领导，四化建设是没有希望的。因此，要领导，就必须努力成为内行。

傅先生谈的第四个问题是加强学术空气问题。第二十七期专刊上登出的他的那篇发言摘要，总的精神和上一篇相同，他对整风运动中出现的不够实事求是的意见提出了批评，指出“有的人过去受过委屈，现在揭露‘三害’可能情绪激动”的态度“是没有好处的”。当然，他也对自己所见的一些不好的现象提出了批评，例如：

在学习苏联时不听老教师意见，院系调整乱合并，造成现在很大问题。又如教材是讲的寒带问题，却拿到我们温带来讲。据说有的领导干部说过，苏联是错的也要学。

下边由于上级这样作风，养成善于领会领导意图，不能

独立思考或不敢独立思考，结果产生报喜不报忧，盲目服从，纸上处处超过指标，实际上完不成，这种风气“自古皆然，于今为烈”。

还有一些诸如此类的意见，不引了。前面我们已经了解到傅任敢是一位何等真诚的民主教育家，我们自应理解他的这些意见是何等的自然与善意。可是，当年就是这样一些意见，也就足够使他成为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了。这不是他一人的不幸，这对于我们党和我们民族，都是一场灾难。值得庆幸的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清算了以往极左的错误，极端地重视了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的建设，下决心不再重蹈过去的覆辙。1979 年，傅先生错划右派一案得到了改正。前面引过的屈惠英等八人的纪念文章中说：

> 一九七九年他恢复工作走进教研室的第一天，便关心询问每个同志开课的情况，并建议要让青壮年教师多挑重担，促使他们迅速成长。他还兴致勃勃地为教研室多出人才多出成果献策献计，为提高教研室一些教师的外语水平，他不顾自己年老体弱多病，辅导专业英语，甚至有病也不耽误一节课。有一次因为看错了表提前来到学校，教师们正在午休，他就悄悄地在办公室里等了一个多小时。对傅先生的这种精神，同志们无不为之感动。在最后两三年里，他还抢时间重新修订了过去有关教育的译稿（英译中、古译今），撰写评介孔子教育活动的论著，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撰写有关教育的条目……直到他病重再也不能握笔为止。

傅先生的家属保存了一件珍贵的遗物，那是 1981 年 8 月

24日他在病中写给孙辈的一首诗：

七七衰翁未自弃，
初升旭日更可喜。
祖孙并肩齐迈进，
争为四化尽绵力。

这是一种多么感人的精神状态呵！

1982年1月24日清晨，傅先生在北京部队总医院与世长辞。

追悼会上，我听到了北京师范学院党委致的悼词，公正地对他一生的业绩作了很高的评价：

傅任敢同志是一位有影响的、爱国、民主、进步的教育家。半个多世纪以来，他把自己的全部精力献给祖国的教育事业。无论是在从事教育工作、培养人才方面，还是在研究、介绍我国古代教育理论方面，他都成绩卓著，多所建树，为发展我们的教育事业，作出了宝贵的贡献。他的逝世是我们教育事业的损失。

悼词扼要地介绍了傅任敢的生平事迹，并且特地指出：

他在逆境中仍然怀着对党和人民的赤子之心，忍辱负重，认真工作，撰写了《教育心理学》和《夸美纽斯传及〈大教学论〉注释》，并参加翻译了《西方的没落》等著作。

一九八一年夏季，在酷暑中他还挥汗赶写《中国大百科

全书》的教育条目。他说，我的时间有限了，必须尽最大的可能利用它。坚持写完了才去住院治疗。在医院的病床上他还口述着要写的几个题目。他就是这样，为人民，为教育事业献出了毕生的精力。

我听了这悼词，在悲哀和怅惘中间也有了一些平安的感觉。党和人民毕竟是公平的，我想，这应该也可以告慰傅先生的在天之灵了。

他一生著译甚勤，从青年时代起就开始翻译西方有关教育的论著。附在《傅任敢教育译著选集》卷末的魏泽馨写的文章中，比较详细地介绍了他这一方面的活动：

> 在清华大学最后二年，……傅教授就靠写文章及借债以维持生活。除参与创办《弘毅》会刊及《认识周报》外，还经常用“举丰”“苕年”笔名向《教育杂志》、《中华教育界》、《民铎杂志》及《学衡》上投稿，现在从北京图书馆查出的一部分他当时的译著中，就有《克伯屈文化与教育》，介绍了克伯屈一九二七年的一篇论文；《后得性遗传问题之实验的研究》，介绍了麦独孤的实验报告；《性感与理智》，介绍了行为主义者华生的一篇心理学论文，等等。
>
> 在清华大学工作期间（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八年），傅教授对于教育学术的翻译工作更加勤奋。先后在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名著》中出版的有：裴斯泰洛齐的《贤伉俪》、娄德安的《生活的科学》、卢骚等的《莉娜及其它》、约翰·洛克的《教育漫话》和夸美纽斯的《大教学论》。此外还编了一部《近代中国教育人物像传》，五年之内利用业余时间出版六

本书，真是很不容易的。

他在编辑《近代中国教育人物像传》时，曾写信给在北大读书的他的学生，嘱他寻找李大钊同志的照片。那时北平正处在国民党反动派白色恐怖之下，可见傅教授当时对大钊同志是有一定认识与尊敬的。

从当年的杂志上可以看到：他在《教育杂志》上发表了不少介绍外国教育情况的文章，如《苏俄职业教育之近况》、《法国中等教育之演变》、《英国中等教育之鸟瞰》、《美国教师专业概况》。在《认识周报》上发表了《优生与教育》、《中国优生问题》、《后得性遗传问题之实验的研究》等好些文章。在《独立评论》上发表过《湖南教育一瞥》。此外，他还在《国闻周报》、《华年周刊》、《旅行杂志》等刊物上发表过文章。在清华大学和清华中学发表的文章就不待说了。

他在解放后写的文章，陆续发表在《光明日报》、《文汇报》、《人民教育》、《教育研究》等报刊上，出版的单行本有《〈学记〉译述》（上海教育出版社）。花了许多心血的著作《教育心理学》及《夸美纽斯传及〈大教学论〉注释》两书，商务印书馆已决定出版，恰值十年内乱发生，“商务”遭到冲击，两本书稿付之一炬，至为可惜。

由于他英语好，长于翻译，他还参加翻译了《西方的没落》、《世界通史资料选辑·现代史部分（第一分册）》等书；此外，他翻译的《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不久即将出版。他的书，我仅仅读过他送我的《〈学记〉译述》一本，以为他治学态度严谨，文笔也是好的。其他的书没有读过，不能说什么，想必也是同样的水平。就凭上述不完全的目录，著译方面这些成绩，也就是值得称道的

了，何况他还有更重要的方面，有他的本业，有他倾注了毕生心力的教育事业呢。

类似傅先生的人，或者说旧中国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大都有一种出污泥而不染的洁癖，清高，正直，鄙弃国民党的官场，希望中国富强、进步，希望通过自己的专业能对祖国有所贡献。这样的人最终必然把希望寄托在我们党的身上，这是爱国的、正直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必然归宿。

我不懂教育。作为一个教育家，我以为傅先生最大的一个特点是重视教人而不只是教书。对于青年一代传授知识是重要的，但是仅仅传授知识是不够的。傅先生办学，是德、智、体、美四育并重。就拿智育来说，他把培养和提高学生自学的能力看得比传授知识更重要。在他主持的学校里，注意采取种种具体措施来培养学生的良好习惯和作风。我以为这是他的教育实践和教育思想中最可宝贵的部分，也是我们今天教育界应当注重发扬的精神。傅先生是一位有着强烈的民主思想的人，这也正是一位教育家应当具备的天然品质，同时，也是我们大家应当向他学习的地方。

鲁迅在一篇文章里，把古往今来那些“埋头苦干的人”、“拼命硬干的人”称做“中国的脊梁”。像傅先生，难道不正是这样一个埋头苦干、拼命硬干的人吗？尽管他又是如此的平凡，并不为许多人所知道，但是他的学生、同事，以及每一个和他熟识的人，却永远不会忘记他。我们的党也从痛苦的教训中开始学会珍惜这样的知识分子了。我不惮烦地把这许多材料摘抄出来，用意也就在这里。

1983 年 12 月

一位敢讲真话的老专家

——怀念老同学泥沙专家方宗岱

老学长方宗岱去世时，我没有收到讣告，没能向他最后告别，悲怅之情久久不能排去。他的女儿方颖给我送来学长遗著《方宗岱论江河治理》，这是由她操办的，父亲去世时，书还在排印；后来又寄给我他们兄弟姐妹写的对父亲的追思，以及好多位老朋友、老同事悼念的信件。女儿从父亲那里熟知我们不仅是老同学，而且在江河治理尤其对三峡工程的看法，几十年来意见是一致的，在这方面可说是志同道合的。

三十年代中期同在武汉大学工学院读书时，方宗岱学长比我高两班，他是土木系，我在机械系。在学校时，我们之间没有什么来往，只是打网球时常碰面，他的网球打得很好。他的夫人张志京是化学系的，比他低一班，这一对郎才女貌的恋人，是很受同学们青睐的。一二九运动时，我们工学院二年级的同学特别活跃，我是“闹事”的头头之一。寒假期中，蒋介石召集全国各大学学生代表到南京聆训，武大两名代表由校方指定。对这两个代表，我们学生救国会很不客气，在天津《大公报》刊登启事，“开除其学籍”，他们回校后，不让在学生大食堂吃饭。后来知道，校方最初曾拟派方宗岱去，遭到他的拒绝。他毕业后即留校做研究生，专门研究黄河泥沙问题，学校特为他安排了模型试验

场地，当年好像就他这么一个获硕士学位的研究生。1946 年他参加过国际治黄考察团，与美国水利专家雷巴德、萨凡奇、葛罗同、柯登和中国水利专家沈怡等，调查研究黄河的治理开发问题，后来他在原资源委员会水力发电工程总处工作过。这个总处为燃料工业部接管后，绝大部分技术干部仍留在水电总局及所属系统。上海解放时，他被留在华东水利部。

1954 年为新安江水电站上马，我到上海找华东局要干部。这时我来到老学长的家中，希望他“归队”，说许多水电老同事都惦念着他。宗岱兄跟我话旧，表示愿意继续搞水电。随后就传来水利部一位领导的话：李锐挖人挖到我们这里来了！ 就在这一年，他调到北京负责水利科学研究院的筹建，并创办了河渠研究所(现泥沙研究所)。五十年代，水电同水利之间，在工作上颇多纠葛，除开官厅、淮河一些工程不大合拍子外，黄河规划终于取得很好的合作，长江规划则一直存在重大的分歧。黄河与长江的治理开发，都与泥沙问题关系密切，半个多世纪来，属于方宗岱的业务范围，他毕生尽力于此。作为研究黄河泥沙有数的专家，在三门峡工程规划设计过程中，他提出在三门峡建高坝大库，可能危害关中平原，并建议排沙底孔高程降低二十米。当年负责设计的苏联水电设计院采纳了这一建议。黄河的异重流(带有高含沙的水流)有其特殊的运行规律，苏联的专家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我自己也属于积极主张建高坝大库发电的。三门峡工程由于不听取老专家黄万里、年轻技术干部温善章的意见：根据黄河特性建低坝排沙，结果高坝蓄水后，库尾泥沙淤积迅速向上发展，严重威胁西安安全，不得不进行大规模改建。在改建过程中，方宗岱又力主打开原为施工期导流用的十二个底孔，从而为改建工程赢得了缓冲时间。三门峡的教训使他刻骨铭心：

黄河难治，难在泥沙，过去泥沙学水平低，又听不进反面意见，以致酿成本来无事的西安与山东上下受洪水威胁的局面。

根据陕西机械学院曹如轩教授的回忆，1959 年在西北水科所做三门峡水库大模型试验时，关于河道水库干支流相互倒灌影响问题，“方老介绍过官厅水库永定河影响妫水河问题，认为应当将官厅水库作为三门峡水库的天然模型。可惜那时大家对此认识肤浅。1960 年三门峡水库蓄水，第二年就出现黄河倒灌渭河，形成拦门坎问题。我去官厅调查，收集了永定河倒灌妫水河资料，心中十分佩服方老的远见卓识。”曹教授还谈到“方老提出高含沙水流的长距离输送及利用高含沙治理黄河的设想”。这个设想得到科协和领导的重视，泥沙专家钱宁等曾给予充分肯定。曹本人在七十年代初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曾得到方的帮助，“方老是一位大专家，对我们很亲切，说他的想法是根据实际，根据我们的工作得出的。他平易近人，诲人不倦。”

由于中间隔断了二十年没有来往，从儿女和老友写的怀念中，才知道宗岱兄是怎样度过那些艰难岁月的，才进一步知道他在工作中求真务实的开拓精神，以及为人处世敢讲真话的种种情景。

“文革”初期，方宗岱当然被列入“反动学术权威”，关入“牛棚”。六个儿女五个天南地北，只有最小的儿子在身边。小儿子回忆说：“每个周末，我总要给父亲送衣服。招待所的地下室关着三、四十个‘牛鬼蛇神’，他们都是五、六十岁的老人。在昏暗的灯光下，一步一步走下楼梯，心中一种莫名的苦涩惆怅。在保卫人员警惕的目光下，同父亲的会面总是无声的对视，看得出父亲在说：我没有做什么错事，也没有什么可交代的。”那个年代的审查是没完没了的，对那顶有历史政治问题的帽子，方宗岱冷然

置之，决不戴上。老四这样写道："几年之后，他仍然对他的所谓审查拒不签字，表现了对真理的执著和对子女的负责，他无言，他却是无畏的。"

1970年的第一号通令后，方宗岱夫妇迁到三门峡工地劳动，住在远离坝区黄河岸边的简易工棚中。这时三门峡在改建，这是他多年心所系之的地方。两位白发老人默默地日夜三班倒，坐火车到工地，爬到坝顶，丈夫浇灌混凝土等重活，妻子做扎钢筋的活。小儿子从云南到三门峡省亲，发现工棚厨房桌下，养着两只黄茸茸的小鸭，屋檐下还种了几束小花，父母在这里住得颇有生意。"记得傍晚邻居坐在一起闲聊，一位邻居嫌腻带孩子，发牢骚说：孩子这么麻烦，养他有什么用？父亲接着说：没有人研究分子、原子结构，哪有现在的卫星上天呵！"这种富有哲理的语言，儿女们记得很牢。老大、老二、老四都在科研战线工作，他们都记得父亲说过的话："文章切忌随人后，科研尤贵创新篇。"老大清华毕业后，在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工作。他回忆父亲的治学风格说：父亲常开导我们：做科研工作就在承前启后，既要虚心向前人学习，又要看到他们所得结论的不足和局限性，要开创出自己新的研究篇章。他说过，一篇有意义的论文，甚至要强过一本大部头的书籍。因为许多科学书籍，除了记叙自己的研究心得和贡献外，大部分是总结、归纳前人的成就，即所谓"天下书籍一半抄"。老四现在是科技大学数学系主任，在美国读了博士后回国的。四人帮粉碎后，他觉得下放时卖酒、扯布、弹棉花、做衣服这些商业活计，自己已经驾轻就熟，颇有点"乐不思蜀"了。他多么感激父亲及时指点迷津："一次回家探亲，我四处寻找做衣服的书，并津津乐道服装加工等商业事务。平时不多言语的父亲，这时却发表意见了，他郑重地对我说：我看你还

是不要丢掉本行,争取调回大学吧。这句话使我终生难忘。父亲平时并不过问孩子的事。但在一些关键的问题上,他总是要表态的。归口以后,我订过庞大的读书计划,想要好好地充实自己。父亲平时除了治黄以外的话题,都没有什么兴趣,这次却对我认真地讲:书上写的是已经成熟了的东西,要多读最新的期刊;期刊比书重要,要去思考没有解决的问题。这以后我就从书籍转向期刊,从继承转向创造。”

1971 年“9.13”事件后,这些被下放的科技干部,才逐渐恢复做一些本职工作。1974 年老大到三门峡去探望年过甲子的双亲,“母亲因多年的焦愁,已经满头白发,父亲也因糖尿病体力日衰。他们仍住在黄河岸边四处透风的简易工棚内,生活条件十分艰苦。父亲说,生活再困难,还能忍受,最令人苦恼的是,至今领导仍未对他的审查做出切合实际的结论。父亲的心情很沉重,因为这不仅影响他一生的清白,而且也影响到几个弟妹的前程,他们都被分配到基层和边疆,从而得不到回城就职和上学的机会。可是,就是处在这样的逆境之中,父亲仍然没有放弃他的泥沙研究工作。在三门峡一恢复工作权力后,他便又注意收集有关泥沙的科技资料和有关报导,当他得知在山西一个因泥沙淤积而报废的水库内,所进行的调沙远程放淤实验成功的消息后,兴奋地对我说:这是减轻水库泥沙淤积的一个现实可行的技术方案,值得深入考察和进行研究。如果能够用人工控制的方法,向下游河道两岸放淤排沙,很有可能使混沙河变为清水河。后来父亲回到郑州黄委会复职后,好像还亲自去山西的那个水库做过实地考察。”

方宗岱留下一百多篇遗著。《方宗岱论江河治理》共收三十五篇专论,其中治理黄河部分十三篇,第三篇题目是“黄河泥沙

的利与害”，附题为“黄河沿岸放淤是治理黄河的必由之路”，第一段小标题为：“千古治河，唯禹景两人”。他认为黄河灾害与治理有近四千年历史记载，有两个时段灾害较少：一是大禹治河后的一千六百年，二是东汉王景治河后近一千年。他非常重视黄河治理的历史研究，以及后人包括清代刘鹗与现代李仪祉等人的有关研究，结合自己的实际观察，当代工程措施形成的实践情况，以及科学理论的相互论证，从而得出自己的结论。这本遗著的编者在“序言”中说：“五十多年来，作者始终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注重研究我国大江大河治理开发中的实际问题，表现出极大的开拓精神，在学术上独树一帜。”请看，这位在三门峡黄河岸边的简陋工棚中，住了五、六年的终生研究泥沙的老专家，虽然受着精神与肉体的折磨，仍然心心相印日夜对着滔滔黄河，孜孜不倦探索如何驯服它，变害为利，造福人民。这是一幅何等讥刺而庄严的画面。

1979年初我回京复职后，遇到的一大问题，仍然是急催三峡上马。在这以后十多年的论证过程中，宗岱兄每有新的意见或新的文章，总要寄一份与我；我为此而写的文章或上书，他也以先睹为快。现在收在遗著中的“治理长江部分”共十二篇，这十多年中，他为三峡论证写的长短文章远远不止此数，他主要是从泥沙与防洪两大问题，来论证三峡工程应否上马，何时上马及其利弊得失，从而提出怎样治理开发长江，如何解决泥沙与洪水为害的问题。他写的《从泥沙方面考虑，论长江三峡水库的任务、规模和开发程序》长文中，开头就说：“一个科学工作者，既要对科学负责，又要对人民负责；对泥沙工作者来说，更重要的还要对历史负责。”在三峡工程十多年的论证过程中，他就是这样以身作则，表现了对科学、对人民、对历史负责的崇高品质。他

以七十多岁的高龄，多病的身躯，几次去四川、湖北三峡库区实地考察，深入基层科研单位，听取科技人员、地方干部和当地群众对洪水、泥沙和泥石流情况的介绍，搜集大量实测资料。回到水科院泥沙所后（他曾长期担任这个所的主要负责人），亲自计算，画图表，跟同事们研究讨论。关于长江治理和三峡工程，一次又一次地提出自己有理有据的意见。

方宗岱认为三峡工程有两大问题：一是水库尤其库尾的泥沙淤积，必然引起碍航和影响重庆港的存活。二是水库下泄清水的冲刷作用，必将增加汉口及其以下的洪水威胁。1979 年，他在急催三峡上马的会议上说：长江的洪量大，在干流上拦蓄洪水，不但力不胜任，且不经济。目前只能加强堤防和有控制的蓄洪、分洪，以减少洪灾损失。在支流上多修水库，拦蓄水沙，同时发电。这种打外围战的方法值得考虑。

他在 1983 年三峡一百五十米方案可行性审查会上说：泥沙为害属于慢性病，往往不为人重视，但对此考虑不周，处理不当，会给国家和后代带来无可挽回的损失。

1985 年，他随全国政协孙越崎率领的三峡考察团，在实地调查研究三十八天之后，写了三篇文章：（一）从长江洪灾成因分析论防洪对策；（二）泥沙处理是水利工程成败的关键；（三）对于三峡工程泥沙电算工作的评价。他希望文章能见诸报刊引起讨论，可是竟石沉大海，毫无反响。

三峡工程的可行性论证，原来是由国家科委、国家计委主持的，各种反面意见尚易于提出并展开讨论。1986 年后，论证改由原水电部领导主持，于是论证人为控制，主其事者总是急于上马，压制反面意见，严密控制舆论，只作正面宣传。论证设十四个专题组，四百一十二位专家参加。方宗岱理所当然应参加泥

沙组，可是却安排他在防洪组。这不能不令人有“防民之口”的感觉。宗岱兄在防洪组，也正好防洪与泥沙并重，既谈防洪，又谈泥沙，他认为在长江两者也是分不开的。在三峡论证中，关于长江年输沙量五点二亿吨，是过去几十年的平均数，方宗岱不同意主管单位用这个老数值作论证，因为 1981 年实测为 8.37 亿吨，1981—1984 这四年的平均值为 6.81 亿吨，应当在设计方案中用新数值。他认为三峡是细沙、粗砂和卵石胶结在一起，很难冲排；三峡水库的泥沙问题，比三门峡难处理得多；三峡论证的主管部门，历来主张的“蓄清排浑”，并不能解决三峡的泥沙问题。他进一步谈到以下各项大难题：重庆将遭受人为洪灾；清水下泄，荆江大堤堤脚淘刷引起崩坍，对武汉防洪不利，以及下游河岸崩坍，河口碍航，对上海防洪影响。因此，他主张长江开发程序应当先上游后下游，先支流后干流，先在金沙江、嘉陵江修建水库，以减轻洪水、泥沙的威胁，然后再考虑三峡工程的修建问题。他的论江河治理的多数文章，都涉及到泥沙处理是水利工程成败的关键，从古代的工程到当代的工程，还包括埃及阿斯旺坝的教训，都反复论述。特别强调，“三门峡水库的泥沙处理失策，终将以失败的记录载入水利史册。三峡水库的泥沙处理，岂可不慎？否则，将重蹈三门峡之覆辙。”

由于对三峡工程论证报告的某些结论有不同看法，方宗岱终于没有在该报告上签字。他是 9 位不签字的专家之一。

1990 年 3 月 23 日《中国科学报》发表方宗岱《天灾还是“人祸”?》一文(此文列在遗著的首篇)，谈到解放前四川森林覆盖率为百分之三十，1987 年仅为百分之十一；岷江枯水量五十年间减少百分之三十三，宜昌站实测长江枯水量也下降百分之三十。由于森林过分砍伐，导致径流两极分化；暴雨强，枯水少，从而土

温增加，土质松动，容易产生泥石流。据中科院成都地理所调查，三十年代四川发生泥石流县为十四个，六十年代七十六个，七十年代一百九个，1981 年(大洪水年)一百三十五个。三峡库区各县多泥石流。泥石流与人口增加成正比，养一个人要开两亩坡地。这就促使河流泥沙增加，洪灾更为严重。文章提出，环境洪灾导致洪灾频率增大，洪峰加大和泥沙增多。

1990 年 7 月，国务院三峡工程论证汇报会上，宗岱兄已重病在身，从医院来到会场，人们见到他脸色苍白，腰间挂着一个尿袋，缓步走上发言台，用微弱颤抖的声音，宣读他最近写的论文：《三峡工程兴建后，重庆最高洪水位将超过 202 米以上》，这比 1870 年历史最高洪水位 197.6 米，还高出 5 米多。由于体力难支，不得不由别人代读全文。这次会议开了一个星期，他始终扶病参加。1991 年 2 月，他已病入膏肓，经进一步计算，写出《三峡工程兴建后，重庆洪水位将达 206 米》短文，交给国务院领导。

1991 年 6 月，方宗岱八十寿辰时，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泥沙所、黄河水利委员会及其水科院，都为他送了祝辞，赞扬他在水利战线上资历深，声望高；为人正直，待人宽厚，谦虚谨慎，提携后进，尤其对中青年科技人员的成长，倾注心血，培育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还颂扬他报效国家，造福人民，坚持真理，矢志不渝，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实事求是精神。

不久前去世的泥沙专家朱鹏程，同方宗岱在泥沙所一个办公室工作三十五年。《方宗岱论江河治理》就是由他主持选定校阅的。可是，这样一部重要的学术著作却由私人集资印行。朱鹏程写了一篇纪念方老去世周年的短文，其中很有些感慨之言："方老一非博士，二无'委员'之尊称，但他为水利工程服役五十

多年的经历中，作出的贡献，较其他知名度很高的水利工程专家，毫无逊色，是一位名实相符有情操有气魄的工程师。他的最大特点，能洞察事物的实质，故而能抓住工程规划设计中的要害，如三门峡水库的泥沙问题，刘家峡水库的排沙设施，三峡工程的泥沙与防洪，峡谷河道的边壁糙率，高含沙量水流治黄的见解等，仍然是今后关键性的研究课题。方老的治学，不听命于上级领导的意图，亦不计较某些人的讥讽与为难，能始终坚持原则。同事们中有此流传语：‘要使方宗岱赞成，首先提出反面方案，促使他反对之，而后正面方案才能过方老这一关。’语出偏颇，适足以说明方老不苟同于一个方面，总是从正反两个方面辩证观察问题。多年相处，从未见方老动过肝火，不论对谁都平易近人，因而他的见解能得到同行们的广泛支持。方老确实做到古人所言：柔以克刚，谦以协和，坚忍负重，宁静致远。方老之所以能抓住工程技术问题的实质，还因为有扎实的理论基础，深入接触实际，善于将理论与实际结合，且思想解放，不墨守陈规。”

最近知道，国务院颁布的有特殊贡献的国家级专家享受特殊津贴，方宗岱竟不在其列！朱鹏程这篇纪念文章，当然是有所为而发，而“感慨系之”的。

老四写的“思念片断”说：“直到爸爸临终前，在病房里还为正在同儿子闹矛盾的病友劝解。他说：我最感到宽慰的是我们一家人的和睦。”

1991 年 11 月 28 日方宗岱去也。听说弥留之际，还向去看望他的钱正英说，三峡这样特大的工程要慎重决策，以免遗患无穷。

中国的文化传统，很讲究为人处世之道。我这样想着，一代泥沙专家方宗岱去世了，在弥留之际，作为格物、致知、正心、诚

意、修身、齐家，他是死而无憾的，可以瞑目的；可是，作为治国、平天下——对神州大江大河的治理，对黄河与三峡工程，他是死而有憾，难以瞑目的！

缅怀张昌龄总工程师

张昌龄同志是中国水电建设的元老之一，以八十七岁高龄于1993年9月去世。有关方面要为他出纪念文集，命我写篇短文，我们相交40年，实义不容辞。

1952年9月，第一个五年计划将开始之际，我从湖南转业，调到燃料工业部主管水电建设工作。当时水力发电工程局是个部内局，实际听命于计划司；机关设在西郊民巷一所旧房子中，技术干部只有二三十人，都是原国民党资源委员会水电总处的老人。抗战期间，这个总处在西南和西北建了一批小水电站，进行了一些河流的勘测工作。抗战胜利后，水电的勘测和建设就开始推向华东和中南地区，并开始了三峡的勘测与规划。当然，随之而来的内战，这些工作或陷于停顿或进展缓慢，但设在南京的这个总处的人员和全部资料，随整个资源委员会留在大陆，由人民政府顺利接管。当年处长是黄育贤，副处长是张昌龄。这个处的人员调北京后，张仍留在南京，任办事处主任，负责办测绘训练班，半年一期，办了两期，每期约五十人，为新中国的水电事业培养了第一批测绘人员。正如没有剧本，怎能演戏？水电系统一直是勘测设计先行。我到西郊民巷后，黄由局长改任总工程师，张任副总工程师，因此，大家习惯称呼他们为黄总、张总。

当年水电系统的技术人员都知道中国水电的四位元老：施嘉炀、黄育贤、覃修典、张昌龄，他们都出身于清华，都是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初，由清华公费派送美国留学，专攻水力发电工程；除黄毕业于康乃尔外，都毕业于麻省理工，取得博士或硕士学位。施先生一直在清华执教，桃李满天下；黄与覃偏重于施工；张总则偏重于规划设计，尤擅长水文计算，以精通数学著名于同辈。他们确是名符其实有真才实学的元老，开创并经历了新中国水电建设的全过程，一生执着于、迷恋于这个事业，鞠躬尽瘁，到老不止。张总为人正直，厚实寡言，谦虚谨慎，和蔼可亲，遇事沉着冷静，认真负责到底。几十年风风雨雨，就事业和为人而言，证明张总他们不是风中杨柳，更不是墙上芦苇，而是“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的挺拔青松。几十年曲曲折折我同他们、同所有旧社会过来的水电技术老干部，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工作关系或建立了私人友谊，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我们彼此了解，彼此尊重，有共同理想，有共同语言。这里要提起一件往事。1934 年，我从长沙到北平升学，一心一意要考清华的工学院，可是没有考取，就准备住在北京的公寓，第二年再考。由于家庭的督促，不得已再报名，考取了武汉大学，怅怅南归。当年怀有“工业救国”思想的青年，是很羡慕清华园的生活更不要说麻省理工的。因此，我后来虽然是解放区出来的“老干部”，身居领导岗位，在“政治挂帅”、“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我并没有偏离历史尤其经济发展的规律，同张总他们相处非常融洽，没有任何隔阂，充分信任他们、依靠他们。在反右派运动中，水电系统受的损失很小，老技术干部中没有几个右派。新中国建立之初，水电是个新事物，不为世人所知，难于取得信任，人们习惯于发展火电，水利也是重在防洪。由于全面发展了科学技术和

人才的优势，整个方针政策的正确，大批新人才迅速培养出来，使得五十年代的水电建设，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我们常说“在火电与水利的夹缝中奋斗”），仍然得到蓬蓬勃勃的发展，为新中国的水电建设打下良好的基础。这自然同张总他们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1953 年水电总局成立后的大事之一，是参加黄河规划。这之前张总就曾长期住到开封黄河水利委员会，参加并指导黄河水文基本资料的整编，这是黄河流域规划依据的基础。黄河规划委员会成立时，张总任委员并兼任水工组组长（那时黄规会的办公室就设在水电总局）。大家知道，当年在苏联专家帮助和各有关部门协作下，虽然三门峡出了问题，但黄河整个流域的规划工作基本是成功的，尤其是从上游、中游到下游，具体安排了四十六个梯级和选定第一期工程，乃其中的关键。之后，除黄河上游的刘家峡外，张总主持、参与研究和审查的大型水电站，有新安江、新丰江、柘溪、乌江渡、桓仁、云丰、丹江口，以及上汰江和猫跳河梯级。新丰江因水库容积大（一百三十九亿立米）而发生诱发地震后，张总到现场调查研究，提出工程处理措施，从而保证了水库的安全。七十年代后，他主持、参与审查和研究 过的大型水电站，有龙羊峡、白山、东江、凤滩、铜街子、龚咀，以及等水滩和渔子溪梯级。1979 年我复职重建水电总局时，黄育贤已去美国，张昌龄任总工程师。张总晚年一直参加三峡工程的论证。关于三峡的方案，他同一批老水电专家施嘉炀、陆钦佩、李鹗鼎、王伊复、罗西北、黄元镇等，主张降低坝高，采用较低水库蓄水位，以缓解大量移民和其他困难问题。他还同覃修典、王宗源、王世泽（前华东水利学院教授）等，主张三峡两级开发，即在三峡建较低的坝，水库回水至涪陵附近，在该处再建一低坝，回

水至重庆。这样可减少移民，同样取得发电和航运效益，还有一定防洪作用。从三峡论证也可看出，张总是一位始终敢于独立思考、坚持自己意见的人。我总觉得以张总为代表的一批水电老专家，从来埋头苦干，不事喧哗，不趋炎附势，追名逐利，真正能做到古人所求的境界：淡泊明志，宁静致远。这确是现在青年应当学习的一种品格。

张总参加编制过许多水电的技术规程、规范，参加主编8卷大型工具书《水工设计手册》，也写过不少有关水电规划和设计的论文。早期有《水库的洪水推演》、《黄河水力枢纽的工程布置》、《长江规划和黄河规划的比较》、《水力资源普查和水能规划工作上的几个问题》、《河流综合利用工程的经济论证及投资分摊》等十多篇；晚年仍孜孜不倦，结合试验研究，写出《水电站压力水流运动的理论分析及调压室水位振荡的计算程序》、《水电站调压室水位振荡的理论分析及下马岭水电站甩负荷试验的计算论证》等技术论文。

这些论文应在纪念张总的文集或专集刊出，这是中国水电建设的宝贵财富，应当传诸后世。

为帅大姐祝寿(二篇)

回首一生雄

今年1月2日去看望帅孟奇大姐,遇到几位老同志,才知道第二天是大姐九十大寿。这时才注意到,客厅中挂了一幅新画——邵宇写《苍松图》:铁干繁枝,生意盎然,是原在组织部工作的几位老大姐所赠。大家命我也作诗为贺,于公于私,义不容辞。第二天一早,我写了一首五律送去。后来发现颔联不合格律,只得改作,重新书写。定稿及跋语如后:

大姐骄吾党,高风举世宗。
刑庭知铁骨,正气贯长虹。
沥胆披肝剖,先忧后乐中。
耄年参盛业,回首一生雄。

为贺大姐九十大寿,1月3日晨吟得一律,匆匆书呈,未遑推敲。"心如安石榴,骨似泰山松"一联,"榴"字湘人读仄声,实平声。大姐一生,巾帼英雄,虽无儿女,却是慈母;照管烈士子弟,成栋梁之材,诗中亦为未述及。五言八句,挂一漏万也。

1938年的夏天，我从徐州突围，回到武汉，长江局派我回湖南工作。到长沙后，省委第一个来同我接头的，便是帅大姐。抗战爆发后，大姐才从南京监狱放出来。我见她走路很慢，视力不好，显得老态，穿着也不大像城里人。地下党的生活，互相之间很少往来。当时就听老同志谈到大姐1932年被捕受酷刑事：腿骨压断，倒灌煤油水，七孔出血，眼睛几乎失明，牙齿也被打掉，奄奄一息。但敌人一直没能从大姐口中挖出一个字来。受刑前后，敌人还采取过各种劝降、诱供的办法。当叛徒顾顺章来劝降时，被大姐骂了回去。真是“愿作须臾阶下鬼，何妨慷慨殿中狂。”如此宁死不屈，感动了牢房女看守，偷偷为大姐接骨，经难友细心护理，始得生还。这种凛然浩气，对我们这些新党员，当然最具感染力。四、五十年来，我对大姐的尊敬，是从这儿开始的。大姐自己却从来没有跟我提过这些事。李伯钊写的《女共产党员》，记录了大姐这一段斗争经历。这书五十年代发行过几十万册，被译成几种外文。

长沙大火后，省委迁到邵阳，同大姐见面的机会多一些。她当时兼管省委的财务，按月给我们几块钱生活费。1939年2月，博古到邵阳开会，正式成立湖南省委，大姐被选为省委候补委员。她是洞庭湖滨汉寿人，后来调任常（德）益（阳）中心县委书记。1940年，她作为湖南参加“七大”的代表，到了延安。延安时期留在记忆中的一件事是，1943年“抢救运动”后的甄别工作中，大姐熟悉白区情况，根本不相信那些被逼出的口供，曾为许多受冤屈的同志平反。可是当时康生搞什么“红旗党”，搅乱了是非。她对此是很气愤的。大姐出身于农民家庭，没有读过多少书。父亲是小学校长，为人正直，有民主思想，她自幼受父亲熏陶。她常说自己马列主义理论懂得不多，讲不出多少大道

理。可是她最懂得也最能实践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实事求是，一生尊重事实，坚持真理，不为任何风浪所动摇。1928 年她在苏联学习时，曾参加反对王明宗派教条主义的斗争，为此受过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后经申诉，改为党内警告，直到“七大”时才撤销。1957 年“反右”运动时，中央组织部没有什么右派可抓，硬要将一个平时说话不大注意的同志定为右派，大姐不同意，坚持保留意见。1959 年她到浏阳考察，路上被农民拦住，请她去看密植过度的后果。回北京后，她马上向部里汇报，又如实向中央反映了。

大姐是一直关心我的情况的。1979 年我回北京工作后，即去看望她，知道她在十年批斗关押期间，曾因病重开刀，几乎丧生。关于她自己的情况，只跟我谈到一点，就是在牢房中整夜被强灯光直射，眼睛受不了这种折磨，已经不能看报读书了。康生辈强加在大姐头上的罪名是“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对帅大姐这样全党尊敬的“铮铮铁骨”，竟然如此诬陷，即此一事，也足以说明“文化大革命”的荒唐和罪恶。“四人帮”粉碎之后，大姐和中组部、中纪委的同志在中央领导下，为复查冤假错案，端正党的组织路线，做了大量工作。1982 年我到组织部工作时，大姐已退居二线，由于她的平易近人，爱护干部，心中总是惦记着别人，大家有事还是愿意向她反映，征求她的意见。有时在她参加的会议上，如关系到干部的评价，特别是“文革”期间的是非，不论问题如何复杂，看法一时难以一致，她总是据情直言，入木三分，对自己的观点从不含糊，从不模棱两可。有时在闲谈中，也跟我谈及这类往事。如五十年代初，中组部曾派人到苏联考察组织工作方面应设立哪些部门，那时苏联设有工业、商业、财贸、外事等部。刘少奇听了汇报，提出要成立外事工作部。大

姐知道后，向安子文说，不需要成立这个部。她当时主管外事干部工作，我国只同四十几个国家建交，人事工作还不多，成立一个部，至少要扩大编制，增加人员。后来大姐写了报告，少奇也同意不设外事工作部了。

大姐在苏联学习受处分后，曾在纱厂做过工。回国后，在上海长期做纱厂女工工作。由此更使她惯于体察下情和过俭朴的生活。她的家用简单，“四人帮”粉碎后，补发的十年工资全部上交国库；平时节余的钱，也大笔大笔地捐给家乡，作教育后代之用；出差时，总怕公家多开销，从不带家属。她照看过许多烈士遗孤，从延安时起，孩子们都亲热地叫她“帅妈妈”。我听说过这样一件事：陈赓将军长子非常爱戴帅大姐，视为生母。他的母亲与大姐同过监，抗战初于太行牺牲。1975 年大姐流放到江西后，他特地画了一幅梅花寄给帅妈妈，让他的好友题词。他们对八十高龄的老革命家仍受如此迫害，极为悲愤。选用《正气歌》中“清操砺冰雪”意，题词为“经风霜始傲骨，砺冰雪而心坚”，以此表达他们对帅妈妈的崇敬和热爱。

不顾年高体弱，大姐一直坚持常下去考察。虽然已退出了中央顾问委员会，今年仍作了这样的安排。

读过我这首贺诗的同志，多欣赏“回首一生雄”句，认为概括了大姐一生。一个共产党员，回首他走过的人生历程时，能够坦然地说，他把全副精力都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没有、也没有想为自己谋取任何私利，这样的共产党员，是真正的共产党员。帅大姐是做到了这一点的。“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这是唐人王昌龄的一句诗。帅大姐的一生行事，也可说是冰心一片，纯净无瑕。那些过去曾为人民立下功绩，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能保持共产党员节操的人们，在帅大姐面前，是

会感到羞愧的吧！帅大姐是我们党的骄傲，她的高风亮节值得一代代传下去。

1986 年第 9 期

平生只为公

关于帅孟奇大姐，我写过一篇小文刊于《瞭望》1986 年第九期。《模范共产党员帅孟奇》一书的编辑嘱我再补充些内容，主编董边还为此给我写了封长信。帅大姐一生可歌可泣之事甚多，好多同志都已写到，南京监狱的受难和斗争早有专著。我只是觉得，像大姐这样的老一辈同志，党内为数不少，为什么她能独具一格，如此受人尊敬？她最值得学习的品质是什么？

人所称道的大姐高贵品质，是在敌人面前大节凛然，视死如归。我觉得更难得的是她在党的历次大风大浪中岿然不动，一贯站在正确的方面，如 1928 年在莫斯科学习时，反对王明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而受处分，直到七大时才平反；延安抢救运动时，持怀疑态度，负责平反工作，敢于处理疑难案件；“三反”、“五反”时，认为没有“老虎”的单位不要硬打；反右派时，中央组织部划的右派，唯独她坚持不同意；她还保护过在河北挨整的副省长薛迅；“大跃进”时，见到浮夸风，就立即向毛主席反映；反右倾时，亲自去兰州调查，为兰州大学一位副校长免戴帽子；十年浩劫中，被诬为“叛徒”、“特务”，批斗五十天，未失明的右眼被打坏，七年监狱，受尽凌辱，两次病危，任凭虐待，却从不“认罪”。大家都清楚，解放后二十来年的反复风浪，人们多惯于或见风使舵，或明哲保身，或违心迎合，或上纲上线，或墙倒众人推；更下

焉者，损人利己，揭隐发私，造谣惑众，公报私仇，落井下石，乘机上爬。于是，一夕之间，烈士变叛徒，功臣为祸首，黑白颠倒，乾坤错乱，都不以为怪；朋友相仇，师生如敌，夫妻离异，父子分家，也习以为常。在如此世态之中，大姐绝不卷入，能沉默的沉默，该讲话的讲话；我心如秤，不能为人低昂。她真正做到了坚持真理，光荣孤立。她的形象正如郑板桥《竹石》一诗："咬住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是的，要做到不随风倒，问题就在根子扎得深不深：是否从实际出发，尊重客观事实，坚持唯物论。但大智之外还要大勇：能否矢志不渝，言行一致，心口如一，敢讲真话。是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可是，一个共产党员一生讲真话，说来容易，要做到真是难上难呵！回顾历次政治运动，能有多少人做到？大智不一定能大勇，只有无私才能无畏。要敢于讲真话，要提倡讲真话，尤其要造成敢于讲真话的环境，这是我们党几十年来付出浩大代价换来的历史教训，也是今后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课题。而大姐确是一个绝无私心的人，一个无所畏惧的人，一个大智又大勇的人，一个敢讲真话的人。

在日常生活中，大姐心中确有一只天平，经常衡量是非曲直善恶美丑。她不愿为自己提级，大笔存款缴公或支援家乡建设，她也不怕亲属说她六亲不认。对照之下，那些热衷于自己升官提级、谋权夺位的人，那些孜孜于子女升学出国、当官晋爵的人，那些满嘴大公无私、满肚大私无公的人，那些从来唯上唯书、从不唯下唯实的人，是何等渺小，能不汗颜！

作为一个文化不高的老同志，大姐另一种难得的美德，即她对知识分子的爱护与尊重。回顾党的历史，这点特别值得赞扬。

我是1938年认识大姐的。同她有过接触的我们“一二·九”这一代知识分子，对此都有亲身感受。近年大姐多次回乡，见到地县两级提拔了大批文化高的知识分子，她是非常高兴的，常举出一些名字，哪个很称职，哪个有前途。她尤其关心省级班子的文化结构，认为要有称职的大学程度的人。她为此曾上书直言。大姐的秘书陈双碧是在苏联学理工科的，十年如一日帮助大姐，很受大姐品德的感染。她跟我谈过她姑姑陈楚平的事。楚平是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的学生，因积极参加“一二·九”运动，被学校开除，抗战爆发后即到延安，不幸被关进保安处，审查四年后无罪释放，留在该处合作社当会计兼售货员，1943年“抢救运动”时再受审查。大姐主持边区政府系统复查工作中，果断地为她平反做了结论，从而结束了八年恶梦。大姐主持中央妇委工作后，就把陈楚平调去，使她有机会施展冻结十年的才华。1947年邓大姐要秘书时，大姐又果断地将她推荐。陈楚平去世前的最后岗位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著作研究组”组长，曾主编《周恩来选集》。

董边给我信中说：“大姐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做干部工作，她任人唯贤，五湖四海，从不整人，也不迁就落后，有时批评人也很严格。她特别关心女干部的成长，但要女干部靠自己努力做出贡献。她常对我说：最恨‘夫荣妻贵’的思想。对现在有些地方以权谋私，任人唯亲，甚至拉帮结派，互相包庇之事，深恶痛绝。”写到这里，真是不胜感慨：我们党内像帅大姐这样的人太少了！

《回首一生雄》小文中有一首五律，是意犹未尽的，现依原韵，再献一首，为大姐九十进二寿，然而仍不能尽其意也：

湖湘多壮士，巾帼有英雄。
盛德难求喻，平生只为公。
霜枫心似火，古柏骨如铜。
直道堪师表，言多逆耳忠。

1988 年 1 月 3 日

[附录]

缅怀先烈　启迪后人

——《平江人民革命史》序

《平江人民革命史》的编者，嘱我为这本书写一篇序言，实不好推辞。这不仅因为我的老家是平江，曾两度在湖南工作过，还因为我确切知道平江这个地方同中国现代革命史的关系：是产生中国红军的摇篮之一。

1949年7月，南下湖南路过平江时，顿觉城乡一片生机。往事涌心头，近乡情更切。此种心情，我的《龙胆紫集》中有一首七律记之：

并非特具故园心，一过通城景物新。
土铳三千迎北伐，梭标十万欲西拚。
口丁减半"暴徒"在，村屋夷平草木欣。
不倒红旗二十载，擦干眼泪接亲人。

尽管我自幼没有在平江生活过，这次路过县城也只住了几天，对故乡的感情却是愈老弥深的。去年我写了一篇《忆六如老伯》的长文，其中这样谈到平江的革命历史：

"平江这个地方，清末即得风气之先，五四运动时有过群众

性的反日斗争，尤其十年内战时，是湘鄂赣根据地的中心区域，斗争极其尖锐而残酷。国民党高喊‘血洗平江’，实施三光政策，烈士之多，居湖南首位。全县人口由七十多万减到开国初的四十多万。”

“十年内战时期，平江这个地方高潮低潮，汹涌来去；胜利失败，交织起伏；迅猛的发展，惨重的牺牲，常常更迭而至。”

在平江为革命播火种的人是李六如。他 1919 年从日本留学回国时，怀有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认为只有把工人和农民教育、组织起来，振兴实业，国家才有希望。他集资办的织布厂虽然破了产，但他创办的救贫工厂、工农夜校以及工会和农会，不仅出现了平江第一代产业工人，同时培养了平江最早的一代革命干部。在长沙同毛泽东、何叔衡发生工作联系后，1921 年他就入了党，第二年，平江的工会会长陈弗章、农会会长余贲民也由毛泽东介绍入了党。

在写这篇长文时，我已收到《平江人民革命史》的稿本，因此文中得以确切地叙述了下面这些有关“红军摇篮”的事实：

1923 年，平江成立了第一个共产党支部，党员中有裁缝、木匠和小学教员。1924 年，有团员二十三人。献钟党支部书记罗纳川(1928 年牺牲时为县委负责人)领导二千造纸工人罢工，取得胜利。平江人前往黄埔军校学习的，一至四期有三十二人，五至七期有五十五人。这年由共产党员为主建立起来的平江国民党，有党员一百多人。1925 年，党员发展到约四十人，正式成立县委。在北伐战争前夕，平江即展开了轰轰烈烈的爱国群众运动。

平江是通湖北的要道。1926 年 7 月，北伐军进逼时，党领导的民团成立了敢死队，支援叶挺团攻占县城。余贲民任县团

防局的总局长。1927 年，党员达七千多人。马日事变后，湖南城乡一片白色恐怖。7 月，县委集合团防局、工农武装共一千二百余人编为平江工农义勇队，由余贲民任大队长，奉命前往南昌参加起义。后来这支部队辗转战斗，到浏阳文家市与毛泽东会合，上了井冈山。为对付反动派的屠杀，此时县委成立了平江暴动委员会，由罗纳川任主任，在四乡成立义勇队，人数几十、几百、上千不等，枪支不过几支、几十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起来。九月，暴委即组织农民数百人扑城一次。这些初出茅庐的游击队，同国民党的清乡部队进行了极为残酷的斗争。由于形势的恶化，全县党员由七千多人减到三千七百人。1928 年 3 月，县游击总队组织“十万农军”第二次扑城，因人数太多，过早暴露目标而撤退。这次扑城高潮时，党员发展到一万一千多人。7 月，彭德怀起义后，有的村子，群众集体入党，全县党员一时号称七万。到 1930 年为止的四年之内，平江的地方武装不断编入正规红军，总计约有五万青壮年参加了红四军、红五军、红十六军。1930 年红三军团攻打长沙时，全县动员参战的赤卫军达十二个团。1931 年 3 月，红军攻克县城后，一次选志愿兵一千五百人到江西补充红军。1938 年初，以平江为主的湘鄂赣地方武装，又合编为红十八军。红军长征后，空前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敌人几十倍的兵力也没能将游击队整垮。1938 年初，新四军第一支队成立时，傅秋涛率领的第一团从平江出发，共一千一百人，还有二百多支步枪、三挺轻机枪和七百把马刀；地方上还有二百多党员。

国民党统治时期，一天也没有放松过对平江的清剿和控制。1928 年春，国民党军到平江清乡时，从东乡到南乡，火烧八十里。陈光中部在东乡，分配士兵杀人任务，每天交左耳一只。8

月，有名的“龙门惨案”，三天时间，在这个乡杀一千三百人。这几个月内，东南北三乡火光不熄，几万人无家可归。王东原部清乡时，口号为“血洗东南乡”，见人就杀，见屋就烧。韦家洞长四十五里，为进剿重点，二百七十户人家，六百多纸槽，被烧光毁尽。许多干部和积极分子的全家人口，被斩尽杀绝。整个内战时期，国民党在平江实施一烧、二杀、三捕的政策；城乡建立“挨户团”地主武装；普遍施行“自首自新条例”和颁发“良民证”，以对付苏维埃政权和农民游击战争。抗日战争初期，1939 年 6 月，还制造了有名的平江惨案，湘鄂赣的老领导人涂正坤等惨遭杀害。写到这里，不禁要问，为什么平江这个地方能够成为红军的摇篮，“不倒红旗二十载”？我以为除开特殊的地理环境——峰峦绵亘的三省边界，和土地高度集中的阶级矛盾之外，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得时代风气之先。清末民初就有维新分子在这里办学校，开民智，后来这些学校，不论是私立的（启明女子学堂）、教会的（培元学校）和公办的（小学、中学和师范），都有进步分子或党员在内活动，都起了广泛的传播知识、解放思想的启蒙作用，促使人们重新认识世界。有一所吴克坚同志等坚持的秀野师范，更是大革命前党办的学校。重视文化为平江这个地方的传统风气，不管家境如何贫困，农民也总要尽力让子弟读一点书。平江的红军将领数以百计，他们大多数是贫苦农民出身，都读过几年书，因此在革命队伍中成长就快。细心的读者，在书中会发现这个情况。二是有革命知识分子与工农的结合。知识分子人数少，但在革命运动中起骨干作用。从全国来说，平江是建党最早、党的作用发挥最好的地区之一，同这一条分不开。老一辈的革命知识分子代表除李六如外，还有方维夏和毛简青等。方维夏的文章道德为地方敬重，有“方圣人”之称。1910 年，他

从日本东京农业大学毕业回国，在长沙从事教育工作，任教第一师范，参加倒袁、驱张诸役，曾任省署教育司长、教育会会长，为全省教育界著名人士，在平江的影响尤大。他 1924 年在广州入党，北伐战争时，任第二军第二师党代表，内战时期在江西受左倾路线的打击，1935 年在湘赣边区牺牲。方维夏虽然没有在平江工作过，但一代师表，春风桃李，在故乡有形无形的影响很大。“方圣人在党”，不仅鼓舞青年学子，对豪绅地主也是一种震撼。毛简青出身于富豪之家，抱着实业救国的理想，1913 年到日本求学，在东京帝国大学经济系毕业，获硕士学位，1921 年回国后，即由李六如介绍入党，1924 年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马日事变后，被派回平江任县委书记，领导秋收暴动，开展游击战争。1928 年 3 月扑城失败后，他到党中央汇报工作，即赴莫斯科出席党的六次大会，回国后在湘鄂西工作。比他们年纪小一些的知识分子，如罗纳川、张纯青、吴溉之、李宗白、邹平等，早年都当过教员，或到黄埔军校、农运讲习所学习过，因此，成为游击战争初期的领导人和红军的高级将领。我从小在家庭的亲友中，就常听说女英雄胡筠的名字。她自幼习文练武，夫家是平江大地主，1923 年冲破家庭樊笼，到启明女子师范读书，为学生运动领袖，五卅惨案后即入了党，北伐战争时随叶挺团作宣传工作，后在武汉参加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女生队。1927 年 7 月派回平江领导武装斗争，初任北乡暴动委员会主任。她将夫家千亩良田分给农民，带领游击队伍转战边区。彭德怀起义后，她任平江县第一任苏维埃主席，后来还担任过红军赣北独立团团长，以及湘鄂赣省委妇女部长等职。不幸的是，知识分子和出身不好的干部，在过去左倾路线特别是错误的肃反政策中，多易遭到打击乃至迫害至死。毛简青、余贲民和胡筠三位曾是平江家喻户晓的

人物，就都死于 1932、1933 年的肃反事件中。

像平江这样同中国革命有密切关系的地方，是应该单独成史的，它是整个中国现代革命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是一项必不可少的补充。因为它能为读者提供更为详尽也更为翔实的材料，能帮助读者具体了解当年革命家所进行的艰苦卓绝、可歌可泣的斗争，还能使读者温习革命过程中种种经验教训尤其是重大的失误，从而了解中国革命曾走过一条多么艰难、复杂而曲折的道路。六十年代中，李六如曾经受命主持编写《平江革命斗争史》一书（他还写了《余贲民传》），由于“文化大革命”狂飚骤起，未能藏事，他还因此得个“为彭德怀翻案”的大罪名。令人高兴的是，平江从事党史工作的同志，近年来做了大量资料征集的工作，访问了许多老同志，出版了不少党史资料。平江籍的老同志多年来也写了许多回忆文章。我见到的《平江革命历史文献资料集》，五十二万字，内容极为丰富，都是第一手材料。在这样的基础上，曹继肖、吴定邦、凌辉、徐许斌四位同志编写了这本四十万字的史书，他们的辛勤劳作，是令人尊敬的。我草草翻阅一过，觉得此稿条理分明，文字流畅，史料宏富，事迹直书，且多生动资料。就体例言，似亦兼取中西史籍之长，前部分《革命史》，按照四次革命战争时期，分段分事叙述，眉目清楚；后部分《人物传》，三百一十位历史人物分别立传，文字详略依其事迹而定。引人注意的是，有关当年盲动主义、左倾路线错误等等史实，根据文献，有所记载。如果要说有什么不足之处，苛求一点，则材料取舍、内容详略、文字处理上，似尚有粗糙之感，文献资料有的照录过多，有欠分析之处。关于几次左倾路线的错误，虽在叙述中已予提及，但如重要的土地政策、经济政策等，究竟受到何等影响，来龙去脉如何，缺乏概括的综合说明。又如使革命力量遭

致严重损失的肃反政策，虽然“AB 团”“改组派”等类问题，已有基本总结，书中好几节对此有所记述，却不够清楚。总之，我以为这是一本好书，公开出版，既可以缅怀先烈，知前人创业之艰难；更可以启迪后人，知理想与抱负之可贵。至于种种不足之处，经过广大读者的评论，以及编写者的继续努力，相信再版时当可更臻完善。

1986 年 12 月 21 日

老区平江县
至今还很贫困

4月中旬，我回到阔别五十一年的家乡——湖南平江县长寿街，见到一些亲属，同县委负责同志座谈，看了几个企业。所见所闻，使我感受最深的是：这个曾经为中国革命付出巨大牺牲的山区县，整个面貌虽有较大变化，但同各地近几年的发展相比，仍然是很落后的，还有百分之十五的农户温饱问题尚未解决，迫切需要进一步予以扶持。路过嘉义，我去看望了八十五岁的喻杰同志，谈到家乡贫困情况时，他说："平江好象一个病了很久的病人，体质已经十分虚弱，服一两剂药是无补于事的，一定要花点本钱扶本，才能恢复元气。"喻老回家乡住了二十多年，了解情况深切，我认为他的看法很对。扶本，关键就是要对平江这样的贫困老苏区进一步放宽政策，进一步落实既定政策，以增强其自求生存，自求发展的能力。

现根据县委提供的材料和我的见闻，提出以下看法和意见，请湖南省委和中央有关部门考虑。

仍然是贫困县

平江县地处湘鄂赣三省交界山区，现有九十一万人（比建国

初期增加三十三万人)。人均田地八分,山地四亩八分。近四十年来,全县经济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五点六,其中"六五"期间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三点一。1987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达四万三千四百二十九万元,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十三点五一;粮食总产量达九万一千五百六十万斤,比上年增加一千三十九万斤;农民人均纯收入三百九元,比上年增加四十五元,剔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增长百分之一点七。这说明,平江县经济建设已出现了一个较好的发展势头。

但是,平江仍然没有摆脱贫困。据1985年底统计,人均纯收入在二百元以下的还有五万七千六十三户,共二十六万人,分别占总农户的百分之三十点六和总人口的百分之三十一点五。去年被中央列为全国二百七十一个贫困县之一。

贫困状况特征

该县的贫困状况主要表现为:

一是生产发展慢。整个农村经济还没有突破粮食加牲猪的单一结构,粮猪产值占整个农业产值的百分之六十以上。每亩山林收入仅四点七元。工业尤其落后,1987年工业产值只占工农业总产值的三分之一。二百六十多家县、乡、镇企业,没有一个中型企业,年产值过百万元的仅十八家。大部分企业设备陈旧,技术落后,有的甚至还在使用三十年代的设备,致使产品消耗高,质量差,缺乏竞争能力。因此,全县经济水平与全省的差距越来越大。近几年,全县人均工农业产值居岳阳市倒数第一;与全省平均水平比,一九七八年低二百五元,1984年低三百八

十元,1986 年低六百六元。就是与湘西自治州相比,1986 年平江县农民人均纯收入二百六十八元,比湘西自治州十个县市中的任何一个县市都要低。

二是地方财力弱。1980 年到 1987 年,县财政收入一万三千八百四十八万元,其中工商企业收入仅占百分之十四;财政总支出一万八千七百万元,其中维持人头经费的开支占百分之八十六点四,用于生产建设性支出只占百分之十三点六。八年中有四年出现财政赤字一百八十一万元。1987 年预算内赤字四十一万元。

三是基础设施差。全县还有九万多亩水利死角,一万一千人口及牲畜的饮水问题没有解决。现有水利工程普遍存在质量差、不配套、效益低的问题。二百五十四座水库中有一百三座急需整修、配套,水库设计灌溉面积近三十一万亩,实际受益不到二十万亩。全县还有半数以上的村不通广播、电话。百分之四十的村不通公路,百分之二十的村不通电。用电基本上靠自办的小水电站,发电量只及需求的一半,严重制约了生产的发展。

四是群众生活水平低。1987 年全县农民人均实际收入只有三百九元,且地区间很不平衡。全县五十八个乡镇,除靠近县城和部分乡镇基本解决温饱问题以外,大部分乡镇都较为贫困。在这些地方,相当一部分农民还是"吃杂粮借粮,住茅房破房,照竹片松光,穿补钉衣裳。"

贫困的原因

平江的贫困落后,有着重要的客观和历史原因。

第一，自然条件差。全县大部分地方山多坡陡，土地贫瘠，近半数的地区是红黄壤和风化层砂砾岩地带，土壤团粒结构差，水土流失十分严重。自然灾害的发生机率高，1983 年至 1987 年五年中，年年都有灾害。在一些大山区，青禾风、黄禾风、鼠灾、兽害等相当严重。加上交通闭塞，运输不便（水运已断，全靠公路），如每运进一吨货物，要比相邻的汨罗县多花三十来元运费。为了运进运出，半数左右的劳动日用于肩挑背驮，与平原、湖区比较，不但劳动强度大，花工数量多，生产成本高，而且无效劳动多。

第二，人口素质低。在不少山区，上学难、就医难、结婚难的问题至今未得到解决。现有初高中任课教师中，能够胜任本职工作的只占百分之三十七点五，拔高使用的占百分之六十二点五。小学教师中，具有高中、中专文化的只占百分之五十四点七。其余都是初中以下文化，经考核不能胜任的占百分之四十三点六。不少学生要跑十多里山路才能上学。不少贫困户由于劳力缺乏，学费困难，子女不能上学，成了新文盲。一些贫困乡镇由于医疗网点少，医务人员奇缺，一些地方病、传染病、多发病得不到有效控制。天岳乡有两千多人患气喘病，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三十四。去年计划生育体检妇女三百七十人，有妇科病的占百分之九十八。由于贫困，山里妹子往外嫁，埠里妹子不进山。许多男子找不到对象。这些因素，使得智力和体力“双重贫乏”。人才留不住，引不进也是个大问题。1980 年至 1987 年，全县共流出大中专知识分子一百二十人，其中助理工程师以上三十三人。去年，省里分配大学本科毕业生六名回平江工作，最后只回来一名。

第三，“左”的破坏大。党长期的左倾错误，给平江造成了严

重影响。在经济工作中，过去长期强调“以粮为纲”，不讲因地制宜，只讲贡献，不讲休养生息。使山区经济在某些方面不但没有发展，而且逐渐萎缩。为了抓粮食，山区不得不垦荒种粮，挖山种粮，造成水土严重流失。平江历史上一直是个吃进口粮的县。可是，国家的粮食征、超购任务逐年增加。1950 年六千二百三十四万斤，1964 年七千五百万斤，七十年代以后，每年要完成一亿斤以上的征、超购粮，最高年达一点七亿斤。实际上全县粮食问题没完全解决。夏收、秋收后送交国家，春荒、灾荒又返销回来。木材问题最大，五十年代国家平均每年下达派购任务一点七万立米，六十年代达到二点一万，七十年代起高达四点一万。为了完成木材派购任务，山区不得不超伐林木。加上自用木材和“大跃进”、“文革”时期的严重破坏，木材蓄积量急剧下降。据林业调查资料，全县 1957 年林木蓄积量为三百二十八万立米，1975 年减少到二百六十八万，1985 年减少到二百来万。解放后全县共上交国家木材一百一十四万立米，平均每立米收购价格仅十五元。这不能不说是平江县的“自杀性”的贡献。直到 1984 年取消派购，提高价格时，木材已砍得差不多了，绝大部分林区成了过伐残林。山林植被的恢复周期长，资金劳力投入多，山区大多数农民无力进行残林改造和林地更新。尤其是山林一旦遭到破坏，生态、生产环境也随之恶化，造成自然灾害频繁。据近二十多年资料分析，全县山洪为害的机率已高达百分之六十一，干旱发生机率高达百分之六十四，水土流失日趋严重。据农业区划调查，全县水土流失面积由开国初期的十二万多亩剧增到 1982 年的一百七十一万多亩，增长近十四倍。有十七个乡镇，山上表土严重流失，形成了光头山、石壳山，耕地土壤严重沙化，既不保水，又不保肥。

左倾错误的影响还表现在对人的积极性的挫伤。开国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据统计，平江直接受到迫害的共五千十八人。其中有四百八十一人被错划为右派，一千七百九十四人被打成叛徒特务。平江起义发生在平江，1959 年因彭德怀牵连而挨整的干部群众就有二千七百四十三人。多年来由此导致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战争年代亲如鱼水的党群关系受到严重损害。不少人至今谈“左”变色，心有余悸。

第四，历史创伤重。平江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农民运动和武装斗争的中心地带之一，因之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全县共有二十三万多人惨遭反动派杀害，现已查明并认定在册的烈士一万八千八十九人，占湖南全省烈士总数的五分之一。四十多万间房屋和大量山林被烧毁（我到长寿街附近山冲为父母扫墓，原有的大“庄屋”就被反动派烧毁），人力和自然资源遭到极大破坏，不少乡村至今尚未恢复元气。

扶贫政策初见成效

近几年，中央和湖南对帮助贫困地区改变面貌，制订了一系列的方针政策，省市党政负责同志和有关部门多次到平江调查研究，给予具体指导和扶持，解决了不少实际问题。平江县各级党政都把扶贫工作作为一件大事在抓。近三年多来，他们在制订改变贫困面貌规划的基础上，围绕五年基本脱贫这个奋斗目标，动员全县人民艰苦奋斗，致力于山区经济开发，狠抓基础设施建设，商品基地建设，农、林、矿产加工工业和大面积扶贫四项工作，取得了初步成效。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全县共集资二千九百六十三万元，投工一千一百二十万个，用于发展交通、能源、

农田水利设施和教育事业；商品基地建设，狠抓了水果、茶叶、药材、生猪、速生丰产林、山桂花蜜和淡季蔬菜等七大基地建设，共投入资金二百三十五万元；农、林、矿产加工业，已投资三千七百十九万元，新建、扩建七十五个加工企业，全部建成后，年增产值可达六千多万元；大面积扶贫工作，三年来，全县筹集资金八百三十一万元，重点扶持了三十一万多贫困户发展生产，占贫困户总数的百分之六十四，已有一万六千二百户基本脱贫。可见，平江的扶贫工作由于上级的积极扶持和本身的艰苦努力，已经出现了一个效果明显的好势头。这是一个方面。

还要进一步放宽政策和落实政策

另一方面，平江要真正实现扶贫规划，改变贫困面貌，没有几年扎扎实实的艰苦努力是不行的，同时没有上级的进一步扶持也是不行的。正如前述喻杰同志的看法，关键就是要进一步放宽政策，进一步落实既定政策。

一、关于对贫困地区的政策问题。平江既是老苏区，又是贫困地区。平江及与之相邻的江西修水、铜鼓以及湖北通城等县，当时称湘鄂赣边根据地，现在都比较贫困。建议中央对这个地区采取一些跟对大别山、沂蒙山根据地相同的政策，在资金、建设等方面给予必要的扶持。据了解，中央对大别山区根据地的几个贫困县，每年每县投资五百万元，还发动中央十多个部委到那里定点扶持，效果十分明显。

同时，平江县的同志认为，对贫困地区的政策须要进一步落实。1986 年国务院已将平江列为全国重点扶持县之一，1987 年《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第四次全体会议纪要》中又

进一步明确平江为全国贫困县之一，但国家对贫困地区实行的优惠政策，有些在平江尚未落实。首先是农业税减免政策没落实。中央规定："对贫困地区从1985年起，分别情况，减免农业税，最困难的免征农业税五年，困难较轻的酌量减征一至三年"。"在划定的贫困地区，由于调整政策，实行减税免税、发展教育事业而增加的财政支出，首先由地方财政解决，地方财政确有困难的，由中央财政酌予补贴。"但平江却没有享受每年约六百三十万元的农业税减免的优惠。其次是粮食购销优惠政策。湖南省曾规定，从1987年起不向贫困县分配粮食合同定购任务。但平江每年仍有四千二百五十万公斤的定购任务。加上认购国券、集资办学搞建设等，有的农民一年到头，交了各种税费，自己所剩无几。这次在长沙我与毛致用同志交谈，他说平江县有十六个贫困乡。实际上，这可能是过去县里向上级反映情况不全面，导致省里对平江的贫困面了解不足。当然，湖南的财政不宽裕，全省二十多个重点扶持县，负担较重，承受能力有限。但是平江的情况如前所述，不论从历史或现状，确实特殊一些。建议省里予以适当考虑。

二、关于优抚政策问题。平江县共五十八个乡镇，经省政府认定均属老苏区。现已查明并认定在册的烈士有一万八千八十九人，占全省烈士总数的五分之一。全县民政优抚对象现只有九千三百人享受了"双定"补助。由于经费严重不足，还有五千多人符合享受"双定"补助条件的没有享受，已经享受的也不够民政部门规定的标准，人均每年只有一百七十七元。全县有七百多名优抚对象应住进光荣院，由于财力所限，现住进光荣院的只有二百三十二人，且月生活费只有十八元。全县有复退军人十三万八千多人，其中有六百多人少房或无房，有一千多名应享

受“双定”补助的没有享受。他们对此有意见。1985 年以来，以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的退伍军人为主，多次到县集体上访，今年 3 月，四十多名退伍军人到长沙集体上访。对于这些问题，建议有关部门按照政策予以解决。

三、关于对山区的有关政策问题。我国人多地广，各地情况差异大，分类指导十分重要。据平江县反映，有些现行政策对山区不太适合。一是粮食定购“三挂钩”政策，对平江这样的山区来说，由于田土少、产粮少，粮食合同定购任务也少。但实行“三挂钩”以后，国家平价供应的化肥、柴油比以前更少了。今年全县“三挂钩”平价化肥亩均只有六点三斤，不足部分都要农民去买高价肥料，而且还买不到。有些山区由于没有粮食定购任务，也就没有平价化肥、柴油供应。但在这些地方，农民毕竟要种田。二是小水电贷款政策。平江县是全国小水电重点县之一，1963 年以来全县共建小水电站一百十三处，装机二点九万千瓦。国家对发展小水电实行“拨改贷”以后，平江小水电建设共借贷款一千六百多万元。省政府曾明文规定，对小水电建设贷款，按月息三点六厘偿还。但平江所借小水电贷款，利率高达千分之九点三六，每年要付出利息九十七万多元，现基本无力偿还贷款，县里也因包袱沉重不愿再搞小水电了。三是农村教育、卫生事业问题。农村教育实行分级办学，农村卫生院下放到乡镇管理，这在经济发达地区，无疑有利于教育卫生事业的迅速发展。但在贫困地区，不仅增加了农民负担，而且因农民无力集资而影响教育、卫生事业的发展。在平江，少数山区校舍危房无力改造，基本的课桌教具无钱添置。因学杂费大幅度增加，许多贫困户的学龄儿童只好停学。全县有八个山区卫生院，自下放到乡一级后，因人不敷出，只好借贷款发工资，卫生事业开始萎缩。

总之，国家对于山区特别是贫困山区，应考虑其特殊性，采取特殊政策，只有这样，才能有利于这些地区的发展。

以上情况和意见，基本根据县委同志提供的材料，我不可能一一查对，我看到的是一些印象，但相信喻杰同志的看法，特作这样一个汇报。

1988 年 5 月 1 日于长沙

《怀念廿篇》序言

收集在本书中的二十篇文章，前十篇曾以《怀念十篇》为名，于一九八三年出版。那本书的《序言》开头说道：

四十年代到五十年代初，由于工作的关系，经常要熬夜握笔。登在报刊上的那些行云流水的东西，大都早已记不起来了，但怀旧的文章，却始终不能忘却。收集在这本小书中的十篇文章，最早的一篇《悼念涂正坤》，写于一九三九年八月，最后一篇《忆谢文耀》，写于一九八二年八月。前后四十三年！这四十三年的中国，真是充满了硝烟和血腥，战斗和创伤，苦难和欢乐。应当说，这十篇文章，都从一些侧面反映了这个时代的面貌吧。

做新闻工作的同志，大概都有这样的经验：有许多文字并不全是出自肺腑，而主要是出自义务即逼出来的。可是，这十篇东西都是我的理智、尤其是我的感情迫使我非写不可的。其中记录了我钦敬的、亲近的同志的血迹，也记录了我的心的痛楚，更多地记录了我的铭刻于心的怀念。可以说，没有一篇是奉命而作，而是自己以为非写不可才命笔的。

近三年来，尤其是一九八五年退居二线有了握笔时间后，或由于约稿，或由于“非写不可”，又陆续写出性质相似的文章十篇。因《怀念十篇》已经脱售，三联书店愿意将两个十篇合成一集。想不起更恰当的书名，只有名符其实，曰《怀念廿篇》。有两三篇文章是纪念性质，但异曲同声，也都编入了。

这后十篇多数比较冗长，有几篇只是材料汇集而已。不过为求实存真，如见其人，也别无他法。相信读者不会因此见怪：如此堆砌成文。

《怀念十篇》出版之后，颇有反响，得到鼓励。尤其戴文葆同志为文褒奖；聂绀弩同志赋诗推荐，使我感激，也使我不安。只是绀弩同志已经作古，不及见此书新版了。

《怀念十篇》序言中，曾将每篇写作的背景略加说明，后十篇也援前例，现一并作为《后记》，附于书末。全书二十篇文章，按写作时序排列。

作　者

一九八六年五月八日

《怀念廿篇》后记

一九三九年夏，在重庆南方局开青年工作会议，住在红岩嘴“八路军办事处”。南方局要开一个小型的平江惨案烈士追悼会，并出纪念册。涂正坤的音容笑貌还历历如在目前。纪念刊小册子印出之后，办事处的同志说，唯有我那篇东西有感情。

一九四二年春，何斌遇害的噩耗传来，在延安引起很大震动。那时我在解放日报社工作。一个晚上写出此文，大概第三天副刊部就发排了，登在四版头条，记得标题的字体很大，大约是二号字吧。当时报纸上很少直接批评国民党，文中对陈诚之流的斥责，引起了大家的快意和称许。追悼会是一个多月后才举行的，由凯丰同志主持。他的讲话慷慨激昂，至今还记得有这样一句：“蒋介石的手就是屠杀青年的手”。在当年统战环境中，这种稀有的追悼会是一种最好的阶级教育。（一九八五年四月，收到湖北寄来的《何功伟烈士诗文笺注》，嘱我作序。这篇序言即附于此文之后。）

一九四九年八月四日，长沙宣告和平解放。是夜入城时，省委负责同志向欢迎人群发表了简短讲话。当时长沙报纸甚多，我负责审阅新闻记者发布的稿件，对程潜、陈明仁两位将军起义的欢迎措词，我同主持统战工作的同志小有争论。八月十五日

《新湖南报》发刊社论《庆祝新湖南的诞生》，七月间在武汉停留时，我就写了初稿，其中谈到两位将军起义的重大意义和受到湖南人民的热烈欢迎。南下的北方同志不了解湖南的历史。郭亮在大革命时是湖南妇孺皆知的英雄人物，于是我有意写了这篇文章，让广大读者不要忘记历史——革命胜利来之不易；同时也是写给北方同志看的。但是，程潜将军曾是当事人。孙中山在广东召集非常国会时，先父是参加非常国会的湘籍议员，同程是熟人（程当年也在广州，他们都是孙中山一派的）。于是，此文发表后，黄克诚同志宴请程潜将军，我也叨陪末座，我也曾作过程家的客人，还参加了他七十岁的寿宴。这就避免了误会——表明这篇文章决不是写给他看的。

《怀念田家英》是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写的。在这之前，我去看望了家英的夫人董边同志，她详谈了家英辞世前几天的情况，又目睹了许多遗物。悲从中来，虽然当时家英的结论还没有作出，我说，我先写一篇悼文吧。我同家英的交情是很深的，尤其是某些个人的爱好相同，性格也有相似之处。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五九年九月，“大跃进”时期，我们经常在一起，思想观点一致，几乎无话不谈，文中的怀念当然写不完的。这时许多历史问题还没有作结论，许多事情和观点很不易着笔。这篇文章写出后，给一些老朋友看，都担心难以发表，当然也有不赞成的。一位老朋友的女儿甚至说：“李叔叔，你还挨整得不够！”无奈，我只好将文章直寄胡耀邦同志，第二天他就寄还，并在我的信上批曰：“此文亦鲁迅笔法，无所谓不可发表。”于是才将文章和耀邦同志的批件一起寄出。然而还是没有能在《人民日报》刊出，只刊在《战地》增刊上。

接着就写了纪念总理的文章，一直放在抽屉内。一九八二

年《人物》约稿，就寄去了，刊载在九月出版的《人物》第五期上。有熟人读了后，给我来信说，此文如早在报上发表，影响不是更大一些吗。后来《中华英烈》一九八六年第一期重刊此文时，又作了重要的补充。

一九八〇年初冬住在医院时，才得以动手写出《想念你呵，文立徽》。原来计划的篇幅较长，由于《中国青年报》版面限制，只有大加压缩。所有关于立徽的材料，只好暂时存压下来。

怀念周小舟的文章寄出前经过胡乔木同志过目。一九七九年到广州，见到小舟夫人王宁同志，探问小舟逝世前的情况。她说，批斗后几天，他烧掉了马、列、毛选之外的全部藏书。一个知识分子，烧书时的心情，可想而知，是同战士毁掉武器时一样的。那时，湖南一些人对小舟的评价还不公正，长时间揪住他当年的“右倾”不放，王宁同志对此很不满意。我认为我应该为小舟写篇悼文。

《彭德怀自述》还未正式出版前，我就收到征求意见本。读完后的心情，当然同许多读者一样。《读书》杂志约我写一篇读后。写好之后，我曾读给萧克同志听过，承他指点过若干有关史实，他特别详谈了尚未作出历史结论的反 AB 团公案。黄克诚同志当时身体不好，住医院，就没有为此去打搅他。

澜波同志逝世后，余秋里同志特地嘱我写篇纪念文章，我自己也正有此打算，这也是澜波的夫人和儿辈的心愿。“十二大”前，工作非常紧张，文章是断断续续写成的。

一九四八年在哈尔滨得到文耀牺牲的噩耗时，就动笔写怀念文章，也许是因为当时刚调换工作，心绪不甚安定，此文只开了个头，一直没有能够续成，一拖就是几十年。后来因约，才逼出这样一篇东西。

以上十篇收在《怀念十篇》中，以下十篇则为近年所作。

《学生时代的毛泽东》是《时代的报告》（现改名《报告文学》）为纪念毛泽东九十诞辰的约稿，当时工作甚忙，拖了很久才写成。因为我必须重新“进入角色”，重翻旧的资料和消化新的有关论著。毛泽东的早期思想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大课题，现在已有不少同志写了专著。我对此不过接触较早，研究却是很不够的。可能是文中引用了一些新的资料，作了一些探索性的新的论断，发表后曾引起人们注意，特别是其中这一段话，使人发生兴趣：“青少年时代的思想初恋，似乎在晚年又燃起了某种‘怀旧’之情，这就不能不使人们发生‘沉重的负担’这类感叹。”一九八〇年讨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我在小组会的发言中，曾谈到毛泽东晚年的“左”的思想，可以从早期追溯。英文版《北京周报》于一九八四年四、五月间全文转载后，在国外也引起反响，曾收到国外读者的来信。我接触过的三个外国研究中国革命的学者施拉姆、麦克法夸尔和索尔兹伯里，也都谈到这篇文章。国外研究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专家甚多，专著数以百计。这种情况对我们实为一种鞭策。

《一个献身教育事业的人》（记傅任敢教授）一文，是在傅先生的追悼会上看到他的老友和学生们的挽辞后，有感而作的。这样一位正直的、勤奋一生的教育家，虽无赫赫之功与籍籍之名，其生平事迹，正好说明这样一个道理：为什么老一代爱国的、有民主思想的知识分子，必然会跟着共产党走，即令长期身处逆境，也不改变初衷。傅先生的女儿交给我许多第一手材料，反复考虑后，为存其真，行文时没有由我转述，而是将傅先生的友人、同事与弟子们的观感，以及他本人的自述，稍加整理，直接记录下来。文中附带说明，从这样一位老教育家身上，也可看出当年

的“反右派”运动，有过怎样的不公正，又何等违背历史的正常发展。

一九八四年九月，收到筹建湘潭齐白石纪念馆的征募诗文专函后，使我想起为这位受世人尊敬的老人写一篇文章，借以叙说自己自幼酷爱美术，以及所藏珍品毁于浩劫的痛惜心情。五十年代跑琉璃厂时，田家英跟我说过齐白石的一些轶事，他去过老人的家。一次，老人怀着一袋子金器，满城驱车，要献与毛主席。当年忙忙碌碌，竟没有去拜望过老人，实在是憾事。

范寿康先生的猝然去世，太使人意外。先生回国之后，不仅心情格外愉快，身体也日见强实，平时红光满面，可以不坐轮椅而持杖行走了。大家都以为他将成为望百寿星，也都希望他能写出新的著作，为祖国统一大业继续作出贡献。从岱年同志处得知，先生于一九二〇年就在《东方杂志》介绍马克思唯物论，更使我对先生增加钦敬之心，觉得于公于私，都应当写一篇纪念文章。值得欣慰的是，先生的重要著作即将出版，这就可以弥补国内对先生的长期隔膜了。

一九八四年四月卅日，接到吴觉去世的电话后，听见金明同志说，吴觉去世前，为自己一生坎坷，尤其是入党时间一直未能落实，很是感慨。讣告上说，遵照遗愿，丧事从简，不举行追悼会和遗体告别仪式。随后就收到他儿子深情的信和吴觉的生平资料。我才详细了解吴觉一生的动人事迹和不幸遭遇，同时感到五十年代中期在他身上出现的党内不正常生活，可以作为现代史鉴。这些，我都如实写在文章中了。不久前，收到南京工学院纪念吴觉的专刊《怀念与学习》（我的文章收集在内），见到名誉院长、江苏省政协主席钱钟韩的文章，其中写到：“吴觉同志到南工不久，就主动辞去了自己所兼任的院长职务，并在民主推荐的

基础上积极组建了院行政领导班子。他经常支持和鼓励我们独立工作，挑起领导担子。他一直以身作则，坚持党政分工的原则。当有些人为了行政上的事直接去找他时，他从不轻易表态，从而肯定了行政人员的职责和权威。”我的文章只写了他真诚坦率的性格，同知识分子相处得好，重视知识和人才。这样善于处理党政分工，正是我们长期以来没有解决、也是当前深入全面改革的重大问题。这就不能不令人更加怀念吴觉了。

写完《想念你呵，文立徵》之后，有关立徵的一堆材料和他的表弟陈铁如整理成篇的《寻兄经过》，一直在我手头，这是一桩未了之事。这些材料和我写好的前一部分，曾经在一个刊物压了很长时间，大概是由于没有什么“文艺性”，终难采用。去年五月，我要了回来，下了个狠心，关门几天，整理成《文立徵烈士二题》这样一篇不伦不类的东西。应当感谢《中国》主编丁玲同志的慷慨，能够全文在该刊一次发表。该刊编辑曾拟改成《铁道游击队政委蒙冤记》这样一个题目，其实立徵兼任铁道游击队政委不到一年时间。“一二·九”一代的大学生，像立徵这样，在抗战期间，始终在敌后第一线打游击，是不很多的。尽管我尽了自己的努力，使这位既是书生更是战士的形象如实留在人间，但我总觉得我写的这两篇东西实在太单薄了，好在有一部《铁道游击队》的小说和电影为人们关注。我希望当年同文立徵一起生活和战斗的战友，能继续写出文章、材料或提供有关背景资料，使至今为鲁南人民怀念的战士，将来能有一部内容较充实的传记。陈铁如后来又寄我一篇《寻兄记补遗》，特附录于文后。

《重读张闻天同志的庐山发言》打印出来后，即分送一些同志审阅。刘英同志和《张闻天选集》编辑小组的同志都表示满意。关于同庐山会议有关人的怀念文章，最早一篇是田家英，其

后是周小舟和彭德怀。涉及到当年山上之事，我是很谨慎的，下笔是有分寸的，可说字斟句酌。这三篇文章发表经过，前面都已说及。可是，这篇文章审阅过程中却发生了一点意外的不愉快，好在历史已走到一九八五年，当代中国已进入全面改革了。感谢《读书》的编辑同志，使这篇文章在出书之前就能与世人相见。

我还不到五岁，父亲就去世了。年青的母亲带着三个孩子艰难地生活着。大概由于同父亲志同道合的亲密友谊，母亲常跟我们念叨六如、竹雅（方维夏）两个名字，表示她对他们的尊敬。我的老家平江长寿街曾是湘鄂赣老苏区的中心地区。一九三一年红军攻占长寿街的这一次，曾采取将地主家属迁移出境的政策。老家中有十多口老弱妇孺，或在迁移途中，或辗转逃到长沙我们家中，在一个短时间内，先后去世。这对我母亲在经济上也是一个不堪承受的负担。然而，我们从来没有听到母亲对共产党有过什么怨言，相反，我们从她的念叨中得知，六如伯的两个弟弟和儿子是国民党杀害的；她只要回老家，路过献钟，总要去看望“桓嫂”（六如伯的元配夫人），尽可能给予一些接济。一九七九年回到北京后，就想着要为六如伯写一篇纪念文章。直到去年夏天，才挤出时间，了却这一心愿。

《请读〈胡杨泪〉》和《胡杨泪》在《人民日报》发表后，引起很大的社会反响，钱宗仁本人收到成百上千封信，我也收到许多信。钱宗仁到《人民日报》工作后，关心他的人对他都寄予一种特殊的期望，希望他在新的工作岗位上有新的贡献。这一点，我是决不怀疑的。虽然他还不是共产党员（他已写了申请），但早已具备一个共产党员最重要的品质：无私无畏，实事求是，目标坚定，忘我劳动；何况他还有广博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有文采才华，更有二十多年的艰苦磨练，意志如钢。我暗暗为他

欣幸:终逢盛世,前程似锦。谁料到突闻噩耗。我永远不会忘记,在医院中见到的他那凄哀而无限期望的眼神。纪念集《胡杨泪尽》出版之后,相信钱宗仁的精神会留在人间。

一本书,一篇文章,一首诗歌,对青少年的心灵往往发生很大的影响,丁玲的《田家冲》于我就是如此。读这篇小说时,我只有十四岁,却终生难忘。丁玲比我大十多岁,是革命的长辈,多年的曲折道路和坎坷生活,使我们终于成为忘年之交。就像题目一样,《怀丁玲》只是表达了自己从少年时起就培育起来的这种感情。多年来很少读文艺作品,也缺乏这方面的知识,对她的作品难置一词。我们的交谈,文艺也不是主要的方面。我在她的家中,遇见过北大荒的农民朋友,他们之间感情自然,纯朴相通。丁玲是在城市长大的,长期在上海生活过,却能真正深入群众,同群众打成一片,她不止是去"体会生活",而是同群众生活融为一体。以"异己"身份在北大荒十二年,能够在那里扎根,这是很不容易的。我在北大荒呆过一年半,这一点我很清楚。"文如其人",作家的思想、品德,总是贯穿在自己的作品中的。研究丁玲的人,当会注意到这一点。她的重要遗作(如写南京幽禁生活的《魍魉世界》)正在由陈明同志整理,希望能尽快与读者见面。

《怀念十篇》序言中最后写道:"平生似与文字结了缘。一九五二年毅然转业到工业系统工作,仍不能解缘。现在晚年再次改行,这个缘分能否了结呢?我自己也不知道。"这是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十四日写的。八二年开始,在中央组织部工作的三年,缘分并未能解除。现在退居二线,仍闲不下来,自己也确有想写的东西,与文字工作大概要结终生之缘了。

一九八六年五月九日